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下：
新民主主义革命
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

概括：

一、简介

二、矛盾律：唯物辩证法独特的基本规律

- 1-马列毛发展过程矛盾律的建立
- 2-阿瓦基安和普拉昌达：修正主义、投降和哲学证伪
- 3- MCI 的团结不会在以下原则下取得进展 合二为一_

III-帝国主义与民主革命

- 一、错误的“帝国主义进步倾向”
 - 2-帝国主义阻碍被压迫国家的民族发展
 - 3-托洛茨基主义对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分析
-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民族问题
- 5、资本主义向农村的渗透与半殖民地国家的农民问题

利润最大化法则与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

- 1-利润最大化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性
- 2-帝国主义时期半殖民地国家的土地收入
- 3-资本主义进程垄断阶段的主要矛盾

V- 团结在毛主义之下！

- 1-设想毛主义就是在无情打击所有修正主义：旧的、现代的赫鲁晓夫主义者-邓主义者-霍查主义者和 21 世纪的修正主义模式
- 2-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与民主革命
- 3-贡萨罗主席概括和发展了毛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理论
- 4-确定了两个阵营，分界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对绝大多数国家和绝大多数地球人口的有效性

巴西共产党 – PCB
中央委员会

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下：
新民主主义革命
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

一、简介

12月26日，是国际无产阶级伟大巨人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主席直接并亲自领导了20世纪的两次伟大事件：中国伟大革命（1949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在这些过程中，毛主义得到了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第三个和更高的阶段。他把国际无产阶级的思想推向了最高峰，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事业，彻底解决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定性问题。中国伟大的革命，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不间断地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GRCP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继续走向金色共产主义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毛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整体三个组成部分的质的飞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毛主席除了完成了列宁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之外，还实现了辉煌的飞跃，确立了矛盾律作为唯物辩证法唯一基本规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主要矛盾，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规律的确立方面取得了至关重要的进展。此外，它还建立了官僚资本主义理论，这是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通过资本输出而产生的一种资本主义。在此过程中，它发展了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因为它表明了帝国主义与这些受其压迫的国家的大庄园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在科学社会主义中，毛主席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形式及其不间断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通过连续不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避免复辟的危险。此外，它还建立了无产阶级最发达形式的军事理论：长期人民战争。今天，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意味着成为一名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因此，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呼吁全球庆祝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具有重要意义。

同年12月26日是LCI公开宣布成立一周年，LCI是由成功的统一毛主义国际会议（CIMU）创建的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CIMU是十多年来集中工作、会议、区域会议和国际行动运动的成果。经过这场坚决而崇高的斗争，来自14个国家的15个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政党和组织诞生了LCI，并向国际无产阶级传达了他们的决定：

“参加统一毛主义国际会议（CIMU）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政党和组织，遵循伟大列宁创立的第三国际的道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MCI）的最佳传统，庄严声明向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致敬，他们做出了历史性的、超凡的决定，赋予了新的毛主义国际组织以生命，该组织是在三面伟大而光荣的红旗成立的：毛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聚集在这里的共产党和组织再次郑重承诺，通过展开、捍卫和运用国际无产阶级全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来履行毛主义统一国际会议的协议。列宁主义-毛主义。

坚定地致力于艰苦而不懈的斗争，将毛主义作为世界革命的唯一指挥和指南，作为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世界人民胜利保证的唯一不褪色的红旗他们坚定不移地迈向金色的、永远辉煌的共产主义。”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政治宣言和原则) 1

CIMU 的召开将整个以分散和试图重组力量为特征的阶段推向高潮，同时开启了自中央委员会公布讨论基础后贯穿 2022 年的激烈两条路线斗争的新阶段。统一毛主义国际会议协调委员会。《国际共产主义》杂志刊登了讨论基地的所有批判和党派立场，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久违的两条路线斗争。CIMU 对于在场的组织和无法参加这一盛会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高潮的舞台。12 月 26 日发表的辉煌的《政治宣言和原则》是其最高思想成果。的行动 2023 年 1 月，在数十个国家举行的庆祝活动中，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取得了第一个实际成果，随后是大规模的五一节庆祝活动，以及反对修建跨洋走廊的国际运动。特万特佩克地峡（墨西哥）、对易卜拉欣·凯帕卡亚（TKP/ML）阵亡 50 周年的有力致敬、纪念菲律宾同志贝尼托和威尔玛（PCF）的荣誉和荣耀运动、国际主义行动法国示威释放政治犯，呼吁民主、反帝和革命力量，有力地表明了对英勇的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的支持，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及其 76 年来的犯罪行径的谴责和拒绝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

整整 40 年前，贡萨罗主席和菲律宾共产党发起了具有挑战性的毛主义运动。CIMU 的创建和 LCI 的成立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代表着共产主义者在全世界统一、克服分散、反对修正主义和走向未来重建光荣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共产国际。因此，它是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世界反动派的沉重打击，迟早会被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从地球上抹去！世界革命由两大潮流组成：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各国都有）和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有）。第一个潮流是地球上所有国家现有的或将要组建和重组的共产党和 MCI；第二股潮流代表了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革命斗争，必须由各自的共产党领导。LCI 的成立对于 RPM 这两大潮流的革命性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勇的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的辉煌革命反攻，对实行种族灭绝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以色列造成了沉重打击。巴勒斯坦游击队在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的指挥下，对以色列占领的领土进行的大胆进攻，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毕竟，它是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及其主人、世界人民最大敌人美帝国主义的占领和扩张主义的沉重打击。世界各地的群众庆祝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的这一伟大胜利，这更有力地成为世界辩论的中心，世界各地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还活着，在与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的坚定而血腥的斗争中燃烧着希望。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些群众要求一致的思想、政治和军事方向，因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责任加快其斗争步伐，以实现革命阶级斗争的高级形式，即人民战争。

英勇的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塔利班将美国军队驱逐出其领土的伟大胜利，以及乌克兰人民的坚持不懈的抵抗，他们同时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占领和泽连斯基的领导。美帝国主义和欧盟代表了当前的确认：在帝国主义中，资本主义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反对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接受帝国主义统治。这面由毛主席在 20 世纪 60 年代展开的强大旗帜，在 LCI 的《政治和原则宣言》中以精确而有力的方式再次升起：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其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当从非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世界上存在着三个基本矛盾：

第一个矛盾：一方面是被压迫民族与超级大国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这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同时也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

第二个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第三个矛盾：帝国主义内部矛盾。”（PCCh）²

二十一世纪孜孜不倦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全面复兴，集中体现在巴勒斯坦群众的英勇斗争中，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迫切需要毛主义领导的明确体现。因为只有毛主义才能为这场斗争指明方向，引导这场斗争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这是因为，毛主义通过把矛盾律确立为唯物辩证法的唯一基本规律，成功地证明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维持民族压迫，再现半封建制度，从而开创了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民主革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形式。只要共产党人支持、直接参与和指导这些斗争，毛主义就会被这些群众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秘鲁、土耳其、印度和菲律宾正在进行的人民战争以及即将开始的人民战争，构成了这些斗争势头和正确方向的巨大堡垒。

巴勒斯坦、阿富汗和乌克兰的抵抗运动，尽管具有民族半封建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方向，却自发地通过长期人民战争理论来接近毛主义的假设，并以自己的方式运用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产生钝击到帝国主义。然而，这还不够，这些进程必须将毛主义视为意识形态政治路线和方向，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提高反帝国主义的抵抗力，进行不间断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这是击败帝国主义并将其从地球上消灭的唯一可能的方法。然而，这一壮举只有通过加强 MCI、每个国家成立和重组共产党以发起和发展人民战争才能实现。关于民族抵抗，共产党人迫切需要支持他们，直接参与他们，从而为他们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

LCI 的成立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因为它极大地克服了分散的危险，将来自 14 个国家的 15 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政党和组织统一在同一个国际组织中。其中秘鲁共产党和土耳其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土耳其共产党/马列领导了世界上两场非常重要的人民战争。与此同时，LCI 的成立，开启了 MCI 两条路线斗争的新阶段。一方面，菲律宾共产党（PCF）和印度共产党（毛主义）-PCI（M）等重要政党正在领导非常重要的人民战争，但无法参加 CIMU 和其筹备辩论今年以不同的方式定位了 LCI 的成立及其政治宣言和原则。另一方面，受邀参加会议的组织参与了去年公开的两条路线斗争，并故意决定不参加 CIMU 并捍卫自己的立场。在最后一组中，有两个组织脱颖而出，它们在不久前与阿瓦基安主义和普拉昌德主义非常接近，分别是哥伦比亚的 UOC（马列毛）和 PCm（意大利），它们继续对 CIMU 和当时成立的 LCI 表达相同的批评立场。

政治宣言和原则的两条路线斗争一直持续到 2023 年，这是围绕呼吁 CIMU 的讨论基础的两条路线斗争在新水平上的延续。这些立场存在一些差异和细微差别，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勾勒出一条分界线：那些捍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效性以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与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之间主要矛盾的人。

帝国主义;还有一些人否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把主要矛盾降为次要条件。

一方面，参加 LCI 的政党和组织，加上法共和意共（马）公开走无产阶级的红线，这完全符合帝国主义阶段和当今时代。另一方面，UOC（马列主义）和 PCm（意大利）则认为帝国主义扫除了半殖民地国家的半封建关系，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日益过时。第一个代表了对毛主义的捍卫，以及半殖民地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普遍性。后者仍然是 21 世纪修正主义模式的捍卫者，特别是阿瓦基主义和普拉昌达主义。UOC（马列毛）以更明确的方式，PCm（意大利）以更狡猾和隐蔽的方式。

在历史性地宣布 LCI 成立一天后，哥伦比亚共产主义工人联盟 (MLM) 发表了一份声明，向其根据地证明其不参加 CIMU 的合理性。不久之后，他发表了一份长文，批评 LCI 的 15 个创始组织和政党，特别是我们的巴西共产党（PCB），涉嫌“宗派主义和左派主义”。在本文件中，UOC（马列毛）专门攻击我们，因为我们涉嫌他们在 2016 年访问巴西时受到“怪诞和羞辱”的对待。最终，我们将驳斥这个愤怒和卑鄙的谎言，因为我们认为 MCI 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意识形态、哲学、UOC 对 CIMU 以及 LCI 创始政党和组织的批评（马列毛）的政治和经济内容。正如贡萨罗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斗争提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消除右翼和“左翼”机会主义立场和教条主义，粉碎修正主义。UOC（马列毛主义）文件特别攻击了 LCI 和 PCB，因为它详细地捍卫了自己的立场，暴露了它对马列毛主义的理解，让我们看到它与修正主义的融合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否认。毛主义。因为，尽管他将自己定义为“马列毛主义者”，但他公开否认矛盾律是辩证法唯一基本规律，他否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效性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说，肯定帝国主义中存在所谓的进步趋势，却否认了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农民斗争对于革命的决定性重要性。哥伦比亚是世界上土地最集中的国家，也是拉丁美洲最伟大的武装农民斗争传统之一，UOC（马列主义）的领导层表示，在他们的国家实际上已经没有农民了，而且哥伦比亚革命将立即成为社会主义革命。

在它成立一个世纪之后，在为将自己建立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奋斗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过去近三十年的为将其重建为军事化的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的斗争中，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斗争，主要是毛主义，贡萨罗主席的贡献有效，PCB 在学习自己的历史和国际经验、纠正错误的长期过程中，但始终依靠所有国际经验的积极方面，认为有必要和紧迫性来解决这一问题更全面、更严格地揭示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偏差和错误，这些问题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平衡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当今时代的这些偏差和错误。在这份文件中，为了促进在这些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我们以论战的形式这样做，就 UOC（马列毛）领导层对 LCI 和 PCB 的批评和攻击而言，我们称之为阿瓦基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以更集中、更明确的方式呈现。在全文中，在我们的分析和论证中，我们引用了大量、长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许多是为许多人所熟知的，但我们反复引用它们，因为我们认为它们在当前的斗争中极其重要。MCI 正在进行的两条路线，以所有科学严谨性建立其概念基础，同时也关注所有可能的读者和对这场斗争感兴趣的人，关心吸引新一代日益增长的革命激进主义，其中许多人肯定仍然缺乏对革命理论的更多掌握。

二、矛盾律：唯物辩证法独特的基本规律

马列毛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意识形态，是列宁所定义的“因为精确而万能”的学说³。它是意识形态，因为它是某个阶级的思想社会性的，它是科学的，因为它支持并寻求真理作为改造世界的武器：

“简而言之，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是有历史条件的，但**每一种科学意识形态**（与宗教意识形态等不同）**都无条件地对应于客观真理、绝对本质。**”（列宁）⁴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想与存在的关系，其中存在是首要的。恩格斯在他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以清晰的方式确立了这个问题，他定义辩证唯物主义捍卫了与思想相关的存在的首要特征，并且思想能够认识，反映了客观规律。物质并转化它。辩证法研究运动的一般规律以及过程、事物和现象之间的联系。唯物辩证法研究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及其各种表现形式：自然、社会和思想。

辩证唯物主义最普遍的表述是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以及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运用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哲学作为革命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意识形态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得到了更精确的阐述。作为这一过程的产物，在第三阶段，毛主义实现了唯物辩证法最先进的革命内容的卓越综合。其著作《实践论》、《矛盾论》（1937年）、《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正确思想从何而来？》（1963），以及1964年5月至1965年5月之间发生的中共内部围绕宇宙万物一分为二的哲学原理的伟大哲学论战，毛主席，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两条路线的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在其阐述上、在应用上，还是在将这一革命哲学传播到广大群众的能力上，都实现了巨大飞跃。

毛主义在唯物辩证法上的飞跃可以概括为：物质即宇宙（自然、社会、思想）的一切过程都是作为两个矛盾方面的统一体发展起来的，对立面之间的斗争贯穿始终。从开始到结束的所有过程，或者它们的解决方案。对立的方面是相互依存、对立的，同时，在事物或现象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依存或对立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矛盾发展过程中，由量变阶段进入质变阶段，质变阶段的转变是明显的、明显的。质变对应的是现象质的飞跃，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被打破，最终对立面转化为对立面，形成新的对立统一体，从而无限发展。从对古代对立统一的肯定，我们走向了对这种统一的否定，走向了现象性质的转变，或者走向了新过程的出现。

正如我们将在下面更详细地看到的，这是毛主义在毛主义发起前夕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表述。它既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的飞跃，也代表了它的连续性。因为，马克思和列宁虽然没有机会和时间这样把矛盾律确立为唯物辩证法唯一的基本规律，但他们却把这一内容运用到了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中。获取资本、工作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的《大观》应用了同样的基本规律，其最精确和最通俗的表述与毛主义一起取得了卓越的发展。同样，我们在列宁主义的武器库中会发现无数精确应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单一基本法则的例子。

毛主席对矛盾律的确立是一个飞跃，它用更加尖锐、更加精确的哲学武装了无产阶级。然而，哲学并不是一门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它的发展是人类知识系统化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正如各门科学的进步有赖于哲学的进步一样，哲学的进步也有赖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进步；而这一切都取决于

社会实践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

哲学是理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马克思如果不从最先进的哲学、最革命的世界观出发，就不能真正确立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发展、危机以及共产主义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规律。在人类历史上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因此，毛主席提出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优越形式，并不是为了反对马克思和列宁，而是为了完成以前无法解决的理论任务。真理不会立即出现，任何科学分支都没有直接的知识，无产阶级的科学意识形态也是如此。列宁强调：

“如果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大写字母），他就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这一点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得到深刻的运用。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知识论（不需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被应用到一门科学中，它吸收了黑格尔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将这种价值提升了。（列宁）⁵

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飞跃，正是对这种“资本逻辑”的阐述、阐述和系统化。这样做，它创造了一个飞跃，因为它用更高的理论精确性武装了无产阶级，这是解决特定革命进程和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新情况中出现的新问题的关键问题。哲学的发展对于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尤为重要，因为作为一种世界观，掌握并坚定辩证唯物主义对于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逆流而上、顺势而行至关重要。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以深刻、朴素、战斗的方式传递给国际无产阶级。这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武装阶级，反对修正主义的偏差。始终如一地体现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原理，对于成功地面对世界阶级斗争的动荡和革命与反革命的进程，把革命斗争发展到更高的高度，坚持到底，直至取得彻底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修正主义本身并不是源于哲学“错误”；而是源于哲学“错误”。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必然现象，是革命组织中阶级斗争在先锋队意识中的必然反映。修正主义随着帝国主义的出现而增强了其经济和社会基础，而且，它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斗争加剧的产物，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或通过修改其真理投降的斗争的产物。在决定性冲突前夕或重要的暂时失败之后，最激烈的时刻以两种方式反映在个人的意识中：克服困难和面对困难一瘸一拐。跛行是修正主义的倾向，它首先表现为行为，然后表现为思想、观念，最后表现为修正主义路线。

因此，修正主义的首要表现之一就是世界观念的改变，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观念的放弃，以及对其他观念的假设，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小资产阶级的。为了构建修正主义路线，修正主义总是必须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创造与其阶级背叛相对应的“理论基础”。毕竟，严重依靠辩证唯物主义是不可能维持右翼和“左翼”机会主义路线的。然而，由于政治斗争的突发事件往往需要重要的战术调整，修正主义总是试图偷偷地躲在他们所谓的“当下的特殊性”背后。因此，从哲学角度揭露修正主义立场往往比从政治角度更容易。揭露修正主义立场或路线的理论斗争的重要性在于，它使无产阶级路线保持主动性，通过两条路线的斗争，预见和粉碎修正主义立场的表现，防止修正主义路线的发展。党内结构。

在 MCI 反对修正主义立场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哲学辩论的重要性在 MRI 的历史经验过程中已经变得很明显。1980 年，美国共产党和智利共产党召开秋季会议，其最重要的成果是恢复了毛主席克服中国反革命政变造成的 MCI 分裂的斗争。

(1976) 并召开了 1984 年会议，催生了 MRI。1980 年至 1984 年间，鲍勃·阿瓦基安 (Bob 阿瓦基安) 和美国 PCR-USA 的其他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波浪潮经验的哲学和历史文章。这些文件构成了阿瓦基安的哲学歪曲，其目的是将右翼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 MCI。他们的基本立场是在 1984 年会议上失败，会议的结果是 MRI 的成立，其原则宣言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其中包含重要的修正主义违禁品。随着秘鲁人民战争的全面进展，进入共产党的核磁共振检查和其领导的两条路线斗争，阿瓦基安主义修正主义立场处于守势，等待再次挺身而出的时机。这个机会发生在 1992 年 9 月贡萨罗主席被捕之后，主要是在“和平协议”骗局之后。阿瓦基安随后跳入讲座，先是秘密地然后公开地攻击 MRI 中的左派立场。

反动派对 PCP 的打击以及民众战争的恢复对 MCI 的影响，对阿瓦基安的机会主义路线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引发了需要调查贡萨罗主席是否是《反动派》的作者的争论。腐烂的“和平信件”。这一立场将秘鲁反动派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伎俩视为真理，导致 1994 年国际保卫贡萨罗主席生命运动解散。有了这个阿瓦基安打算打开 1998 年，随着 TKP/ML 被荒谬地从 MRI 中驱逐，它在 MRI 中取得了其路线的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1996 年 2 月，由当时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领导的光荣的人民战争在尼泊尔开始，他们最初采取了反对阿瓦基安主义的立场，但面对普遍的反革命，他们很快开始转向其投降主义立场。其攻势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来，它在世界各地自由统治，但集中攻击秘鲁的人民战争。经过五年人民战争的重大进展，普拉昌达在 2001 年第二次全国共产党（毛主义）会议上推出了《大跃进》文件，其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及其腐烂的“融合理论”的第一个哲学歪曲已经出现……重新表述了“调和矛盾”的旧理论，或者“合二为一”的修正主义概念。2006 年 11 月，当普拉昌修正主义领导层从人民战争投降并签署《全球和平协议》时，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上的彻底投降进程才刚刚完成，其后果是：2001 年的哲学歪曲已经埋下伏笔。

阿瓦基安和普拉昌达的例子说明了古老而腐烂的修正主义道路：投降——修正主义——哲学证伪，以从理论上支持路线的改变。伯恩斯坦试图用新康德哲学来证实他的修正主义，主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在德波林的哲学证伪中寻求，德波林主张矛盾只在过程中的某一时刻出现，即对立方面的调和，这是他试图阻止集体化进程的修正主义立场的理论基础。在农业方面。反过来，赫鲁晓夫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在苏联德波林学派的复兴中，以“生产力理论”为哲学基础，建立了他的修正主义立场。反过来，刘少奇试图在理论上将其资本主义复辟的腐朽路线建立在修正主义理论家杨献珍的哲学证伪之上，杨献珍认为矛盾律意味着对立方面的融合，即它们的和解修正主义原则“合二为一”，而不是毛主义原则“一分为二”。

修正主义总是试图将哲学辩论引向学术领域，其中的争议表现为对术语或非常抽象问题的争论。不同的修正主义思潮经常围绕抽象的哲学术语相互对立，但本质上它们都捍卫相同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哲学观念。革命无产阶级必须清理这些学院派争论的哲学争论领域，以便尽可能客观地触及问题的本质，从而揭示争论立场的内容。但是，我们不能低估哲学斗争对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充分正确发展的重要性，这一点在中共 1971 年发表的毛主席左派路线的重要文件《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三大斗争》中有明确的划分。中国哲学阵线指出：

“哲学战线上的三个重要斗争表明，两个对立派别在这个战线上的对抗**始终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它是为这些斗争服务的，**我们不应该考虑斗争。**”在哲学上只有“学术争论”。刘少奇、杨献珍等人疯狂攻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宣扬反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挑起一场又一场斗争，正是为了动摇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哲学基础，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创造“理论基础”。恢复资本主义。哲学战线上的三个重要斗争告诉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之间的斗争**。一个人的世界观决定走哪条线 保卫并跟随。”（中共中央直属高等党校革命群众批评写作小组）。

在许多术语和概念方面，普拉昌达和阿瓦基安的哲学证伪似乎是相互对立的。阿瓦基安在形式上捍卫毛主义的一分为二的原则，并批评普拉昌达的融合理论是合二而一的修正主义观念的表达。普拉昌达反驳阿瓦基安的说法，认为 MCI 过于重视一分为二的原则，而太少重视团结、斗争、转化的原则。阿瓦基安谴责马克思的使用《资本论》中的否定之否定是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第一阶段中存在的“准宗教和形而上学决定论的表达”。普拉昌达反过来将为否认的否认辩护，指出这项法律解释了尼泊尔共产党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发展。阿瓦基安会说，矛盾律是辩证法最基本的规律，否定之否定必须被彻底抛弃。普拉昌达反对这一点，并声称他通过增加数量和质量定律以及否定之否定定律来丰富了矛盾律。

从术语和概念的运用来看，普拉昌达和阿瓦基安似乎处于相反的立场。然而，从实践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它们本质上代表了 21 世纪的不同修正主义形态。无产阶级哲学批评必须清除这一术语争议领域，以证明这两种立场的共同资产阶级本质，从而彻底摧毁它们作为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和革命叛徒的立场。

UOC（马列毛）在攻击 LCI 和 PCB 时，首先通过对矛盾律的表述进行明显的修改来开始其哲学论证。在 2023 年 1 月的文件中，它说：“我们并不否认对立统一和斗争的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而且**他们声称承认“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辩证法一般规律**”，甚至认为这只是“**辩证法第三定律**”⁷。通过这一声明，UOC（毛主义）似乎同意毛主义的基本原则，即矛盾律作为唯物辩证法唯一基本规律的条件。对于一个自称毛主义的政治力量来说，这是最不值得期待的，但仔细研究同一份 UOC（马列毛）文件就足以认识到其最初声明的虚假性。因此，他反对把矛盾条件作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他说：“‘否定之否定’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嗯，这是指示社会和自然生活不同领域**运动方向的一般规律**”⁸。所以这不是你的谎言 开幕词？说否定之否定是指示运动方向的规律，这不是与“对立统一和斗争的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的说法相矛盾吗？

然而，这并不是 UOC（马列毛）方面概念上或争论上的不一致。只要了解一点他们的历史就足以知道他们对否定之否定作为辩证法最重要法则的重视。举个例子，20 世纪 90 年代，他的理论机关报叫《矛盾》，2000 年代以后，叫《*Negação da Negação*》。当时他这样表述：“**正是我们所说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一般规律**解释了运动的意义、方向：上升、进步、进步和**新旧交替**”⁹。还有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不仅限于理论或哲学问题，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中，对否定之否定法的处理是 MCI 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20 世纪：

《苏共史（二）》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著作中，是如何从辩证法中剔除否定之否定的法则的。这并没有“逃脱惩罚”。革命无产阶级只能在辩证的基础上前进，倾向于否认国家，消灭国家，并且只能否认被否认的东西，肯定自由的统治，表面上是回到原始社会的无国家社会，但其基础是对于许多世纪的阶级社会来说，所有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民主）的发展都是如此。否认否认！**如果不接受和利用这一趋势，这种客观的社会规律作为工人阶级的纲领性假设和政治目标，导致我们遭受了两次巨大的失败：1956年的俄罗斯和1976年的中国。**”[UOC（马列毛）] ¹⁰

换句话说，它指出，斯大林和毛主席没有采取否定之否定法则，导致了俄罗斯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显然，他们对矛盾律和以毛主义为代表的飞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否定之否定是指示运动方向的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严重误解。然而，他说，只有否定之否定才能完全解释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取代，因为“这种运动不是以线性方式发生，而是以明显的循环方式发生，其中**每一次进步反过来又是一次挫折**，但是绝对是一个提升的“UOC(mlm) ¹¹，进而构成伪造马克思主义哲学。

UOC（毛主义）领导层重申的这一立场是错误的，原因有三：1）矛盾律支配着新事物克服旧事物的过程，因此它指示了物质运动和转化的方向。；2）确认因否定之否定而产生的螺旋式上升运动将对应于进步，同时也是挫折，这是应用修正主义的理论调和矛盾、合二为一，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第三）因为**矛盾律是辩证法唯一的基本规律**，我们将在下面证实这一点。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

“我们经常谈论‘以旧换新’。这就是宇宙的普遍且不可更改的法则。一种现象向另一种现象的转变，通过其形式根据现象本身的特征和其所处的条件而变化的跳跃，这是新旧交替的过程。无论何种现象，新旧矛盾总是存在的，这就决定了一系列曲折的斗争。这些斗争导致新的成长并上升到主导地位，而旧的则相反地衰落并最终消亡。一旦新的事物对旧的事物占据主导地位，旧的现象就质地转变为新的现象。”（毛主席） ¹²

这是关于新旧更替、关于运动方向的最客观、最发达的哲学表述。必须看到，毛主席的这一提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大发展。因为事物和现象的两个方面转化为对立面过程是由什么组成的，这是前所未有的清晰。任何事物、任何现象都是一分为二的，它是作为对立统一而存在的；在这个单位的形成方面因此，作为主导的方面，新事物总是显得脆弱和无力。旧的最初是主导的方面，决定了所述现象的质量，通过新与旧的斗争，新的从脆弱变得强大，从主导的方面变成主导的方面，这种变化对应于事物和现象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事物和新现象，但仍然存在新事物与旧事物的斗争，现在在新的条件下，通过这种斗争，新的事物更加加强，直到旧的方面减少并死亡。在这个新事物、新现象中，作为一个新的对立统一体，其两个方面的斗争从未停止过。

在支持否定之否定作为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最能解释运动方向的论点中，UOC（毛主义）将阿瓦基安的攻击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和《反资本主义》中使用否定之否定进行了对比。杜林。然而，它假设相同的解释阿瓦基安证伪者认为，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否定之否定是一种进步，同时也是一种挫折。另一方面，在为否认的否认辩护时，UOC（马列毛）的领导层在于公然向他的基础和无产阶级提出普拉昌达将反对这一辩证原则，而实际上事实恰恰相反。在对可耻的普拉昌德投降的批评中，他们指出：

“让我们从哲学领域的一个小型展览开始吧。《大跃进：历史的必然》是普拉昌达提出并经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文件 国家 PCN(m) 2001 年 2 月 (...)。为了压制质的飞跃——革命的法则——并忽视否定的否定——发展、前景、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法则——普拉昌达认为，“列宁提升了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向新的高度。他充分地解释说，对立统一和斗争的原则是辩证法唯一的基本原则” (.....)。 [UOC (马列毛)]¹³

他们引用了一份文件，据称普拉昌达在该文件中“不知道否定的否定”，而正是在这份文件中，叛徒试图逃避矛盾律和一分为二的原则，呈现了历史尼泊尔共产党从否认到否认：

“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否定的否定**。党最初的正确政策被修正主义否定了，然后又被修正主义否定了。修正主义以求正确的革命政策，最终出现了人民战争的伟大进程。” (普拉昌达)¹⁴

再次强调，我们不认为 UOC (马列毛) 管理层犯了一个小错误。这不会是故意伪造吧？毕竟，它在其他场合重复出现，例如在这段话中，他显然有时与阿瓦基安有时与普拉昌达发现：

“因此，事实证明，根据‘新综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最终既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辩证法，他们有‘某种狭隘和线性的视野’，他们采用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否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它表现为“走向还原论的倾向”，“可能走向必然主义和简单化的公式”；或多或少都像“普拉昌达路径”的一位追随者在《*Estrela Vermelha*》第 21 期 (.....) 中对否定之否定的怪诞“反驳”。” [UOC (马列毛)]¹⁵

这篇文章并不是对这种辩证法的反驳，相反，它的标题是《**否定的否定**》，实际上公开捍卫了尼共（毛主义）的修正主义立场，特别是右翼巴特拉伊的立场。本文将否定之否定解释为“进步同时也是挫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与修正主义对手的结合辩护。

这种 UOC (马列毛) 程序是典型的修正主义：用一个小的文本欺诈来“维持”一个大的概念伪造。文本欺诈是最不重要的，只有揭开它们的面纱，澄清事实，我们才能参与真正重要的辩论：这些哲学伪造的内容及其政治和经济后果。正如所见：阿瓦基安“捍卫”矛盾律，而不是否定之否定，以及“一分为二”而不是“合二而一”的原则。普拉昌达结合矛盾律、融合理论来捍卫否定之否定。

□ 团结斗争改造，反对一分为二的原则。反过来，UOC (马列毛主义) 将否定的否定辩护为辩证法的一般法则，与阿瓦基安“对立”，并掩盖其好战性，即普拉昌达是同一立场的捍卫者。有必要厘清争论的“术语”地形，厘清辩证法的唯一基本规律——矛盾在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并探讨立场的真正内容。阿瓦基安和普拉昌达的研究揭示了在“解释学”差异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 UOC (马列毛主义) 与 21 世纪修正主义变种的趋同。本质上，一切修正主义都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哲学的一种或另一种基础上的，因为这是投降派的世界观。那么，阿瓦基安和普拉昌达的这些言论，如果不是对矛盾律的否定，对一分为二原理的否定，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否定，又算什么呢？

一、马列毛主义发展过程中矛盾规律的确立

马列毛主义的发展，被视为无产阶级科学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就像每一个社会和理论过程一样，都受到辩证法规律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支配。毛主席将矛盾律应用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了列宁的反射理论，确立了：

“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思想。先进阶级所特有的正确思想，一旦掌握在群众手中，就会成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力量有时会受到失败，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正确，只是因为斗争力量对比中，先进力量目前还没有反动力量强大，因此暂时失败，但迟早会取得成功。（……）一般来说，正确的认识只有经过多次重复从物质到意识、从意识到物质的过程才能获得，即：从实践到知识，从知识到实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毛主席）¹⁶

社会实践与知识形成知识过程的对立统一。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想，正确的思想得到群众的体现，就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物质在其永恒的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的条件下，反映在思想中，同样，思想在一定的条件下，又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毛主席还强调，认识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正确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能来自于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不断运动。正如列宁已经确立的那样：

“人类对空间和时间的表征是相对的，但这些相对表征加起来就是绝对真理，在发展过程中，朝着绝对真理前进，并越来越接近它。”（列宁）¹⁷

这种使知识更接近真理的连续过程发生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为此，毛主席强调，在社会斗争中，先进的社会力量，即使他们的思想是正确的，也会遭受挫折。正确的思想要战胜反动势力，必须有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存在和主观因素的建构，才能发生跨越，新的压倒旧的，从而消灭，这是需要一定的努力的。时间和力量的积累。新事物的失败只能是暂时的，迟早会战胜旧事物。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这就是马克思提出、列宁和毛主席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修正主义者和叛徒阿瓦基安长期以来一直在谴责这种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假设马克思主义知识论的修正主义观念，阿瓦基安认为无产阶级的暂时失败是由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错误”造成的；并将任何和所有错误或不足视为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哲学概念的表现。阿瓦基安在顽强地寻找错误的过程中，发现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形而上学错误，这位除了发泄“头脑中的奇妙运动”之外从不犯任何错误的人。此外，它还呈现了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各个阶段的发展，仿佛每个阶段本质上都是前一个阶段的“错误和不足的纠正”。因此，阿瓦基安将毛主席的矛盾律视为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最后部分使用否定之否定的“修正”。这是阿瓦基安编造的又一历史歪曲，目的是把自己描绘成他纯粹的、平淡的、修正主义的“共产主义新综合”中错误的总纠正者。

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

正是在这种意识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中，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得以形成并将继续发展。正是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国际无产阶级的巨人为阶级确立了强有力的真理。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实践有错误吗？当然是的，但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领导人，他们尽快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对个人的错误和不准确毫不留情。然而，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定义所凝结的，是这些伟大领袖的实践和他们所指导的革命进程中所发生的最准确的事情。因此，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是一套真理，是一个完整而和谐的学说，而不是正确与错误的二元结合。但国际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像宇宙中的一切一样，是一分为二的，由

特殊真理和普遍真理。马克思思想中的特殊真理，与其形成的时间和地点有关，分别是 19 世纪和欧洲，他在那里得出普遍规律，随着资本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自由竞争阶段。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发展和克服垄断资本的阶段，列宁主义成功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力几乎不存在或仍然非常落后的地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大多数民族都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同样，毛主义发展并克服了列宁思想的特殊真理，例如，指的是俄罗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正在发展，但封建落后的关系仍然在广大地区盛行。它是半封建的，但它是一个专制帝国，压迫数十个其他国家和人民，因此与俄罗斯资产阶级本身进行斗争。因此，毛主席为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确立了一条更为普遍的真理，即新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必要组成部分。贡萨罗主席在秘鲁人民战争的领导下对毛主义做出了辉煌的定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普遍真理的精确界定。

矛盾规律的表述发展过程，遵循着同样的辩证法规律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正确的初始公式中，它们将获得更高的精度，因为更多的经验是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因此，毛主席在 1937 年《矛盾论》中充分确立的矛盾律与辩证法或“资本逻辑”并不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发生的是使“相对表征”更接近绝对真理的过程。

1.1-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第一阶段过程中哲学表述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哲学丰富性是巨大的。毫无疑问，他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哲学上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在 1845 年至 1848 年间得到了充分的形成。这一时期的作品包括《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 年）、《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 年）、《哲学的苦难与工资劳动与资本》（1847 年）和《共产党宣言》（1848 年）。在这组壮观的作品中，科学思想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意识形态的斗争，奠定了马克思思想的基础，即新生的共产主义的基础。它包含着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与清算、对黑格尔哲学绝对体系的批判以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首次阐述；经济调查的开始；对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在 1848 年席卷欧洲大陆的民主革命大浪潮前夕向欧洲工人阶级提出的。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哲学发展并没有就此结束。经过多年与革命实践密不可分的艰苦理论工作，马克思出版了另一部精彩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1867 年）、《法国内战》（1871 年）、《哥达纲领批判》（1875 年），以及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的最后序言中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在此之前，《宣言》中还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继马克思之后，除了路德维希的著作之外，还出版了《反杜林论》（1877-78 年）、《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于 1885 年和 1894 年）、《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 年），并留下了重要著作《自然辩证法》（写于 1878-88 年间）未出版。这套著作，加上他的各种书信和笔记，出色地完成了对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论阐述。最重要的科学著作无疑是《资本论》，它的四本书。然而，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状况问题，都取得了很大进展。现在正在向东部推进

修正主义表现在拉萨尔和杜林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上。而且，恩格斯还总结了哲学问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需要发展的中心问题：知识论和辩证法。这些任务是列宁和毛主席承担和完成的。

在当前的哲学争论中，在 UOC（毛主义）对否定之否定的折衷处理中，以及在揭露阿瓦基安和普拉昌达的哲学歪曲中，最重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分析。尤其是《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的作品。作为扫清道路、触及修正主义观念的本质、从根源上压制修正主义观念的工作的一部分，厘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否定之否定所使用的内容以及这种运用的真正分量是什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整个建筑中。为了澄清这一内容，该工作 恩格斯的观点是根本性的，因为杜林对马克思的攻击之一正是围绕着使用否定之否定来解释“剥夺者的剥夺”。争论的哲学部分 马克思反对蒲鲁东对于理解否定之否定的修正主义内容以及马克思的概念也非常重要。

我们来详细看看马克思在《资本论》最后部分对否定之否定的运用。他首先将问题介绍如下：

“私有财产是集体财产、社会财产的对立面，只有当工具和其他外部工作条件属于个人时才存在。**根据这些人是否是工人，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私有财产的无数细微差别乍一看，这些提议仅反映了存在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状态，即**工人的私有财产和非工人的私有财产。**”
(马克思) 18

马克思首先从集体所有制与私有制的对立出发，重点分析了私有制对生产资料和其他外部劳动条件的影响。然后他将私有财产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工人的私有财产与非工人的私有财产。接下来，马克思分析了工人对其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相对于非工人的私有财产作为社会的主导方面而存在的历史条件：

“工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小工业的基础（.....）但只有当工人是工作条件（手段和资料）的自由所有者时，它才会蓬勃发展，只有发展其所有能量，才能达到适当的古典形式。工作对象），即农民拥有他耕种的土地，工匠拥有他用专业技术操作的工具。”（马克思） 19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指的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奴役束缚的放松、农民和工匠成为自由所有者的过程；具体来说，指的是 15 世纪末的英国。然而，这种以工人对自己的劳动工具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发展，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产生了导致其解体的矛盾：

“这种生产方式涉及土地的分割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这种生产方式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自身毁灭的物质手段。**（.....）它的毁灭，生产资料的单独转变 分散在社会集中的环境中，从许多人的微小财产到少数人的巨大财产，对广大人民的征用，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他们的生存手段和他们的工作工具，这种可怕而困难的征用，构成了资本的史前时期。**（.....）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的私有财产，可以说是基于对孤立和独立的个体工人及其工作条件的认同，被基于对他人工作的剥削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所取代。**”（马克思） 20

马克思所指出的私有财产的两个极端，即属于工人自己的生产资料与非工人的私有财产之间的对立统一，被其自身的发展所否定。工人的生产资料被剥夺

占主导地位的私有财产成为非工人的财产，以资本主义财产的形式出现。这种第一次的否定产生了一个新的过程，其中矛盾的方面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主导）和日益社会化的生产（作为主导）。这种新的对立统一的发展将产生第二次否定，从而开启第三次进程。

正如上面引文所指出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对拥有生产资料的自由工人的剥夺构成了资本的史前史。这种剥夺对应于工人向无产阶级的转变以及他们的工作条件向资本的转变，这些方面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个新的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剥夺过程，即资本家之间的剥夺，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集中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拥有最佳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往往会迫使竞争的资本家破产，然后通过剥夺他们，将生产资料集中到数量日益有限的资产阶级手中。资本的集中反过来又推动了矛盾的相反方面，即生产的社会化，它变得越来越大，发展如下：“（……）工作过程的合作形式，科学对技术进步的自觉应用、有计划地开发土地、改造只能共用的工作方式”²¹。因此，社会工作手段日益被垄断者所垄断。一小部分资本家，是这样的：

“资本的垄断开始阻碍与其一起繁荣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的集中化和工作的社会化达到了与资本主义框架格格不入的地步。外壳破裂。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后时刻响起。征用者被征用。”（马克思）²²

资本主义所有制与生产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解决这一矛盾的斗争愈加激烈。否认。马克思用以下术语总结了第一个和第二个否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物品的方式，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基于自己劳动的个人私有制的第一次否定。然而，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它自己的否定，具有自然过程的致命性。这是否认中的否认。这第二次否认并不是重建私有财产，而是基于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个人财产：工作本身产生的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合作和共同所有权。

资本主义财产向社会财产的转变要漫长得多、艰难得多，而社会财产实际上已经建立在集体模式的基础上。的生产。”（马克思）²³

第一个否认（剥夺工人自己的生产资料）构成了资本的史前史；第二个否认（对剥夺者的剥夺）构成了资本的终结。资本主义财产支配着社会生产，控制着社会生产力（工人和生产资料）；生产的社会特征否定了这种对立统一，并开创了一个新的进程，即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生产资料上重建私有制，而是在生产资料上建立社会财产。否定之否定并不支配矛盾的发展，它解释了两个或多个矛盾在对立单位的顺序过程中的发展和解决。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否定之否定。一方面，受到叛徒阿瓦基安的辩护，认为它是“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宗教形而上学的表达”，另一方面，UOC（马列毛主义）选择它作为“辩证法的一般法则，最好地解释了运动的方向”，因为它将证明“每一次进步反过来都是一种挫折”²⁴。这两种立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让我们来看看。

马克思在这里分析了历史运动的广泛进程，他面前有人类五个世纪的发展，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相互关联的伟大社会进程：工人拥有个人生产资料，资本家拥有社会生产资料。

生产，工人拥有（社会所有制）**社会生产资料**。马克思分析了这些生产资料的三种所有权形式：个人财产、资本主义财产和社会财产。将三个不同的历史过程描述为否定的否定。伟大的马克思这样阐述历史进程，难道是不符合矛盾律吗？不。毛主席本人也表明，根据矛盾律，这些过程是相互放在一起的：

“所有的过程都有开始和结束，**所有的过程都会转化为它们的对立面**。所有过程的持久性都是相对的，而它们的可变性，表达为一种过程向另一种过程的转变，是绝对的。”（毛主席）²⁵

反过来，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来描述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压制，是描述这场运动及其方向的最成熟、最完整的方式吗？不，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不同的历史过程是在一系列对立单位中作为一个更广泛的历史序列来分析的，而没有详细分析当前要改造的过程，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换句话说，否定之否定对应于两个矛盾单位的相继解决，每个单位对应一个独特的历史进程和第三个进程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是共产主义社会。下表说明了此顺序：

封建		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
私有财产 的工人 生产资料	第一次否定	资本主义财产（形式 已开发财产 非工人的私人）	第二次否定	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 （适当的所有权形式 生产的社会特征）
相对		相对		相对
私有财产 非工人的		社会生产		工人个人所有权 关于消费品

否定之否定只不过是两个对立单位、两个截然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社会过程的顺序解决，而这两个过程又作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相互关联（封建主义的分解过程与封建主义的出现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否定之否定是矛盾律的一种特殊情况或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特殊情况，它不可能是解释运动方向的最佳方式。这这一点在国际无产阶级第一阶段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在恩格斯与杜林攻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攻击《资本论》时的歪曲事实的斗争中，都是显而易见的。

否定内容，因为它与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涵盖的内容相同。也就是说，对马克思来说，一种对立统一体的否定相当于新的方面对旧的方面的压制，而不是斗争方面的结合或调和，更不是斗争中的进步。正如 UOC（马列毛）所提倡的，同时也是一次挫折。要理解马克思否定的革命性和非保守性内容，回到恩格斯对杜林的精彩驳斥是非常有用的。这个社会主义头目批评了《资本论》的同一段话，并诽谤性地指出：

“（……）黑格尔否定的否定需要在这里提供助产服务，通过这种服务，未来诞生在过去的子宫里。自 16 世纪以来，对个人财产的压制就是第一次否认。接下来是第二次，其特点是**否定的否定**，因此是“**个人财产**”的恢复，但以更高的形式，基于土地和土地的共同占有。的工作手段。事实上，这种新的“个人财产”也同时被先生称为。马克思的“社会财产”强调了黑格尔的最高统一性，**在这种统一性中，矛盾被克服**，即根据文字游戏，**矛盾既被克服又被保留**。（...）先生。马克思仍然对他的**个人财产和社会财产**的模糊世界充满信心，并将其留给他的追随者来解决，他们它们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辩证之谜。”（杜林与恩格斯）²⁶

杜林的证伪在于将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与黑格尔的保守体系等同起来。因此，根据杜林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在于对私有财产的同时克服和保护，或者说个人财产与社会财产的综合。恩格斯驳斥了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这种歪曲解释，就好像它是对黑格尔否定的否定一样。恩格斯在提到杜林的早期文本时指出，他曾“（……）犯了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等同起来的错误”²⁷。对于上述杜兴派的证伪，恩格斯具体反驳如下：

“（……）在这里，他毫不费力地根据黑格尔的观点纠正了马克思，将马克思没有提及的财产的最高统一性归咎于他。（……）通过征用者的征用而建立的国家（……）**意味着社会财产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财产包括其他产品，即消费对象。**”（恩格斯）²⁸

恩格斯无可辩驳地阐明了马克思使用否定之否定的革命意义。它不是要调和矛盾，更不是要社会财产与个人财产之间的综合（在对立结合的意义上）。在马克思看来，对被剥夺者的剥夺就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镇压，从而使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无论是资本主义形式还是小业主形式，都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共产主义中继续存在的是社会生产，社会财产是唯一适当的财产形式。然而，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生产转变为另一个历史过程，从而改变了其本质。随着社会阶级的结束，社会分工也结束了，工人和农民、农村和城市、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别也结束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马克思所定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不断革命的时期。共产主义生产以以往生产的社会化为基础，将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并最终使人类摆脱必然领域，进入自由领域：人类解放。但共产主义有矛盾吗？显然，社会对立已经结束，新旧之争、是非之争、是非之争、无数事物和现象的斗争是永不停歇的、无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社会生产与个人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将继续存在，生产超越消费的持久斗争是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座右铭的条件。这句话不是通过调和矛盾来实现的，任何矛盾，无论是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只有斗争才能解决。

阿瓦基安、普拉昌达以及 UOC（马列主义）都得出结论，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的内容与杜林所诽谤的内容是一样的，即好像是正题-反题-综合式的三脚架。 ，其中综合是对立方面的组合或调解。PCR-USA 在最近的一份出版物中指出：

“在共产主义之前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初构想中，包括在马克思的表述中，有一种倾向（...）具有某种狭隘和线性的视野。例如，它体现在“**否定之否定**”的概念中（即事物以这样一种方式发展，即一个特定的事物被其他事物否定，这反过来又导致另一个否定和**包含了元素的综合**）**以前的事情**，但处于更高的水平）。（...）作为正如鲍勃·阿瓦基安（Bob 阿瓦基安）所说，“**否定之否定**”可能会走向“**必然主义**”——就好像一件事必须以特定的方式否定其他事物，从而导致几乎是预定的综合。（PCR-美国）²⁹

他们是叛徒和证伪者，重复着杜林反对马克思的同样论点，仿佛《资本论》中的否定之否定表明了更高层次的综合，在其中， 以前的事情。阿瓦基安反对所谓的否定之否定的“必然主义”，只是为了掩盖他反对毛主席完全确立的矛盾法则的“必然主义”。毕竟，毛主席在矛盾律中而不是在否定之否定中规定：新旧交替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反毛主义的阿瓦基主义者瞄准了马克思，但也试图打击毛主席。

普拉昌达和 UOC（马列主义）的领导层反过来又以杜林诽谤性的方式捍卫否定之否定，就好像这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使用的真正的否定一样。他们说：“运动不是以线性方式发生，而是以明显的循环方式发生，其中**每一次进步反过来都是一次挫折**”。另一方面，叛徒普拉昌达伪造说：

“最后，在总结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时，可以说，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按照**团结-斗争-改造，或正题-反题-综合的辩证原则，在新的基础上打造新的团结**。（……）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过程也可以被视为**否定的否定**。”（普拉昌达）³⁰

普拉昌达显然拿杜林对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的诽谤性解释来证实他腐烂的融合理论，这是旧有的矛盾调和理论的更新版。列宁和恩格斯一样，也明确了马克思对否定的否定的革命性和非和解性意义：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黑格尔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一思想，比当前的进化论思想更广泛、内容更丰富。这是一种**似乎重复已经采取的步骤的发展**，但在不同的基础上，在更高的基础上（“**否定的否定**”）；一可以说，发展是螺旋式的，而不是直线式的；通过飞跃、灾难、革命来发展；“连续性解决方案”；量变到质变；**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由矛盾、力量的冲突和**在特定现象的框架内或特定社会内，作用于特定身体的不同倾向（……）。”（列宁）³¹

只有像阿瓦基安这样的证伪者才能声称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是矛盾对立面的结合。正如列宁所明确指出的，螺旋式上升的辩证运动只是表面上重复了已经采取的步骤。因此，马克思对否定的否定并不意味着过去的复活，或者未来过去与现在的和解。我们吵架。

马克思本人在《哲学的贫困》（1847）中已经批评了蒲鲁东安抚地使用否定之否定作为将相反方面合并为矛盾的一种方式。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破坏了这些立场 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他在之前的两本书中试图将一种和解的辩证法应用于对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在他的著作《什么是财产？从 1840 年开始，蒲鲁东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开始批评财产的法律概念而不是其物质存在。你们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在保留占有的同时压制财产**，仅仅通过这种修改，你们将彻底改变法律、政府、机构，你们将从地球上消除邪恶”³²。压制财产并保留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生产，这是蒲鲁东式的对保守主义否定的否定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 1846 年的《经济矛盾体系》一书中，蒲鲁东扩展了他将唯心主义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尝试，试图通过他认为的辩证方法来推论所有经济范畴。

马克思在回应中简要介绍了蒲鲁东试图运用否定之否定来调和矛盾的悲惨尝试：

“经济学家的素材是人们积极主动的生活；先生的材料蒲鲁东是经济学家的教条。但是，从人们不再追求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的那一刻起，生产关系的范畴只是理论表达，从那一刻起，人们只想在这些范畴中看到独立于现实关系的观念、自发的思想，从那时起，**人们被迫将纯粹理性的运动视为这些思想的起源**。

（……）

非个人理性，在其外部既没有可以放置自己的基础，也没有可以反对的对象，它发现自己被迫翻筋斗，定位自己，反对自己，安定自己——**立场、对立、组合……**。说希腊语时，我们有**正题、对立题和综合题**。至于那些不知情的人用黑格尔的语言，我们会告诉你圣礼的公式：**肯定、否定和否定的否定**。”（马克思）³³

马克思明显地与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辩证法解开了联系，它以正题-反题-综合的形式，以否定的否定，以及作为矛盾的对立方面之间的合成的综合。对蒲鲁东式的否认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即压制私有财产和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结合。这种受到马克思严厉批评的唯心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公式，正是杜林诽谤地归咎于他的公式。阿瓦基安和普拉昌达伪造的正是这种形式，仿佛它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使用相对应。

否定之否定的内容，仿佛它与小资产阶级的“辩证法”是同一回事，因为他所假定的本质是蒲鲁东的否定之否定。以下对马克思的批判是在 1847 年提出的，蒲鲁东辩证法是对叛徒普拉昌达融合理论的完整批判：

“（……）一旦理性成功地把自己确立为一个论点，这个论点、这个思想，与自身相对立，就会展开成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积极的和消极的，是的和不是的。这两种对立因素之间的斗争，以对立的方式来理解，就构成了辩证运动。是变成了否，否变成了是，是同时变成了是和否，否同时变成了否和是，对立面平衡、中和、瘫痪。这两个矛盾的要素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新的思想，这就是它的综合。那新思想进一步展开为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而这两种思想又融合为新的综合体。（…）先生。尽管蒲鲁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图攀登到矛盾体系的顶峰，但他从未成功地超越了命题的前两步和简单的对立，而且，他只达到了两次——其中一次，他向后倒去。”（马克思）³⁴

“这两个矛盾因素的融合”作为一种高级综合，代表了对普拉昌达哲学证伪的精确描述，这种证伪首先渗透到哲学中，渗透到所谓的融合理论中，然后渗透到哲学中。在政治领域，在人民战争的投降中，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主张中，它明确地、可耻地达到了顶峰³⁵。马克思在对蒲鲁东的压倒性批判中，驳斥了任何调解和融合矛盾的企图，他表明，迄今为止的社会都是经过对立面的斗争，经过对立面的对抗性斗争，只有通过这种斗争才能解决问题。其矛盾之处：

“在其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将以排除阶级及其对抗的联合体取代旧的公民社会，并且不再有政治权力本身，因为政治权力正是对抗性的官方概括。公民社会的。然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最高表现是一场彻底的革命。此外，它是令人惊讶的是，一个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社会会导致残酷的矛盾，以肉搏战作为最终的解决办法？不要说社会运动排除了政治运动。从来没有一场政治运动不是同时具有社会性的。只有在不再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演变才不再是政治革命。直到那时，在每次全面重组的前夕对于社会来说，社会科学的最后一句话永远是：“要么战斗，要么死亡，要么血腥斗争，要么一无所有”。这就是如何不可抗拒地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乔治·桑）。（马克思）³⁶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明确的：只有对立面的斗争，而不是对立面的和解，才能解决资产阶级社会固有的矛盾。《资本论》中也有同样的世界观、同样的哲学：对剥夺者的剥夺是资本主义财产的最后时刻；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否定之否定不是矛盾的调和，而是矛盾的解决通过不可调和的斗争进行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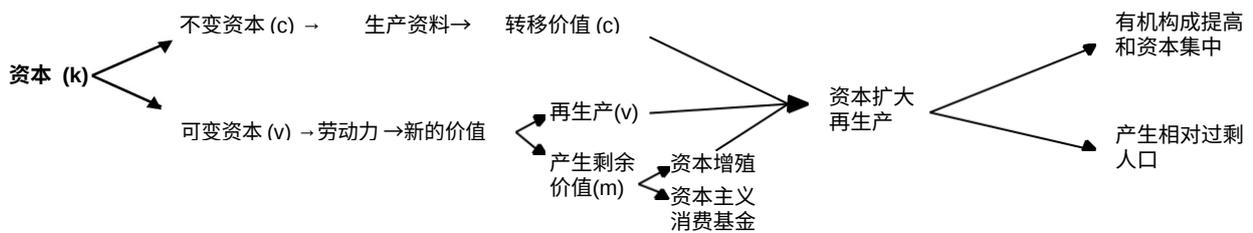
否定之否定的内容之后，剩下的只是评估其使用在整个著作中的份量了。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只使用了一次否定的否定。因此，《资本论》的哲学核心不能概括为否定之否定。一切资本都是建立在对立统一和斗争的辩证法基础上的，其内容可以更多基于毛主义一分为二的原则，易于掌握和普及。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具体现象时，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第一卷中介绍）和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第二卷中介绍）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来分析，其中生产过程是决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导方面。决定于最终是资本的流通方式。因此，马克思在第一卷中尽可能地抽象了流通现象对生产的影响。这种抽象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价值规律本身，是生产和流通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第二卷中，马克思以同样的方式抽象了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的作用，以理解资本的流通，即剩余价值所赋予的价值。最后，马克思在第三卷中分析了这两方面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过程中，出现了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统一和斗争的结果，使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成为可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具体利润率，即剩余价值分配规律。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从历史上先于资本的最具体的要素、最基本的单位——商品开始。它论证了商品如何是两个矛盾方面的统一体：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或价值，即一分为二，并论证了分工的发展和交换的增加如何使交换成为可能。价值或价值是这个矛盾中的主导方面。也体现了作品的双重性格 商品中的物化：产生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构成商品价值实质的抽象劳动。反过来，他得出结论，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形式，通过分析价值形式的矛盾发展，他得出了货币的形式，其中，一分为二。在价值的货币形式中，商品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被打破；货币，以其最发达的形式，由一种商品组成，其唯一的效用是作为其他商品之间的一般等价物或价值衡量标准。它展示了货币如何推动交换以及这种增长如何增加社会分工，然后 在一系列其他社会关系中，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价值的数量积累，决定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

马克思随后分析了资本如何成为一种分为两个对立方面的价值：不变的和可变的。就像在生产过程中一样，不变资本再生产自己的价值，而可变资本则通过购买劳动力，从而产生新的价值。反过来，这个新值 它也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工资的再生产，另一方面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即创造的新价值中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部分。剩余价值又分为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额外资本和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它们是资产阶级的个人开支，用于奢侈和维持。额外资本对应于扩大再生产现象，即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的、具体的产品；其生产条件是以自由竞争为条件。一方面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另一方面是自由竞争，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总是需要以扩大的方式再生产，以维持剩余价值的生产，即资本家的利润。自由竞争下剩余价值生产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不断增长，从而导致资本的高度积累。资本集中化。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的集中，通过增加其有机构成，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产物：过剩人口。因此，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家自己对资本家的剥夺，另一方面又导致大量不幸人民的生产，这些人民迟早会 必然会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并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扔进历史的垃圾箱。

一分为二的过程，在《资本论》中可以表述为：



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并不是建立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矛盾律的基础上。为此，毛主席强调：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了**分析对立面运动的模型**，这个模型贯穿于事物自始至终发展的全过程。结尾。”（毛主席）³⁷

和：

马克思、恩格斯**把事物的矛盾规律运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中**，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

把这一规律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中，发现这个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和财产的私有性之间的矛盾。（毛主席）³⁸

换句话说，马克思出色地将矛盾律运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中。他只是没有时间在单独的哲学著作中阐述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否定之否定的运用，只是在分析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压制时，构成了矛盾律的一种特殊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内部反对形而上学概念的两条路线斗争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在《反杜林论》中是如何发展的。《反杜林论》一书分为三大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恩格斯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体。全书整体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角度出发，从革命的否定走向了矛盾律的否定。

在第一节中，恩格斯在驳斥杜林的证伪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仍然以革命否定的否定的形式来表现对私有财产的压制。然而，回到同一主题时，在著作的最后一部分《科学社会主义》中，恩格斯不再从广义的历史进程来论述对资本主义财产权的压制，而是详细地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为了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发展，恩格斯在《资本论》中描述了同样的现象，现在基于资本主义过程、其解决方案或革命否定的对立面的统一：

“资产阶级（……）如果不将有限的生产资料从碎片化和分散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不将其集中化，不将其从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的生产资料，就无法将有限的生产资料转变为强大的生产力……只能由一群人应用。

（…）

生产资料和生产本质上变得社会化。但它们受到一种以个人私人生产为前提的占有模式的影响，其中每个人都拥有产品并将其推向市场。生产方式受制于这种占有方式（……）。在这种矛盾中，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特征，在当前整个冲突中已萌芽。”（恩格斯）³⁹

换句话说，生产资料只能在社会上操作，“本质上是集体的”生产方式与占有方式，即与私有制、资本主义财产制相矛盾。恩格斯强调，当前的整个冲突就存在于“**这个矛盾之中**”。因此，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巨人继续说道：

“一方面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家手中，另一方面生产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
(恩格斯) 40

恩格斯清楚地提出了这一过程的根本矛盾，其经济基础：生产社会占有与私人占有及其社会表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进程的矛盾出发，不再从对不同历史进程的两个对立单位一连串的否定出发，而是从同一基本矛盾的发展出发，解释了生产过剩的危机。：

“在危机中，**社会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受到严重影响。猛烈爆发。**商品流通瞬间消失；流通手段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一切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规律都被颠倒了。经济冲击达到顶峰：**生产方式反抗交换方式，生产力反抗其起源的生产方式。**” (恩格斯) 41

《反杜林论》中这样阐述了社会生产力和私有制之间、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之间的矛盾解决：

“[社会生产力]一旦了解其本质，它们就可以在相关生产者手中从恶魔般的统治者转变为顺从的仆人（.....）。根据最终确定的性质来对待当前的生产力，意味着用符合群体和个人需求的社会计划生产调节来取代生产的社会无政府状态。个人；因此，产品首先奴役生产者，然后奴役任何人的资本主义占有模式，**被基于生产资料本身性质的产品占有模式所取代：**一方面，直接社会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手段，另一方面，直接个人占有作为生活和享受的手段。” (恩格斯) 42

恩格斯详细阐述了如何解决经济方面、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和计划经济方面的根本矛盾。从政治角度来看：“**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并将生产资料主要转化为国家财产**” 43。

《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1880）一书中得到普及。在《资本论》中，对私有财产的压制必须向从两个对立单位的顺序和链式解析开始；资本主义因对第一单位的否定而产生，因对第二单位的否定而毁灭。这个最初的解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准确的，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但是它需要深化，这就是通过两条路线反对杜林立场所发生的情况。在呈现对资本主义财产的压制时，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从而更加详细地呈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和形式。事实证明，以矛盾律来呈现历史的上升运动更加具体，也更加普遍。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第一阶段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发展。

然而，这种发展不仅是反对学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也是阶级斗争进步的产物，毕竟，革命哲学在寻求改造现实的过程中不断进步。1867年出版《资本论》，出版《反杜林论》

完整的，只是在 1878 年。在这短暂的历史时期，发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件和新生的 MCI 两条非常重要的路线的斗争。1871 年，在第一国际的直接干预下，在马克思的亲自指导下，不朽的巴黎公社诞生了，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在公社的领导层中占少数；1875 年，德国爆发了非常重要的反对拉萨尔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制定了强有力的文件《法国内战》，其中他强调巴黎公社以下形式解决了历史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其次，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确立了共产主义建设将经历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在生产资料社会化之后，必然要同现行的资产阶级法律和社会分工作斗争，特别是要同乡村和城市、工人和农民、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差别作斗争。工作、差异，这些都是社会主义中敌对阶级存在的表现。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目的是证明剥夺者被剥夺的历史必然性，因此他认为剥夺与三个本质上不同的社会进程有关。因此，在作为这些过程之间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剥夺者的剥夺表现为一种行为。经过巴黎公社及其在法国内战中的正确平衡，经过对哥达纲领的批判，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反对杜林的斗争中，很明显，不能在同样的条件下提出这个问题。因此，征收人的征收现在被呈现为一个过程，其中必须遵守某些步骤。剥夺者的剥夺作为一个过程只能通过矛盾律在哲学上呈现。

在《反杜林论》中列举了自然、社会和思想不同发展过程中否定之否定的一系列例子。这些论证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因为恩格斯通过强调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中否定之否定的普遍性，揭示了辩证法的普遍性。辩证法普遍性的提出是确立矛盾律的普遍性和绝对有效性的必要步骤。因此，恩格斯的著作在任何意义上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进步。

然而，虽然否定之否定存在于一切形式的物质运动中，但它并不像矛盾律那样绝对有效地存在于所有现象中。恩格斯在提出了大麦籽粒发展过程中否定之否定的普遍方面之后，也提出了它的特殊方面。我们先来看看恩格斯是如何分析其普遍有效性的：

“让我们取一粒大麦。数十亿大麦粒被研磨、煮沸、发酵然后食用。然而，如果这些大麦粒之一遇到了它正常的条件，当它落在合适的土壤上时，在热量和湿度的影响下，它会发生一种非常特殊的变化：它发芽；它会发芽；它会发芽；它会发芽。谷物就这样消失了，它被否定了，它的位置被由它产生的植物所取代，这是对谷物的否定。但这种植物的正常生命过程是怎样的呢？她成长，它开花、受精，最后结出其他大麦粒；一旦它们成熟，它们的茎就会枯萎，进而失效。由于这种否定的否定，我们又得到了最初的大麦谷物，只不过不是单纯的谷物，而是数量的十倍、二十倍、三十倍。”（恩格斯）⁴⁴

大麦籽粒构成了对立统一体，当在某些条件下被拒绝时，它就会变成大麦植物；反过来，同一植物在某些条件下生长、受精并产生许多其他谷物，这些谷物否定了构成植物的对立统一。谷物在第一次否定中被否定，植物在否定的否定中被谷物集合否定。两个截然不同且相互联系的对立单位的过程必然会产生与之前的两个不同的第三个过程：大麦谷物的数量扩张。然后，恩格斯指出了这种顺序运动形式的局限性：

“在辩证法中，否定并不简单地意味着说不或宣称某物不存在或以某种随意的方式摧毁它。斯皮诺萨已经说过：*omnis dematio est negatio*，每一个界定或决定同时都是否定。此外，否定的类型是

在这里，首先由该过程的普遍性决定，其次由其特殊性决定。我不仅要否认，而且还要撤销否认。因此，我必须以这样的方式确立第一个否定，使得第二个否定仍然存在或成为可能。作为？始终根据每个个案的具体性质。当我压碎一粒大麦时，当我压碎一只昆虫时，我实际上执行了第一幕，但我却让第二幕变得不可能。”（恩格斯）⁴⁵

否定之否定的特殊性：第一个对立统一必须以特定的方式被否定，才能保证第二个否定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否认的否认可以解释大麦的自然、自发生长，但不能解释农业现象。对于消费，另一种否认大麦谷物的具体方式出现了，这使得否认的否认变得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大麦种子过程的推进源于对大麦种子统一性的肯定。谷物的对立，直到植物发芽而否定这种统一；然而，植物的对立统一从对这种统一的肯定进展到以粉碎的形式对其（不自然的）否定。对立统一的肯定与否定，构成了矛盾律的派生形式和普遍形式；反过来，否定之否定仅构成存在于一切事物中的一种特定形式。物质运动的形式，但它不能解释所有过程和现象的转变。这种对肯定与否定的理解，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是中共内部围绕毛主义一分为二原则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非常重要的哲学成果之一。

恩格斯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第一阶段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而且确立了下一代共产主义者应该重点关注并完成解决的哲学问题。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强调了革命哲学当前的任务：

“现在，问题不再是把一连串的事情从我们的头脑中剔除，而是在事实本身中发现它们。脱离了自然和历史的哲学，除了纯粹思想的领域之外没有任何避难所，而纯粹思想的领域仍然存在：知识本身过程的规律理论、逻辑和辩证法。”（恩格斯）⁴⁶

认识过程规律理论是伟大的列宁在其巨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主席在《实践论》、《正确的思想从何而来？》关于逻辑和辩证法，恩格斯在他的著作《自然辩证法》中给出了另一个重要的指示，表明了后来的需要。事态发展：

“因此，辩证法规律是从自然历史和人类社会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这些只是历史发展这两个阶段的最普遍规律，就像思想本身一样。更准确地说，它们可以减少到三个：

- 量变质变规律；
- 对立面相互渗透的法则；
- 否定之否定法则；

这三者都是黑格尔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发展为简单的思想法则：第一个是在《逻辑学》第一部分的存在论中；第二个是在《逻辑学》第一部分中的存在理论；第二部分占据了《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这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即本质理论；第三条最终以法律的形式出现是整个系统建设的基础。

（.....）

至此，我们不需要撰写辩证法手册，而只需证明辩证法是自然发展的真实规律，即对于自然的理论科学考察也具有有效性。因此，我们无法在这里解决这些法律的内部相互关联性。”（恩格斯）⁴⁷

《逻辑学》中汲取了自然、社会和思想的最普遍规律。它强调了每一个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关系：作为存在学说一部分的数量到质量的转换法则；矛盾律作为一部分

本质学说，被恩格斯强调为黑格尔逻辑最重要的部分；否定之否定法则是概念学说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黑格尔体系的基本法则。然而，最重要的是，恩格斯指出需要解决这些法律的内部相互关联性。

不幸的是，伟大的列宁未能看到《自然辩证法》一书，因为它于1927年才在苏联出版。然而，在他精彩的哲学笔记本中，特别是在他对黑格尔逻辑科学的研究中，他精确地阐述了这些定律的内部相互联系。反过来，毛主席在很大程度上以列宁的思想为基础，在《矛盾论》中向国际无产阶级提供了唯物辩证法的最先进的表述，以直截了当的方式阐述了矛盾律：辩证法唯一的基本规律，以及随后与其表达或派生规律的内在联系：数量/质量和肯定/否定。这就是我们将在下一个主题中寻求解决的问题。

1.2-列宁主义：以对立统一和斗争的规律为辩证法的核心

在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第二阶段，列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理论阐述的重要飞跃，即辩证唯物主义的飞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认识论和辩证法这两个核心问题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对于第一个问题，列宁全面彻底地确立了认识论是物质在意识中的主动反映。关于辩证法，列宁首次提出对立统一构成“辩证法的核心”。

列宁最早的理论著作之一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与俄罗斯民粹主义者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进行了论战。在《谁是“人民的朋友”以及他们如何与社会民主党作斗争》（1894）中，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进行了大力辩护，并且，特别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提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示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理论和实践掌握。

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1909）于几年后出版，当时正值俄罗斯共产党人陷入意识形态危机。1905年，俄国发生了第一次民主革命，大规模动员工农发动武装起义，随后进行了相对漫长的内战，直至1907年。第一次革命尝试被沙皇政府挫败，革命浪潮落潮后，沙皇政府挫败了沙皇政府的阴谋，发起了广泛而暴力的反革命，即斯托利皮尼亚反动。许多革命者被逮捕、流放、放逐，但对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影响最大的是意识形态，即是否有可能进行民主革命来打败沙皇专制，无论其革命策略是否可行。期间是正确的。

当时，列宁已经是该国主要的共产主义领导人，领导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1905年初，工农武装起义开始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别召开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对俄国民主革命的策略。孟什维克主张采取右翼策略，追随俄罗斯自由资产阶级，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向托付给后者；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反过来制定了强有力的策略，主张无产阶级应该为革命的方向而奋斗，以尽可能地推动革命，并建立以武装部队为基础的工农联盟。由无产阶级领导，发动针对沙皇贵族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起义，通过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来指导这场革命。

尽管这条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布尔什维克派的更大的主观发展和更大的组织能力还缺乏条件，以执行进行和实现革命及其胜利所需的革命任务。这些主观条件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通过列宁和左翼布尔什维克在1912年布拉格会议上重建的当时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巨大努力而获得，并确保了这一目标的实现1917年2月，民主革命爆发，转变为社会主义伟大革命。

同年十月。然而，1905年民主革命的失败引起了包括布尔什维克派在内的社会民主主义队伍的巨大意识形态动摇。这些意识形态的动摇试图通过采用资产阶级哲学观念来从理论上证明他们的投降是正当的，以便以自然科学最新进展的名义，质疑无产阶级革命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有效性。

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卢纳察尔斯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活动家和领导人开始辩护说，奥地利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提出的经验批判哲学相当于一个伟大的哲学进步，代表着克服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伟大的列宁追随恩格斯《反杜林论》的脚步，对这些立场进行了可怕的两条路线斗争，揭露了他们的哲学歪曲，揭露了他们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屈服，从而粉碎了这一腐朽的修正主义立场。布尔什维克派。这样，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构成了克服1905年失败的挫折、走向世界的决定性的思想著作。1917年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进步。

对于这种“批判”经验主义来说，在认识过程中，感觉是首要的，但认为物质本身并不存在，现象的本质是无法得知的。经验批判主义嘲笑哲学唯物主义，认为这种革命性的观念将物质视为“神圣”的东西。对于经验批判主义来说，意识之外的客观物质并不存在；对于这种唯心主义观念来说，物理身体是“感觉的复合体”。

列宁首先揭露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哲学内容，指出马赫的哲学基础中并不存在“新颖性”，而是伯克利主教对17世纪旧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哲学理论的重新发表。马赫的哲学在感觉和物理身体之间建立了绝对同一性，通过这种方式，将物质简化为我们对它的感觉，并将知识过程简化为发现我们自己的感觉之间的必要关系，而不是先验的物质运动。，相对独立于我们的意识。反过来，贝克莱的哲学认为事物是一组“观念”，从而在意识和事物之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同一性，从而将知识的过程简化为发现预先存在于所有自然和社会现象中的神圣观念。

与这种观念相反，列宁将捍卫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系统化的哲学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1) 物质先于意识并独立于意识而存在；2) 意识能够反映一切现象的客观本质。它将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即共产主义思想与存在关系观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首先，列宁论证了思想与事物之间、感觉与物质身体之间并不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它论证了物质先于人类意识，揭示了这是无机物向有机物发展的结果，是人类社会生命转化的结果。因此，物质先于意识，而意识又是物质转化的产物，因此，物质既不能是“感觉的复合体”，也不能是“观念的集合”。根据列宁的精彩定义，物质是：

“（……）一个哲学范畴，用于指定客观现实，赋予人以他的感觉，由我们的感觉追踪、拍摄和反映，并独立于它们而存在。”（列宁）⁴⁸

列宁准确地论证了思想与存在的对立统一的条件性和相对性。这种统一性并不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意识既不先于物质，也不立即随物质产生。因此，正如恩格斯出色地定义的那样，存在与思维之间的统一是自然辩证法的产物。这种统一的产生需要某些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有意识。反过来，惰性物质转化为有机性以及有机性转化为意识的条件是由物质本身的运动和转化创造的。意识不是由自然外部力量引起的，而是由其自身的运动和转变产生的，因此，列宁强调，尽管物质不是“一组思想”或“一组感觉”，但“可以逻辑地假设”这一切

物质具有本质上类似于感觉的属性，即**反射的属性**”。对机械、化学、电运动等的反映、反应是惰性物质的内在属性，也就是说，是永恒物质固有的矛盾驱动着其不断变化的自我运动。

这样，列宁支持了物质转化为意识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念，这符合唯物主义哲学的第一基本原理，或者说存在与思维同一性的第一形式。接下来，列宁讨论了意识认识存在、反映意识外客观现象本质的能力问题。这个

□ 存在与思维之间同一性的第二种形式。第一种形式的同一性对应于反射理论的被动方面；第二同一性的形式，对应于反射理论的主动方面。在第一种形式中，存在转变为意识；在第二种形式中，存在转变为意识。在第二个阶段，意识转变为存在。且看列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时如何把这个问题确立在一个新的高度上。

列宁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引用了恩格斯的话：

“黑格尔是第一个正确解释自由与必然之间关系的人。对他来说，自由只不过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自由并不在于梦想中的独立于自然法则，而在于对这些法则的了解，以及基于这些知识，使**这些法则为某些目的以常规方式行事的可能性**。（……）因此，自由在于基于对自然需求的了解，**对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的控制**。”（恩格斯与列宁）⁴⁹

然后列宁出色地捍卫和发展了这一马克思主义假设：

“每个单独的人类个体意识的发展和全人类集体知识的发展，每一步都向我们展示了未知的‘事物本身’向已知的‘我们的事物’的转变，盲目的**转变需要**，不为人所知，“需要”本身，在“我们的需要”中为人所知。（……）在上述推理中，恩格斯显然将“生命飞跃”的方法运用到了哲学上，即**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对自然的统治，体现在**人类的实践中**，是结果人类大脑对自然现象和过程的忠实客观反映，并**证明所述反映**（在实践向我们展示的范围**内**）是**客观真理**，绝对的、永恒的。”（列宁）⁵⁰

在这个表述中，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实现了一个重要的飞跃，他确立了知识对应于**需要的转变**，知识的过程需要**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而且**实践构成了客观真理的标准**。决定了现实意识中的**主观反映**。

列宁巧妙地解决了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从而在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观的理论阐述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因此，它呈现了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必然关系，以及思想作为物质发展的产物的必然关系。从而建立了其第一种形式的相对统一。它表明思想是社会实践的反映，就像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一样。通过表明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是对必然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通过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而发生的，列宁以一种优越的形式提出了思想与存在之间同一性的第二种形式，或者说，知与行之间。并通过解决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关系问题，表现出思想与存在的统一性、主观与客观的对应性的相对性：

“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对客观、绝对真理的近似程度是有历史条件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以及我们接近它的事实，**不遵守条件**。他们是历史上以图片的轮廓为条件，但这张图片代表客观存在的模型是无条件的。从历史上看，我们何时何地推进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有条件的（……），但无条件地，这些发现中的每一个都构成了‘无条件客观知识’的进步。”（列宁）⁵¹

每一个发现都构成了主观与客观的同一性，由于每一个对立单位都是相对的，因此所获得的真理也将具有相对的、条件性的特征。然而，无穷无尽的相对真理构成了宇宙无条件的绝对真理。因此，知识的过程是意识朝向客观和绝对真理的无限运动。列宁主义的这一表述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知识论的一个重要飞跃。

伟大的列宁在驳斥关于知识论的唯心主义立场时，无论是像马赫这样的经验主义立场，还是像贝克莱这样的主观唯心主义立场，都严厉地攻击了这些立场的唯心主义背景，这些立场有时宣称存在先于自然的神圣意识，有时宣称存在先于自然的神圣意识。存在“环境与自我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就像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博格丹诺夫对其的运用一样。正如上面已经看到的，列宁展示了这种统一的相对特征以及物质先于意识的必要条件。然而，列宁在正确批判物质与意识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时，却把“同一性”一词等同于“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概念，从而提出了如下提法：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并不相同，就像一般存在和一般意识不同一样。从人类在彼此交往时作为有意识的存在这一事实来看，决不能得出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是相同的结论。（……）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教导我们的。反射可能是所反射的内容的大致精确复制品，但在这里谈论同一性是荒谬的。（……）这种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同一性的理论，从始至终都是一种荒谬，一种毫无疑问是反动理论。”（列宁）⁵²

□ 显然，列宁在谈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非同源性时，并不是否认在一定条件下，某一方面会转化为另一方面。以至于凸显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在这段话中，列宁正在反对博格丹诺夫的哲学歪曲 它建立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绝对同一性。从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错误假设出发，博格丹诺夫得出的结论是，研究社会意识就足以从中推断出社会存在的特征。除了唯心主义之外，这种修正主义观念也是形而上学的，因为它具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就好像它们是同一件事一样。矛盾对立面的绝对而非相对同一性是合二为一的形而上学方式之一。

因此，列宁正在捍卫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该观认为，人们在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关系的情况下就进入了某些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社会意识是社会实践和社会意识辩证发展的产物，因此不能立即给出。正如列宁所确立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有这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主观相对于客观的近似反映。

这段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内容后来被中国修正主义哲学家、刘少奇的追随者用来作为反对毛主义的一种方式。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只需强调以下几点：上面引用的列宁的这段话，在哲学概念上并没有错误，但在问题的提出上、在对“同一性”这一辩证概念的处理上，有不准确的地方。，它同时包含差异和平等。列宁本人将在《哲学笔记》中解决这个概念问题，但在这里重要的是要看到，正如在阶级斗争中一样，并非每一次失败都对应着政治路线或哲学观念的错误；相反，在阶级斗争中，并非每一次失败都对应着政治路线或哲学观念的错误。同样在理论斗争中，并非所有不精确或不充分的表述都对应于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表现。哲学对应于某一阶级的世界观的理论表述；这种表述也是一个接近更精确和精确形式的过程。这就是本案中发生的情况。强调它的重要性在于强调列宁反对矛盾各方面的绝对同一性的斗争的重要性。因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有两种符合二而一的方法；普拉昌达通过调和矛盾方面来做到这一点，而阿瓦基安通过对对立面之间的绝对同一性来做到这一点。两者都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主义观点，因为最终两者都压制对立面的斗争。

关于恩格斯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主要问题——辩证法，列宁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巨大飞跃浓缩在上述 1929 年和 1930 年在苏联出版的《哲学笔记》（1914-1915）中。在这本浩瀚的材料中，两份手稿最为重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摘要（1914 年）和《论辩证法问题》（1915 年）。第一个是列宁研究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时的笔记；二是对列宁唯物辩证法结论的系统化。该材料包含一系列精彩的列宁主义辩证法哲学表述，以及对其反射理论的一些重要的最后润色。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提出：

“（……）内部矛盾导致旧内容被新的、更优越的内容所取代。”（列宁）⁵³

众所周知，这个提法后来被毛主席出色地发展起来。对于“同一性”这个概念，列宁完整地完成了他的理解，明确地表述为：

“辩证法是这样一种学说：对立面如何能够以及如何变得相同——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同的，相互转化——为什么人的理性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视为死的、僵化的，而是活的、受制约的、可移动的，相互转化。”（列宁）⁵⁴

在这段和其他段落中，列宁的哲学思想在他自己的著作中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解释对私有财产的压制时从否定的否定前进到矛盾一样，列宁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绝对非同一性前进到了对立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并变得同一的认识。概念是相同的，但表述却发生了重大飞跃。对辩证法理解的进步使列宁能够以更加完善和清晰的形式阐述马克思主义知识论，特别是关于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同一性问题：

“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总之，一切科学的抽象（正确的、严肃的、非荒谬的）都更深刻、更忠实、更完整地反映自然……”从生动的直觉到抽象思维，再从抽象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现实的辩证路径。”（列宁）⁵⁵

在这里，列宁充分地展现了认识过程中的两次飞跃，并在后来由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得到了充分发展。关于变主观为客观的问题，列宁强调：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不能满足人，而人决定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它。”（列宁）⁵⁶

把实践作为知识发展过程的主要方面，指出：

“实践优于（理论）知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尊严，而且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列宁）⁵⁷

和：

“行动的结果是主观认识的证明，是客观性真正存在的标准。”（列宁）⁵⁸

与列宁主义在辩证法表述方面的飞跃有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摘要出现在《矛盾论》中不朽且充分发展的段落中：

“简而言之，辩证法可以定义为对立统一学说。这将涵盖辩证法的核心，但这需要澄清和发展。”（列宁）⁵⁹

《论辩证法问题的手稿》（1915）中进一步确立矛盾律为唯物辩证法唯一的基本规律。为原则奠定基础 列宁提出了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一分为二的革命性观念：

“一的分二及其矛盾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本质。”（列宁）⁶⁰

对立统一的表述发展为辩证法的核心，并指出：

“对立面的同一性（……）是对所有自然现象和过程（也包括精神和社会）。世界一切过程的“自我运动”、自发发展、生命活动的知识条件，是对它们作为对立统一体的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列宁）⁶¹

列宁追随恩格斯的脚步，出色地确立了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关系。自然界的一切过程都是作为对立面的同一和斗争而前进的，因此，认识这些过程的条件就是把它们作为对立的统一体。列宁以其广为人知的表述经典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发展（进化）的两个基本概念（……）是：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发展是对立统一体（对立面分为相互排斥的对立面和相互对立面的相互关系）。**”（列宁）⁶²

概括了矛盾律和一分二为二的原理。此外，列宁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

“**对立统一（巧合、同一、作用相等）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短暂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和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⁶³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两本巨著和《哲学笔记》中对于确立矛盾律作为辩证法唯一基本规律的巨大作用是毫无疑问的。因此，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这使得 UOC（马列毛）坚持认为这是“最能解释运动方向”的否定之否定法则。这不仅明显反对毛主义，当然也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最后，有必要谈谈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作用。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者，在 1924 年列宁英年早逝后，他承担起了继续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艰巨的任务。随后，他出色地领导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后来反对布哈林主义的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在反对布哈林反对完成新经济政策 and 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斯大林面临着比托洛茨基公开的反革命和叛国立场更为结构化的复辟主义路线。布哈林是托洛茨基主义思潮的忠实追随者，他开始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应该长期结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因素。为了支持他的立场，他依靠德波林学派的哲学表述，德波林学派是一位捍卫矛盾调和理论的修正主义哲学家。德波林认为，在一定的过程中，矛盾只在某一时刻产生，以前只会留下差异，而不会留下矛盾。换句话说，对他来说，差异并不矛盾。

斯大林成功地及时粉碎了布哈林的复辟主义路线，使苏联为即将在世界范围内宣布的伟大冲突做好了准备，纳粹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崛起。与腐烂相反的斗争

矛盾调和论。斯大林同志凝结无产阶级路线的基础、粉碎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表述，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该书构成了非常重要的著作《共产党（b）苏联历史纲要》（1937年）的一章。然而，本章强调了两个重要的错误：斯大林同志反对布哈林和德波林立场的**单边主义**。在农村集体化的斗争中，斯大林过分强调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革命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错误，因为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次经验。然而，斯大林同志在论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特征”⁶⁴时，在揭露辩证法的本质上犯了重大错误。物质主义的。这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它们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已经提出的问题。因此，斯大林在这部著作中对辩证法的阐述是一种挫折。

□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存在错误，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阐述主要是正确的，错误是次要的，需要通过意识形态的后续发展来克服。斯大林同志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1) 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2) 一切都在转变；3) 量变到质变；4) 对立面的斗争。斯大林正确地指出：

“如果世界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之中，如果**发展的规律**

□ **旧的灭亡，新的加强**，显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社会制度，也不存在私有制和剥削的“永恒原则”，也不存在服从人民的“永恒观念”。从农民到地主，从工人到资本家。”（斯大林）⁶⁵

正如毛主席所强调的，新旧交替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因此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中心问题。另一个方面斯大林在本文中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一种现象只能通过其内部矛盾和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才能得到解决。这样，它正确地强调了列宁所强调并后来由毛主席发展的对立斗争的绝对性：

“如果发展的过程是**揭示内部矛盾的过程**，是对立力量基于这些矛盾并为了克服这些矛盾而发生冲突的过程，那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显然是一种完全自然的现象。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我们要做的不是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而是要把它贯彻到底。这就是说，在政治上，为了不犯错误，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的、不妥协的政策，而不是改良主义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和谐政策，即“**逐步融合**”的**机会主义政策**。社会主义中的**资本主义**。”（斯大林）⁶⁶

斯大林同志用这个提法，试图摧毁布哈林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德波林的哲学理论及其调和矛盾的主张。

但斯大林同志却片面强调对立斗争，脱离对立统一来对待它。它不完整地论述了对立面的同一性，其最重要的内容是：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以及这种转化的条件是如何创造的。在处理他所列出的辩证方法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时，斯大林处理的是现象之间的相互依赖，即“**与周围现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受其制约**”⁶⁷。因此，它涉及对立统一的一个方面，即它们是相互依存的，但它以一种脱离斗争的方式来对待它是错误的，因为是什么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不同现象以及矛盾中的对立面，并不是必然的联系，而是对立面之间的绝对斗争和相对统一。

另一方面，斯大林在谈到辩证法的第四个特征——对立面的斗争时，却是脱离对立统一来讨论的，而不是分析对立面的转化。的对立面的斗争和同一的现象，从而没有揭示出一个过程的质的飞跃构成了新旧矛盾方面的相互转化，新的方面

呈现出主要的、主导的状态，而老人则成为次要的、主导的状态。于是，该同志将质量飞跃表述如下：

“（……）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并不是遵循现象和谐发展的道路，而是总是凸显物体和现象的内在矛盾，是作用于**事物的对立倾向之间的‘斗争’过程**。这些矛盾的基础。”（斯大林）⁶⁸

正如列宁已经强调的那样，现象的发展过程是对立面之间的统一和斗争的过程，通过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绝对斗争，每个对立面都会转化为它的对立面，这是同一性最重要的方面。对立面。

统一与对立斗争的关系，特别是对立面同一性这一方面认识不够，是斯大林同志有时犯的形而上学观念的错误，也是毛主席批评和纠正的错误。这一观念错误与斯大林的其他错误有关，如没有考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对立统一性。也就是说，尽管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最终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主导，但在社会进程发展的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却成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主导。矛盾的主要方面。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这些错误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斯大林同志在发展其领导能力的过程中亲自纠正的。例如，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1952）中纠正了他关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的观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是生产关系的发展问题。然而，这部著作的另一个错误是低估了上层建筑革命对于全面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革命的重要性。然而，在早期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中，斯大林正确地指出：

“上层建筑是由基地创建的，正是为了服务于它，所以它积极地帮助它成形和强化自己，**以便它积极地为摧毁旧的、过时的基地及其旧的上层建筑而斗争。**”（斯大林）⁶⁹

在这里，斯大林正确地处理了上层建筑在矛盾中占据主要方面的条件，它在破坏社会旧经济基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此作为新生产关系繁荣和发展的条件。这说明了斯大林同志的世界观是根本正确的，同时也说明了这一世界观的理论表述上的错误是如何阻碍思想发展的。

与 UOC（马列主义）所说的相反，斯大林的哲学错误并不在于他“删去了”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否定之否定。问题出在管理和开发上 矛盾律的理论，是从列宁在其著作《哲学笔记》中所建立的理论出发的。问题不在于否认的否认，而在于对列宁的进步缺乏理解，对毛主席 1937 年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实现的哲学大飞跃缺乏认识。

1.3-矛盾律及其在“一分为二”原理中的科学通俗表达

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飞跃，也不是由于纠正了斯大林的错误而产生的。史诗般的长征之后不久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中国军事路线和民主革命路线发展的必然飞跃。没有辩证法的这一飞跃，就不可能建立处理共产党内部矛盾的两条路线斗争方法、长期人民战争理论、革命的三个基本工具——党、人民军队和革命统一战线——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六大法则。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斗争，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两条路线斗争，反对右翼和“左翼”的机会主义立场以及中共内部的教条主义立场，因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大飞跃的根源。毛泽东主席写的。

毛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是在解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时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的第三阶段开始发展的。这一发展又始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特别是斯大林思想的贡献，包括列宁主义的定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现实，这是对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贡献。在斯大林的贡献中，二战时期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公正正确的国际路线也很突出。毛主席正是把这些普遍贡献应用于中国革命，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三大工具理论。

毛主义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确阐述，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不断性问题的解决，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然意味着对斯大林同志的哲学错误。这是意识形态发展的迫切需要，但这并不是其发展的原因，正如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对阿瓦基安主义和普拉昌达主义的评价所指出的那样。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在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后写成的。蒋介石亲自指挥的针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行动，主要是针对位于钦坎山区最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导致革命的重大失败，主要是红军的失败军队是中共领导的。1934年10月16日，红军成功突围，开始战略撤退，即12500公里长征。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主观的，是王明“四面出击”、谋求迅速占领大城市的“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路线占主导地位；不久，突破国民党的围困后，“逃亡”路线就毫无目标了。这条机会主义路线，导致革命的许多生力军和土地革命战争解放的领土全部丧失。然而，毛主席知道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只能是暂时的，他坚持中共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首先粉碎了王明的军事路线，然后粉碎了他的中国民主革命路线。因此，1935年确定，日本自1931年起从满洲开始对中国内陆的日益扩大的入侵，与中国革命主要矛盾的变化相对应，这样，长期的斗争就得以实现。向华北进军，击败张国焘的投降逃亡路线。在延安建立陕西支援根据地，抢占抗击日军进攻的第一线，把延安建设成为革命和抗日民族战争的大总后卫。

毛主席撰写的上述哲学著作等立即代表了中共左翼路线的思想巩固，类似于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在中期提出的哲学原理然而，1937年，它们已经以应用形式出现在军事理论中，出现在1936年12月编写的非常重要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主席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确立了矛盾法的基本原则：

1) 强调战争是解决社会敌对矛盾的最高途径：

“战争自私有财产和阶级出现以来就一直存在，是解决阶级、民族、国家或政治团体之间矛盾的最高形式的斗争，当这些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了。”（毛主席）⁷⁰

2) 指出战争只有两种类型和消除战争的一种方法：

“战争这个人类之间的杀戮怪物，最终会被人类社会的进步所消灭，并且会在不远的将来。但消除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反对

战争对战争，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民族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只知道两种类型的战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毛主席）⁷¹

3) 从两个对立方面的团结和斗争的角度来分析一切军事问题：

“考虑损失与补充、战斗与休整、集中与分散、进攻与防守、主攻与次攻、集中与分散指挥、长期战争与速决战争的区别和联系。、阵地战和运动战、（……）内战和民族战争之间、一个历史阶段和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等等。”（毛主席）⁷²

4) 确立了战争进程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问题：

“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个方面，是同时存在的，即有利条件的同时也有困难。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其他规律都是由这个规律衍生出来的。”（总统毛）⁷³

5) 它确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两种基本战斗形式及其必要的插入：

“**战斗的基本形式只有两种：进攻和防守。**当我们破坏了敌人的‘围歼’行动，我方由守转攻，敌方转为守势，必须重新整顿兵力后，再发动进攻，那么，敌人就遭受了战略失败。”（毛主席）⁷⁴

6) 强调需要创造条件扭转战争的矛盾方面：

目的是**保存军事潜力，准备反攻。**过去，许多人坚决反对撤军，认为这是一条“机会主义的、纯粹的防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反对是完全错误的。在准备反攻时，必须选择并**创造一些对己有利、对敌不利的条件**，以达到力量对比的变化，然后再进行反攻。进入反攻阶段。”（毛主席）⁷⁵

7) 反过来，他强调，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质的飞跃，扭转战争的矛盾方面：

“对我有利、对敌不利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敌人的失败。这些条件和情况，使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成为可能，而不是现实。想要分出胜负，**就必须两军决战。**只有这一战才能解决问题 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毛主席）⁷⁶

8) 它强调在矛盾方面的相互转化中、同一性中，对立面的差异和斗争继续存在：

“无论是反攻还是进攻，解决这些问题的原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反攻就是进攻。**然而，**反攻并不完全是进攻。**敌进攻时适用反攻的原则，敌守时适用进攻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攻和进攻是有一定区别的。”（毛主席）⁷⁷

总而言之，毛主席的军事路线确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矛盾，具有有利条件（幅员辽阔的半殖民地国家和共产党领导的正义战争）与不利条件（面对强大敌人）的对立面。和

一支小而弱的军队)。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战争。面对敌人的进攻围剿，革命力量积极防御，作为反围剿的一部分。战役中防御阶段的目的是为反攻创造条件；只有创造决战条件，暂时扭转力量对比，对战略上占优势的敌人实施战术进攻，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长期人民战争中贯穿其三个战略阶段（防御、制衡和进攻）的战术进攻的连续性，使得改变整体力量对比以实现歼灭敌人、夺取全国政权成为可能。

在《矛盾论》中，毛主席在他的军事思想中哲学地发展了这一辉煌的辩证法，并已成功地应用于国民党对华南革命根据地的前四次围剿行动（1930-1933年）和史诗般的长征（1934-1936）。《矛盾论》概括和发展了这一辩证法，武装无产阶级中国和国际哲学的全能哲学以深刻的科学性和同时真正流行的方式建立起来。

他的工作一开始就确立了关于事物和现象的发展的世界只有两种观念：辩证观念，根据这种观念，事物通过量变和质变而发展为“内部和必然的自我运动”；形而上学的概念认为，运动是由于外部原因而发生的，变化只是数量上的。它确立了“矛盾的普遍性或矛盾的绝对性”有两个方面：

- 1) 一切事物、现象发生过程中都存在着矛盾；这是
- 2) 这种矛盾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过程。

毛主席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或相对性”时，又从五个层次进行分析，表明：

- 1) 物质运动的每种形式都有其特定的矛盾；
- 2) 在给定的物质运动形式中，其每个过程都有一个特定的或基本的矛盾，将其与该运动形式的其他过程区分开来；
- 3) 这种矛盾是由两个特定的对立方面组成的；
- 4) 一个过程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又都有特定的矛盾；
- 5) 一个过程的某个阶段的特定矛盾也有两个特定的相反方面。

毛主席总结矛盾的特殊性的研究，表明了研究一切事物现象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特殊性和普遍性是统一的，一切事物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具有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我们在研究具体事物时，必须努力发现这两个方面及其相互联系，特殊性与普遍性及其相互联系，并发现事物的本质。所述事物与它之外的众多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毛主席）⁷⁸

此外，在研究矛盾特殊性所提到的五个方案中，毛主席还特别分析了另外两个问题：

- 1) 主要矛盾；这是
- 2) 矛盾的主要方面。

因此它强调，每一个复杂的过程都是由无数矛盾组成的，但在该过程的某一特定阶段或发展阶段，只有其中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进一步指出，主要矛盾的解决决定和条件次要矛盾的解决；研究某一现象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解决其矛盾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研究了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以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之后，毛主席又转向研究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然后它确定身份有两个含义：

- 1) 一个方面的存在以它的对立面的存在为前提；这是
- 2) 在一定条件下，每个方面都会转化为相反的方面。

此外，它确定第二个含义是最重要的，因为它表明现象的变化及其方向。关于同一性与对立斗争的关系，毛主席根据列宁的确立，提出：

“每个过程都有开始和结束，每个过程都会转化为相反的过程。每个过程的持久性都是相对的，而其可变性（表现为一个过程向另一个过程的转变）则是绝对的。”（毛主席）⁷⁹

量变质定律，建立了对立面的同一性和斗争之间的关系：

“一切事物都有两个运动阶段：相对**静止阶段和明显变化阶段**……。两者都源于所包含的**两个矛盾因素之间的斗争**一切。在运动的第一阶段，物体只发生**量变**，没有发生质变，因此**表现为静止状态**。事情转到**第二阶段运动**，第一阶段产生的量变已达到顶峰，使事物整体分解，即**质变**；这样就出现了**明显变化的阶段**。单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凝聚、统一、和谐、平衡、僵局、中立、静止、恒久、统一、凝集、吸引等，都是事物量变阶段的表现。反之，单一整体的解体，即这种凝聚力、联合性、和谐性、平衡性、僵局性、中立性、静止性、持久性、统一性、凝集性、吸引力的破坏，及其向各自对立面的转化，都是事物发生质变的阶段，即从一种过程转变为另一种过程。事物不断变化，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这两个阶段都存在对立的斗争，矛盾通过第二阶段得到解决**。这是因为 因为对立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斗争是相互排斥的、绝对的。”（毛主席）⁸⁰

矛盾律作为辩证法唯一基本规律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量变到质变的第一次建立在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基础上，就是，通过矛盾律。毛主席把一切事物现象的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相对休息和明显变化；确定这两个阶段的运动起源于对立方面的斗争。在第一阶段，量变的发生为明显的变化、质的飞跃创造了条件。第一阶段，矛盾方面的和谐、平衡是量变阶段的表现；在第二阶段，矛盾的统一体消失，一个方面或过程转变为它的对立面。他强调，对立面的斗争发生在两个阶段，但矛盾只有在第二个阶段，即明显的变化阶段才能得到解决。这是列宁定义对立统一是相对的、对立斗争是绝对的基础。

在《实践论》一书中，由于篇幅原因，我们无法在本文中详细讨论，它出现在《矛盾论》之前几个月，并且以最详尽的形式构成了矛盾律在知识过程中的应用。这样，也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关键问题的哲学飞跃。在这部著作中，毛主席把社会实践和知识分析为对立统一，真理是这两个对立方面统一和斗争的结果，但主要是它们之间斗争的结果。通过社会实践，人脑反映了客观现实，并返回到证实或反驳这些反映的同一现实。社会实践和这种实践的意识反思构成了人类思想运动的矛盾方面。人类知识在走向真理的过程中也有两个阶段：1) 感性知识，2) 理性知识。通过

在第一阶段，人类意识收集大量信息，使其能够反映事物和现象的外观。这些信息的积累、这些数据的分析，为质的飞跃创造了条件：敏感知识转变为理性知识，对客观数据的分析转变为力求反映事物和现象本质的综合。然而，知识的运动并不以这种主观综合结束，理性的结论还需要社会实践的证实。认识的过程从来都不是直接的，因此，对真理的追求是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无限运动。在社会实践与社会意识的对立统一中，社会实践构成了主要方面，它构成了知识的起源，同时也构成了真理的标准。理论源于实践，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实。反过来，在这一矛盾运动中，一方面转化为它的反面：实践成为理性知识，而理性知识一旦成立，就会通过实践改造客观现实。此外，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强调，在一定条件下，意识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

《矛盾论》最后一节中，毛主席进一步分析了矛盾中对抗性的作用，作为对立斗争研究的一部分。它规定，尽管矛盾的解决它只能通过对立面的斗争而发生，而对立面的斗争又有两种发展形式，根据矛盾的性质而有所不同：

- 1) 对抗性矛盾；这是
- 2) 非对抗性矛盾。

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存在于一切过程、事物和现象中；但是，矛盾并不等于对抗，对抗是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需要不同的、相应的方法来解决。当识别错误时，非对抗性矛盾就会转变为对抗性矛盾，从而导致其解决变得困难。另一方面，某一矛盾在一定的过程中可以是对抗性的，而在相反的过程中则可以是非对抗性的，就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矛盾一样，在资本主义中是对抗性的，但在社会主义中必须用社会主义来解决。非对抗性方法，对抗性方法。

《矛盾论》中，为广大群众深入地提出了极其复杂的哲学问题，这是整个资产阶级哲学史上从未在这个层面上解决过的。通过对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并通过论证矛盾规律中量变质的转化，明确地朝着确立矛盾作为辩证法唯一基本规律的方向前进。正因为如此，毛主席用以下精彩的综合总结了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巨著：

“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因而也是思想的基本规律。”
(毛主席) ⁸¹

矛盾律确立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确立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特别是对立斗争的两种形式（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彻底破坏了德波林学派的观念。，也是斯大林同志的战斗对象。这样，《矛盾论》就成为毛主席对 MCI 反对布哈林主义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贡献，正如 1964 年至 1965 年中国共产党哲学大争论期间的一篇重要文章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稍后会解决的问题）：

“德波林将对立统一法则扭曲为对立面的调和、整合或综合。他排除了事物内部对立面的斗争。在此理论的基础上，他还否认苏联社会存在阶级矛盾。就这样，德波林的反辩证法哲学就被反布哈林托洛茨基党派当作了思想武器。”（饶庆晃） ⁸²

布哈林和托洛茨基支持资本主义复辟、反对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立场在德波林哲学中寻求了理论基础。他们试图支持他们的右翼路线，以维持

NEP（新经济政策）基本实现了内战（1918-1922）后重建国家的目标，其腐烂的阶级和解理论、对立面融合以及捍卫不存在的理论苏联的阶级斗争。斯大林反对这一立场，但只有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才彻底推翻了德波林学派的哲学歪曲。

与布尔什维克党一样，修正主义路线试图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歪曲在中国共产党中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同样的现象在 1949 年全国夺取政权后也出现了。从 1949 年到 1966 年的十五年里，中共内部主要的两条路线斗争，即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反对右翼。叛徒、卖工刘少奇的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的红线曾多次压制修正主义复辟立场。通过这一重要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从 1949 年开始）的具体经验和 GRCP 的开始（最终反对刘少奇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思想发展并转变为毛主义：第三，新的、更高级的阶段，正如贡萨罗主席后来所定义的那样。在这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中（1949-1966 年），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密不可分的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出现了新的重大进展。

中共这场长期而决定性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围绕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从总路线到过渡时期（工商业、小企业、手工业社会化和农民合作化、集体化运动）进行的。农村）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包括人民公社建设和大跃进）。必须强调的是，反对刘少奇右翼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生在 MCI 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的中间，其高峰期发生在 1963-64 年间。在大论战中，中共在毛主席红线的指挥下，粉碎了赫鲁晓夫的立场。

中国全面政权的实现，标志着毛主席反对刘少奇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开始。1949 年 3 月，胜利前几个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夺取一切政权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成了“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⁸³。1952 年底，毛主席确立了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对资本主义农业、手工业、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毛主席）⁸⁴

刘少奇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制定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右翼机会主义路线。这一立场得到了毛主席 1953 年在关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中的赞同：

“民主革命胜利后，有些人还停留在原地。在不了解革命的性质已经改变的情况下，他们继续为新的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变革而努力。这将导致他们犯右翼错误。”（毛主席）⁸⁵

中共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中国农村的运用，使贫农、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带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右派对农村社会主义攻势的反应是重新阐述其复辟路线的理论基础，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斗争到捍卫转型时期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将建立在“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综合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应该促进和服务这两种经济基础。这条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表述是刘少奇委托给修正主义哲学家杨献珍写的，杨献珍写了反动小册子《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过渡时期的基础和上层建筑》。

右翼的攻势最初导致“合作社数量”的减少⁸⁶。然而，“综合经济基础”的地位被毛主席 1955 年发动的斗争所动摇。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文件》攻击了资产阶级右翼立场的本质：重新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腐烂的生产力理论，主张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只能走向社会主义关系田间机械化后。由于该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落后，这个过程将需要很长时间。毛主席破坏了这些立场，并展示了生产关系如何实际上优先于生产力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在机械化还不稳定、不充分的情况下，农业合作化在中国迅速发展。这是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在第二次失败之后，刘少奇的右翼机会主义路线试图在 1956 年 2 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重新获得动力，这次代表大会下令在苏联缓慢地走向资本主义复辟，赫鲁晓夫的带领下，修正主义的攻势和他的腐烂的、撒谎的秘密报告。受到该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和复辟主义理论的支持以及临时失败 刘少奇右翼资产阶级集团在同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发动进攻，成功地批准了党的思想定义的倒退，取消了部分内容。七大通过的，从 1945 年起，从“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思想正在阔步前进，向马克思主义新的第三阶段、高级阶段转变。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来看，右翼机会主义路线在“综合经济基础”理论失败后，又想出新的伎俩，甚至在八大上批准了“综合经济基础”理论的主张。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⁸⁷，从而以新的标签宣告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旧的、修正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认为只有机械化进步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进步。

尽管中共八大遭遇挫折，毛主席的革命无产阶级路线仍保持主动，并对刘少奇右翼路线发起新的打击。尽管如此，毛主席还是在 1958 年赢得了中央委员会的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集中一切力量，按照数量、速度、质量、节约的标准，奋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毛主席）⁸⁸

有了这条强有力的路线，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大胆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推进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经济社会和政治单位的建设，推动了消除城乡、工人和农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差异的斗争。此外，通过保障劳动妇女广泛参与生产、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确保她们享有更大的权利。

困难主要是由于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干旱、洪水、地震、瘟疫等）以及实施大跃进等涉及亿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妇女的大胆计划时遇到的其他困难造成的。青年除了反革命破坏外，还被刘少奇右翼集团利用来攻击毛泽东思想。右翼分子再次利用修正主义哲学家杨献珍攻击中共内部的红线，杨献珍也在 1958 年写了反动文章《略论“身份”的两个范畴》，其中指出：捍卫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同一性是一种理想主义观念。这个文件是在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证实了批判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修正主义立场，仿佛它是主观主义的。因此，他指出，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实施中的挫折是理想主义知识论观念的产物，是一种主观主义理论的产物，因为它相信现实可以适应党的计划。

1958 年杨献珍的这些哲学歪曲被毛主席的红线粉碎了。在这场斗争中，毛主义干部和无产阶级哲学家艾思奇脱颖而出，正如隶属于共产党的高等党报《革命群众批评》编辑组所强调的那样。
CC 1971 年，中国共产党：

“我们的敌人是腐朽颓废的反动派，是一小撮被野心蒙蔽了双眼的愚蠢之徒，他们总是误判形势。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进行野蛮反击时，尖锐地指出，必须批评杨献珍一伙长期以来故意歪曲恩格斯的话来支持自己的反动谬论。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导下，艾思迟等同志发表文章，对理论和政治上的“思想与存在缺乏同一性论”进行了谴责和批判。（革命群众批评写作组）⁸⁹

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伎俩就是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上为他对毛主席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攻击提供依据。用伪马克思主义的言辞来掩盖你们资本主义复辟的腐朽资产阶级路线。这种修正主义的反击再次遭到毛主席的谴责，他指出：

“转型时期充满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比过去的革命武装斗争还要深入。这是一场将永远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和其他剥削制度的革命。”（毛主席）⁹⁰

《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那样，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一个不断革命的时期，直到共产主义，这一认识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斗争的具体经验的支持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共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形成了需要连续不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两条路线斗争，主要集中在思想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捍卫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然而，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1949年至1964年期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为“哲学战线上的三大斗争”：

第一次伟大斗争：反对“综合经济基础”理论（1949-1955）
第二次伟大斗争：捍卫思想与存在辩证同一的概念（1958-1959）
第三次伟大斗争：捍卫一分为二的辩证原理（1964-1965）

所有这些哲学斗争，本质上都是毛主席的红线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冲突。在所有这些哲学斗争中，刘少奇利用他的心腹杨献珍为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创造了理论基础和舆论基础。正如《哲学战线上的三大斗争》一文所总结的那样：

1949年至1964年间，我国哲学战线上发生了三场重要的原则性斗争，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斗争、思想与存在是否同一问题的斗争、思想与存在是否同一问题的斗争。围绕“一分为二”或“合二为一”问题的斗争。这三场斗争，是在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由哲学界叛徒、汉奸、卖国工人刘少奇的代理人杨献珍先后挑起的。两条道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两条路线（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一方面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之间的斗争。它们在哲学战线上反映了激烈的国内和国际阶级斗争。”（革命群众批评写作组）⁹¹

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级别斗争的反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标志着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哲学进步的思想著作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党内团结的辩证法（1957）、正确思想从哪里来？（1963）。

如前所述，毛主席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撕碎了腐烂的、修正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大概

在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问题上，提出了在矛盾各方面需要寻求相对平衡时如何对待团结和对立斗争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就是如何实现生产与消费、工业与农业、集中与民主之间的平衡。毛主席表明，这种平衡只能通过对立面的斗争而不是通过矛盾的调和来实现：

“我们所说的平衡，是对立面的相对、暂时的统一。一年之后，这种整体上的平衡被对立面的斗争所打破，这种统一被改变，平衡变成了不平衡，统一变成了分裂，然后，下一年又需要达到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所在。事实上，这种平衡和统一每个月、每个季度都会被部分打破，需要部分调整。”（毛主席）⁹²

认识矛盾和采取适当的斗争方法解决矛盾，对于逐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会达到没有矛盾的地步。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只有认识到这两个对立方面的矛盾才能实现，而这种平衡是不能通过调和矛盾来实现的；毕竟，一切矛盾都只能通过斗争才能解决，因此，只有通过坚决斗争，克服“每月、每季度”这两个矛盾方面之间出现的不平衡，才能实现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理想平衡。这是毛主席确立的重要哲学发展，对于正确制定社会主义建设计划、迈向光明的共产主义至关重要。

毛主席通过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矛盾，重申了矛盾规律的普遍性、绝对性。为此，他在1957年更加精辟地重申了矛盾律作为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一定律对于自然、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思想都具有普遍有效性。矛盾的对立面结合起来又相互斗争，**从而产生事物的运动和转化**。处处都是矛盾，但根据事物的性质，它们具有不同的特征。在任何具体事物中，对立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短暂的，因而是相对的，而对立斗争则是绝对的。”（毛主席）⁹³

通过压制矛盾律作为宇宙的基本规律，毛主席还强调：

□产生事物和现象的运动和转化的矛盾。因此，声称自己是毛主义者，同时又辩解说，否认的否认最能解释运动的方向和事物的转变，这无非是对UOC（马列毛主义）领导层的伪造。在这种情况下，难度这不是要识别伪造品，而是分析这种伪造品与其他意识形态和政治歪曲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也会讨论。

正如前面提到的，正确的想法从何而来？（1963）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知识论的重大发展，因为它更加强调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同一性问题。这一发展也是具体斗争的产物 社会主义建设和反对修正主义刘少奇及其文士杨献珍的两条路线斗争。杨献珍的理论基础是对列宁主义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哲学证伪。正如我们在上一届会议中看到的，在这部著作中，列宁通过建立反思理论，捍卫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统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及两个方面之间的同一性，即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同一性。然而，列宁还反对另一种修正主义哲学歪曲，这种歪曲主张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绝对同一**。例如，经验批判修正主义者博格丹诺夫的立场就是如此，他应用了马赫的理论，将感觉和物质之间的绝对同一性与知识理论联系起来，提出了这种折衷主义的混合，克服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二元论”。杨献珍利用列宁对马赫和波格丹诺夫的批评，断章取义地歪曲其内容，否认思想与存在辩证同一的任何可能性，正如中共红线同志在1971年所分析的那样：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彻底批判了把思维与存在放在同一平面上的性别歧视理论**，即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谬论。恩斯特·马赫等人主张“事物是感觉的复合体”、“**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是同一的**”。故意以一者为另一者：身份对于思想与存在的区别以及思想与存在同一性的性别歧视谬论，杨献珍武断地说，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从头到尾批判了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革命群众批评写作组）⁹⁴

毛主席《正确的思想从哪里来？》，消除了这些修正主义的证伪，并用以下术语发展了思想与存在之间同一性的表述：

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想。先进阶级所特有的正确思想，一旦掌握在群众手中，**就会成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一开始，知识纯粹是感官的。至如果这种敏感的知识积累起来，就会发生飞跃，转化为理性的知识，转化为思想。这就是认识的过程。它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是从客观物质到主观意识、从存在到观念的阶段**。（...）然后出现了知识过程的第二阶段，即阶段**从意识到物质，从观念到存在**，即将第一阶段获得的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看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和决议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一般来说，做得好的就是足够的，做得不好的就是错误的，尤其是在人类与自然的斗争中。”（毛主席）⁹⁵

毛主席以更加清晰的方式阐述了思想与存在同一这一重要哲学问题的解决。它体现了事物相互转化的辩证运动。思想和社会存在。它强调，一方面，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维；另一方面，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维。另一方面，正确的思想被群众所接受，就成为能够改造社会和世界的物质力量。它展示了在第一阶段的知识中客观物质如何转化为主观意识，以及在第二阶段的知识中主观意识如何转化为物质力量。认识过程中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两次质的飞跃，对应着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双重运动：存在变成思想，思想变成思想。转变为存在。在这个表述中，毛主席驳斥了杨献珍否定思想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观念。进而攻击杨献珍的歪曲，将列宁对思想与存在绝对同一性的批判转化为对这两个对立方面辩证同一性的否定。毕竟，如果思想和存在之间存在这种绝对同一性，知识就会是直接的；然而，正如马克思主义知识论所确立的，知识是通过思想接近、反映客观现实的过程，是一个以社会实践为中介的过程。

杨献珍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绝对同一的批判完全是一场闹剧，他所追求的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攻击。作为修正主义哲学家，杨善珍与波格丹诺夫的资产阶级立场有着相同的本质，并且像他一样否认知识是一个不断接近客观真理的过程。正如《群众革命批判》编辑部的文章所强调的那样：

杨献珍完全否认人认识客观事物**需要一个过程**。在他眼里，**主观与客观不能同时吻合的就是“唯心主义”**。他从这个荒谬的观点出发，毫无顾忌地攻击了一个观点。”____（团体革命群众批评编辑）⁹⁶

正如前面几页已经表明的那样，我们坚持认为，毛主席在1963年彻底驳斥了修正主义杨的这一立场。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出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显得更加必要了，我们再说一遍：

“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力量有时会遭受一些失败，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力量的相互关系中斗争中，先进势力目前还没有反动势力强大，所以暂时失败，但迟早会成功。（……）一般来说，正确的认识必须经过多次重复从物质到意识、从意识到物质的过程，即从实践到认识、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知识去实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毛主席）⁹⁷

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知识论，触及了对今天的 MCI 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这是科学的、无产阶级的面对错误和失败的方式。即使是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在应用过程中也难免出现一定比例的错误，毕竟“失败乃成功之母”，对于追求真理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只有反复实行公平路线，才能创造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对比逆转的客观条件。对于代表未来的力量、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失败只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的，因此，无产阶级没有绝对的失败。未来的确定性，无产阶级迟早会取得成功的确定性，必须成为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信念。共产主义者只有充满这种革命乐观主义，才能克服一切障碍，摧毁和扫除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以及阶级社会。这不是主观主义，这是革命思想的化身，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是毛主席的重要贡献。

正确的思想从何而来？196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成就，以及1963年7月随着著名的《中国信》的发表而开始的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大辩论，将中共修正主义立场推向了全面防御的境地。在摧毁了“综合经济基础”和“思想与存在不可能同一”的腐朽理论之后，刘少奇通过杨献珍尝试了最后一招。他从关于辩证法的更抽象的论证出发，开始捍卫矛盾律、事物的同一性。对立面，可以概括为“合二为一”的哲学原理。这是暗中攻击毛主席提出的宇宙万物皆一的原理。一分为二。尽管如此，1957年，毛主席在《党内团结的辩证法》中确立了这一重要的哲学综合：

“一分为二：这是普遍现象，这是辩证法。”（毛主席）⁹⁸

此外，他更详细地确立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

“一切都一分为二。”“人类社会正如自然界一样，每个实体总是分为不同的部分；仅在方面存在差异不同具体条件下的内容和形式。”（毛主席）⁹⁹

“合二为一”的原则，试图更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和毛主席所反对的德波林派调和矛盾的腐烂理论。他们试图将自己表现为对矛盾律的正确和非单方面的解释。杨献珍以典型的修正主义者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论点。他通过一些学生的文章提出了他的哲学证伪，并提出了矛盾律只能从两个原理一起开始才能被充分理解：一分为二，合二为一。

《光明日报》发表了第一篇修正主义文章。此后，又发表了其他修正主义文章，但主要是来自左翼的大量文章反对和攻击隐藏在整合两种对立哲学原则的错误尝试中的修正主义观念。在三大哲学斗争中，捍卫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原理的争论，由于两条路线的斗争涉及面很大，被称为哲学战线大争论。正如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话一样，

1964年8月举行的《毛泽东主席哲学谈话录》，其笔记在红卫兵大革命期间公开发表。关于一分为二的哲学争论，也在GRCP期间发表了他们的会议纪要，其中，国外只知道他们的英文版本。这场哲学论战的所有材料都刊登在《人民日报》、《红旗》等中共重要报刊上，构成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反对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群众斗争，代表了确立矛盾律为唯一根本法的高潮。唯物辩证法。

右翼的论点尽管是谬误和证伪的，但却不容易反驳，正因为如此，它们要求并暗示在毛主义本身的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大发展。

杨献珍提出了他的恶劣立场：

“对立统一的思想简单来说就是矛盾的两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万物皆合二而一。所以，在求解遇到问题，需要“一分为二”，采取集成合二而一。学习对立统一规律就是获得连接两个想法的能力。在对立统一中捕捉对立面，必须始终记住事物的两面是密不可分的。这样才能避免实际工作中的片面性。”（杨献珍与艾思琪）¹⁰⁰

修正主义者的哲学歪曲，把各方面的相互依存变成矛盾，变成对立方面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片面地只理解对立同一性的第一个含义，即相互依存；它们隐藏了身份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含义：将一个方面转变为它的对立面。此外，他们还提出了折衷原则，即在分析一个问题或一个矛盾时，必须一分为二，但解决这个问题或一个矛盾，必须将合二而一。因此，他们概括说，分析对应于将一分为二，综合对应于将二合为一：

“[杨献珍]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分析和综合两个方面，一分为二只适用于分析，‘合二为一’适用于综合。”（艾思琪）¹⁰¹

修正主义者在提出这种哲学歪曲时，从来没有举出与阶级斗争有关的例子，因为这有利于揭穿它。例如，修正主义文章中没有一篇文章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通过两者的结合，或者通过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来实现的。在“综合经济基础”的机会主义路线传播之后，捍卫这一点将是公然的资产阶级立场。通常，修正主义者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矛盾方面寻求相对平衡的那些类型的矛盾，需要将两者合而为一。艾思奇指出了机会主义者的这一伎俩：

杨献珍等人把主要精力放在与阶级斗争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上，比较容易隐藏自己的真实意识形态色彩。他们关注的是：红人和专家、工作和休息、质量与数量、工业与农业，以及类似的综合与协调问题。”（艾思琪）¹⁰²

修正主义者在谋求工业与农业的协调发展、争红、争专家时，试图通过合二为一的方法来解决这类矛盾，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而一分为二的原则对于这种矛盾是没有用的，因为它会导致单边主义和所谓的工农业分离等等。这一修正主义诡计与普拉昌达2001年推出修正主义“融合理论”时的做法如出一辙。最初，他提出了将起义道路与乡村围城相结合的重要性，然后，将议会工作与人民战争相结合的重要性，并于2008年提出了他“辩证”结合的最终结果：融合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¹⁰³。如果普拉昌达出示了这个伪造品

2001年就已经明确表明，他显然会在党内失败。这就是为什么他用更令人困惑的措辞来表述它，这为党的领导中心后来变成走私、整个修正主义投降铺平了道路。在当时的共产党（毛主义）的左翼中，每个人都应该对这些修正主义的歪曲保持警惕，因为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出现来走私资产阶级立场的危险所在。

和普拉昌达一样，杨献珍的追随者总是用“两条腿走路”的比喻来对抗所谓的一分为二的毛主义原则的单边主义。这种修正主义的歪曲在1964年5月的第一篇文章中表述如下：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存在着许多对立的方面。第一，要找到联系、团结对立面的条件，在工作中团结、融合对立面。用象征性的语言来说，这就是“**两条腿走路**”。例如，艰苦奋斗、持之以恒、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规律。更大、更快、更好、更省的效益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一方面，更大和更快的结果之间存在矛盾，另一方面，更好和更经济的结果之间存在矛盾。然而，更大、更快的结果离不开更好、更具成本效益的结果。”（艾恒甫、林青山）¹⁰⁴

修正主义者故意将非对抗性矛盾中协调、相对平衡、两个矛盾方面之间的平衡的需要与合二为一的原则混为一谈。正如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已经指出的那样，以对立为单位，寻求两者的相对平衡。在更大、更快的成果方面，必须从认识两者的矛盾入手，通过斗争达到新的水平上的平衡。因为它们是对立的，所以总会出现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只能通过双方之间的斗争来解决，而不是通过两者的融合或整合来解决。因此，只有通过斗争，保持矛盾的主要方面占主导地位，才能达到平衡。正如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统一体中的矛盾方面总是不平衡地发展的，总是需要斗争，以便在对立的统一体中，最先进、最必要的方面占主导地位。

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修正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在某些类型的矛盾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是主要方面：

“关于**民主与独裁的矛盾**，由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人内部矛盾相互交织，容易混淆，所以一定要分清，防止敌人在讲民主时有机可乘，避免在谈论独裁时给一些人留下错误的印象。而且，独裁统治最终会被消灭，只剩下全民的共产主义联盟。**民主和集中这两个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孰轻孰重。**”（潘晓媛）¹⁰⁵

修正主义者歪曲了毛主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歪曲了矛盾规律，并开始辩解说，在某些矛盾中，这无关紧要。无论单位的主要方面是什么。他们又举了一个矛盾的例子，要求各方面之间取得相对平衡，毕竟，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都必须有集中和民主，既有独裁，又有民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方面之间没有一个是主要的。否认矛盾的主要方面和争取新事物的斗争，就是否认矛盾解决的向上方向。这样，在集中制与民主制的矛盾中，虽然必须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但集中制

□ 矛盾的主要方面。毕竟，党内生活的民主旨在实现行动的统一，因为只有无产阶级的集中行动才能摧毁资本主义。这个矛盾涉及集体与个人的统一，归根结底，集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在一定条件下，民主或个人必然承担矛盾的主体作用。

左派的文章一一驳斥和揭露了修正主义的哲学歪曲，揭露了他们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理论基础和舆论的卑鄙目的。通过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些文章极大地有助于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要是毛泽东主席的哲学著作中的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些内容有时在非学术界的研究中被忽视。争论的热度。现在让我们看看左派在这些斗争中粉碎修正主义立场的一些论点。

驳斥修正主义歪曲，在矛盾中追求对立面的相对平衡，应坚持合二为一的原则，把中共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中提出的“两条腿走路”的座右铭作为如果符合这个修正主义原则，中共毛主义左派的文章指出：

“现阶段，在中国，工农业之间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工人和农民之间，不仅存在两种不同的财产制度，两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人。而且，就工业或农业本身的发展而言，客观上存在着一个恒定的规律。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也是一个矛盾。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处理工业和农业的方法不是实行“两化合一”，即否认它们之间的矛盾，而是在正视矛盾的基础上制定方针和政策。党的国民经济发展总路线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是在客观矛盾分析的基础上制定的。“两条腿走路”，而不是一条腿，正是为了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而制定的。（钦筒）¹⁰⁶

“两条腿走路”的理念正是从对矛盾的认识和解决矛盾的正确管理开始的。任何矛盾的解决，都必须通过对对立面的斗争，而对对立面的斗争，就是使矛盾的先进方面成为主导。因此，一切平衡只能是相对的，相对平衡只有在必要时，只有在最先进的方面在对立统一中占主导地位时，才会导致历史的进步。在工农业矛盾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逐步实现工业对农业的支配，同时消除农村和城市、工人和农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只有工业占主导地位才能向这个方向前进，而社会主义建设只有以农业为基础才能前进。这一矛盾的彻底解决，是建立在工农相对平衡的基础上的。

□ 努力将整个社会、农村和城市转变为一种高级社会组织形式，即人民公社。

1964年11月，毛主义左派的一篇文章驳斥了“合二为一”可以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谬论，认为：

“生死斗争是对抗性矛盾的斗争形式；相反，是非对抗性矛盾的斗争形式。（……）但就像所有其他矛盾一样，红色和专家之间的矛盾**必须通过矛盾的两个方面的面对面斗争来解决**，以一个方面代替另一个方面，而不是“合而为一””。（高大胜、冯玉昌）¹⁰⁷

红色和专家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和一切矛盾一样，只能通过斗争来解决，不是一般的斗争，而是矛盾的两个方面面对面的斗争，用一种替代方式来解决。另一个方面。这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但仍然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之间的正面的、渐进的斗争。对于主要矛盾方面的问题，同一篇文章中强调：

“在红色与专家的矛盾中，**红色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熟练的指挥和灵魂**；当红色和专家之间的不平衡为发展壮大，只有特产，没有红色。所以，解决红色与专家之间的矛盾，就不能不涉及红色问题；‘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的斗争必须提前进行，这样才能既达到红色又达到专家。”（高大胜、冯玉昌）¹⁰⁸

修正主义者杨献珍歪曲了分析与综合的概念，指出一切矛盾的解决都是通过合二而一来解决的。一分为二的分析只是掩饰他对毛泽东主席的敌意的一个诡计。A 杨献珍的哲学歪曲，把对立统一变成了对立面之间的不解之缘。由于这种联系是不可分割的，根据修正主义者的说法，矛盾的解决只能通过协调或调和这两个矛盾的方面来实现。

毛主义左派在哲学大辩论中的攻势，一旦受到反击，这个谬论将凸显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论点。证明一个过程的开始是作为一个一分为二而发生的，它的解决也是通过对立统一的分裂、通过这一统一的解体而发生的。当一个方面转变为它的对立面时，现象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或者一个新的过程就会出现。如果对立统一是不解的，那么主导的方面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主导的方面。这种对立的相互转化是通过旧的矛盾统一体的瓦解而发生的。因此，对立面的同一性在其最重要的意义上也是一分为二的同一性。当一对既定的对立消失，出现一个新的对立统一的新过程时，这种矛盾的解决也是一分为二的：方面从旧的对立统一中分离出来，旧的方面走向了新的方面。历史的垃圾和新的方面一分为二，开始了新的进程。

《北京评论》上毛泽东左派的文章强调：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本质是事物内部的矛盾状态及其可分性。恩格斯指出：“辩证法从我们迄今为止对自然的经验结果证明，一切极对立的事物都是由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这些对立面存在着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联系和联合之中，相反，它们的联合只存在于它们的分离和相互联系仅存在于它们的对立中”（自然辩证法）。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在不忽视两个对立方面之间的斗争和分离性的情况下谈论它们之间的联系。两个对立方面之间的斗争，必然会导致其相互联系的破坏、实体的解体和事物本质的改变。因此，两个对立的方面之间的联系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它们的分离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大众批评写作小组 革命）¹⁰⁹

对杨献珍关于矛盾方面不可分割的联系哲学证伪的驳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先前的表述，正是强调一切矛盾中相互依存与可分离的统一。从而强调团结肯定相互联系，斗争导致对立方面的分离，从而导致事物性质的变化。这个基础在《矛盾论》中已经有了，但两条路线斗争的历程却凸显了这些方面，并指出了它们的发展。1937年，毛主席确立：

“认识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要了解各自在矛盾中所处的具体地位，与对方的相互依存、矛盾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在双方处于矛盾状态时与对方进行斗争的具体手段。”相互依存，以及相互依存破裂后的矛盾。”（毛主席）¹¹⁰

毛主席在这段话中已经指出，矛盾的解决是通过相互依存的破裂，通过对立统一体一分为二，从而使矛盾瓦解，产生新的过程或现象。反对修正主义哲学歪曲的斗争鼓励左派回归这一原则，并用新的论据来发展它，以镇压右派。毛主义左派1964年7月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表述的：

“然而，在我们看来，不同的定性过程不能相互混合。形成不同过程的不同本构对立不能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如果一个新的过程已经开始，那么这个新的过程绝不是“合二而一”的产物，即两个对立的矛盾的结合。

旧的过程，但它是旧过程中的矛盾的一方面战胜了另一方面的过程，通过解决矛盾和解决旧的过程而结束旧的过程。更换为新工艺。”（钦简）¹¹¹

正如前面所强调的，在对立统一中，新的方面作为主导的方面出现，通过与主导方面的斗争中的数量积累，新的方面不断发展，直至成为主导。从弱者主导到强者主导，这是现象本质的质的飞跃。在新现象中，同一矛盾对的连续性，在相反的位置上，随着旧的方面寻求恢复主导地位 and 新的方面（现在占主导地位）寻求清算过时的方面而发展。矛盾的解决或其客观的综合，构成了这种统一的分离和瓦解，新的事物完全战胜了旧的事物，新的进程出现了。

大论战公开结束。这篇文章总结了这场论战中最成熟的表述，并明确指出矛盾律是辩证法唯一的基本法则：

“对立统一是事物内部对立面不断斗争的统一。（……）对立面之间不断的斗争不断地使他们的统一走向分裂和瓦解。而且，分裂和解体迟早会成为现实，那么事物就会发生转变，从旧的运动形式到新的运动形式，从量变到质变，从肯定到否定。这正是一个一分为二的过程，这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本质。”（艾思琪）¹¹²

哲学大争论中捍卫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原则的斗争，推动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关于黑格尔在《科学》中确立的辩证法三大基本规律之间联系的问题的解决。逻辑学。正如前面所强调的，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已经论证了，量变质的基础是矛盾律。一分为二的答辩过程中，问题的最后一个环节就完成了。否定之否定是根据矛盾律来解释的 特别是通过一分为二的合成。

当在辩论过程中强调一个过程的开始和它的解决都是根据统一体的分裂和可分离性的单一且相同的辩证原理发生时，很明显，过程的起源，矛盾的发展和解决是从量变到质变，**从肯定对立统一到否定同一对立统一**。这表明主导方面是寻求肯定对立面的统一，通过斗争强加对立面的统治，从而防止统一的瓦解。反过来，新的、占主导地位的方面，是寻求通过斗争来**否认对立统一**、消解这种统一，并通过斗争将自己转变为占主导地位的方面——否认 因此，旧的矛盾开启了一个新的过程，或者一种具有新性质的现象。

在左翼干部和艾思奇在哲学大论战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这个提法中，它以一个提法出现，围绕一个辩证原理，这三个概念是什么？辩证法基本规律：一分为二是矛盾律的本质，揭示量变质、变肯定变否定不构成规律 脱离矛盾律。量变到质变、从肯定到否定的对立统一，是矛盾律不可分割的要素。在任何和所有事物和现象的矛盾是立即产生的，即事物或现象只能作为对立统一和斗争而存在。反过来，每一个矛盾的解决都不是立即的，而是一个过程的结果。一切矛盾的解决过程，都必然经历一个量变转化为质变的阶段。反过来，对立方面的斗争始终是主导方面肯定对立统一性的斗争，与被统治方面否定对立统一性的斗争。

通过将否定之否定建立在矛盾律的基础上，将其普遍形式定义为对立统一体从肯定到否定的运动，哲学大辩论

阐明了伟大的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阐述中的最初贡献并与之建立了联系。毛主义左翼的一篇文章引用了《神圣家族》（1845）中的重要引述，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青年黑格尔派的形而上学概念进行了结算。这些段落以富有启发性的方式说明了矛盾律是如何肯定和否定对立统一的基础：

“无产阶级和财富是对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形成了一个整体。两者都是私有财产世界的形式。**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在对立中所占据的确定位置。**仅将它们澄清为整体的两个方面或极端是不够的。该物业私有财产在作为财富的私有财产的条件下，有义务维持其自身的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其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面的积极一面**，即自我满足的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必须废除自身，并随之废除其制约性的对立面，也就是将其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私有财产。**这是对对立面的消极面**，它本身就是不安定的，是不断消散的私有财产。（……）**因此，在这一对立中，私人所有者是保守的一方，而无产阶级则是破坏性的一方。从第一个开始，旨在维护对立的行动，从第二个开始，就是消灭这个对立的行动。**”（马克思）¹¹³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对立统一体。资产阶级在矛盾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被迫维持自己的存在，也被迫维持其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无产阶级构成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来源。资产阶级是矛盾的积极一方，因为它肯定这种对立统一，因此，保守一方则千方百计地试图保持这种统一。无产阶级是矛盾的消极面，它需要废除资产阶级的统治，并随之废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因此，无产阶级是破坏性的一面，它寻求革命性地否认塑造资产阶级社会的对立统一。

肯定和否定对于所有现象都是普遍的。正如已经看到的，否定的否定对于某些类型的现象来说是特有的，在这些现象中，两个相反的单位发生了连锁的、必要的顺序解决。因此，与 UOC（毛主义）在其最新关于否定之否定的言论中所说的相反，当毛主席谈到肯定与否定时，他并不是在修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法律名称的同时，他也在改变其内容，以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世界观。

这一重大的哲学发展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中国共产党内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先于并成为了 GRPC 火焰的燃料和火花。正如《北京评论》1971 年的文章所总结的那样：

杨思辰‘合二为一’的反革命理论一出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揭露了其本质，指挥和发动了对杨思辰的公开批判。**不久，汹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洪流，把杨献珍和他的师父刘少奇以及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扫入了历史的堆里。（革命群众批评写作组）¹¹⁴

与此同时，这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并有助于准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哲学争论是以矛盾律为中心的，正如毛主义左派的一篇文章所强调的那样：

“这场争论的中心是是否应该承认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的根本规律这一事实**以及是否应该承认这一事实。或者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饶庆晃）¹¹⁵

这就是提出的问题。贡萨罗主席、秘鲁共产党和秘鲁人民战争的领导层必须以最严格的科学基础来认识、计划和维持矛盾律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此外，贡萨罗主席是第一个将矛盾律应用于研究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的人，并确认它是最重要的。单一的科学意识形态。这样，贡萨罗主席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发展的必要阶段是与客观现实、社会和世界的运动相对应的。强调新的阶段对应着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必然发展，即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伟大飞跃。

质量作为一个整体。巧妙地处理长期人民战争的阶级斗争中的矛盾规律，将把毛主义定义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发展的新的、第三个和更高的阶段，主要是毛主义：无产阶级国际，因为科学、真实而无所不能。在这个定义中，他将毛主义描述为意识形态三个构成部分作为一个整体的巨大飞跃，牢固地结合其他结论，确立矛盾律是辩证法唯一的基本规律，因为它是支配一切的规律。永恒的物质在其不断的转变中，在其所有的表现、自然、社会和人类思想。从而明确地解决了意识形态阶段的普遍性与具体应用的特殊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充分阐述了思想指导理论是每个共产党人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其各自国家的革命，是国际无产阶级在其最发达和优越阶段的意识形态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该国具体和特殊现实，并与该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同一个国家。因此，贡萨罗主席向世界各国共产党人指出，要重建/建立军事化的共产党，以在本国引发更多的人民革命战争，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并将毛主义作为他们唯一的指挥、指导和扫荡。赶走帝国主义和地球表面的整个反动势力。

2- 阿瓦基安和普拉昌达：修正主义、投降和哲学证伪

矛盾律作为唯物辩证法唯一基本规律的丰富过程，跨越了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一个多世纪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先进的理论表述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 MCI 两条极其重要路线的斗争的结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挑战性问题提供了必要的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证实，从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共产主义先锋队内部的修正主义现象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在客观现实或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往往会增加。它的要求，其中新的和关键的问题向革命者提出，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有两个历史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现象：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 1949 年的中国，面对不间断地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挑战，反对刘少奇路线的斗争更加深入；1905 年革命失败后，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修正主义是投降的意识形态表现，无论是在重大挫折的情况下，还是在对于革命者来说意味着巨大挑战和风险的积极情况下。此外，修正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内部的反动资产阶级流派，力求以马克思主义色彩为投降奠定基础，以掩盖其阶级内容。修正主义不可能在理论上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因此，叛徒们就不可避免地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妄图以理论为基础，掩盖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制造公共利益。证明他们合理的意见。因此，阶级及其先锋队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原则和基础，是制定和维护红线、必要揭露和消除修正主义立场的重要武器。

详细研究矛盾律的建立及其一分为二的基本原则，不仅可以正确平衡 RPM 和 MCI 过程，而且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革命的新问题，如何区分阿瓦基安、普拉昌达、米里安和其他修正主义者的 LOD 哲学的确切内容。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它们在形式上的分歧背后，有着相同的内容，相同的反动唯心形而上的资产阶级哲学。阿瓦基安认为矛盾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普拉昌达则认为除此之外，还必须包括数量与质量的规律以及否定的否定；然而，他们都反对，并且暗中反对，但以敌对的方式，反对它的内容。革命矛盾律。阿瓦基安在形式上捍卫一分为二的原则，普拉昌达在实践中运用了两种对立原则之间的融合：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然而，两者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应用了合二为一的修正主义原则。

阿瓦基安主义和普拉昌达主义这两种新近形式的修正主义，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本质：20 世纪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本质上是消极的平衡，对斯大林同志和毛主席的荒谬批评，在面对问题时的畏缩。反对美帝国主义，捍卫社会主义中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持久团结，以及重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两者都代表了同一类型的右翼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阿瓦基安主义有责任在毛主义内部发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审查和否定。阿瓦基安自 1981 年以来系统地进行了伪造。普拉昌达主义负有将这些概念付诸实践的具体革命进程的责任，可耻地背叛了尼泊尔人民战争。

UOC（马列毛主义）自 20 世纪 90 年代成立以来，就分享了许多 1980 年代初的阿瓦基安主义教条。尽管他们没有公开承认，但他们对帝国主义、他认为哥伦比亚农村不再存在半封建关系，该国革命的性质已经是直接社会主义的，这些观点都是基于阿瓦基安提出的修正主义论点。UOC（马列主义）采取阿瓦基安主义立场，反对世界上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普遍性，这就是为什么它认为 1984 年的 MRI 宣言相对于 1980 年秋季会议宣言来说是一个挫折。例如，UOC（马列毛）创始人表示：

“在继续研究 MRI 及其成员提到[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革命]问题的方式之前，似乎有必要提及阿瓦基安同志提出的引起关注的呼吁（.....）。这种反马克思主义、反唯物主义的倾向有时达到了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高度，从字面上理解了塞卡斯在《论新民主主义》一书中提到被压迫国家时所用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字眼。革命应该经历两个阶段。” [UOC（马列毛）] 116

在其迟来的、不充分的、没有任何对普拉昌达主义和阿瓦基安主义的自我批评中，UOC（毛主义）分别将尼泊尔修正主义者描述为右翼机会主义，将“新综合”的“英雄”描述为“中间派”。他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掩饰他以前与 1980 年代阿瓦基安修正主义论点的联系，二是否认他在 2001 年至 2006 年期间与普拉昌达主义的趋同，当时普拉昌达的投降和哲学歪曲变得越来越明显。UOC（马列主义）在其期刊中，不厌其烦地将尼泊尔人民战争颂扬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即使是在修正主义迹象已经太多的 2005 年明显¹¹⁷。这种支持不仅限于对尼泊尔革命的军事征服的合理热情，还延伸到与普拉昌达修正主义论点的融合：

“在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的领导下，人民战争推进了进攻战略，作为**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创造性结合的一部分**，在为期四个月的单方面停火中，群众对党的支持社会政治力量的指导和联合反对尼泊尔君主制。” [UOC（马列毛），2006 年 2 月] 118

公然捍卫普拉昌达主义融合、整合、结合、调和两个对立方面的理论：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它没有提出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和平斗争只有为武装斗争服务才合理的问题。相反，他们公开捍卫这一矛盾的两个对立方面之间的和解。这种和解只能导致群众解除武装和背叛革命。2006 年 3 月，UOC（马列主义）赞扬了 PCN（毛主义）的修正主义领导及其腐烂的修正主义路线，其措辞如下：

“自人民战争开始以来，党[PCN（M）]一直坚持正确的路线（.....）。尼共（毛主义）所奉行的**正确政治路线**，以坚定的战略和灵活的战术为基础，使其在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以至于今天的力量共产党控制了尼泊尔 80% 以上的领土，因为他们采取灵活的策略，在不牺牲新民主主义国家战略的情况下，赢得了议会各党派的支持，形成反对君主制的统一战线”。 [UOC（马列毛），2006 年 3 月] 119

同年 2006 年，UOC（马列主义）大声攻击尼共（毛主义）领导层的投降和普拉昌达的修正主义。它自诩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开批评并不遗余力地指责委员会的米格尔·阿隆索同志的组织。

重组加利西亚共产党，要求公众进行自我批评。然而，UOC（马列主义）从未提及先前与普拉昌德主义论点的趋同，也从未对此进行过丝毫的自我批评。

通过对矛盾律的确立过程和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中一分为二的原则的分析，让我们继续讨论揭露阿瓦基安、普拉昌达的哲学歪曲以及 UOC（马列毛）与他们的融合。

2.1-阿瓦基安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哲学证伪

20 世纪 70 年代末，美国共产党积极行动，谴责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的反革命政变和逮捕中共左翼路线领导人，特别是江青同志和张忠同志。潮。此外，它与智利共产党一起召开了 1980 年秋季会议，汇集了寻求扭转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共产主义势力分散的革命政党和组织。尽管提出了积极的倡议，但秋季会议讨论文件的思想 and 政治内容的局限性已经暴露了阿瓦基安的投降主义立场。该文件分析了邓小平修正主义中国的国际政策，得出的结论是：

共产国际以前所犯的某些非常严重的错误的极端延续，特别是在苏联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特别是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PCR-美国和 PCR-智利] 120

该文件暗示，叛徒滕的国际路线是斯大林同志路线的延续。提议召开秋季会议的文件中的这一内容和其他违禁品只是阿瓦基安面对无产阶级暂时失败时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动摇的一个例子。随着 1975 年越南战争的结束，美国革命斗争的退潮，随着 1976 年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以及随着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失败（1975 年）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尼加拉瓜（1979 年）和伊朗（1980 年），伊斯兰神权政权顺从并实施了对共产主义者最残酷的镇压，是阿瓦基安意识形态断裂得以巩固的环境。由此而来的是阿瓦基安在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寻找“错误”的险恶道路，他可以用这些错误来将这些错误描述为暂时失败的原因。阿瓦基安因此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知识论，并开始像修正主义者杨献珍一样，将每一个错误和每一次暂时的失败视为哲学观念缺陷的结果。

从 1981 年到 1984 年，阿瓦基安及其同伙系统地进行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歪曲，目的是为其修正主义路线提供理论基础，并影响 MRI 的成立会议。1981 年，阿瓦基安在以下文章中提出了他的哲学歪曲：再次论辩证法问题，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哲学基础和世界层面的主要和根本矛盾。在这些文章中，阿瓦基安攻击了完全确立的矛盾律的基础毛主席。还是在 1981 年，阿瓦基安在文件《征服世界？》中提出了他对 MCI 历史的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评估，其中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工作进行了泼脏水。1984 年，他们通过以雷蒙德·洛塔名义出版的《衰落中的美国》一书，完成了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帝国主义内部矛盾是帝国主义世界主要矛盾的腐朽立场。资本主义阶段。

新综合”的新颖性并不是 21 世纪产生的，而是一条已经创建了很长时间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且是在已经存在的论据中烹制的。由阿瓦基安在 MRI 成立之前于 1984 年制定。分析这些文本对于证明 1984 年会议主要代表阿瓦基安主义路线的失败非常重要，因为其大部分论点都被参加会议的政党群体拒绝。被拒绝的阿瓦基安主义论点正是 UOC（马列毛主义）感到遗憾的地方，这些观点出现在 1980 年宣言中，但没有出现在 1984 年宣言中。

复杂的修正主义揭示了 1984 年宣言中仍然包含的消极方面都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制定的阿瓦基安主义违禁品。

叛徒阿瓦基安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对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的评价可以概括为他的以下言论：

“（……）没有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列宁主义，毛主义就是民族主义（在某些社会背景下也是沙文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阿瓦基安，1981）¹²¹

在所谓的列宁主义辩护中，阿瓦基安对国际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污蔑，列宁主义将提升马克思主义，同时支持毛主义。尽管他正式宣称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但他的整个评估却指向相反的方向；面对暂时的失败，阿瓦基安在思想上崩溃了，只能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堆错误。显然，他对列宁主义的辩护是错误的，以至于阿瓦基安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

“（……）列宁的这个推理有一定的资产阶级逻辑”。（阿瓦基安，1981）¹²²

而对于毛主席，阿瓦基安无耻地宣称：

“（……）即使在毛泽东那里，尽管与他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贡献和发展相矛盾，但在这方面却表现出了一些与民族主义倾向相互关联的形而上学倾向。”（阿瓦基安，1981）¹²³

这是叛徒阿瓦基安的意识形态平衡，他在 1990 年代受到 UOC（马列毛主义）的赞扬，并在 2000 年代初被描述为中间派。后来，在批评普拉昌达明显的投降主义时，阿瓦基安试图表达他对普拉昌达明显的投降主义的悲观评估。MCI 伪装成革命辩证原理：

“（……）[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正在‘一分为二’：其革命、正确、科学的核心，反过来又得到验证，正在推进到新的水平；政治和理论中已发现的仍然次要的错误是真实且有害的，作为实现所需飞跃的一部分，有可能也有必要与它们作斗争。”（PCR-美国，2012 年）¹²⁴

阿瓦基安的又一个小资产阶级哲学歪曲。可见，国际无产阶级的思想在各个阶段都有过成功和错误，主要是依靠前者，通过纠正后者，积累管理经验，不断进步。更接近客观真理。但在每个阶段，被定义为无产阶级学说的要素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 170 多年来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所证明的真实方面。因此，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是一套无数的综合真理，作为一种科学学说，而不是成功和错误的堆砌。就像宇宙中的一切一样，国际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是一分为二的，但不是分为对与错，而是分为普遍真理和特殊真理。马克思主义中提出的一些真理仅适用于 19 世纪的欧洲，它们是特殊的真理，但在今天已不再具有普遍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犯了错误。国际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阶段的飞跃，主要是根据解决国际阶级斗争舞台上和各国中出现的和将永远出现的新问题的需要而变化的。

阿瓦基安的伪科学是“错误”的猎手，是一个没有任何革命实践的典型小资产阶级，超越了他对他人革命实践的解读和思辨表述，没有真正的阶级斗争实践的风险。他在讲坛上发表自己的判决，对那些真正冒险从事进化工作的人进行审判，他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犯一定的错误并遭受失败，但他们坚持斗争，纠正错误并前进。取得胜利的前锋，遭受新的失败，他们坚持到底，直到战斗完全胜利。针对这类人，列宁有力地宣称：

“资本家及其走狗（包括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主义者）尖叫着说我们犯了错误。100个错误的背后，有100个伟大而英雄的行为，有100个简单、谨慎、隐蔽的行为，就在工厂或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列宁）¹²⁵

为了维持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投降主义平衡，阿瓦基安必须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即矛盾律。像每一个修正主义者一样，阿瓦基安认为这次攻击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表述。阿瓦基安的诡计是针对矛盾律的基础之一来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否定之否定的运用。攻击恩格斯基于否定之否定的大麦循环例证，阿瓦基安指出：

“[恩格斯指出]磨碎这粒[大麦]不会导致否定的否定，他认为‘每一种事物都有其特有的被否定的方式’（《反杜林论》）。但这和辩证法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谁说，一切事物都有其‘特有的’被否认的方式？在我看来，这充满了预定性和事物本质不变的概念。毛泽东反对这种思想，他指出遗传和变异是对立的统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否定之否定的概念是如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实际基本规律——对立统一——相矛盾的。（矛盾）。”（阿瓦基安，1981）¹²⁶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阿瓦基安主义伪造的典型过程：它将一种经典与另一种经典相对立，以攻击两者立场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就与伟大的恩格斯处于对立的地位。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否定之否定与毛主席矛盾律之间设置了一道中国墙。这样做是为了在第一步中找到一个重大“错误”，并在第三步中找到一个所谓的“解决方案”。然后他解释了每个人的错误，并以救赎者的身份出现，在他的“新综合体”中纠正了所有这些错误。这是一个可耻的、伪造的程序。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在第一阶段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恩格斯（反杜林论）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表述从否定的否定走向了矛盾。我们还看到，否定之否定与矛盾之间不存在这种对立；毕竟，否定之否定只是解决对立统一的一种特殊形式。此外，阿瓦基安的篡改是如此卑鄙，他声称是毛主席在大麦的生命周期中发现了遗传与突变的对立统一，而指出这一矛盾的是恩格斯本人：

“遗传与适应之间的永久冲突如何影响着一切进展，一方面发展为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发展为人类。”（恩格斯）¹²⁷

修正主义的典型伎俩：以小文本造假，大盗意识形态内容。阿瓦基安说，否定之否定“带有预定性的意味”，他认为恩格斯关于每件事物都有其特有的被否定方式的推理是荒谬的。对于叛徒来说，这样的结论将构成决定论、目的论。发现现象的必要规律是科学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因此将自己构建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本人将他的科学发现总结如下：

“就我而言，我不值得被认为发现了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或阶级之间的斗争。早在我之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就揭示了这场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揭示了他们的经济解剖。我再次做的是：

1. 证明阶级的存在仅与生产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有关；
2. 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 同样的专政只是构成了向克服所有阶级和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¹²⁸

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马克思发现的社会规律，而不是他构建的目的论预定。资产阶级社会有一种特殊的被否定的方式，这种形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克服社会阶级的过渡，即共产主义。总统

与魔术师阿瓦基安的说法相反，毛泽东并没有反对这一点。相反，它把对立统一中的新方面必然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否定旧的对立统一作为普遍规律：

“我们经常谈论‘以旧换新’。这就是宇宙的普遍且不可更改的法则。一种现象向另一种现象的转变，通过跳跃的形式，其形式根据现象本身的特征和其所处的条件而变化，这是新旧交替的过程。无论何种现象，新旧矛盾总是存在的，这就决定了一系列曲折的斗争。这些斗争导致新的成长并上升到主导地位，而旧的则相反地衰落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去死。一旦新的事物对旧的事物占据主导地位，旧的现象就质地转变为新的现象。”（毛主席）¹²⁹

每个过程都有一种特定的被否定方式：新的方面否定旧的过程，成为主导方面并改变现象的质量。恩格斯与毛主席的对立无非是阿瓦基安主义的歪曲。他要否定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在人类的活动过程中，通过社会实践，人的意识能够反映现象的本质，发现现象的规律，从而按照其目的改造现实。对于资产阶级科学，对于它的反动相对主义哲学来说，这就是决定论。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就是科学，就是唯物主义，就是辩证法。

阿瓦基安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使用否定之否定，意图以科学批评的形式走私哲学相对主义。与米歇尔·福柯及其同伴（现在学术界流行的腐烂的后现代主义的先驱）的小资产阶级哲学非常一致，阿瓦基安反对矛盾律，即新旧交替是“新的”。宇宙的普遍且不可侵犯的法则”。阿瓦基安反对这一普遍真理，并通过他的一位部下指出：

综合的过程，是新的创造的过程，这只能通过与旧的斗争来进行并最终取代旧的。”（莱尼·沃尔夫，1983）¹³⁰

和：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想法越符合现实，它改变现实的路径就越难以预测。”（莱尼·沃尔夫，1983）¹³¹

20 世纪 80 年代初，阿瓦基安以这样荒唐的悖论展现了他的相对论唯心主义。2000 年代，他甚至使用更粗暴的伪造手段来假冒违禁品。阿瓦基安分析了马克思所引用的一段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限制的需要的段落，他狡辩如下：

“关于‘必然’这个词：我不得不说，对我来说，马克思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必然’的确切含义并不完全清楚，但‘必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区别——而‘必然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阿瓦基安，2019）¹³²

一如既往，阿瓦基安一如江湖骗子，最初试图区分“必然性”与必然性。然后实现你的真正目标：

“共产主义的目标，导致它的必要过程——革命和社会的深刻变革，最终是整个（……）以及这场革命的可能性（不是必然性，而是可能性）：不是所有这是通过一些建立的主观和乌托邦幻想的类型，如果没有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在这里，正如将可能性与必然性进行对比的观察所表明的那样，一个关键的区别和一个深刻的方法论问题开始发挥作用。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从其创立的那一刻起，就存在一种“必然主义”的倾向——错误地认为：历史的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的胜利（……）。”（阿瓦基安，2019）¹³³

阿瓦基安将必然性与必然性相对立，然后将必然性与可能性相对立。这就暗中否定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把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变成了可能性。否认需要共产主义，将其转化为小资产阶级趣味，成为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这就是阿瓦基安哲学证伪的意识形态目标。因此，他把毛主席与恩格斯对立起来，显然是想用否定之否定，从本质上纠正矛盾律。

但阿瓦基安并不只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论，即反映社会客观规律来改造它、按照这些规律行动、改造必然性的可能性。阿瓦基安除了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之外，还是一个形而上学家，他反对辩证的世界观，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的转化都是从其内在原因发生的；外部条件影响现象的发展，但总是通过其内部矛盾起作用。

作为对 MCI 的投降主义评估的一部分，阿瓦基安指出了恩格斯、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做法中所谓的民族主义“错误”。他认为，这种“错误”与给定过程中内部和外部因素之间关系的形而上学概念有关。阿瓦基安巧妙地处理了非对抗性矛盾中的对立面，就像合二为一原则的修正主义捍卫者所做的那样，阿瓦基安的模仿如下：

“[对毛泽东来说].....内部原因实际上相对于外部原因来说是首要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种形而上学地构思和应用这一原则的倾向，这与中国党内的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有关，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事实上，这种倾向与《矛盾论》中强调的另一条原则相反：“鉴于事物的多样性是不可估量的，其发展是无限的，在一种情况下普遍的东西在另一种情况下变得特殊，反之亦然。”。

这意味着在一种情况下内部的东西在另一种情况下变成外部的，反之亦然。例如，中国（或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自身的特殊矛盾，并且在一定背景下，世界其他地区（以及其中的斗争和变革）

□ 外部（中国或美国等）。但也确实，在另一个背景下，中国和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构成了世界（人类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其内部矛盾和转型是由一个普遍的规律决定的。矛盾感 资产阶级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特定国家的阶级（和民族）斗争的发展、革命局势的发展等更多地取决于世界整体的发展，而不是特定国家的发展。**

— 不仅被确定为变化的条件（外因），而且被确定为变化的基础（内因）。”（阿瓦基安，1981）¹³⁴

阿瓦基安是一个故意混淆视听的阿谀奉承者。首先，它说毛主席以形而上的方式来认识内因（作为基础）和外因（作为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这两个对立的方面之间似乎没有对立的同一性。这是一个公然的谎言，因为毛主席在《矛盾论》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例子，说明一个国家的内部变革如何意味着外部条件，即整个世界的质的改变：

“唯物辩证法排除外因吗？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基础，外因是通过内因发生作用的。（.....）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影响。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互动是极其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开创了俄罗斯历史的新时代，也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已经产生了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内部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内部变化。然而，这种变化**是通过包括中国在内的上述国家各自的国内法发生的。**”（毛主席）¹³⁵

毛主席对于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理解中的民族主义是什么？毛主义对关系的表述中什么是形而上学

给定过程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之间的关系？毛主席决不否认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之间的矛盾的统一性。从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即某个国家的内部变革，决定了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这在哲学上意味着什么？一个国家的内部状况已经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决定和影响世界各国。但这种对立统一并不否认一个辩证原理，即事物发展变化的基础始终是内因。毕竟，正如毛主席所强调的那样，俄国革命所决定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根据并通过各国的内部矛盾而在每个国家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例如，GRSO 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变化，从旧式的民主革命现在必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然而，大革命并没有改变法国大革命的性质，法国大革命一如既往地要求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阿瓦基安除了歪曲和谎报毛主席的哲学和思想结论外，还歪曲了反对者身份的内容。根据唯物辩证法，一个方面转化为它的对立面意味着主导的方面变成了被支配的，反之亦然。阿瓦基安伪造了这一内容，并声称在给定的上下文中，对立面变得等于其对立面，从而消除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对于阿瓦基安来说，在某些情况下，外部=内部，反之亦然。因此，当他指出在给定的背景下，世界（即外部世界）变成了内部世界，成为变化的基础时，他达到了诡辩的高度。这样，它就把资本主义进程的根本矛盾（社会生产×私人占有）归结为这个世界的**内部矛盾**。如果世界变成了“内部”，那么外部又会是什么呢？每个特定的国家或银河系？也不是，因为阿瓦基安的对立同一性是旧有的绝对对立同一性，对他来说，相互转化并不是对立面互相争斗，改变立场，同时保持差异和相互斗争。对阿瓦基安来说，相互转化就是对立面的平等化，内部和外部不再有区别，一场“革命”立即出现，是国际性的。但这只能是一场推测性的“革命”，因为阿瓦基安否认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各个国家发生，也就否认了这些国家之间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等。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它只是腐烂的托洛茨基主义观念的重新发行，否认单一国家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非偶然，他无耻地说：

“我们必须在‘民族虚无主义’光荣的思想旗帜下，气势磅礴、坚定前行。”（阿瓦基安，1981）

136

阿瓦基安对矛盾律的攻击还不止于此。阿瓦基安以一种伪左翼的选择来对抗主要矛盾，并声称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同时全方位地与敌人作战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在攻击了毛主席所谓的“不以外部条件为内部条件”的“民族主义”之后，阿瓦基安指出：

“与此同时，毛泽东身上还表现出一种反复出现的倾向，即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一一**击败敌人的政策转化为原则**。”（阿瓦基安，1981）¹³⁷

和：

“没有任何原则规定我必须这样做；**如果我有能力一次性打败他们**，那么我就必须与他们对抗，将他们化为碎片，这样对整个世界来说就更好了。国际无产阶级。”（阿瓦基安，1981）¹³⁸

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阿瓦基安，一个王明，一个战斗将军的闹剧。哲学上的歪曲是：1) 主观唯心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变成纯粹的“可能性”；2) 否认内因是现象转化的基础，外因是现象转化的条件；3) 否认现象中主要矛盾的存在，主张一次性解决所有矛盾。这些哲学上的歪曲是阿瓦基安主义者制定修正主义路线的一部分。从以下角度来看

历史唯物主义，阿瓦基安，仍然在 1981 年，反对马克思主义发现的规律，即“（……）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引擎”¹³⁹。根据叛徒的说法：

推动这一过程的动力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尽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矛盾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对劳动力的剥削是剩余价值被创造和占有的形式和方法，但导致这些生产者在更强烈和更广泛的历史范围内剥削工人阶级。**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动力**，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表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全面发展。**如果不是这些商品生产者彼此独立存在，同时又被价值规律的运作交织在一起，他们就不会感受到同样的剥削无产阶级的强制——资产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可以减轻。这是资本扩张的内在强制**，解释了这种生产方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活力，这是一个不断改变价值关系并导致危机的过程。”（阿瓦基安，1981）¹⁴⁰

修正主义者的无耻是没有限度的，阿瓦基安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转化为资本主义进程的驱动力。如上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家之间竞争的重要性，表明资本主义财产如何通过竞争导致资产阶级本身对生产资料的剥夺。这确实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因素，但把这一矛盾转化为历史的动力，无非是廉价的修正主义。此外，阿瓦基安的结论是，如果没有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是可以减轻的；这与叛徒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的垄断倾向可以缓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的道理是一样的。阿瓦基安说，正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导致这些“生产者”以更加激烈和广泛的方式剥削工人阶级。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资本的自我扩张运动有一个明确的根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这种生产关系以剩余价值作为其特定的产品，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未支付而转化为资本的劳动。资本产生剩余价值，积累的剩余价值就成为资本。这就是马克思发现的资本自我扩张的经济过程。自由竞争是这一过程不可或缺的外因，但其基础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剩余价值、无偿劳动、利润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动动力。资本的自我扩张是其不可避免的结果；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越自由，这种自我扩张就越快，资本的集中就越快，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就越尖锐，解决它的条件就越有利。然而，解决这一矛盾只能通过思想上强化矛盾的主导方面，即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社会生产中反对私有制的斗争的社会和政治代表阶级。资本家是根本矛盾的主导方面的个体代表，他们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在自由竞争阶段，还是在垄断阶段，帝国主义阶段，他们影响矛盾的解决，但不决定矛盾的解决。只有矛盾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才能解决矛盾。

《衰落中的美国》一书中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证实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证伪。作为典型的修正主义程序，他们从一个小小的文本造假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原则进行重大歪曲。洛塔指出：

“社会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有两种表现形式、**两种运动形式**：（1）个体企业（或更高、更综合的所有制水平）的组织性与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作为一个整体；（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关系矛盾。**恩格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通过其内在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而发生变化的。（……）反杜林论的这段话的理论和政治含义需要进一步解释和阐述。一、根本矛盾

资本主义构成了这两种运动形式的基础材料。（……）但再次强调一点，**无政府状态驱动的运动是社会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主要运动形式。**”（洛塔，1984）¹⁴¹

洛塔指出，恩格斯已经确立了基本矛盾运动的两种形式，但这一表述缺乏进一步的发展，而他和阿瓦基安在确定这些形式中哪一种为主要形式时适当地完成了这一工作。他们歪曲恩格斯的名言，故意为他们的腐朽理论寻找马克思主义的虚假基础，即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产阶级之间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比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更重要。帝国主义。让我们回顾一下恩格斯的完整段落，看看他究竟是用什么术语表达的：

“社会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被再现为个体工厂的生产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在其根源所固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中发生变化。**”（恩格斯）¹⁴²

因此，恩格斯强调的矛盾运动的两种形式是：1) 社会生产与私人占有；2) 生产组织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两个都形式是不可分割的，但第一种形式显然是主要的，因为它构成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即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其相应的流通方式：自由竞争之间的关系。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自由竞争导致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洛塔伪造了这段话，说这两个人运动的形式是：1) 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2) 阶级矛盾。

但阿瓦基安和洛塔在过去几十年里在 PCR-USA 出版物中无数次出现的这种小文本欺诈，与他们试图通过这种伪造来证实的修正主义国际政治路线的内容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基于这套哲学歪曲和他们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进程和工运的投降主义意识形态平衡，阿瓦基安根据以下教条制定了他的国际路线：1) 帝国主义意味着将世界转变为一个和一个统一的世界。相同的生产流程；2) 因此，国际舞台成为各国革命的“内部”条件，一个国家的革命转型主要取决于国际形势，而不是取决于其内部矛盾的发展程度；3) 资本主义进程的根本矛盾是国际革命的“内部”矛盾；4) 这一矛盾的主要运动形式是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产阶级间、帝国主义间的矛盾；5) 这种根本矛盾运动的主要形式，决定了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国家“扫除半封建生产关系”的主要动力特征；6) 是矛盾的发展帝国主义是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一种发达形式，它为阶级斗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创造了条件。

让我们快速看看整个阿瓦基安主义哲学伪造的政治后果，总结为第 5 点和第 6 点。

“世界资本主义面临并必须纳入先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在全球范围内，**帝国主义致力于破坏和改变前资本主义的方式。**这是通过竞争的力量或通过直接资本化来实现的。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其结果是加速将农民从生存经济和农村手工业中驱逐出去。”（洛塔，1985）¹⁴³

因此，根据阿瓦基安和洛塔的观点，帝国主义保留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进步特征，这种特征通过解体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得以扩展。为了阿瓦基安主义帝国主义通过破坏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依赖构成民族压迫的决定性内部基础的半封建关系来发展并实现利润最大化。对于阿瓦基安主义来说，不仅是一般的帝国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也是如此：

“此外，帝国主义之间的世界大战首先是为争取较小或较大胜利而进行的军事争端，其直接结果在某些重要方面可能与持久扩张的经济结果并不相符（即使考虑到此类战争客观上重新构成了经济扩张的条件）积累。但如果忽略重新划分和重组的具体条款，个人和国家层面的资本主义组织就会发生飞跃，而且**全世界前资本主义关系也会解体。**”（洛塔，1984）¹⁴⁴

这是典型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帝国主义概念，与列宁主义的表述截然相反。列宁否定了帝国主义所谓进步性的整个论点，相反地表述道：

“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的时代，它在任何地方都带来了**统治的倾向，而不是自由的倾向。**无论政治体制如何，**都会有全面的反应**；这一领域的矛盾也极端激化：这就是这种趋势的结果。**民族压迫和吞并倾向也特别加剧，即侵犯民族独立**（因为吞并无非就是侵犯民族自决权）。”（列宁）¹⁴⁵

修正主义对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定义的歪曲，作为资本主义进程基本矛盾的主要运动的一种形式，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创造一个理论基础，为腐朽的阿瓦基安主义论点辩护，即帝国主义战争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阿瓦基安始终寄希望于一场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以此作为革命前进的条件。正如洛塔在 2014 年明确阐述的那样，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由此衍生的帝国主义内部矛盾：

“（……）它为改变社会和世界需要做的事情**奠定了主要舞台。**”（洛塔，2014）¹⁴⁶

对于这些修正主义者来说，阶级斗争不是历史的引擎，而是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发展，毕竟，正是这一矛盾的发展才为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每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时，**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带来了物质领域、社会领域的根本变化。**决定阶级斗争框架的变化。”（洛塔，2014）¹⁴⁷

CIMU 讨论基地对两条路线斗争的干预之一中，正确地揭露了阿瓦基安主义的哲学歪曲及其意识形态政治后果。在他的文件《揭开阿瓦基安主义机会主义》中，我们正在共产党人之间建立团结，其中指出：

“在关于基本矛盾运动的主要形式的论述中，阿瓦基安忽略了垄断及其对自由贸易的影响，因此也忽略了它对无政府状态本身的影响。”（PP-OP-马列毛）¹⁴⁸

在引用列宁描述自由竞争向垄断转变的重要段落时，他得出结论：

“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在我们眼中发生的事情’（即被证据所掩盖），不可能是未知的。这意味着，对于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当帝国主义（垄断）的强加取代了自由竞争时，**无政府状态就不再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也不是其他矛盾的动力。**”（PP-OP-马列毛）¹⁴⁹

这是阿瓦基安歪曲的要点之一，他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视为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与其帝国主义阶段没有区别。

面对这种资产阶级哲学基础，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这些伟大的歪曲之后，阿瓦基安之流只能根据他们的帝国理论制定投降主义策略。如果有条件的话

对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和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所创造的革命来说，共产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以及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剩下的就是等待这些条件成熟，然后……进行革命。阿瓦基安在宣扬反马列毛主义的论点，一再攻击国际无产阶级巨人的同时，还提出了他大胆的口号：

“一边加速，一边等待革命局势的出现。”（阿瓦基安，2019）¹⁵⁰

20 世纪的阿瓦基安投降主义及其所谓“新综合”的错误本身就已经太明显了。这里重要的是要证明这些立场是如何扎根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哲学证伪的。重要的是要证明马克思主义在所谓的矛盾律辩护和一分为二原则背后的证伪哲学内容。一些组织及其领导人一直酗酒来源。这是本主题中要揭示的最重要的问题。通过消除伪造，就更容易找到阿瓦基安主义哲学中反动的资产阶级内容；其相对主义本质及其对合二为一的修正主义原则的运用。阿瓦基安（阿瓦基安）应用了与普拉昌主义者相同的两种形式的整合，但他是通过不同的路线。普拉昌达公开宣扬矛盾的调和，而阿瓦基安则运用对立面的绝对同一性，并被“左派”话语所掩盖（这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

因此，就像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一样，他的唯心主义立场被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所扁平化，他在社会存在和社会存在之间建立了一种绝对的、形而上学的、非辩证的同一性。阿瓦基安在社会意识中建立了外部条件与内部矛盾、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绝对同一。显然，这种绝对同一并不是等比例出现的，而是对外部条件的肯定和对内部矛盾的压制，对理论的肯定和实践的压制。正如杨献珍的观念通过消除对立的斗争在调和矛盾的过程中，阿瓦基安的绝对同一性通过无视矛盾代表新的方面来消除对立面的斗争，即消除了革命实践与理论的统一，人为地消除了一个国家的内部矛盾作为基础。这个国家的革命转型的过程是以外部条件作为决定因素的。

阿瓦基安在他的“科学认识论”中完全压制了实践。他的理论与实践绝对一致的结果出现在他这样的表述中：

“（……）重要的是要看到这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实践。”（阿瓦基安，2008）¹⁵¹

换句话说，阶级斗争的具体实践、办公室、主席的理论实践的无风险实践，完全脱离了群众和阶级斗争的具体性。因此，阿瓦基安声称可以发展脱离革命斗争的革命理论，并否认群众在促进和锻造其科学意识形态方面的积极作用。阿瓦基安的科学观是资产阶级的真理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理论——实践，从群众到群众的运动，对他来说无非是一种“民粹主义认识论”：

“民粹主义和民粹主义认识论的这种普遍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渗透并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科学性的需要。”（阿瓦基安，2019）¹⁵²

刘少奇的哲学家杨献珍主张红色与专家这对立的方面之间的和解，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促进专业性，从而损害工人的党派性和战斗性的革命性格。阿瓦基安宣扬同样的资产阶级和反动观念：

“所有这些都与《纲要》中关于新综合的内容密切相关：‘认识论和党派之争。在科学性和党派性之间的关系中，最主要的是要系统地科学化’。”（阿瓦基安，2019）¹⁵³

阿瓦基安是一个长期的修正主义者、一个顽固的伪造者、一个懦弱的投降主义者。UOC（马列毛）将阿瓦基安主义描述为中间派只是为了掩盖其前身的痕迹

意识形态的归属、伪装的起源是其理论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阿瓦基安开创了在核磁共振成像中运作的修正主义模式，从而开启了后来普拉昌达紧随其后的哲学伪造的刺痛。阿瓦基安主义在 20 世纪 80 年代并不繁荣，因为土耳其共产党 / 解放运动在 1984 年会议上的出现以及秘鲁共产党随后的加入，以及秘鲁人民战争在理论、实践和意识形态政治上的巨大进步的支持，使阿瓦基安主义陷入了困境。防守位置..多年来，他被迫随着左翼在那里演奏的音乐跳舞。贡萨罗主席倒台后，阿瓦基安做出了最邪恶的举动：1) 他在 1994 年组织了一场诽谤贡萨罗主席的国际运动，导致捍卫共产党生命的国际运动解散领导；2) 1998 年，可耻地提出将 TKP/ML 从 MRI 中剔除。此后，随着 2000 年千禧年的宣布，它在 CoMRI 中遭受了重大失败，但左派的这场胜利只是间接的。一旦普拉昌达主义公开成为修正主义，特别是在 2001 年 2 月的尼共（毛主义）第二次全国会议上，阿瓦基安和普拉昌达就开始一起跳投降华尔兹。2005 年，他们离婚了，但他们仍然拥有相同的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和相同的资产阶级哲学。

2.2-普拉昌达主义作为阿瓦基安主义思辨的实际实现

2006 年 11 月，当普拉昌达签署了邪恶的“全球和平协议”，同意人民解放军驻扎和解除武装时，他的修正主义投降就变得很明显了。当时，普拉昌达的立场本质与表象是一致的，不需要太多的科学来识别普拉昌达的修正主义。尽管如此，MRI 内部的许多组织和政党多年来仍然大力捍卫普拉昌达的投降主义路线，仿佛这是对毛主义的非教条运用。2008 年，当已经担任尼泊尔总理的普拉昌达正在推广他的最新发明，即平庸且非历史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¹⁵⁴时，意大利共产党宣称：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经验的平衡，即 21 世纪的革命斗争，得到了重要的首次评价，因为它基于尼泊尔革命的真正进展以及理论、**实践和政治贡献**。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尼泊尔共产党和普拉昌达同志贡献的毛主义者。”（PCm 来自 意大利，2008）¹⁵⁵

这些组织中的许多组织并没有批评自己给予了国际支持和对普拉昌达领导层叛徒立场的支持，而是歪曲了自己的责任，并试图将普拉昌达的投降描述为“令人惊讶”和“意外”的事情。因此，他们试图将 2006 年以来普拉昌达主义的立场与他们之前在人民战争最初几年的表述区分开来。诸如此类的立场隐藏了普拉昌达立场的资产阶级哲学基础，因此无法摆脱或打破这种修正主义模式的持久影响。正如阿瓦基安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他的哲学证伪，试图创造一个理论基础来证明他的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合理性一样，普拉昌达显然已经在 2001 年 2 月的第二次全国共产党（毛主义）会议上开始了同样的过程。。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所谓的“普拉昌达道路”，它已经作为修正主义形态诞生，尽管仍然被左翼言辞所掩盖。

这些普拉昌达的立场并没有被尼泊尔共产党掩盖，相反，自 2001 年以来，它们被其宣传机构广泛宣传：《毛主义国际公报》、《工人》杂志以及叛徒普拉昌达对国际新闻和传播垄断机构的采访。当时的毛主义政党和组织没有意识到尼共（毛主义）领导层的这种右倾，要么非常不专心，被表象所迷惑，要么与普拉昌达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趋同。不管怎样，他们都应该自我批评，纠正自己的立场。对 2000 年代初普拉昌达主义的哲学歪曲和意识形态投降的批评对于深入纠正这些立场具有决定性作用。联合国把重点批评解放军放下武器，提出“全球化帝国主义国家”、“多党竞争”，总之“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提法，只不过是停留在“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外壳上。投降主义立场却没有设法粉碎其本质。

与所有修正主义立场一样，普拉昌达主义是尼泊尔革命进程方向上的投降主义的表现。不是面对失败的投降，而是面对革命的进展给领导层带来的巨大挑战的投降。尼泊尔革命的进展正朝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新阶段的开始迈出一大步。面对反动君主政体即将垮台，美国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准备进行军事干预，以阻止人民战争的超常进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普拉昌达可耻地投降了，他用以下措辞为这种对革命和尼泊尔民族的背叛辩护：

“地理事实是，我国只有 2500 万居民，却被挤在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人口均超过 10 亿的大国之间。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发展以对抗美帝国主义。印度军队是世界第四强大的军队。以我们国家的资源和解放军的实力，为了保卫我们的地理完整，抵御外来军事侵略，即使我们把年轻人都招进来，除了美国，我们不能想到打败任何一支邻近的军队。帝国主义军队。”（普拉昌达，2006）¹⁵⁶

这是修正主义者试图用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来证明自己投降的合理性的证明。它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全部经验都扔进了垃圾桶，整个 20 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无数次证明，共产党领导的群众通过人民战争可以打败任何敌人：**帝国主义是一只老虎的纸**。今天，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了最新、最英勇的证明，即使被像以色列这样的种族灭绝的帝国主义宪兵国家包围，被压缩成一条平均只有 9 公里宽、40 公里长、由超过 200 万居民组成的狭长地带，在抵抗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它可以击败当帝国主义有一个持续的领导层来推动一场长期的大规模战争时，即使这个领导层没有得到无产阶级的科学意识形态的武装，帝国主义的统治也是如此。普拉昌达可耻的投降是如此明显，只有修正主义的背叛才能证明其合理性。

UOC（马列毛主义）的领导层呼应托洛茨基主义者对阿瓦基安主义的赞扬，用以下术语分析了普拉昌达的投降：

“长期以来，MCI 内部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适应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机会主义、与民主运动的民族主义倾向之间的斗争。小资产阶级对于脱离阶级斗争的民族解放斗争，或者有时带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色彩，无论如何，都是陌生的，反对与阶级斗争结盟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也反对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基本上与当前马克思主义和普拉昌达主义之间的斗争内容相同”。[UOC（马列毛）]¹⁵⁷

普拉昌达主义的特点并不在于民族主义的偏离，相反，普拉昌达恰恰是从民族解放斗争中投降的。从人民战争推进到民族革命阶段投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推进到民族解放阶段投降。它投降和出卖尼泊尔民族和人民、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与美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交好，用尼泊尔民族解放换一盘扁豆。这一立场没有任何民族主义色彩。

普拉昌达投降的意识形态表达明确地出现在 2001 年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大跃进》中，当时普拉昌达拥抱了无耻地查看 MCI 的阿瓦基安主义者资产负债表。尽管这份文件中有很多向左派的让步，普拉昌达公开强调：

“PCR-USA 及其主席 Bob 阿瓦基安撰写和准备的文件和文章在将辩论提升到新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普拉昌达，2001）¹⁵⁸

普拉昌达在这份文件中澄清了叛徒阿瓦基安提出的新级别将包括以下内容：

“现在，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可以在没有任何政治压力的情况下自由地汲取历史经验的精华，并肩负着巨大的责任。

你的肩膀（……）。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更深入地探讨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发起的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大辩论期间题为《斯大林问题》的信中最初提到的内容。（普拉昌达，2001）¹⁵⁹

普拉昌达对斯大林的批评的“深化”无非是对斯大林论点的重复。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阿瓦基安：

“强调保卫苏联社会免受外部威胁实际上破坏了国际主义并夸大了俄罗斯民族主义，这在理解世界革命的进展和共产国际的运作方面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普拉昌达，2001）¹⁶⁰

同样的阿瓦基安主义关于所谓民族主义倾向的长篇大论也在斯大林和 MCI 中出现。同样的阿瓦基安策略，通过攻击斯大林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攻击，然后否认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部本质。普拉昌达在 2001 年宣布的“自由”，以“加深”对斯大林同志的批评，导致 2005 年公开宣布放弃马克思列宁毛主义：

“21 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注意力必须完全集中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列宁和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及他们在此基础上发展的一些与无产阶级战略有关的概念已经过时了。”（普拉昌达，2005）¹⁶¹

2001 年以来的普拉昌主义与阿瓦基安主义在 MCI 上的意识形态平衡完全一致，已经从阿瓦基安主义思辨的实际表达转变而来。由此，阿瓦基安的“硬核”的“非常弹性”就表现为普拉昌达的“多方竞争”。阿瓦基安主义的“新综合”将自己描述为普拉昌达的“21 世纪社会主义”。普拉昌达主义所运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作为阿瓦基安帝国主义动态因素的论点，将其自身呈现为全球化帝国主义国家的理论。阿瓦基安主义的混乱局面将国际形势转化为某个国家革命发展的内部原因，这本身就是普拉昌达为该国人民战争投降提供的意识形态理由。

阿瓦基安主义理论作为普拉昌达实践的这种表现不仅发生在 2006 年，而且自 2001 年以来就出现了。在普拉昌达的投降主义遗嘱中如此明显地高估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力量，已经出现在 PCN(*m*) 的 II CN 中，2001 年：

“在内的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进步与廉价的第三世界劳动力相结合来积累无限的利润。”（普拉昌达，2001）¹⁶²

除了为帝国主义道歉以及帝国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假定的进步作用之外，普拉昌达还重复了阿瓦基安主义关于“生产过程全球化”的咒语：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适当利润，信息技术领域（主要是电子产品）的空前发展已将整个世界缩小为一个单一的小型农村单位。”（普拉昌达，2001）¹⁶³

所有这些对帝国主义的道歉，都是为了提出一种错误的评价，即 21 世纪头十年的国际形势对世界革命非常不利。这是阿瓦基安宣扬的评估，尤其是在 9 月 11 日事件之后。与这种平衡相反，9 月 11 日的阴谋是美国对帝国主义反革命总攻势衰落和下半年发动的整个反动势力的反应。20 世纪 80 年代，其顶峰在 1992 年至 1996 年期间达到顶峰。这场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总反革命攻势，依靠俄罗斯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后来彻底崩溃）的有害行动，颁布了共产主义的消亡乃至历史的终结，清算了波茨坦体系，瓜分了东欧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势力范围，所有这些都“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虚假口号所包裹，并建立了美国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霸权地位独一无二。但是，与整个反应的估计相反，世界的混乱只会增加。正当极端民族主义兴起之际

帝国主义为了分享战利品而发动法西斯主义、种族战争和贪婪战争，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死灰复燃，却没有实现世界经济预期的增长和稳定。9月11日是美国佬的阴谋，目的是制造公众舆论，否则反革命攻势就无法恢复，随后，美国佬领导的联军占领了阿富汗，然后又占领了伊拉克。这种进攻性的恢复并不是基于帝国主义整体利润率的扩张或重组，而是基于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而这场危机至今仍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不断恶化。分解垄断资本。当时客观上已经发生的情况最明显的表现就是2007年底2008年初美国的房地产和衍生品危机，这是战后美国金融体系最严重的危机，从而揭露了阿瓦基安勋爵和普拉昌达勋爵对帝国主义的整个辩护分析。

反过来，尼泊尔叛徒的处境则需要更多的处理。因为，除了所谓的不利的国际形势之外，还有一个严峻的国内局势，使共产党（毛主义）处于不是在全国夺取政权的前夕，而是迈向民族革命战争阶段的前夕。领导无产阶级、农民和整个尼泊尔人民实现民族解放，赢得了全世界国际主义的支持，并加剧了印度和社会帝国主义中国的阶级斗争的紧张局势。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普拉昌德派利用了阿瓦基安托洛茨基主义的格言，即国际形势构成了某一国家革命前进或倒退的主要原因。因此，如果国际形势不利，尼泊尔革命的投降和拖延也是合理的，以等待全球范围内有利的“时机”。普拉昌达因此应用了阿瓦基安主义者的“口号”：在等待时加速。在“等待”承诺的有利形势的同时，加速了人民战争的投降。世界大战，对于这些大师来说，只有新的世界大战才能实现。这一立场似乎是右翼巴特拉伊在分析2005年9月/10月PCN(m)CC会议决议时提出的：

“该决议对当今全球化的帝国主义进行了客观评估，并提出了只有在新的背景下采取全球革命主动权才能实现和捍卫特定国家的革命的观点。”（巴特拉伊）¹⁶⁴

将阿瓦基安主义实际运用到具体的革命进程中，只能是对革命最可耻的投降。PCR-USA和PCN(m)在2005年至2008年之间交换的信件中所表达的分歧仅代表了修正主义猜测与其实际应用之间的矛盾。修正主义在思想世界里可能显得有些争议，但进入“一国实践”时，它的阴暗、保守、反动本质就暴露无遗。

普拉昌德主义的投降和修正主义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与阿瓦基安主义相同。哲学证伪有不同的细微差别，但保持相同的本质：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普拉昌达的这些哲学歪曲发生在2001年之前，揭示了他的意识形态轨迹，再次重申了哲学斗争对于发展两条路线斗争、加强左派和镇压右派的重要性。

与UOC(MLM)声称的激进主义相反，普拉昌达长期以来一直在捍卫和运用“否定之否定法则”。尽管如此，1991年，在人民战争开始之前，普拉昌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如下定义：

“唯物辩证法，即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世界观，认为斗争的绝对性质，甚至在物质对立面的相对统一中也占主导地位，认为它是导致每一个事件的增长和毁灭的因素。自然、社会和人类思想。正如列宁所说，每一个事物和事件的演变的辩证法是相互关联的，在连续变化的动态流动中，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以一系列连续性断裂和跳跃的形式发生。、灾难与革命、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法的科学本质。”（普拉昌达，1991）¹⁶⁵

当我们详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大争论时，普拉昌达主义的证伪就变得更加明显，因为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在大革命前夕建立的矛盾律的最高综合体，肯定了对立的统一性。正如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一切矛盾都是通过一分为二的原则来解决的，一切矛盾的解决都是从量变到质变，从它的主导地位对一定的对立统一的肯定来的。其主导方面对这种统一的否定。正如所提到的，这种哲学综合解决了恩格斯提出的关于当时辩证法三个基本定律之间相互联系的问题。

普拉昌达歪曲了这个问题，取代了肯定和否定，从否定中压制否定，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和绝对要素。此外，在同一份初始文件中，对一分为二的原则进行了微妙但顽固的伪造：

“对一分为二问题**作为辩证法主要方面的深入分析和运用**，为反修斗争提供了利器 反对修正主义”。（普拉昌达，1991）¹⁶⁶

“一分为二”的原则，作为辩证法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什么？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本中，他没有说明这是哪一篇，但这种不准确为随后的伪造留下了余地。在 2000 年代，普拉昌达以一种仍然隐秘的方式提出了他所设想的辩证法的另一个方面：

GRCP 最明智的教训“一分为二”和团结的过程-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导致了独特财富的发展，其形式是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建立党内革命潮流，击败各种非无产阶级倾向。”（普拉昌达，2000）¹⁶⁷

我们详细地看到，GRCP 前夕最明智的哲学教训正是：

一分为二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完整、科学、通俗的表现形式。这意味着世界上的一切（包括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都是一分为二的。”（饶庆晃）¹⁶⁸

在矛盾律的框架内，用否定之否定代替肯定和否定，并把一分为二的原则与统一、斗争、变革的口号放在一起，这些理由并没有白费。这些都是有意歪曲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表述，目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偷偷摸摸地赋予它相反的内容。普拉昌达“微妙”的歪曲背后的意图与刘少奇、杨献珍的意图是一样的：在一分为二的革命原则之外，加上合二而一的资产阶级和调和原则。与杨善珍一样，普拉昌达也沿着这个方向前进，首先采取了非对抗性矛盾，或在一段时间内努力实现两者之间相对平衡的矛盾方面。让我们来看看：

“随着人民战争的进展，我们的这种独特理解不断发展和完善。通过人民战争第五个计划的成功实施，党的这种认识体现在政治进攻与军事进攻之间的**平衡**、地方干预与中央干预之间的**平衡**、人民战争与群众运动之间的**平衡**、**主要力量之间的平衡等特殊形式上**。力和次要力，主要区域之间的**平衡** 其次，集权与分权的**平衡**、自主主动与策略联盟的**平衡**、**对话与协调的平衡**、地方与中央的**平衡**、国内与国外活动的**平衡**、阶级斗争与两条路线斗争的**平衡**等。原则战术水平的发展和发展，然后党的指导思想的出现。”（普拉昌达，2000）¹⁶⁹

普拉昌达路径的出现被认为是平衡矛盾方面的结果。从来没有强调任何相对平衡只能通过斗争来实现，任何矛盾，即使是相对平衡，也必须以最先进的方面占主导地位，只有这样才能以革命的方式解决矛盾。

普拉昌达主义的下一步是在 2001 年的 II CN 上提出其腐烂的“融合论”。与修正主义者杨献珍一样，普拉昌达最初提出了与阶级对抗没有直接关系的矛盾的“融合”：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流行的革命模式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武装起义与人民战争**以及长期人民战争与武装起义战略的新融合已势在必行。如果没有这种融合，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发生真正的革命。”（普拉昌达，2001）¹⁷⁰

以这种方式呈现，无论是哲学上的歪曲还是其内容都是不明显的。因为将长期的人民战争与起义结合起来需要似乎是相对合乎逻辑的。事实上，这是毛主席所确立的无产阶级本身的军事理论中已经隐含的东西，毕竟战略进攻是与完成农村围城和通过起义夺取大城市相对应的。之内。这一毛主义原则也被贡萨罗主席出色地发展和运用，他对“统一人民战争”主战场和城市的贡献作出了必要的补充。普拉昌达提出聚变理论最初带有左翼色彩正是为了掩盖其投降主义政治内容。

合并理论中所谓的武装起义，无非是投降主义者急于与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某些部分达成协议，从而否定了殖民地国家人民战争的基本阶段，即民族革命战争。在武装起义的响亮口号背后，是右翼提出的与反动议会党派组成制宪会议的主张，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工农革命专政的否定。人民战争与起义融合的理论旨在掩盖其政治内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这一点在 PCN(m) 的 II CN 决议内容中已经很明显：

从战术上看，集中打击主要敌人的政策、继续党的谈判政策、强调统一战线战术发展等政策将继续保持。但仅此还不足以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我们党要前进，就必须在以下问题上有所计划：组织全国各党派和人民团体派代表参加的各政治力量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临时政府，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临时政府的宪法。**中央将制定具体启动方案和计划。这个计划的大纲将把总起义的策略纳入持久人民战争之中。”（普拉昌达，2001）¹⁷¹

如果说普拉昌达在 2005 年和 2006 年的投降是令人惊讶的，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投降计划已在 PCN(m) 的 II CN 中概述。人民战争与起义相结合的理论的政治内容已经在关于在全国所有反动党派会议的基础上建立临时政府的提案中给出了。也就是说，普拉昌德的融合理论，从一开始，无非是最明目张胆的资产阶级合二为一的哲学。

融合理论、矛盾各方面之间的平衡以及普拉昌德否定的否定的调解内容在 PCN(m) 的第二 CN 决议中也很明显。当普拉昌达分析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时，合二为一的内容就清晰可见在尼泊尔：

“最后，当我们将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化时，可以说，它正在按照**团结-斗争-改造或正反综合的辩证原则，在新的基础上打造新的团结。**党的成立、党的宣言初步、政策和计划是**单元或论文**。在发展过程中，各种思潮、内部冲突、起起落落、分裂派别，是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或对立**面。过去五年来，尼共领导的伟大人民战争是**变革和综合的体现**，是新基础上的新团结的体现。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否定的否定**。党的正确政策被修正主义否定了，然后又被修正主义否定了。

修正主义以求正确的革命政治，最终出现了人民战争的伟大进程。”（普拉昌达，2001）¹⁷²

通过将统一—斗争—变革呈现为正题—对立—综合，普拉昌达做出了典型的修正主义举动：他将斗争与统一分开，将斗争与变革分开，然后在矛盾中使斗争相对而统一绝对。这场斗争只出现在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最消极、最分散、小资产阶级和阴谋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时刻。斗争反对变革，以至于这一点在团结代表大会上实现，它建立了变革和综合的基础。对于否定之否定，普拉昌达所赋予的意义与蒲鲁东所赋予的意义相同：进步同时也是挫折，即是非对错的结合。普拉昌达将党堕落为修正主义作为第一个否认，因此，修正主义成为政党发展的新的、必要的方面。对于普拉昌达来说，革命路线只能与修正主义立场结盟才能前进。

开发方法”系统化时，这一点变得更加明确。
破碎的”：

“这场思想斗争是与派别实践以大一统为借口进行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通过对立统一和两条路线斗争来发展党的辩证法。”（普拉昌达，2001）¹⁷³

党的发展只有一种方法和理念：两条路线斗争。对立统一并不构成与两条路线斗争并存的方法，而是一种与两条路线斗争并存的方法。毕竟，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从承认政党是矛盾开始的，也是以左翼占主导地位的目标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因此，没有办法团结党内的对立面，谋求党内与修正主义共存，这无非是合二为一的烂理论。

普拉昌达只是用新词重新发表了杨献珍的哲学证伪。2006年，他将矛盾律定义如下：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革命哲学；它不仅适用于社会，也适用于人类思想。统一与对立斗争构成其根本规律。这意味着每个实体都分为两部分，并且每个方面都转变为它的对立面。我们认为，第二个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要方面。”（普拉昌达，2006）¹⁷⁴

普拉昌达在这里将统一一分为二与方面的相互转化分开。因此，它提出了“一分为二”的原则，只是作为矛盾的开始，而不是作为矛盾的解决。正如我们在《哲学大争论》的研究中详细看到的，这正是修正主义者的论点，即矛盾运动始于一分为二，而解决则通过二合而为一。分析为一分为二，综合为合二为一。因此，普拉昌达融合论无非是对刘少奇、严世珍腐烂的修正主义哲学的翻版。早在20世纪60年代，毛主义路线就揭穿了合并理论的另一种本质上相同的变体：

“如果我们按照杨献珍[普拉昌达]和其他同志[巴特拉伊]合二为一的观点行事，只会导致矛盾的融合和斗争的调和，我们会从根本上丧失能力。实现目标革命者。这正是现代修正主义广泛宣扬的观点。”（赛福廷、贾古林等）¹⁷⁵

普拉昌达的哲学歪曲与杨善真如出一辙，普拉昌达无非就是尼泊尔的刘少奇。迟早，它会被尼泊尔群众席卷，他们将在先锋队的带领下，重新走上长期人民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有必要将修正主义的融合论视为矛盾的调和或绝对同一性，与客观的、自然的、社会的融合过程区分开来。并非每一次合并都意味着

“合二为一”，即矛盾的调和。例如，当列宁强调必须把民族革命战争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结合起来时，

□ 显然，他并不是否认国际无产阶级斗争与争取民族解放的民主斗争之间的区别，而是否认其中之一如何发展为另一者。PCC-FR 管理层在 2022 年对 UOC（马列毛）的回应中非常精确地阐述了这个问题，让我们看看：

鉴于这一计划，联合组织的同志们强烈指出，“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相结合的可憎理论归咎于列宁，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不谈同志们所说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融合论”，我们先看看列宁对世界革命两大潮流或力量的融合的定义是否正确。为此，最好逐字引用列宁的话：

“社会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各国革命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这将是所有殖民地、所有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所有附属国家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我们党今年三月通过的纲领中，我们在描述全世界社会革命的进展时说，**所有先进国家的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剥削者的内战开始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这证实了革命的进展，我们将越来越多地看到 确认的。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东方。”

由此可见，协调委员会向列宁提出这一“令人憎恶”的理論的建议并没有什么“大错误”。列宁总是谴责这种“融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致命错误”，这是不真实的，而且它非但非“可憎”，相反，它是伟大的苏共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构成了今天，这是对后来由毛主席制定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宝贵而有效的指导。

几年后，即 1921 年，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框架内，列宁以另一种方式再次捍卫了这一思想：

当各国**被剥削和被压迫工人的革命冲动**克服了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抵抗和由劳动贵族组成的微不足道的精英阶层与**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革命冲动融合在一起，而这些人民至今仍处于历史的边缘**，对此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一个病人主体”。

即使我们在 1916 年写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军事纲领》中，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从地球上消灭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战略的定义，也更加明确和准确，因为它表明：两种力量的路径可能除了革命战争及其合并之外。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怀疑每场战争只不过是政治通过其他方式的延续是完全错误的。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个大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延续，这一政策是由帝国主义时代的一套关系所产生和滋养的。但这个时代也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和滋养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政治，因此，首先，**起义和民族战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第三，从两类革命战争的融合**等方面来看。”（PCC-FR）¹⁷⁶

列宁所主张的融合，与全世界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相一致。因此，在这种对立统一中，必须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方面是无产阶级领导，它除了领导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外，也是唯一能够导致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及其不间断过渡的领导。到社会主义革命。UOC（马列毛主义）的领导层并不反对“合二为一”的原则，而是否认列宁提出的“合二为一”的需要。

* 1919 年第二次全俄东方人民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的报告。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革命战争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2.3- UOC（马列毛）与修正主义合二为一原则的趋同

阿瓦基安和普拉昌达总体上对 MCI 做出了可耻的投降主义评价，特别是对 20 世纪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进行了可耻的投降主义评价。UOC（马列主义）基本上同意这一评价，从 2001 年普拉昌达对斯大林同志的攻击开始。UOC（马列主义）这样分析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荣经验：

“俄罗斯共产党人，特别是斯大林的错误（.....）[源于]新型国家建设方向的改变：苏维埃，“所有国家权力的永久和唯一基础”，变成了仅仅是传动带，**最终被转变为与资产阶级议会相同的机构。1936 年苏联宪法（“法治”）声称普拉昌达和阿瓦基安以及所有小资产阶级正式剥夺了苏维埃的所有权力，并将其转变为纯粹的议会工具；也就是说，它本质上采取了与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相同的形式，群众既不参与也不参与。决定公共事务，国家官僚和军队脱离群众、凌驾于社会之上并反对群众**”。[UOC（马列毛），2008] 177

在针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发表了这种典型的托洛茨基主义废话之后，他们对 20 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做出了以下意识形态评估：

“对无产阶级掌权的经验的批判性分析清楚地表明（.....）它并没有消除阶级统治的旧机器，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运动屈服于马克思和马克思所批评的对国家的迷信信仰。恩格斯在这方面强加了考茨基主义的思想。**实际上，考茨基在俄罗斯和中国都赢得了胜利。**” [UOC（马列毛），2008] 178

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中，考茨基主义的国家观占了主导地位。他们声称，苏维埃在 1930 年代成为资产阶级议会工具，而红军则将自己与群众分开，凌驾于群众之上并反对群众。苏联在斯大林元帅的指挥下击败纳粹法西斯入侵，清楚地证明了这些修正主义攻击的虚假性。UOC（马列毛）只是重复了阿瓦基安的老话：

“苏联是基于**爱国即资产阶级民主的立场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阿瓦基安，1981） 179

阿瓦基安的这一评估与 UOC 的上述结论没有区别：

“长期以来，**MCI 内部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适应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机会主义之间的斗争**”。[UOC（马列毛）] 180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UOC（马列主义）甚至强调巴黎公社是最先进的经验，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平衡，与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的立场相一致：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容所提出的要求。因此，这些关系的社会主义内容需要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巴黎公社型国家**。” [UOC（马列毛）] 181

光荣的巴黎公社虽然来不及发展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却英勇地笼统地概括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内容，但决不能将其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典型典范。这是对巴黎公社的错误辩护，其目的完全是为了掩盖他们对 20 世纪社会主义经验所做的投降主义评估。1917 年至 1956 年苏联无产阶级执政，在此期间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功绩，打败了纳粹法西斯野兽，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从 1949 年到 1976 年发展起来，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被几个强国瓜分

帝国主义者以一己之力，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超然的群众运动，建立了人民公社，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典型模式就是巴黎公社？与阿瓦基安一样，UOC（马列毛）并没有说 20 世纪 MCI 的主要方面是消极的，他们正式说这种经历主要是积极的。但是，当 UOC（马列主义）评估时，20 世纪巴黎市无产阶级政权两个月的经历比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 39 年和 37 年更接近国家的灭亡。在中国，很明显，他的平衡在本质上完全与阿瓦基安和普拉昌达趋同，后者很容易重复同样的话：

斯大林在晚年提出的**新国家构想**实际上是**俄罗斯和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致命弱点。**”
[UOC（马列毛）] 182

UOC（马列主义）的趋同，特别是与阿瓦基安主义的趋同，并不局限于 MCI 主义的投降主义平衡。UOC（马列主义）几乎完全采用阿瓦基安的修正主义帝国主义概念，即所谓的帝国主义进步趋势，它消除了半殖民地的前资本主义关系，此外，还假定了无政府状态的动态作用。帝国主义阶段的社会生产：

“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化的生产方式，将所有国家及其特定的生产方式连接成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输出的资本作用于被压迫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种子或资本主义发展，作为一般趋势，它加速了它们的发展，**扫除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痕迹**”。[UOC（马列毛）] 183

在对普拉昌达主义的批评中，UOC（马列毛主义）强调了它认为阿瓦基主义的积极之处，并批评它缺乏后果：

“我们支持 PCR、美国对尼泊尔修正主义政党的正确批评；我们批评的是他们到最后都不一致，这是他们的中间派立场”。[UOC（马列毛）] 184

阿瓦基安主义从头到脚都是右翼修正主义，没有任何中间主义。阿瓦基安是这种修正主义形态的先驱，他是普拉昌达的老师，必须受到批评并承担**责任**。UOC（马列毛）对阿瓦基安哲学的批评只是唯名论的批评，因为他们只是用不同的标签来捍卫同一个资产阶级观念。

一个组织怎么能自称为毛主义，而不把《论马克思的矛盾》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视为最发达的呢？如果不是因为一个自称为毛主义的组织在其历史的某个时刻将其理论机构的名称从 *Contradicción* 改为 *Negación de la Negación*，如果不是因为它认为这条法则是唯物主义最本质的法则，那么它的理由是什么？辩证法？还是因为他认为否定之否定是“最能解释运动方向、解决矛盾的”法则？然而，正如在哲学上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不捍卫矛盾律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一样，他不得不明确声明：“我们不否认矛盾法则对立统一和斗争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但接着又指出“否定之否定”“只是辩证法第三定律”，同时又指出，这是“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指示社会和自然生活不同领域的运动方向**”。所以，这不是无知的问题，而是证伪的问题 哲学的。毛主席在其全部著作中充分阐述和运用了矛盾律，因此不可能走私包裹在“否定之否定”的抽象概念中的资产阶级观念。

UOC（马列毛主义）采取了否定之否定，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和《反杜林论》中所捍卫的内容。这个内容正如上一届所论证的那样，无非是一分为二，即社会生产与私有财产的统一性消失了，相互依存性被打破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有的一切——都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社会生产作为新的方面，转变为一种高级形式：它以社会生产力为基础，但又走向社会阶级终结、社会分工、城乡分离。否认

正如蒲鲁东、杜林和普拉昌达所定义的那样，否认 UOC（马列毛）是一种进步，同时也是一种挫折，是进步与延迟的综合体。这种对否定之否定概念的歪曲，为 UOC（毛主义）的领导层提供了理论依据，以证明其修正主义立场，例如阿瓦基安主义的帝国主义概念：

“因此，在某些时候，在某些被压迫国家，帝国主义在支持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面发现了更多好处，作为**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反趋势**（……），在整个过程中，**最普遍的**由于各种不同和矛盾的特定趋势，**它在被压迫国家引入和发展资本主义关系时，按照否定的否定法则**，即社会运动的一般运动规律之一，具有进步的方向。”。[UOC（马列毛）] 185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的进步性这一论点，有时阻碍、有时推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生产关系，是叛徒阿瓦基安提出的。上面这段话中应该强调的，除了 UOC（马列毛）完全同意这一修正主义论点之外，它还试图根据其否定之否定法则为其辩护。换言之，对于 UOC（马列毛）来说，帝国主义所谓的进步倾向与其保守的“反倾向”并存，根据它的否定否定，即进步同时也是挫折。这个伪造品哲学无非是合二而一的旧修正主义原理，即对于 UOC 来说，帝国主义是进步与落后结合的结果。而且，进步是“大势所趋”。

UOC（马列毛）利用阿瓦基安所捍卫的否认的否认来支持阿瓦基安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论点。UOC（马列毛）的这一论点并无前后矛盾之处，毕竟 UOC 和阿瓦基安都通过不同的手段，以同样的方式攻击矛盾律。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实行修正主义合二为一的原则。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在其军事路线上，UOC（马列毛）重复了同样的内容，并形成了普拉昌德融合理论，并一直被他们所拥护，直到 2006 年 3 月。让我们看看：

“人民战争根据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式，或者是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暴动形式，或者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长期人民战争形式，或者是城市暴动的组合形式。”**在主要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国家，农民起义和农村武装斗争不断发生。** [UOC（马列毛）] 186

普拉昌达宣布他的合并理论对世界所有国家都有效。UOC（马列主义）遵循其戒律，根据普拉昌主义的修正主义口号制定其军事路线，宣布在城市发动起义，目的是放弃农村的武装斗争。面对当前将农民战争组织为人民战争的任务，他赞扬未来的起义，以此作为逃避投降的一种方式。

UOC（马列毛）在对哥伦比亚土地农民问题的分析中（我们稍后会详细分析）再次运用了合二为一的哲学歪曲。它将土地所有者和农民合并为一个类别，将两个对立的方面合而为一：土地所有者。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在哥伦比亚农村，大地主和小地主之间的矛盾不再存在，或者不再重要，他们断言这种对抗性矛盾已经不存在，并捍卫“农业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地主”的斗争，走私托洛茨基主义农业计划：

“农业无产阶级不像工业无产阶级那么集中，重要的是，它在纲领和组织上都独立于农民；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业主的农村小资氛围和小财产的幻想。只有这样，才能**教导农民**，为了拯救自己，必须与无产阶级结盟，**反对私有制，把土地所有权转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剥削**，因为个人剥削是有条件的。通过财产。个人，才是导致农民走向灭亡的原因。” [UOC（马列毛）] 187

因此，联合组织（马列主义）没有正确区分朋友和敌人，把所有地主都变成敌人，放弃了贫苦无地或无地农民为革命夺取和分享地主土地而进行的正义和必要的斗争。这就是你们的哲学伪造的目的，你们对否认的虚假否认，你们捍卫合二为一的腐烂修正主义哲学。

最后，UOC（马列主义）认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立即就是反资本主义斗争，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结合在同一个纲领中。他用“激进的反资本主义”的措辞，认为这些被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立即是社会主义的，从而完全放弃了民族解放的基本阶段：

“问题是如何科学地理解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和被压迫国家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目标直接是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完全符合无产阶级斗争的一般国际主义性质，不再是保卫资产阶级民族的民主斗争**，而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民主斗争。反资本主义斗争，将资本主义从世界上驱逐出去 帝国主义。” [UOC（马列毛）] ¹⁸⁸

他们以阿瓦基安风格合二为一，压制了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他们否认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崇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口号。

合二为一的原则下前进

UOC（马列毛）的方向，当指出否定的否定“（...）是指示社会和自然生活不同领域运动方向的一般规律”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划分出不同领域之间的差异。蒲鲁东、杜林、阿瓦基安或普拉昌达的观念否定了马克思对其的理解和运用。修正主义把否定的否定歪曲为正题、对立、合成，把合成当作合二为一。在两条战线的争夺中 CIMU，UOC（马列毛）解释了其应用否定之否定和综合作为合二为一的理想主义方式。去年，在讨论基础上，管理层 UOC(mlm)指出 CCIMU 提出的提案：

“（.....）它并不代表一个**普遍的共同的团结基础**，继续围绕革命共产主义者内部目前合法的分歧进行斗争，因为这样的提议只表达了**共产主义运动特定阴影的立场**。” [UOC（马列毛）] ¹⁸⁹

UOC（马列毛）领导层抗议 CCIMU 为 MCI 公开辩论而提出的讨论基础仅表达了所谓的“特定细微差别”，并建议 CCIMU 应该提出一个通用单位基础常见的。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在战斗展开之前提供一个综合。这种方法不符合共产主义的方法，因为只有通过两条路线的斗争才能达到共同的基础。毕竟，这种共同基础是革命性综合的表达，而不是平衡和折衷的组合；只有通过两条路线的斗争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从而充分解决分歧，并达成某些妥协。这就是 CCIMU 所做的：它启动了一个讨论基地，显然应该表达其支持者的意识形态基调，并将其公开，这在 MCI 几十年来从未发生过，导致了关于这一问题的非常重要的两条路线之争。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一主张反映在 CIMU 的辩论中，并在《政治宣言和原则》以及其他决议（例如成立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得到体现。两线作战 并将继续在另一个新的水平上发展。

□ 过于理想主义，以致于相信一个组织，甚至一组组织，可以通过其单纯的智力努力立即找到共同团结的基础。准备这份文件的标准是什么？在不同的立场中寻找一个共同的结果，一个综合，这意味着统一？我们应该像蒲鲁东那样行事，马克思批评蒲鲁东试图以唯心主义的方式“（.....）从上帝、绝对理性中夺取一个综合公式” ¹⁹⁰ 这代表了统一的普遍基础？这无非是“合二为一”，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降级，就是把共产主义团结变成了资产阶级外交。为了

面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散的具体问题，我们不能像某些人那样，把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细微差别隐藏起来，假装分歧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是次要的、不重要的问题。这些都是必须摆在桌面上的问题，回避这些问题的斗争就是用在斗争领域之外与善意勾结的虚假团结来欺骗我们自己。

CIMU 的力量及其政治宣言和原则的力量在于，它是之前的两条路线斗争以及会议本身内部发生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在 CIMU 的过程中，存在着现有立场和缺席组织背后的批评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正是这种正确的方法允许对讨论基础进行修改，以对某些分歧的新理解和对其他一些问题的解决的形式，使组织之间达成妥协。那里实现的团结是否代表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不，它让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另一个层次上继续发展，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在孔子学院，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的内部团结的辩证方法是严格遵循的：

“辩证法的基本概念是对立统一。如果接受的话，又该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呢？一是与他们作斗争，清算他们的错误思想，二是帮助他们。也就是说，首先，战斗，第二，帮助。从善意出发，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让他们有出路。（……）在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条件下，别人可以接受的意见我们就接受，我们自己可以放弃的意见我们就接受。因此，我们用两只手行动，一只手与犯错误的同志斗争，一只手与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坚持原则和灵活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是对立统一。（……）一分为二：这是普遍现象，这是辩证法。”（毛主席）¹⁹¹

这就是共产主义面对分歧的方法：一是斗争；二是斗争。其次，一致或多数决定，或达成妥协，取决于分歧的性质，无论是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取决于给定过程的条件和在一定时期内，即使与敌人也是可能的。达成妥协是必要的。战前寻求妥协，就是套用蒲鲁东或普拉昌达的哲学证伪，就是寻求调和、平衡、融合不同立场。这意味着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勾结，从而共产主义组织不可能发展。在 1964/65 年中国人民的哲学大论战中，刘少奇集团修正主义者认为毛主席的国际路线是“合二为一”的例子。上述《人民日报》1965 年 5 月 20 日的文章驳斥了这种捏造，如下：

“他们试图给人一种印象，这条[国际]路线也可以是他们的‘合二为一’（……）杨先辰所提倡的‘合二为一’的所谓‘综合’。等人废了打。（…）基于团结愿望的批评和斗争

正是一分为二的过程。更高层次上的新的团结是通过批评和斗争而达到的，也是克服错误后一分为二的结果。这个最高依据根本不是成功与错误合二为一的依据，而是成功与错误一分为二的依据。”（艾思琪）¹⁹²

在目前尼泊尔共产党关于 CIMU 和 LCI 成立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尼泊尔共产党（革命毛主义）、PCN（MR）的领导层两次公开发表讲话，一次是在讨论基地，2022 年 9 月，距离 CIMU 宣布又过去了几个月。首先，他欢迎各政党和组织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上采取的公开立场，并指出“一场新的辩论已经开始。在这些辩论中，许多统一和分歧的问题浮出水面。这并没有错”。然后他给自己定位，多次保持这样的状态：斗争是绝对的，团结是相对的；这是正确的，我们向您对此的明确立场表示敬意。然而，他批评主张统一会议的不同倡议之间没有出现联合声明。然而，这一共同宣言只能是两条路线斗争发展到一个新层次的结果，即在 CIMU 内部，邀请那些公开表达不同意见的人以权利和义务参加。

其他。* 因此，捍卫在战斗最低限度发展之前发表联合声明的必要性，与“合二为一”的可能性一样，都是理想主义、幻想。PCN(MR)领导层还提议：“通过解散两个协调委员会，组建一个新的组织委员会，召开统一国际会议”。关于这一点，是需要澄清的是，2022年只有一个协调委员会，就是中总，从《讨论基础》的发表开始，公开推动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召开了数十次会议，试图达成共识，正如上面的参考注释中所明确的那样。另一次会议的捍卫者举行了一次由意大利共产党通过互联网召开的会议，以其自由主义和法制主义标准，计算出其对共产党的诽谤性报告以及对其所谓的“冈萨雷斯集团”和其他人的攻击“主要毛主义集团”本身将联合这些政党和组织在同年年底召开“团结会议”，正如会议决定的那样，其目标是在 CIMU 之前进行，其基础是意共（马）的文件《建立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进一步决定邀请“冈萨里斯塔集团”参加，如果不参加，将向 MCI 报告为分裂等。这些是这次会议记录的条款，其中甚至没有对 2013 年会议中提出的内容进行任何评估，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一些参与者正式结束了 2013 年会议的提议。已经破产的 MRI，将推动一系列任务和活动，以支持复兴 MRI 的国际会议。这并不是说对 MCI 的评估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缺乏任何主张。对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说，已经十分混乱，世界根本矛盾特别是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进一步恶化，也没有什么。更没有人对其因狭隘而狭隘的霸权主义利益而对 MCI 的停滞不前甚至疏忽进行自我批评。在这次 2020 年 1 月会议的参与者中，并非所有人都在 2022 年 5 月 1 日签署了相同的声明。因此，建议像 PCN(MR) 声明一样，解散 CCIMU，与在这一切之后，各党单方面接受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层在这次会议上提交的有关 CIMU 进程的伪造报告，这些报告涉及近 20 个马列毛主义政党在十多年来辛勤无私的国际主义工作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组织，将意味着离开 CIMU 以及一切花费了十多年痛苦但成功的努力的东西，将被拖入懦弱的取消主义，因此，我们不能同意。

* 只有 PCI(m) 无法收到 CIMU 的邀请，该会议是秘密举行的。自 2014 年以来，我们党和意共（毛）之间就失去了联系，直到今天，重新建立这种联系仍然很困难。同样，致力于实施 CIMU 的缔约方和组织都没有它。声称与 PCI(m) CC 有联系并参加 2020 年 1 月会议的各方从来都不愿意帮助我们重建它。自 2014 年以来，我们已多次尝试重新建立联系，而早在 2017 年，一名持票人就向我们发送了《意共无产阶级新国际组织》的文件，要求将其转交给毛主义政党我们接触过的组织以及让他们对此发表评论。该文件一到达我方，我们立即将其转发给与我们有安全联系的所有马列毛政党和组织，包括通过 Pcm-Galicia 将其转发给 PCm（意大利），它是最早收到该文件的组织之一，以便它也可以将其移交给与其接触的缔约方和组织。我们完全按照将其传输给我们的运营商的要求进行了操作。从 PCB。我们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才获得了我们与 PCI(m) CC 的通信，以重新建立沟通渠道、我们对您的文件的评论以及 CIMU 整个准备过程的详细报告。但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而且由于 PCI(m) 没有公开这份文件，我们党也没有这样做，因为它知道自己没有获得这样做的授权。然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 PCI(m) 管理层一直没有联系我们，因为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到通道重新建立后，出现安全问题，一次又一次地中断联系。我们至今仍然如此。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在 2020 年 1 月举行党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党主动寻求 PCm（意大利）提议召开我们党与所有党派的会议参加 2020 年 1 月会议的组织，并同意尽快举行会议。我们的目的是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介绍 CCIMU 关于 CIMU 准备流程的报告，因为大多数这些方只有 PCm-意大利和 PCm（加利西亚）版本的 CIMU 流程，因此有可能就 CIMU 流程达成共识 CIMU 准备。然而，以 Covid-19 大流行问题为借口，这次会议从未举行。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走狗施加的健康限制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还没有达到阻止共产党和共产党组织在某个时候开会的程度。毕竟，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任何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都没有停止工作或战斗。CCIMU 继续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开展活动，并开展群众运动，反对以经济危机为借口削减工人权利的反动措施和抗击疫情的措施。在我们对这次会议的强烈要求之后，同一个意大利共产党提议，我们的党、意大利共产党和加利西亚共产党应该聚集在一起。虽然我们的建议是与尽可能多的参加一月份会议的各方会面，但我们同意会面，希望能举行更广泛的会议，但事实上，很明显，这样的会议并不可行。为了意大利共产党的利益，他们竭尽全力让我们试图理解的努力失败。这是影响进程的严重问题。PCm-Galicia 的管理层就是这一点的见证者。

在 2023 年 11 月关于 CIMU 和 LCI 成立的第二次公开说明中，PCN(MR) 管理层宣称，它已经这样做了，但由于上一整年都承诺了这一事实，所以它现在才发声。关于 PCN(MR) 与 PCN(Maioria) 统一的进程，单独处理这一问题是不合适的，并已等待这一进程结束后发表单一声明。他还表示，令人钦佩的是，这么多政党和组织成功召开会议，为无产阶级创建一个国际中心，特别是在无产阶级跨越世界的时刻。它很快宣布对 LCI 政治宣言和原则中的一些主题存在分歧，并将其列为 9 个问题。在这些陈述中，他声称《宣言》中的某些陈述是正确的，但他认为《宣言》没有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尽管 PCN(MR) 的这一声明不是本文件的直接目标，即使其中表达的立场已在上述 2023 年 1 月的 UOC(MLM) 文件中阐述，该文件也涉及 LCI 的成立，我们不能不重申我们对 PCN (MR) 立场的批评，PCN (MR) 在关于 LCI 的第二次声明中更完整地表达了其右翼本质。我们就拿第一点来说，据说它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言》中界定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 5 条界限原则中的 4 条是一致的，即“承认或不承认革命暴力的万能性”的原则。使革命本身成为“国家”，就是将毛主义降格为“革命暴力”。他指出，暴力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并不比马克思主义更强大”；并引用毛主席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中总结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所有论断，然后认为毛主席会在一定的背景下阐述这些概念。现在，如果不是将战争和战略问题作为进行革命的手段来处理，那么背景是什么？纯粹的文字游戏。然后他说，《宣言》将“是的，我们是革命战争全能的支持者”这一表述视为狭隘的，并且用双关语引用了列宁的名言“马克思主义是全能的”：马克思主义“比暴力更万能”。在这里，如果不是 PCN(MR) 的领导层，谁会试图将暴力与马克思主义分开呢？阿瓦基亚修正主义试图将革命暴力、人民战争与毛主义分开，因为毛主义的根本是无产阶级的权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征服和捍卫的权力。然后，争论转向另一个立场，并指出《宣言》是正确的，因为目前所有修正主义都反对使用人民斗争的暴力。但他的矛盾之处还不止于此，他或多或少地得出结论，该宣言含有“军国主义”概念。难道是这么多年的人民战争和与共产主义的决裂？普拉昌达的国家和阶级背叛并没有起到澄清这样的专利问题的作用？或者说，与普拉昌达主义的决裂并没有达到摆脱其修正主义发明的程度，例如“融合理论”，这是一种以“混合与融合”的误导性形式呈现腐烂的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新方式。所有形式的斗争。”军国主义是 PCN (MR) 领导层在感叹世界革命力量的“脆弱性”时得出的结论，并引用了世界各地正在爆发的大规模起义，并以斯里兰卡发生的事件为例，抱怨说：这个国家的大规模起义，来自许多国家的起义，刚出现，很快就消失了，就斯里兰卡而言，那里甚至没有一支“小军队”来进行战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中，决定无产阶级革命战争性质的不是军事组织，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党所培养的思想和军事观念。

作为一般性结论，PCN(MR) 领导层通过给 CIMU 和 LCI 加上“分裂主义者”的绰号来结束其批评。相反，CIMU 和 LCI 将两条路线的斗争置于更高的水平，分裂主义并没有加入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进步，以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争取团结。那么，马克思之所以把 AIT 总理事会派到美国，是为了让它有一个结局，而不是让它被无原则的单位谋杀，这是有分裂性的吗？列宁是否因创立第三国际而无视“第二国际英雄”而造成分裂？1963/64 年是谁分裂了 MCI，是毛主席的中共还是“三和二”的库绍夫修正主义？如果不是通过在组织中向前迈进，作为与机会主义彻底决裂的意识形态政治进步的表现，那么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疲惫是如何克服的呢？当欧洲和美国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陷入捍卫各自国家资产阶级的背叛时，列宁在“共同基础”上建立了第三国际，从国际无产阶级最早的组织经验、进步或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坚定捍卫，其中最突出的是集中制组织原则

民主是他制定的？通过拒绝国际无产阶级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来捍卫 MCI 的统一，这有什么好处呢？表现得非常负责任、审慎、谨慎，符合客观实际，用马克思主义原则说话：这样的“共同基础”最应该排除哪些原则？所谓的重新统一 MCI 所必需的“更广泛的团结”是什么？只有一种团结，是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实现的，这种团结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一切原则的坚定捍卫的基础上的。声称共产主义运动无法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就是在捍卫共产党人之间无原则的团结。因为许多“共产党”不同意，就将实行民主集中制视为宗派主义，坚持这样做会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削弱，这是荒谬的，也是狭隘的。

□ 不把这个原理理解为对立统一。这些原则是通过调解来适用的，实行民主集中制并不意味着所有决定都必须由多数人做出。公正、正确地运用民主集中制，通过两条路线斗争的耐心过程，在没有获得不构成威胁的绝对多数的情况下，通过耐心的斗争，解决矛盾尖锐的团结问题上的分歧，并不会引发不良后果。通过达成过渡期限承诺来分裂。这清楚地表明了历史经验中真正共产党的实践。说采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不能团结今天的工运，这是错误的、误导性的，也是游说的论点，这是修正主义的观点。事实上，在共产党里，事情就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来组织自己，以捍卫其作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组织原则，这是非常奇怪的。哪个党可以自称共产主义，而不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不以民主集中制为统治者，不经调解而实行呢？一个自称共产主义、不接受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团结起来的政党，要么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要么必须参加其他更广泛形式的统一战线，例如必要的、果断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建造的。共产国际的终结发生在一个比简单的原因复杂得多的情况下，即所谓的其组织形式不再有助于加强共产国际。不。至少还有另外两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其一是为了在战争期间保持全球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团结，盟军对其存在施加压力和讹诈（参见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以及另一个关于右翼立场采用它的危险（新修正主义的迹象已经出现在西方的重要政党中，后来的共产国际的短暂存在证明了这一点。出于各种原因，共产国际已经疲惫不堪，必须跳到一个新的水平，以适应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战略平衡的国际形势，适应当时已经处于美基霸权之下的帝国主义的反应，美基主义用冷战战略和原子讹诈拔出了自己的爪子历史仍然鲜为人知，Comiform 很好地说明和澄清了这个问题。用毛主席的声明声称共产国际的结束是为右翼主义辩护的“正确决定”，就像他说斯大林那样，这是机会主义的。“提出了一些不好的建议”，但没有充分考虑他所表达的内容，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当他犯错误时，斯大林能够批评自己。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提出了一些不好的建议。胜利之后，它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中共评论，论斯大林问题）。

新事物的诞生，旧事物的消亡是必要的，这阻碍了新事物的繁荣，而新事物确立自己的地位时，发生的是斗争、断裂和飞跃，一分为二。新的对立统一，也一分为二。在旧的事物中，新的事物作为主导的方面，必须在斗争中击败占主导地位的旧的方面，征服它，成为主导，分裂和摧毁旧的事物，新的事物正在出现。一必须分为二。因此，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诞生标志着共产主义内部普拉昌达主义、阿瓦基安主义、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 LOD 的消亡；CIMU 也标志着宗派主义、阴谋和霸权主义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两条路线斗争，后者在其存在的最后几年成为了 MRI。《政治和原则宣言》优于之前的 MRI 宣言，因为，除了进步之外 MCI 的积极平衡，1980 年和 1984 年文件中的反斯大林修正主义立场和对毛主席的不可接受的机会主义批评都没有出现在其中。CIMU 是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MCI 的分散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克服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在世界历史正在进入的革命新时期中，坚定而果断地朝着重建共产国际的方向迈进。

最后，关于哲学主题的最后一个问题。在其最近的立场中，UOC（马列毛）声称矛盾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但它**不是辩证法的唯一基本规律**，这是一种企图给讨论蒙上阴影的企图。他们不能再否认矛盾律就是规律。然而，最根本的是，他们继续指出，否定之否定才是运动方向的最佳解释。它的纠正必须是彻底的：承认矛盾律是辩证法唯一的基本规律，并将这种认识延伸到其他规律都是矛盾律的派生物或特殊表现形式。派生法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它们是法律 矛盾这一单一基本法则的细节、具体表达。这意味着，正如伟大的哲学辩论所解释的那样，数量和质量的规律，肯定和否定的规律，都是派生规律或矛盾规律的内在要素。伟大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于 1936 年 12 月，即革命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

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个方面，是同时存在的，即有利条件的同时也有困难。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其他规律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毛主席）¹⁹³

从给定的基本规律中可以推导出其他规律；这些派生规律是基本规律的具体表现。正如自由必然法则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表现一样，也是矛盾律物质运动形式的一种特殊表现。对于否定之否定也是一样，我们理解它是辩证法唯一的基本规律——矛盾律的一种表现形式。然而，我们认为在当前的辩论中最重要的是 MCI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是：1) 矛盾律是永恒物质不断变化的唯一基本规律，因此，是唯物辩证法的；2) 因此，定律 矛盾是在其复杂性上无所不能地支配、描述和解释物质的运动及其在无限上升螺旋形式中的方向；3) 马克思对否定之否定的运用与蒲鲁东、杜林、阿瓦基安、普拉昌达对否定之否定的运用不同；4)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于一分为二的单一原则，而修正主义哲学则相反，主张对立原则之间的平衡：一分为二，两者整合在一个.....上。

II-帝国主义与民主革命

UOC（马列主义）在批评 LCI 的创始政党和组织，特别是 PCB 时，指出我们为半殖民地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效性辩护的教条主义。他批评我们在分析帝国主义和被压迫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时缺乏“客观性”。无论是在批评中还是在其他文件中，UOC（马列毛主义）的领导层都制定了一种“新”的帝国主义理论，试图将其伪装成毛主义对当前世界形势和被压迫国家的具体和客观的应用。根据 UOC(MLM)的说法，帝国主义将是一种“世界生产方式”，其中“**两种趋势共存**：一种趋向停滞 (...)，另一种趋向**进步**”。这种假定的进步趋势意味着帝国主义在受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国家“**扫除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痕迹**”。帝国主义扫除半封建制度反过来意味着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特别是在农村的充分发展，并且其资产阶级将获得“**与其他国家资产阶级相同的利润率**”。即帝国主义者。根据 UOC（毛主义），被压迫国家有两种类型：1) 被压迫资本主义国家和 2) 半封建国家，即半殖民地两种类型，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殖民地。在他的表述中，被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半封建国家都是半殖民地，但半殖民地革命的性质 第一个是立即社会主义，并且只有对于半封建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才会生效。

分析阿瓦基安的修正主义立场，不难看出，UOC（毛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表述的根源正是阿瓦基安主义。像这种修正主义变体一样，UOC（马列主义）捍卫帝国主义作为一种世界生产方式，其活力扫除了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导致主要被压迫国家的出现

资本家的革命必须立即是社会主义的。此外，UOC（马列毛）在对哥伦比亚局势的“具体分析”中应用了阿瓦基安主义的表述，正如我们将在下面展示的那样。

根据 UOC（马列主义）的分析，哥伦比亚将是一个被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哥伦比亚革命的性质将立即是社会主义的。对于哥伦比亚农民来说，“耕种者有土地”的口号将不再提上议程。仅举一条信息：哥伦比亚是拉美国家，主张土地所有权集中，根据 Oxfam（2016）的调查，1%的最大土地所有者拥有 81%的土地。因此，UOC（马列毛）计划中包含了胡言乱语，根据该计划，哥伦比亚共产党人的任务必须是“教导农民（.....）反对私有财产并将其土地所有权转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剥削。”¹⁹⁴。

对于 UOC（马列毛）来说，如果哥伦比亚是一个受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这种情况在巴西、印度和菲律宾等国家会更加明显：

巴西、印度和菲律宾资产阶级在过去几十年里的行为**根本不仅仅是买办资产阶级的行为.....**。

例如，印度国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后殖民资本主义国家**，其特征是资产阶级既不国家（...），也不是买家（因为，它不仅是帝国主义的仆人和中介，

... 做出了**与宗主国资产阶级相矛盾的独立政治决定**），更何况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因为印度资产阶级的资本重要性远远大于其资本输出，毫无疑问，资本输出在过去二十年）。**巴西资产阶级相对于金砖国家的性质和作用**表明，其国际角色早已不再是收买或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而是在其限度内渴望成为地区行动者。这已经表明了**相对于其他被压迫国家的主导地位**。”[UOC(MLM)]¹⁹⁵

也就是说，UOC（马列毛）领导层得出的结论是，巴西、印度和菲律宾的资产阶级不再具有买家角色。他指出，特别是巴西和印度的资产阶级，虽然不是帝国主义者，但已经输出资本，与“宗主国”资产阶级竞争，并征服其他被压迫国家。与 PCP、TKP/ML、PCI(M)、PCF 和 PCB 以及绝大多数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政党的主张相反，UOC(MLM)表明这些国家的革命将立即成为社会主义。

UOC（毛主义）提出的 MCI 国际路线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重要性正在下降。毕竟，如果帝国主义继续“扫除”被压迫国家的半封建制度，那么“被压迫资本主义”国家就会越来越多，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就会立即爆发社会主义革命。UOC（马列主义）的这一分析和结论是对列宁主义，主要是其帝国主义理论的全​​面回顾。

与 UOC（马列毛主义）的这一结论相反，无产阶级的科学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民族压迫不增反减，全面走向政治化的趋势。反动和暴力是帝国主义的法则，随着资本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资本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它埋葬并废除了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一切进步特征。这就是国际无产阶级伟大领袖所说的，这是列宁主义和毛主义的基本知识，也是我们在当今世界上以惊人的方式看到的：超级大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压迫的增长，主要是，战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爆炸性增长，其中英勇的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最鼓舞人心的榜样。帝国主义是资本的寄生和分解，它是一种令人痛苦的状况，其危机是资产阶级民主加速腐败的物质基础，表现为国家的反动和法西斯化在全球所有国家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增长。因此，与 UOC（马列主义）的结论恰恰相反，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世界革命的重要性在近几十年来才变得更加重要。今天，理解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对于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一、错误的“帝国主义进步倾向”

对于 UOC（毛主义）的领导来说，帝国主义阶段构成了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生产方式，他们重复阿瓦基安主义的口头禅，他们指出，在自由竞争阶段“世界经济不具有凝聚力，每个国家的经济都缺乏凝聚力”。结构为独立的流程，彼此外部，通过市场逐渐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它们只是通过市场联系在一起，在流通领域。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世界经济将“将自身统一为一个单一的过程（……）将生产本身转变为全球性的生产，打破各国经济的自主权并将它们连接到一个**单一的生产过程中**”¹⁹⁶

。

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相反，这种全球化的生产方式将包括

∇ 帝国主义的“进步”方面：“在帝国主义阶段，**两种趋势**：一是停滞以及经济和政治危机；另一个是进步，是**世界生产的社会化**。”¹⁹⁷ 对于 UOC（马列毛）来说，世界生产社会化的增长将是一种趋势“进步”，因为它将导致扫除半封建制度：

“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化的生产方式，将所有国家及其特定的生产方式连接成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输出资本作用于被压迫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种子，并作为一般趋势加速其发展，**扫除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痕迹**”。[UOC（马列毛）]¹⁹⁸

此外，“资本主义本身，当它成为一种全球生产方式时”，更清楚地表达了“各国无产阶级将其劳动力出卖给全球资产阶级”。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则成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伙伴和参与者”。并且通过“从帝国主义关系中受益（……），它获得了与其他国家资产阶级相同的利润率”。这样，UOC(mlm) 定义为：

“（……）帝国主义是一种国际化的生产方式，在全球生产、积累和产生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包括其他人，影响他们，改造他们，磨损他们，耗尽他们。”[UOC（马列毛）]¹⁹⁹

自由竞争阶段，世界经济通过市场凝聚起来；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成为一种国际化的生产方式，将所有国家，无论其具体的生产方式如何，连接成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这条链条导致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扫荡，半殖民地资产阶级转变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伙伴，这保证了他们“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润率相等”。因此，出现了一个全球资产阶级，它在单一的生产过程中剥削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归结为剩余价值的全球生产、积累和产生过程。

UOC（马列主义）的这一概念从整体上攻击了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并与考茨基主义的超帝国主义“理论”相一致。

首先，UOC（马列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由竞争阶段“世界经济不具有凝聚力”的结论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正如伟大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证的那样，大工业与世界市场是辩证统一的，其中大工业是主要方面。但两者又是相互决定的，即大产业决定了单一世界市场的形成，而单一世界市场又加速了大产业的发展。对于马克思来说，大工业只有在与世界经济凝聚力的范围内才能发展：

“**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市场**，随着美洲的发现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世界市场极大地加速了商业、航海和陆路运输的发展。**这种发展反过来又影响了工业的兴起**，随着工业、商业、航海和铁路的扩张，资产阶级发展起来，其资本倍增，并将所有阶级降为次要地位。

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代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是一系列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革命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²⁰⁰

这是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资产阶级作为新的革命社会力量，把一切中世纪的装饰都抛诸脑后。如果每个国家的经济都被构建为独立的进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发展，更不用说达到帝国主义阶段了。世界经济交织成一个单一的过程，国际分工，不是帝国主义的特殊性，而是以往自由竞争阶段的历史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作出如下规定：

“通过开发世界市场，资产阶级赋予了生产世界性的特征

世界和所有国家的消费。反动派怀着极大的情绪，剥夺了工业的国家基础。旧工业已经被摧毁，而且还在不断自我毁灭。它们被新工业所取代，新工业的引入成为所有文明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被不再使用当地原材料的工业所取代，但原材料是从世界最遥远的地区销售的，其产品不仅在该国本土消费，而且在全球各地消费。地区和国家之间不再存在过去的孤立和痛苦，而是建立了普遍的交流 and 相互依存。各国普遍。这既指物质生产，也指智力生产。一个民族的智力成果成为所有人的共同遗产。如今，民族狭隘和排他主义已不再可能。从众多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文学中，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²⁰¹

毫无疑问，对于马克思来说，正如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著作中所确立的那样，世界生产正是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中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过程？普遍市场以大工业为前提，两者构成了普遍物质生产的矛盾方面，而普遍物质生产代表了普遍智力生产的基础。这些都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产物，这场革命随着帝国主义的出现而结束，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历史上失去了革命性和进步性，彻底沦为反革命。因此，帝国主义不但没有促进任何进步，相反，它还作为全面反动，反对人类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但是，UOC（马列毛）不仅错误地描述了自由竞争阶段已经存在和构成的要素，就好像它们是帝国主义阶段的特殊性一样，它还歪曲了自由竞争阶段的特征。这就是国际化的制作。在谈到帝国主义的两种倾向时，它强调了世界生产的社会化，仿佛它可以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而无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的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当这强调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将各国经济作为单一生产过程联系起来的生产方式时，它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生产不断增长的社会化，资本家继续作为私人所有者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相互对抗。换句话说，帝国主义世界并没有转变为单一全球资本的单一工厂，共同剥削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这些结论也与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所捍卫的“全球资本”的“后现代”论点相悖，这些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美化了“全球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见普拉昌达等人。

帝国主义不仅是“（.....）剩余价值的生产、积累和产生的全球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剩余价值进行肆无忌惮、暴力和反动争论的全球过程。**这种剩余价值的分配，是通过私人占有这种剩余价值来实现的。**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史前时期当今帝国主义的历史，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为分配全世界生产的剩余价值，为半殖民地国家掠夺、掠夺而进行的最血腥的战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又与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这些国家的大资产阶级（官僚和买办）发生争执，他们将获得这些国家所生产的社会剩余价值的最大部分。因此，说在帝国主义中半殖民地资产阶级与他们的帝国主义“伙伴”获得相同的利润率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资本主义私有制构成了资产阶级从他人那里侵占无偿劳动、获取剩余价值的权利。UOC（毛主义）所传播的帝国主义进步趋势的黄金梦想“只”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日益社会化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本条件，它是它的根本矛盾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对立统一体——资本主义，其主导方面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条件和矛盾，在自由竞争阶段和垄断阶段是相同的，但前提是在第二个阶段，在生产社会化加速的同时，集中度和垄断度发生更大的飞跃。由于主导方面的垄断性质，资本集中化。我们看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生产社会化现象时，是如何全面地对待这个问题的：

“（……）生产社会化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拨款仍然是私人的”。（列宁）²⁰²

因此，帝国主义阶段典型的垄断财产不能在不增加与生产社会化的任何时候的冲突的情况下促进这种生产社会化。因此，帝国主义时代的生产社会化是以与马克思在《宣言》中强调的进步性相反的方式前进的。处于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并没有扫除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恰恰相反，金融资本通过资本输出主要依赖于这些腐烂的基础，使它们保持在底层，并通过资本输出来实现这一点。其形式的演变，通常以明显的“受薪形式”。垄断竞争（残酷竞争）以追求最大利润为基础，不可避免地主要导致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掠夺战争、瓜分世界的斗争、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殖民奴役和法西斯主义。面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样，帝国主义就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各国的发展准备了客观条件，即社会主义革命和不间断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分别符合各国的性质，发展过程是不平等的，但又是不同的。单一的无产阶级方向。

帝国主义及其对立面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出现，开始了单一资本主义市场的解体，但绝没有导致一种将各国统一在单一过程中的生产方式。正如斯大林同志所强调的：

“单一、全面的世界市场的解体必须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后果的最重要的经济后果。它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体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斯大林）²⁰³

如果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连单一的世界市场的存在都不能保证，更谈不上形成将世界各国联结为一个单一的生产方式了。过程。更不用说在帝国主义扫除半封建制度的进步趋势中了。毛主席简历如下 IC 第六次大会针对半殖民地国家的这些重要论点：

“帝国主义‘首先与先前社会政权的统治层结盟——封建主和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反对大多数人民。在任何地方，帝国主义都试图保存和延续所有那些前资本主义形式的剥削（特别是在农村），这是其反动盟友存在的基础。（...）帝国主义在中国拥有全部的金融和军事力量，是支持、鼓励、培植和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官僚军国主义上层建筑的力量”。（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毛主席）²⁰⁴

怎么可能试图调和毛主义的辩护与帝国主义进步倾向的错误论点呢？怎么可能自称是毛主义者，说帝国主义扫除了半封建关系呢？在半殖民地国家？UOC(MLM)指出，它并没有低估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些国家，主要趋势是加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在这一阶段的开始**”²⁰⁵。它试图用一个补丁来调和其对毛主义的明显偏离：在一些国家，帝国主义一开始就强化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他们因此将国际委员会和毛主席的路线变成了例外，并在帝国主义历史上制造了错误的二分法：在这个阶段的开始，它推动了帝国主义的发展。

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然后把它们扫走。UOC（马列毛）剩下的就是解释这种帝国主义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从全面的反应到所谓的进步趋势。为了反对这种修正主义观念，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永远不会成佛”。

此外，它还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渗透被压迫国家的目的从来不是发展社会形态、使其进步，也不是扫除旧的生产方式，相反：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我国，**无意将封建中国改造为资本主义中国**。他的目标恰恰相反：让她成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毛主席）²⁰⁶

帝国主义不具有进步倾向，也不能被认为是一种将世界各国连成一体的生产方式。正如斯大林同志所确立的，帝国主义是：

“资本主义向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强化输出；“势力范围”和殖民领域的延伸，涵盖整个地球；将资本主义转变为少数“先进”国家对全球绝大多数人口进行**金融奴役和民族压迫的全球体系**；这一切，一方面，**将不同的世界经济、不同的国家领土，转化为同一条链条上的一环**，称为世界经济；另一方面，它将地球人口分为两个阵营：少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压迫广大殖民地和广大附属国，以及绝大多数殖民地和附属国被迫摆脱帝国主义枷锁而进行斗争”。（斯大林）²⁰⁷

定义上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因为UOC（毛主义）将帝国主义归类为一种国际化的生产方式，它扫除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斯大林同志定义了它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奴役和民族压迫体系**。对于斯大林来说，帝国主义不是一种将国民经济转变为单一过程的生产方式，而是将它们转变为“**同一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在这个统治链中，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受帝国主义统治的束缚。认为帝国主义促进其压迫的国家的进步完全是修正主义的观点。

UOC（马列毛主义）指出：“旧资产阶级革命典型的民主倾向已经被全面、各种秩序的政治反动倾向所取代。”列宁主义的这个论断申明，为了然后支持关于帝国主义两种倾向的修正主义论点。认真阅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表述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拒绝这种UOC（马列毛）假设。

毕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列宁出色地确立了帝国主义只有一种倾向：

“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的时代，它在任何地方都带来了统治的倾向，而不是自由的倾向。无论政治体制如何，**都会有全面的反应**；这一领域的矛盾也极端激化：**这就是这种趋势的结果。民族压迫和倾向吞并，即侵犯民族独立**（因为吞并只不过是侵犯民族自决权）”。（列宁）²⁰⁸

2-帝国主义阻碍国家发展

正如所见，UOC（毛主义）通过归因于一种假定的趋势，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全球范围内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分析。进步到帝国主义。这种“进步”将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达到帝国主义对应于单一生产过程的程度，而在被压迫国家中，达到扫除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意识形态上不可能将这些假设与列宁主义的分析相调和 帝国主义尤其加剧民族压迫。换句话说，资本的结果

金融资本的输出对于被压迫国家来说并不是任何进步。列宁强调这种输出的结果是“矛盾的极端加剧”、“趋于统治而非自由”。帝国主义的这种特殊状况导致了斗争的加剧 民族解放，并使其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具有国际性，无产阶级成为整个民族和民主解放斗争的唯一一致的领导者。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前者作为指导方针，后者作为基础，是人民革命运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构成了帝国主义时代唯一的进步趋势。

UOC（马列主义）以与列宁主义相反的方式得出结论，向被压迫国家输出资本的主要结果将是帝国主义对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扫荡，而不是民族压迫及其暹罗姐妹的加剧。通过其形式的演变来再现半封建关系。它们占据了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地位，仿佛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一样具有进步的内容。他们错误地解释说，资本输出将导致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从属，而这种从属只有在帝国主义阶段才会发生在被压迫国家。货物出口、世界市场的建立，作为自由竞争阶段的典型特征，已经使奴隶制和封建生产关系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他们将支配性与从属性混为一谈，得出以下结论：资本主义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半封建关系的贫穷国家是“被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革命必须立即走向社会主义。对于 UOC（马列主义）来说，主导地位等于从属地位，因此，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属于封建生产方式的国家中才会生效。我们要问，当今世界上哪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是从属于封建主义的？

UOC（马列主义）认为，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从属只发生在 20 世纪。奴隶制和封建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从属决不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也不是资本输出的结果。这种从属关系发生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中，是大工业发展、单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创建和国际分工的一部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个问题分析如下：

“（……）当人们的生产处于奴隶制、徭役等较低阶段时，进入一个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的世界市场，其产品在国外的销售成为主导利益，他们就会超越自己奴隶制、奴役等的野蛮恐怖，以及过度工作的残酷。北美南部各州黑人的劳动保留了一定的父权特征，生产主要是为了直接满足需要。然而，当棉花出口成为这些州的切身利益时，黑人的过度工作和七年工作中生命的消耗就成为冷酷计算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不是从他们那里获得一定数量的有用产品的问题。目标变成了生产的剩余价值。”（马克思）²⁰⁹

马克思明确强调，世界市场是大工业的产物，因此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生产方式 在自由竞争阶段发展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UOC（马列毛主义）的领导层歪曲了毛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并指出：

从这三个文本和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可以看出，（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其特点是资本主义的有限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继续统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服从于封建的生产方式，帝国主义的统治是通过大帝国主义商业资产阶级”。[UOC（马列毛）]²¹⁰

UOC（马列主义）的结论是，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可能从属于封建生产方式，并错误地认为这可以从著作中推论出来。

毛主席的。伟大舵手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

“封建时代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没有被破坏，而且与买办剥削相联系。高利贷资本显然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毛主席）²¹¹

UOC（毛主义）将这种大庄园剥削的主导地位解释为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封建生产方式的从属地位。然而，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就必须隐瞒中华民族 20 世纪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力量是帝国主义，具体地说是在前二十年共享中国沿海的帝国主义列强，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在 1930 年代后期从中国东北向中南地区扩展殖民统治。换句话说，摧毁“封建时代自然经济基础”的并不是刚刚萌芽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帝国主义输出的资本。因此，封建主义主要反对的是民族资本主义，而不是反对压迫、服从和征服中华民族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毛主席在《论新民主主义》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分析如下：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一方面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又强加了他们的统治。”残酷的统治，把它从一个独立国家变成了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毛主席）²¹²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加速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输出决定了封建中国向半封建中国的加速转变。然而，与自由竞争阶段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不同，封建主义的演变以及重商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国家的更大统一，相反，它们使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成了半独立国家。-殖民地国家，因此也是殖民地。

那么，UOC（毛主义）怎么能说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封建生产方式的从属呢？事实恰恰相反，帝国主义压服了中国的封建势力；资助、武装、指挥军阀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势力，从而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能性。这种从属关系并不是中国社会的特有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普遍规律。毛主席概括了帝国主义列强为逐步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所采用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压迫的手段”，然后，在殖民地：

- “1) 他们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
- 2) 他们迫使中国缔结了许多**不平等条约**（.....）。
- 3)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向中国大量涌入他们的商品，将其转变为他们的工业产品的市场，同时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
- 4) 他们在中国建立了众多的轻重工业公司，以利用当地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通过这种方式对中国的民族工业施加直接的经济压力，直接减缓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 5) （.....）他们垄断了国家的银行系统和金融。
- 6) 为了更容易地剥削农民群众和其他阶层的人口，他们在中国建立了一个由买家和高利贷商人组成的剥削网络（.....）。
- 7) 他们把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
- 8) （.....）挑起军事领导人之间错综复杂的战争并镇压人民。
- 9) 而且，他们从未放松过麻痹中国人民的精神。
- 10) 1931 年 9 月 18 日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将中国半殖民地的大片领土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毛主席）²¹³

在殖民、半殖民地的统治和剥削关系中，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是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列强把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作为在中国的统治支柱。因此，把中国封建生产方式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论归咎于毛主席，是一种歪曲。无论是在马克思以 19 世纪为例的例子中，还是在毛主席对 20 世纪中国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示了美国南部棉花生产中的奴隶生产关系是如何已经生效的。为英格兰的剩余价值生产服务。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确保了纺织工业的原材料比英国棉花、印度或埃及棉花更便宜，而用被北方佬奴役的黑人的鲜血生产的棉花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在 20 世纪，帝国主义不但会把把这些不同的生产关系与其服务联系起来，而且会利用一切倒行逆施的力量来确保其国家统治地位。这是从资本输出中获得利润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样，通过不平等条约，使农业生产从属于帝国主义列强的需要，直接建立帝国主义公司，剥削被压迫国家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通过这些手段，列强 帝国主义获得的利润远高于自由竞争阶段所能获得的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强调民族压迫的加剧是帝国主义阶段的结果之一。

UOC（马列主义）歪曲了毛主席对中国社会的分析，把半封建生产关系的盛行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封建生产方式的从属混为一谈，企图向部分人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被压迫的国家是基于毛主席的。因此，它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似乎半封建是这种社会形态的主导方面，似乎这种主导地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充分的理由。因此，他推断，一个半封建制不再服从于资本主义关系的国家将需要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它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完全地与扫除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起来，并将民族问题置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围之内。

这种推理的谬误在于两点：一是帝国主义并没有扫除半封建关系，而只是使它们的形式演变，但仍保留其本质；2) 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限于扫除半封建制度，其最重要的国际意义是彻底解决了从民族解放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问题，因为它最重要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是主要的事情。让我们看看毛主席是如何阐述中国革命的问题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特点。这种局面主要是由日本等列强的帝国主义势力决定的，是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主义勾结的结果。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但是，这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的。”（毛主席）²¹⁴

注意一个细节，毛主席在定义中国的性质时，总是先强调半殖民地，再强调半封建，UOC（马列毛）在提到中国时，总是把半封建放在前面，而把半殖民地放在前面。歪曲了“这是中国社会唯一决定性特征”的结论。摧毁半殖民地国家大庄园的斗争的决定性意义，正是因为这个阶级是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是最倒退的阶级。反对它，就可以团结全国大多数社会阶层和大批政治力量，建立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贫农、中农、富农）、城市小资产阶级乃至中产阶级的广泛革命统一战线。在一定条件下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当帝国主义入侵时，才有可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更广泛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因此，总的来说，反对半封建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的主要矛盾，但决不是这次革命要解决的唯一矛盾。

直到 1940 年代初，毛主席才强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7-1949），他始终指向三个目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当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而我们反对这些敌人的主要力量都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就是这个决定了我们现阶段的革命，从性质上来说，是人民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十月革命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²¹⁵

毛主席立场的这种明确，是毛主义本身思想发展的结果，是二战期间和战后中国和世界变革的反映。帝国主义统治国家工业生产的发展是整个 20 世纪的一个趋势，处于增长期和倒退期之间交替。正如我们在毛主席的上述分析中看到的那样，由于资本输出本身，帝国主义设法在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建立公司，其目的是更容易地剥削那里的原材料并过度剥削现有的劳动力。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特别是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由于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由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全球一级，帝国主义也被迫与被压迫国家的大型地方资本交织在一起，在半殖民地发展资本主义公司。由于其经济在帝国主义金融资本面前处于弱势，大型半殖民地资本要想与其交织在一起，就必须主要通过国家来实现。半殖民地国家的官僚资本主义表现为非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它发展起来，利用旧国家机器的控制，就变成了形式上是国家、内容上是私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与帝国主义产生和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大资产阶级的两个派系的分化，即被压迫国家大资产阶级的第一种形式买办和官僚派别本身，是由于国家内部的这种分化而产生的。在中国，这一过程从 1945 年开始，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败和驱逐，蒋介石在旧国家机器的领导下，在美国金融资本的杠杆作用下，推动了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过程不仅发生在中国，它是帝国主义出现的直接结果，发生在所有较落后的国家，成为不同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种现象成为垄断阶段的规则。资本。这一过程中的阶级斗争和列宁、斯大林、毛主席依次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其消灭和消灭的对象就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剥削、压迫和亡国的三座大山。

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简化为扫除封建主义，就相当于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简化为土地革命，这是对毛主义的歪曲。说帝国主义同半殖民地资产阶级地主专政结盟就能解决土地农民问题，这是修正主义对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最幼稚的幻想的表现。毕竟，正如毛主席强调的那样：

“（……）[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专政道路]是不切实际的。当今国际形势的根本特点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资本主义的衰落和社会主义的崛起。首先，国际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不会允许在我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近代史正是帝国主义侵略它的历史，帝国主义反对它的独立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确实，我们生活在地球最后一口气的时期。帝国主义快要灭亡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但是，正因为它已经濒临灭亡，所以它更加依赖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决不允许在任何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经济上和政治上，就是因为它快要灭亡了，所以它必须入侵中国，把它变成

殖民地，从而关闭了资产阶级专政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毛主席）²¹⁶

UOC（马列毛主义）的领导层反对毛主席的这些结论，但没有公开地说出来。他更喜欢隐藏自己的分歧，以毛主义者的身份兜售他的理论，即部分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在 20 世纪过程中，由于帝国主义的“进步”倾向，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专政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毛主义的主张恰恰相反：帝国主义封闭了被压迫国家的民族发展道路；毕竟，正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的政治特殊性是全面的反应和民族压迫的加剧**”²¹⁷。UOC（马列毛）关于帝国主义扫除前资本主义和这些被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列宁主义或毛主义。

3-托洛茨基主义对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分析

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比批评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更容易的了。经济上软弱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可疑，无法领导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与帝国主义和大庄园妥协，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对农民土地的斗争松懈支持。所有这些限定词都是真实的。然而，一般来说，对被压迫国家资产阶级的批评越响亮、越普遍，对这些社会的阶级分析就越肤浅。20 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特别是在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证明了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甚至在某一特定国家，视为一个没有内部分歧的单一集团的残酷错误。

例如，UOC(MLM)指出，“在不分析阶级结构的情况下，总是假设被压迫国家存在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正确的”。他这样说是因为他的结论是，在这些被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存在民族资产阶级，只有世界资产阶级的局部部分；没有资产阶级走狗，而是联合压迫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资产阶级社会。对于 UOC(马列毛)，这样：

“（……）国家的经济独立与其阶级利益相矛盾，因为它不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企业的简单雇员：它是该体系的合作伙伴和参与者 帝国主义世界”，包括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获得了与其他国家资产阶级同等的利润率”。[UOC（马列毛）]²¹⁸

他们把一切都包起来，根本不顾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存在着广大的中小资产阶级，他们剥削无产阶级，但同时又与帝国主义和这些国家的大资产阶级存在着矛盾。在他们的纲领中，他们甚至不区分哥伦比亚的大资产阶级和中资产阶级。对于 UOC（马列毛）来说，只有资产阶级，它是世界资产阶级统一社会的伙伴和参与者。所有这些“反资产阶级”的言论听起来可能是革命性的，就像“左翼”一样，但它没有任何科学性，因为它根本不符合对世界上被压迫国家的具体情况的分析，特别是在拉丁语中美国。

这种中间层的存在，即这些小地主利用受薪工作，但同时又需要从事自己的“生意”，在阿拉巴马州是一个极其现实的现实。所有这些经济体中都存在庞大的服务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中小业主，就是这一现实的鲜明体现。不顾它，只把它归为无产阶级所有者或大资产阶级，只能是回避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众，它已经成为法西斯思想的基础，就像历史上其他时候发生的那样，需要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他们必须提出与改造这些社会所必需的革命特征相对应的纲领。列宁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

“马丁诺夫骗局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种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忘记了**中间层的作用**，即存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城市和农村的穷人中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之间的大众层。乡村、

“半无产阶级”，小地主）；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我们最低纲领的真正含义。**”（列宁）²¹⁹

UOC（马列毛）甚至提到半无产阶级和小业主，但完全忘记了中间层的其余部分，完全忽视了革命最低纲领的需要，即新民主纲领。在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都是反动的，所以1905年以来列宁主义的策略就是对资产阶级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但是，这与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不同，正是由于这种压迫，当地资产阶级才具有与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不同的特殊性。斯大林在1920年代关于CI对中国革命的路线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决定性辩论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反对派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将1905年发生在俄罗斯这个压迫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与中国这个被迫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其他国家的被压迫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混为一谈。在俄国，**革命是针对资产阶级的，是针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尽管事实上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什么？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不能不反革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布尔什维克没有把自己定位为因此，与自由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和临时协议的问题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斯大林）²²⁰

斯大林同志在制定被压迫国家革命总路线的指导方针时，这样证实了这一点：

“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是一回事：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是其他人民的压迫者；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是其他人民的压迫者；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各个阶段都是反革命的。他们在解放斗争中缺乏民族因素。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是另一回事；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是另一回事。**其中，帝国主义对别国的压迫是革命的因素之一；**对他们来说，这种压迫并不至少可以不再影响民族资产阶级；在他们身上，**在一定阶段、一定时期，资产阶级可以支持本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在他们看来，民族因素作为解放斗争的因素，是民族因素。革命。不区分这个区别，不理解这个区别，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和殖民地的革命混为一谈，这一切就等于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而走上了第二国际支持者的道路。”（斯大林）²²¹

LCI的创始政党和组织位于共产国际的道路上，毛主义带来了巨大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捍卫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普遍性标准。因为这些革命的主要国际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毛主席把共产国际的路线运用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中，在被压迫国家领导了第一次胜利的革命，充分发展了这一理论，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提法。。毛主义发展了对被压迫国家资产阶级特殊性的理解，在这些国家内区分了大资产阶级和中资产阶级。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可能会反对某个帝国主义列强，如抗日战争中的蒋介石，但绝不会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中等资产阶级或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又与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都有矛盾，因为它们都是垄断资产阶级，都限制了他们的利润。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其资本规模巨大，其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统治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半殖民地国家的大资产阶级除了拥有资本的力量外，还统治和控制着国家的国家机器。作为垄断资产阶级，他们赚取超额利润的代价是对无产阶级的超额剥削，同时也是通过限制和限制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润率。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矛盾的经济基础。然而，这个民族资产阶级除了在国内市场上遭受进口商品的不平等竞争之外，还依赖于将其部分商品和服务出售给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本身。它在无数方面依赖于两者，并且由于它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它被剥削，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并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不稳定。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动摇的，无产阶级不能把它当作可靠的盟友，但必须制定一个最低纲领，

考虑您的利益，特别是您的财产和商品市场的保障，旨在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来击败半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毛主席运用斯大林同志的路线分析说：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受帝国主义压迫，所以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包括帝国主义时代**，仍然具有革命性。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各国政府正如 1911 年革命和北伐所见证的那样，国家的官僚和军事领导人可以与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结盟，共同对抗他们都感兴趣的敌人。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与旧沙皇俄国资产阶级的不同之处。由于后者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强国，一个侵略国家，它的资产阶级不具备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职责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与其结盟。反过来，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侵略的受害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具有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有责任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并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政府的统一战线。**军事领导人。”（毛主席）²²²

它发展了国际的立场，明确界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

但同时，正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因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极其薄弱，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安抚外来主义的倾向。**革命的敌人**..即使参加革命，他也不愿意彻底决裂。与帝国主义；此外，它与通过出租土地在农村进行的剥削密切相关。因此，它既不想也不能彻底打败帝国主义，更不可能彻底打败封建势力。因此，它不能解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根本问题。**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张开双臂向帝国主义投降，勾结封建势力，与革命人民作斗争。**1927 年至 1937 年。”（毛主席）²²³

毛主席由此得出结论，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革命性，同时也倾向于安抚革命的敌人。相反，大资产阶级却张开双臂向帝国主义投降，联合封建势力来反对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针对大资产阶级、官僚资本主义，但除了保留中小资产阶级的其他权利外，还保留他们的私有财产。这是毛主席用统一战线六大法则明确规定的。这是毛主席在分析被压迫国家的社会阶级，特别是在如何理解其资产阶级及其派别方面所取得的发展。

对于 UOC（马列毛）来说，在这些被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只有一般的资产阶级，这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盟友，它成为世界资产阶级俱乐部的成员，并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分享同样的利润率。此外，他们声称只有垄断资产阶级，包括本地和外国起源的资产阶级，就其中一些国家而言，他们声称既是帝国主义的。关于哥伦比亚，他们指出：

“今天的哥伦比亚社会不仅不存在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且那些充当民族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消灭者，是人民可恨的敌人的无礼和解者。”[UOC（马列毛）]²²⁴

他们声称哥伦比亚不存在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说这个不存在的阶级的所谓代表将成为人民敌人的和解者。与人民敌人和解，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特征。然而，这并不能消除它可以发挥的革命作用，特别是在帝国主义直接侵略国家领土的时期，无论是由于某一国家革命的发展，还是由于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恶化。

帝国主义统治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新民主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些国家所面临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只能通过新型民主革命来解决，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不断向社会主义迈进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革命中，反对农民土地斗争的重要性，反对中立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间层的重要性，对于民主革命，特别是在民族解放阶段，是适当的。毛主义并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推行腐烂的托洛茨基主义纲领：

“对于资产阶级发展较晚的国家，特别是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来说，**不断革命论意味着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彻底地解决它们的民主和民族解放任务。**他承担了被压迫民族的领导权，尤其是其农民群众的领导权。”（托洛茨基）²²⁵

这是托洛茨基贩卖的虚假左派立场，即希望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立即解决民主、民族和农民问题。UOC（马列毛）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刻画本质上是一样的。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民族问题

UOC（毛主义）为半殖民地国家立即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辩护遵循以下逻辑：“**大前提：**源于帝国主义‘扫荡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趋势”，受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在世界上；**小前提：**如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消灭半封建制度，**因此：“被压迫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必须立即走向社会主义。**这个理论的前提和结论都是完全错误。首先，帝国主义不存在进步倾向。正如毛主席强调的那样，帝国主义列强输出资本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殖民征服被压迫国家。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目的是消灭帝国主义统治、封建制度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即使某个半殖民地国家理论上不存在半封建制度，但由于它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它的革命也必然是不间断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革命。因为这场革命必然意味着反对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内战和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战争。

然而，联合组织（马列毛主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却有着完全歪曲的认识，除了将其目标降格为土地革命之外，还指出其目标之一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与注定要“废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相反。此外，它消除了解放的特征。这些“被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国家主权的民主斗争的“社会主义反帝国主义”。你的程序中的问题是这样的：

“这个时代和被压迫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反帝运动的内容**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而是社会主义（.....）。**继续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也具有民主的内容，**这并不与资本权力的民族基础发生冲突，而是有利于资本权力的发展，因此需要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一个阶段，这是解决半封建国家的问题”。**[UOC（马列毛）]²²⁶

换句话说，对于半封建国家的 UOC（马列主义）来说，民主阶段先于社会主义阶段是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反帝内容就是民主资产阶级解放，因此，革命并不与资本权力的民族基础发生冲突，反而有利于资本权力的发展。一个自称是毛主义的组织如何能够呈现毛主义的内容？毛主席开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怎么能这样概括伟大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阶段的意义呢？这只不过是一种廉价的伪造，目的是为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不断革命”的旧托洛茨基主义“理论”辩护。

对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来说，民族解放是十九世纪末被先进国家资产阶级抛弃的资产阶级民主旗帜，在二十世纪以后，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无法始终如一地维持它。这是帝国主义的到来，资本进入垄断的最后阶段，标志着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结束，开启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发生，资产阶级作为反革命的历史社会阶级的转变。但是，民主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在无产阶级的领导和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支持下，它就成为与社会主义革命无关的新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民族解放斗争超越了资产阶级的内容，不再属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呈现出国际主义的内容，因为它反对对所有人民而不仅仅是本国人民的民族压迫。因此，它具有无产阶级而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内容，并且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同样，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摧毁了封建制度、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某一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但它摧毁了生产资料的垄断所有制，允许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财产权，并不构成新型民主革命的目标，因为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和领导下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下进行的。毕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不间断地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推进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我们看毛主席是如何阐述这个问题的：

“在其第一阶段或第一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即使由于其社会特征，它在根本上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其要求客观上倾向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不再是一个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革命，注定要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国家，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革命，注定要在第一阶段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和所有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正因为如此，这场革命恰恰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在其历程中，由于敌对阵营和盟友之间的变化，它经历了几个阶段，但其**基本特征没有改变**。因此，这样的革命打击了帝国主义，因此，它不会容忍它，而是会反对它。”（毛主席）²²⁷

毛主席明确无误地指出：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第一阶段的要求往往会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这是必然趋势，但绝不构成这个阶段的内容，因为这已不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革命民主阶段的目标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有阶段性，但其基本特征没有改变；这是什么角色？无产阶级本性，这就是帝国主义不容忍并与之斗争的原因 反对她。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与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腐烂歪曲相一致了。中国和右翼主义，在过去，被压迫国家的各个共产党都沉迷于民主革命的目标是发展资本主义，土地革命的目标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谎言。农村，尤其如此。自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苏联解体以来，这些政党在衰落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准确地得出结论，他们国家的革命特征已经是社会主义，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成为依赖资本主义的国家。

毛主席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²²⁸。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民主，除了没收地主，把大片土地交给没有土地或土地很少的贫苦农民外，一切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都被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工业和地方大资产阶级都变成新国家的财产。民主。换句话说，它将工业、交通、大型商业、服务业和服务业最重要的部分社会化。

国家的银行，除了外资业务。鉴于此，UOC（马列毛主义）怎么能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与资本权力的民族基础发生冲突”呢？这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歪曲，是对毛主义基本理论之一的愚蠢拒绝，毛主义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为地球上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提供了革命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与毛主义有什么关系？

在彻底扭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毛主义内容之后，UOC（毛主义）得出的结论是，这就是“以半封建国家的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在这里他强化了自己的认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有在半封建状态下才有效，完全不顾民族压迫和民族解放斗争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上面的引文中得到了证明，毛主席明确指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需要“**第一阶段或第一步**”。毛主席强调的是帝国主义压迫的方面而不是封建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问题。

这样，联运（马列毛主义）就完全混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土地农民革命，颠倒黑白，完全无视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是民主任务这一事实。这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中完成的。1905年俄国革命后，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的两条路线斗争中也面临着同样的证伪：

“当整个社会经济的特征是资本主义时，每一次针对中世纪回忆的农民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并非每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 一场农民革命。（……）换句话说：没有农民，资产阶级国家也是可能的；在这样的国家，没有农民，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可能的。在一个拥有大量农民人口的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是可能的，但是，这场革命不是农民的，相反，它既不彻底改变特别影响农民的土地关系，也不在社会力量中突出农民。最不活跃的革命执行者。（……）一切错误性格的根本根源 普列汉诺夫和追随他们的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1905-1907年）的策略路线是建立在他们根本不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农民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列宁）²²⁹

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其社会特征而言，是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自己的力量同农民结盟，实现必要的民主任务。无产阶级的土地纲领，并不间断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农民革命是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不是唯一的任务。把民主革命说成是农民革命，无非是UOC（马列毛主义）偷偷融入毛主义的诡辩，从而想以它的名义支持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旧论点。列宁在他的历史分析中说得很清楚：现在的农民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农民斗争的中心是个人土地私有制。反过来，并非每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都必然是农民革命；也就是说，一场革命不会仅仅因为不依靠农民的参与而失去其资产阶级性质。同样，民族解放革命也不会因为被压迫国家不再存在农民问题这一假设而不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民族解放斗争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任务，尽管胜利只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不断地向社会主义前进。

UOC（马列主义）的领导力图以绝对的方式将反帝斗争与民族解放斗争等同起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都是反帝国主义的，因为在垄断资本阶段，反对资本主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这场斗争的特殊性在于，在这些国家中，反帝斗争具有民族解放的民主性质，但UOC（毛主义）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是一种“反科学”的态度：

“问题是如何科学地理解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和被压迫国家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目标直接是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完全符合

无产阶级斗争的总体国际主义特征，不再是保卫资产阶级民族的民主斗争，而是成为将资本主义国家从世界上驱逐出去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帝国主义。”[UOC（马列毛）] 230

换句话说，对于 UOC（马列主义）的领导来说，在被压迫国家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再是民族民主的斗争，而只是工人反对资本的社会斗争。（顶多与贫苦农民结盟）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这没有任何关于列宁主义的内容，没有任何关于毛主义的内容。正如伟大的列宁所说：

“所有战争都是政治通过其他方式的延续。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必然是他们民族解放政策的继续。”（列宁） 231

还是：

“任何期待‘纯粹’社会革命的人永远不会看到它。他将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但他并不了解真正的革命。”（列宁） 232

对于列宁主义来说，任何革命都不会是社会“纯粹的”，一个社会阶级反对另一个社会阶级的革命。对列宁来说，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就其性质而言，必然是民族革命，就其政治内容而言，则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毛主席所发展的新型、新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具有社会性（革命阶级是：无产阶级——领导力量——、农民——主要盟友、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民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媒体），具有民族性（因为它是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政权的斗争），并且具有资产阶级政治性，因为保卫国家是资产阶级的一项悬而未决的任务，这并不压制资产阶级的所有权生产资料是全部的，是的，只是本地和外国垄断大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它集中了基本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总是国际主义的。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斗争的民主内容，列宁指出：

“另一件事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即东欧和**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然而，一般来说，也有被压迫民族和不发达国家。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然而，在这些国家中存在客观上普遍的国家任务，即：**民主任务、击败外国枷锁的任务**。”（列宁） 233

因此，在被压迫民族中，反帝斗争不仅限于社会斗争，它还融合了对于革命胜利至关重要的民主和民族因素。蔑视这些分子，就是带领无产阶级走向失败。毛主席在阐述从不间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人民战争理论这一无产阶级最高军事理论时，出色地论述了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之间的区别和共同点。中国。让我们来看看：

“每次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都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即通过战争解决问题。这一革命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各国都具有普遍适用性。

但是，同一个原则，无产阶级政党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运用方式。在**资本主义国家**，当不法法西斯、不战争时，其条件是：内部没有封建制度，而是资产阶级民主；内部没有封建制度，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在国外，**这些国家没有遭受民族压迫，但他们自己压迫其他民族**。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没有民主，只有封建压迫。（.....）在这里，共产党的根本任务不是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才进行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领城市再占领农村，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当帝国主义不对我国、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进攻，或者对与资产阶级结盟的军事首长（帝国主义走狗）进行内战时，如发生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1924年至1927年，或者联合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也是帝国主义走狗）的内战，例如1927年至1936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但是，当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武装进攻时，党就联合全国各阶级、社会各阶层，反对外来侵略者，发动对外敌的民族战争，就像现在的抗日战争一样。”（毛主席）²³⁴

毛主席对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众多伟大贡献之一，就是他发现了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有时发展为革命国内战争，有时发展为民族革命战争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在这种革命经历的不同阶段，战争的条件根据主要矛盾的不同而变化，是内战还是民族战争。就中国革命而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1927）中，无产阶级和贫农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结盟，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北方军事领导人和帝国主义统治；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6）中，无产阶级只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结盟，反对地主；在抗日战争（1937-1945）中，无产阶级就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各个阶级和社会阶层结成联盟。

毛主席强调，认识革命战争特点的这些变化，是正确方向的根本。它显示了战争规律如何根据革命战争的特征（即内战还是民族战争）而变化：

“因此，战争方向的规律根据战争的条件，即战争的时间、地点和性质而变化。战争及其方向规律是与时间因素相关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特点，因此，每个历史阶段的战争法也有其特点，不能机械地从一个阶段移植到另一个阶段。”（毛主席）²³⁵

因此，毛主席根据革命战争是内战还是民族战争重新安排了革命战争法的修改：

“在中国，武装革命打击武装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优点之一。斯大林同志的这篇论文是这个说法完全正确，无论是北伐战争还是抗日战争，都是革命战争，都是为了打击反革命，参加的主要是革命人民。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如同内战与国战、共产党独自进行的战争与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战争一样。显然，这些差异很重要，因为它们表明了战争主力的程度（无论是工农联盟还是工人联盟，农民和资产阶级）以及战争的目标（无论是针对内部敌人还是外部敌人，在第一种情况下，无论是针对北方的军事领导人还是针对国民党）；它们也表明，中国革命战争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容。都是革命战争，都显示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自成立以来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情况，团结尽可能多的同盟者，组织武装斗争，打击反革命。内部或外部武装力量，并实现民族和社会解放。”（毛主席）²³⁶

毛主席正确地强调了区别革命战争不同阶段内容的决定性重要性；凸显了共产党领导的内战和民族战争都属于革命战争，但在革命力量的范围和针对的对象上却存在很大差异。毕竟，正如毛主席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不久所总结的那样：

“中国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之所以能屡屡以少胜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组织和武装了群众。按道理来说，**民族战争必然比土地革命战争更广泛的民众支持。**”（毛主席）²³⁷

以半殖民地国家革命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例，这些国家的人民战争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它要么发展为内战，要么发展为民族革命战争。要明白，随着斗争目标和力量的变化，革命战争的规律也会从一个阶段转变为另一个阶段。认识到民族革命战争比国内内战能让我们团结更多的力量和更广泛的民众支持，这是毛主义对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贡献。然而，UOC（马列毛）鄙视这整个意识形态的发展，因为他们声称：

“无论有什么特殊性，在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社会的资本主义特征**需要反帝国主义运动，而不是在一个单独的阶段（……）。**”进一步说：“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国家主权都不是劳工运动的旗帜；相反，它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破旧旗帜。**”[UOC（马列毛）]²³⁸

UOC（毛主义）领导层否认被压迫国家革命战争发展过程的阶段性，这只能暴露出他们对矛盾律的歪曲，因为正如毛主席所说：事物的一切发展过程都有阶段性。和阶段。通过融合长期人民战争的不同性质的阶段，他们运用了普拉昌达典型的“合二为一”的腐烂哲学。他们否认半殖民地国家需要民族革命战争，重复了修正主义阿瓦基安所捍卫的腐烂的“民族虚无主义”。当他们大声反对国家主权的旗帜，指责它是“磨损的资产阶级旗帜”时，他们只不过是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幼稚的、受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毫无结果的“左”倾机会主义；因为很明显，国家主权的旗帜是资产阶级的，但它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出现而被资产阶级抛弃的旗帜，而无产阶级必须把它握在手中，始终如一地指挥民族解放运动。因此，这些旗帜并不是破旧的旗帜，而是当今的秩序，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进步至关重要。因为正如伟大的列宁所定义的：

“在今年三月通过的我们党的纲领中，我们在描述全世界社会革命的进程时说，**所有先进国家的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剥削者的内战开始与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这证实了革命的进程，每一次更多信息将得到确认。”（列宁）²³⁹

我们用列宁的话来结束这一点，它完全反驳了UOC（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爆发，其目的是否认民族解放斗争的有效性和重要性，民族解放斗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它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因此，他们表明他们不了解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这些国家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因此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正如他们不了解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国家之间的矛盾一样。总的来说，被压迫民族/人民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尽管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可能会引发世界大战，而世界大战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民族解放战争以及无产阶级之间的革命内战。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

列宁说：

“因此，很明显，**在世界革命的未来决定性战役中，地球上大多数人口的运动，针对民族解放的原则，将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并将发挥作用，也许，这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角色。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重要的是要强调，在我们的国际中，这是第一次，我们已经做好了这场战斗的准备。”（列宁）²⁴⁰

英勇的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最近的战术反攻充分证实了列宁的这些革命言论。 LCI 尊重并延续这一伟大的列宁主义信条。

5-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与半殖民地国家的农民问题

以前我们在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一定程度上抽象了对半殖民地国家土地农民问题的分析。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强调，民族解放的任务是一项民主任务，只有通过这种类型的革命才能解决，因为它的基础是与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革命阶级阵线，并通过共产党在无产阶级的指导下进行。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更为方便，因为民族压迫比半封建制更加明显，因为后者继续以潜在的方式存在，大部分时间都被其形式的演变所掩盖。本专题及以后，我们将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角度，分析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向农村渗透的一般特征、发展以及半殖民地国家农民问题的现状。资本主义。

UOC（马列主义）在解释哥伦比亚和其他国家的土地和农民问题时，采用了与某些巴西骗子相同的程序：1) 他们仅将列宁主义著作作为其分析的理论基础。俄罗斯的资本主义，仿佛这是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后一句话；2) 他们机械地把列宁的分析范畴移植到拉丁美洲，而没有考虑到俄罗斯该领域的特殊性；3) 认为俄罗斯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列宁分析的时期，即从 1861 年到 1897 年，这个时期仍然是资本第一阶段，自由竞争的时期，好像它继续没有任何变化，已经处于垄断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正如 19 世纪的俄罗斯一样，20 世纪的拉丁美洲领域的资本主义也以相同或非常相似的方式发展。与巴西的霍克斯主义者一样，UOC（毛主义）得出的结论是农民问题不存在，因为在拉丁美洲国家，农民的分化是完全的，因此那里只会有两个阶级：农业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这座小财产将作为博物馆藏品保存下来，必须受到尊重，但实际上在革命过程中不起任何作用。因此，土地纲领必须是社会主义纲领；在这里，他们重复了与巴西修正主义者相同的困惑：他们把国有化当作土地集体化，因为他们在《GRSO》中歪曲了列宁在 1917 年 10 月提出土地国有化时，本应对俄罗斯实行社会主义纲领。农民。让我们更详细地看看这种歪曲理论和现实的有害后果。

帝国主义存在一种假定的进步趋势，这反过来又意味着，输出到半殖民地的资本将拥有强大的力量。扫除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特别是在农村。他们这样表示：

“输出资本作用于被压迫国家的病菌或资本主义发展，作为其产生的趋势，加速了它们的发展，**扫除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痕迹，加速了农民的分解**”。[UOC（马列毛）] ²⁴¹

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列宁在 19 世纪俄罗斯分析的过程在 20 世纪哥伦比亚也以同样的方式完成：

“在哥伦比亚，农民在农业无产阶级和老板之间的分解和分化是一个事实。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农业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显着的现象。这一过程的实质是**农民阶级的分化，而不是“半封建主义的演变”**。这一过程以加速的方式发生，主要是通过**对独立生产者的暴力征用以及土地和资本的集中**。”[UOC（马列毛）] ²⁴²

换句话说，根据 UOC（马列主义）的观点，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加速了农民的分化过程，将其分化为农业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这种划分的结果，加速了对贫农的暴力征用进程。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农民分解而形成的农业资产阶级剥夺了小地主的财产，

从而使哥伦比亚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达到顶峰。剥夺一方面会强化这个新产生的农业资产阶级，将土地集中在他们手中；另一方面，它会产生没有任何生产工具并被迫出卖劳动力的农业无产阶级。

UOC（马列毛）关于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国家农民分化可能产生农业资产阶级的理论，只是为了粉饰农民的剥夺，给半殖民地形式的演变涂上进步的色彩。-封建制度。UOC（马列毛）在对哥伦比亚进程的研究中，武断地将农民的分化、新老板的出现和对小地主的暴力征用联系起来。他强调，哥伦比亚案例的特殊性在于这些征用的极端暴力，并为我们提供了 1946 年至 1957 年间 165,000 人死亡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UOC（马列毛）隐藏的问题是分析哪个阶级进行了这些征用。哪个阶级应对哥伦比亚战场上的这场屠杀负责？农民分化产生的农业资产阶级是否应对这一过程负责？

UOC（马列毛组织）巧妙地忽略了这个问题，因为在制定这个问题时，它必须表明负责这些征用的阶级是旧的克里奥洛大庄园。必须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征用并不代表农村中基于农民分化的新阶级的出现，而是代表了在拉丁美洲众所周知且古老的旧农村寡头政治的加强。UOC（马列毛主义）所做的就是混合列宁在 1899 年所做的两种不同的分析，并将其视为拉丁美洲农民暴力征用的原因。

在他的巨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在研究俄国农村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中，一一分析了客观现实中结合在一起的两个过程：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列宁在关于小农庄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章节中，详细研究了农民分化的过程，表明了农民是如何分化的。商业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农民分裂为两个对立阶级的过程：农业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这项研究在俄罗斯尤为重要，因为民粹主义思潮认为俄罗斯农民社区代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坚实基础。因此，民粹主义者认为商业经济的进步和农民的分化是反动的。反过来，列宁将展示这一过程的进步特征，因为农民社会以及地主都是俄罗斯封建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列宁在本章中分析了从农民中产生的农村资产阶级，“抽象”了地主，即最初不考虑他们，以更清楚地展示俄罗斯农民经济的资本主义演变过程。列宁随后表明，富农从贫农手中租赁土地时，最终将这些财产集中在他们手中。这一过程导致征用缓慢，与土地所有者征用不同。因此，列宁在本章最后强调，这个新产生的农业资产阶级并不是农民村庄的真正统治阶级，而是旧的地主阶级：

“以前说农民资产阶级是今天乡村的主人，我们是从那些阻碍分化的因素中抽象出来的：附庸、高利贷、劳动报酬等等。事实上，当代乡村的真正主人一般不是农民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是农村的高利贷者和邻近的地主。那然而，抽象是一种完全合法的方法，因为否则就不可能研究农民之间经济关系的内部制度。”（列宁）²⁴³

UOC（马列毛）绝对抽象了哥伦比亚农村的真正主人是谁，并将农民分化和大规模征用视为半殖民地国家农村资本主义全面演变的连续过程的链条。

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与拉丁美洲相比，在时间（19 世纪和 20 世纪）和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列宁研究的过程以 1861 年为起点，当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俄罗斯颁布了所谓的农奴“解放”政策。所谓农奴制的终结是农民反对大庄园的斗争增长的直接结果，但“解决方案”是沙皇政府针对农民的策略。自从

古代，俄罗斯帝国的农民被组织成上述的社区，这些社区有一些重要的特殊性：1) 社区的土地在其成员之间平均分配，并且所有权之间不时发生轮换；2) 封建税费是全体农民“集体”缴纳的，如果一个人不缴纳，其他人就要承担；3) 禁止农民出售土地和离开社区。直到 1861 年，这些社区都由特定的邻近土地所有者或直接由皇室统治。随着“解放”法令的颁布，这些社区正式与邻近的大庄园分离，并通过奴役关系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然而，小农农场和大庄园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两种方式维持的：救助和削减。赎金是农民为“解放”所必须支付的金额，即他为自己拥有的土地所支付的金额。这些地区是解放时被土地所有者征用的大片农民社区。一般来说，这些地区自然资源最丰富，也最肥沃。砍伐和救援阻碍了农民社区的自由发展，因为农民为了生产，需要租用部分被砍伐的土地，例如作为木材来源的森林；除了必须花费重要的一部分您的预算与支付赎金。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集中分析了农民共同体内部的这一过程，其最显着的结果就是前面提到的农民分化，即富农租用同一共同体内贫农的土地。这种分化导致了社会内部富农和贫农的两极分化，这种分化往往将农民分解为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列宁在分析地主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发展时，又重点研究了劳动报酬制度（典型的是封建制度）向工资制度（典型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

由于列宁考虑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因此他在这部著作中没有分析地主和农民之间以前的、更古老的、典型的封建或半封建的矛盾。例如，它没有分析对农民的救助和削减的影响，因为它的结论是贫农的无产阶级化进程已经得到巩固。例如，列宁于 1903 年在第二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土地纲领》主张只征用边疆土地并将其返还给农民，而不是所有大庄园土地。当时，人们并不理解农民土地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必要性，因为经济数据已经表明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农村得到了巩固。

然而，社会进程总是比统计数据更引人注目。当革命进程于 1905 年 1 月开始时，3 月农民以一种令所有人惊讶的力量进入了阶级斗争的舞台。这群群众的斗争不是农村无产阶级反对农民老板的斗争，也不是农村无产阶级反对承包地主争取更高工资的斗争。这些群众的需求只有一个：土地。不仅仅是 1861 年被贵族征用的割地，还有俄罗斯所有的土地都归农民所有。从这些群众的斗争中，产生了**将所有土地国有化**以及所有从事土地劳动的人享有私人享有权利的要求。

列宁是第一个认识到这场农民起义对于持续到 1907 年 12 月的俄国革命的意义的人。在 1905 年 4 月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而在此之前，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一直是布尔什维克争夺霸权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明白，只有得到农民的支持，这种霸权才能实现。布尔什维克的基本策略变成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这是更彻底地结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唯一途径。确保其不间断地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按照这一策略，布尔什维克不仅要关注农业无产阶级与农民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大庄园之间的矛盾，而且还要关注农业无产阶级与农民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大庄园之间的矛盾。列宁从 1905 年起就强调：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农民起义取得彻底胜利之前，革命口号都**必须考虑到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对抗**”。（列宁）²⁴⁴

1905年革命及其所有教义都意味着布尔什维克策略和土地农民纲领的重要方面发生了变化。毕竟，真正的革命纲领是从群众的具体斗争中制定出来的，而不是从统计数据的简单比较中制定出来的。这些修改并没有减损列宁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重要性，因为它从根本上是正确的，准确地分析了俄国的一切发展趋势，从而为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红色派提供了强有力的阶级分析。但群众的革命斗争表明，这些趋势的演变不会像列宁在1899年所设想的那么快。毕竟，阶级斗争是解释社会现实的主要数据：

“事实是，此时还必须考虑到，由于缺乏公开的群众运动，问题无法根据确切的数据得到解决（.....）。事先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在地主部分从劳动支付转向工资支付的影响下，农民的分化程度如何。

没有人能够计算出1861年改革后农业工人的构成数量，以及他们的利益与破产农民群众的利益区别到什么程度。”（列宁）²⁴⁵

生活告诉布尔什维克，这种分化并没有那么深刻。俄罗斯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农业资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列宁充分认识到这一不足，并将群众路线运用到革命意识形态和俄国革命指导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表明了1903年捍卫土地革命的土地纲领的错误基础。仅针对地主征用的土地，而不是地主的全部土地，是**“对俄罗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高估”**。因此，列宁分析道：

“（.....）我们1903年批准的‘切割’计划中的错误。最后一个错误的根源在于，我们在正确定义发展方向时未能定义发展时刻。我们假设元素 资本主义农业，也体现在地主的农场上（除了掠夺的“枝条”；因此要求归还枝条），它也体现在农民的农场上，在我们看来，强大的农民资产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农场不适合“农民土地革命”。造成这一错误纲领的原因不是对农民土地革命的“恐惧”，而是对**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高估**。农奴制的残余在我们看来只是一个小细节，而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农场则显得微不足道。在我们看来，[农民的]和地主的现象是一个完全成熟和巩固的现象。”（列宁）²⁴⁶

列宁这样描述了认识到该路线的不足和发展该路线的必要性的过程：

革命凸显了这个错误。它肯定了我们确定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对俄罗斯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已经被整个事件进程，特别是前两届杜马所证实，以至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已被彻底否定。但农村农奴制政权的痕迹却比我们想象的要强烈得多；它引发了全国农民运动，并使这场运动成为整个资产阶级革命的试金石。革命社会民主主义所发挥的霸权力量的作用在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中，它总是被分配给无产阶级，因此必须更精确地确定它，就像领导者在他身后领导农民的角色一样。什么通向何处？为了最重要和最坚决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错误的纠正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必须捍卫与整个旧农业政权的斗争的任务，而不是与旧的农业政权的残余作斗争的特定任务。而不是解开地主经济，我们着手摧毁它。”（列宁）²⁴⁷

UOC（马列毛）首先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农民分化和暴力征用）合而为一，并考虑将 20 世纪 50 年代的农民征用具体分析为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而不是旧有资本主义的强化和资本化过程。大庄园。这种分析没有任何辩证的地方；它的合成再次是合二而一。其次，他们完全无视列宁的分析，在 1905 年革命之后，对这一发展速度的修正，以及不仅反对旧农业政权的残余，而且消灭旧农业政权的策略的发展。庄园制度..因此，他们歪曲列宁主义理论，据称是为了在帝国主义“扫除”半封建关系的时期，对半殖民地国家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进行错误分析。

当他们开始分析哥伦比亚“农村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大庄园”之间存在的生产关系时，这种扭曲就变得更加荒谬。UOC（马列毛）声称，哥伦比亚农村的合伙关系不是半封建关系，而是受薪的、纯粹资本主义关系的隐蔽形式。他再一次误用了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的学说，再一次忽视了后来的发展。列宁主义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与这些相反，提出了如下问题：

“农业无产阶级的崛起过程实际上是农民，特别是小地主的分化过程，他们在农村生存，不是作为农奴，而是作为半无产者，在资本主义关系网络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通过将一小块土地保留在农村的生产，以确保现代种植园或畜牧业的廉价劳动力。**（.....）**伙伴关系**这种典型的封建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过渡制度，即半封建主义的典型代表，在哥伦比亚演变出了其真正的内容，并成为留住工人在土地上获得土地的方法之一。**受薪劳动力**，廉价且接近资本主义农场，即成为资本主义土地剥削的一种形式。这种受薪生产关系仍然披着古老的合伙制外衣，表面上是半封建的，但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 [UOC（马列毛）] ²⁴⁸

列宁在《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分析了同样类型的关系，即合伙关系，其中地主将一块土地交给农民，目的是在资本主义中建立劳动力队伍。田，以便在农业工作需要更多工人（例如种植或收割）时使用。列宁将这种剥削形式描述为劳动报酬制度（封建）和资本主义制度（工资）的混合体；这恰恰是一种半封建的形式。UOC（马列毛）的领导层表示，在哥伦比亚，这种形式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土地剥削”的完整形式。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之一是工人摆脱（剥夺）了生产工具，那么这种转变怎么可能发生呢？他们对这种转变，即从伙伴关系这种典型的半封建关系到典型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经济学解释如下：

“目前，以合伙关系的形式，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容被隐藏起来：资本家（.....）将其资本投资于农业：一部分作为不变资本（工具、设施、种子、化肥和其他投入），另一部分作为固定资本（工具、设施、种子、化肥和其他投入）其他作为可变资本（相当于有义务向合伙人“预付”的最低工资，正式原因是后者参与“利润”）。而且可变资本（即投资于购买劳动力进行生产的资本）如此之多，以至于在所谓的“分享”时，这种“预付款”会从合伙人的份额（如果有的话）中扣除；如果没有，合作伙伴没有义务退还任何此类“预付款”。事实上，这是一种披着合伙关系外衣的带薪生产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合作伙伴拥有能够自己耕种一小块土地的所谓优势，但这并不重要。**已经 我们知道土地所有者在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为商业作物种植园和牲畜保留廉价劳动力。” [UOC（马列毛）] ²⁴⁹

首先，将工人安置在土地上，无论是通过任何方式、强迫还是“免费”交付土地，都构成了封建要素。这种“合伙”的解决形式在巴西也很常见，在这种形式中，剥削关系往往被隐藏起来，就好像它是所有者之间的自由联合体一样。在 UOC(mlm) 提供的示例中，它是一种伙伴关系形式，其中

工人不会带任何生产工具，他只是“赚”一块土地来自己耕种。然后他们说，合伙人的利润分成实际上并不是利润，而只是工资；作为证据，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企业亏损并且没有利润可分享，合伙人保留他的份额并且不必归还。这一事实仅证明利润分享是一种骗局，但并不能证明 UOC（马列毛）的结论：这种合伙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然而，这是一个不可能的证明，因为劳动力的固定，无论是强制性的还是“自由的”（通过转让一块土地），都不能被解释为自由的工资关系，典型的资本主义关系。

当 UOC（马列毛）声称“一些合作伙伴可以培养一小块地块并不重要”时，他们只是绕过了这种关系的本质特殊性。因为正是这种“割让”给工人的土地的“权利”，才允许出于各种原因对劳动群众进行过度剥削。UOC（马列毛）的管理层意识到这种超级剥削，甚至强调了整个哥伦比亚剥削制度的社会重要性，但是，他们没有解释什么经济条件确保了这种超级剥削：

伙伴工人]在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网络中发挥着特殊作用：一方面，他们通过一块土地被保留在土地上，成为现代种植园或牲畜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他们是潜在相对人口过剩的主要根源，这在哥伦比亚是低工资的最重要根源之一**，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也是如此，最后是普遍过度剥削的根源。无产阶级。” [UOC（马列毛）] ²⁵⁰

UOC（马列主义）指出了一个客观问题，即半殖民地国家大庄园对农民的压迫与资产阶级在榨取剩余价值过程中对劳动力的过度剥削之间的关系。然而，他们再次绕过了问题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您强调，通过提供土地在农村建立劳动力队伍是哥伦比亚社会普遍过度剥削的根源，因为它造成了潜在的相对人口过剩。换句话说，他们只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农民工之间的竞争加剧，这种竞争使得劳动力价格在一定限度内下降。但这种竞争在农村都存在，在城市更激烈；因此，这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的特殊性。列宁对伙伴关系中对农民的超级剥削过程做出了精确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UOC（毛主义）的领导误用了《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提出的教义：

“因此，在劳动力支付体系中（.....），**劳动力价格通常不到资本主义合同价格的一半**。因为您只能支付当地农民工作，此外还‘提供了纳迪尔’（公共土地），工资大幅下降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了**纳迪尔作为自然工资的重要性**。”（列宁） ²⁵¹

列宁正在处理的例子与 UOC（马列毛）所提出的例子非常相似。地主雇用一名农民，在其财产旁边拥有一块土地（*nadiel*）；如果他使用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说，如果他从其他地区雇用季节性工人，那么他在这名工人身上花费的费用是他的一半。列宁随后列出了使劳动力价格下降成为可能的两个原因。首先是大庄园周围的农民之间的竞争，因为他们拥有这块土地，一般来说，他们只能将劳动力出售给附近的地主，而周围的其他农民也是同样的情况。这迫使劳动力价格下降，因为正如 UOC（马列毛）本身所表明的那样，它代表了潜在人口过剩的根源。第二个原因指出了农民份额作为农民自然工资的重要性。换句话说，正如农民所一部分，即使其经济遭到破坏，其提供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弥补其劳动力每年再生产的部分成本。由于他的必要劳动的一部分由他的“他的”份额的劳动来支付，即列宁所说的“自然工资”，它使地主雇主能够向来自其他地区的季节性工人支付一半的工资，这些季节性工人拥有没有一块土地。列宁在另一部著作中更清楚地解释了这个问题：

“一个农民怎么能做几年价值 10 卢布、69 戈比的工作呢？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的份额覆盖了农民家庭的部分开支，并允许工资降低到‘自由就业’以下。”（列宁）²⁵²

这就是降低农民合伙人工资的秘密，而正如 UOC（马列毛）领导层所强调的，这反过来又允许对整个经济中工人的工资施加下行压力，从而确保超额收入。对劳动力的剥削，根据马克思的说法，是以低于其价值的价格购买劳动力。因此，分析这种伙伴关系的问题是确定它所构成的生产关系类型，是纯资本主义的还是半封建的。然而，我们可以立即放弃 UOC（马列毛）的降级评估，因为考虑到合作伙伴是否可以自己耕耘一块土地并不重要。不，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最重要的 这很重要。

在对这种伙伴关系的完整经济分析中，我们看到，就像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工资关系中一样，“伙伴”在一天中的一部分时间工作是为了再生产他的劳动力，或者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构成了必要的工作；一天中的哪一部分时间构成剩余工作。假设分期付款农民的工资是 6 卢布，而“自由”工薪阶层的工资是 10 卢布，同样的工作，同一天，很容易推导出从农民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是 4 卢布，比“自由”工薪阶层的收入高。如果白天生产的价值是 20 卢布，那么工薪农民生产的剩余价值就是 14 卢布，“自由”工薪阶层的剩余价值就是 10 卢布。根据马克思提出的公式之一，剩余价值率为：

剩余价值率 =

对于“自由”工薪阶层 $= 10/10 = 1 = 100\%$ ；而利用“伙伴”获得的增值率为 $= 14/6 = 2.3 = 230\%$ 。正是土地所有者“割让”给合伙人的土地上的耕种，确保了剩余价值率的差异。UOC（马列毛）指出“合作伙伴是否在一块土地上耕种并不重要”。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种超级剥削的秘密在于，农民劳动的一部分构成了他的自然工资，支付了农民家庭的部分开支，因此他可以通过从地主那里获得低 4 卢布的工资来再生产他的劳动力。然而，土地所有者是“免费”给予农民的土地的所有者。农民在这块土地上的生产并不是独立的，因为授予土地的土地所有者和耕种土地的农民之间存在着剥削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分配并不是免费的，因为农民在其中的劳动为地主提供了 4 卢布的额外剩余价值。因此，农民在田地里的劳动也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凡是他在哪里生产的、用来供给地主从他的工资中拿走的 4 卢布的东西，都是地主间接占有的剩余劳动。因此地球不

□ 隐性收入是免费提供给农民的，他支付给地主的隐性收入的价值正是后者从他的工资中扣除的金额。

□ 这种生产关系隐藏在伙伴关系中，其目的是确保该领域的劳动力。它看起来像是土地的自由转让，是大庄园给予农民的恩惠。他觉得有义务回报这份礼物，并付出更多的额外工作，例如：修理围栏和其他财产护理，或者他的妻子在房子周围做家务，此外，从他的家人在名单上的投票中可以明显看出由好心的土地所有者任命的候选人。这就是个人依赖的纽带，仅此一点就解释了为什么农民接受被“困”在土地上，接受低于市场水平的工资，即使他在自己所处的情况下别无选择。这是一种受薪和奴役的关系，即典型的半封建关系，绝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关系。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在雇佣劳动形式的背后是如何存在帝国主义所复制和维持的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因为它们是最有利于获得最大利润的关系。这就是被压迫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反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通过资本输出，在前资本主义、封建/半封建的基础上，在这些国家中产生了官僚资本主义，并维持和再生产其底层的财产和社会。关系，通过其形式的演变来探索工作。换句话说，与 UOC（马列毛）管理层的理解相反

这种伙伴关系是“表面上半封建，实质上半封建”。

然而，UOC（马列毛主义）的领导层除了误用列宁在《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的教义之外，在他的工作中，在他如何发展、随后，对其这种合伙关系的含义进行了分析。因此，他们引用了列宁的以下一段话来将这种剥削关系描述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关系：

“土地流转给农民工的行为往往是为了农民自身的利益，因此，**拥有土地的农民工类型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在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形式：英国佃农与从法国或莱茵省领地的农民不同，而后者又与来自普鲁士的工薪阶层或膝下阶层不同。他们每个人都留下了独特的农业政权和历史的足迹 这是农业关系所特有的，但这并不妨碍经济学家将他们归入同一类型的**农业无产阶级**。”（列宁）²⁵³

UOC（马列毛）以这段话作为支持，将这种形式的合伙企业归类为典型的资本主义。首先，这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它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关系。其次，正如我们在 1905 年以后列宁的文本中看到的那样，他承认有时他高估了俄罗斯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并且很难：“计算 1861 年改革之后直到他们的利益在什么时候与破产农民群众的利益发生了区别”。列宁本人后来对这种类型进行了更精确的分类。剥削关系：

“（……）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最先进的国家，**在大地主附近仍然存在着中世纪对小农的半封建剥削的残余**，例如德国的 *Instleute*，德国的 *métayers*。法国和美国的**租户伙伴**（不仅是黑人，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受到剥削）南方正是如此，但有时白人也是如此。”（列宁）²⁵⁴

或者列宁如何分析美国南部典型的伙伴关系，将其视为从奴隶劳动到工资就业的转变，这对于研究巴西和哥伦比亚的经济社会形态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因为这两个国家也对黑人进行奴隶剥削：

“在北美，典型的白人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而典型的黑人农民则是佃农。（……）他们绝不是欧洲文明现代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租户。半封建**伙伴**，或者从经济角度来看同样是**半奴隶占上风**。”（列宁）²⁵⁵

并将这种类型的伙伴关系分类为基础：

“（……）典型的俄罗斯风格，‘真正的俄罗斯风格’，即基于工作的支付系统，即伙伴关系。”（列宁）²⁵⁶

这种类型的伙伴关系，即使是最先进的形式，其目的只是为了确保该领域的劳动力，也不能被视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其特殊性，即劳动力价格低于农民工的价值，正是地主在其土地上对农民劳动的间接剥削。UOC（马列主义）指出这种关系在半殖民地经济中的重要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国家群众过度剥削的主要根源之一。然而，他们错误地解释了这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和社会内容，将其归类为典型的资本主义，而实际上它是典型的半封建关系。这是列宁解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伟大的恩格斯也曾指出：“**只有受到法律和习惯认可半奴役**，才为剥削农业工人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第 257 章}

如果 UOC（马列毛组织）的领导层对哥伦比亚的分析是一致的，如果它认识到将伙伴关系归类为典型资本主义关系的巨大错误，那么它将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

对哥伦比亚无产阶级的过度剥削是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是建立在半封建和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这一结论对于 PCC（红色派）和无产阶级权力-OP-MLM 所理解的哥伦比亚革命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它将为该国无产阶级重建其先锋党和组织提供新的动力。哥伦比亚革命者。

我们从实践的角度评估，从哥伦比亚近年来的阶级斗争来看，有很多因素可以证明这次整顿是合理的。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是拉丁美洲农民游击队的典型故乡。哥伦比亚农民游击队几十年来不间断地表现了农民群众的巨大努力，而正是由于缺乏适当的无产阶级领导，他们才没有繁荣起来。

从理论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对拉丁美洲经济社会形态分析的错误导致 UOC（马列毛）提出了无法动员农民群众的土地计划。还因为它使我们认为这不是哥伦比亚革命的战略任务，因为他们得出结论，农民的分化过程已经完成，这意味着哥伦比亚农村的基本阶级今天将是农业无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以典型的资本主义关系为基础的旧大庄园逐渐发展成为巨大的资本。因此，严格讲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对立是没有经济基础的，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剩下的只是小规模生产的残余，就像城市中也保留的那样。

列宁在 1899 年指出的农民分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在当今巴西农村社区存在的分化中，农民被分为富农或中农，他们剥削贫农的劳动力，特别是那些没有土地或土地很少的农民。但是，富农转变为农业资产阶级的条件却完全改变了。我们正处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时代，因此，小农经济，即使是富裕的小农经济，也无法取得多大进展，因为它与大农业生产竞争，来自与大资产阶级结盟的旧大庄园，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有资本、金融。即使一个农民出人头地，剥削村里的贫苦农民，最多也只能是当地大庄园的特权走狗；他很难成为资产阶级，就像小工业只能在城市中心作为大生产的辅助生产单位生存一样，通常会永久毁灭。

与列宁研究的俄罗斯相比，拉丁美洲的另一个特殊性是，它的地主经济并不是在 19 世纪才演变为商业形式的，而是在这种条件下诞生的，以外国市场为标志，以“资本主义”为标志。国际分工..因此，一些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形态的特征内容是以种植园制度为标志，以奴隶制和奴役劳动为基础，大量出口单一作物。在俄罗斯，1861 年改革结束时，农民社区拥有一半的耕地。小农半拥有这片土地（*nadiels*），并将其出租。贫农出租土地在拉丁美洲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在巴西，它将更频繁地出现在近代历史中，即旧国家官僚“土地改革”的“解决计划”中。在这些土地上，最贫穷的农民最终将土地租给邻近的地主或当地的富农。或者当这些农民中的几个人在同一片连续的土地上共同将其出租给被这些大庄园包围的大豆和甘蔗大种植者，并将他们的土地转变为牧场并将其出租给牧场主时，或者与他人以半股的方式共同养牛。但这是最近的现象，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一直发生并继续发生的情况是，没有土地的贫农或小地主向邻近的农民租一块地，一般为期十年，以三分之一的基础耕种，最后根据合同，他必须移交地主拥有的地块和其他数百公顷土地以及牧场。作为合同的一部分，他还必须维护整个庄园的围栏和其他服务。

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将一种基于封建土地垄断的过时制度转移到了美洲，在许多情况下建立了封建政权，而在其他情况下则建立了奴隶封建制度，这两种情况通常都将农民财产完全排除在土地之外。地球。一般来说，在巴西，农民一直是地主土地上的居民。只有逃到农业边境以外的最偏远地区，他才能获得自由。与之前的奴役相比，他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农场、自然经济和不稳定的自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土地的“所有者”到来，并获得旧国家公证官僚机构提供的“合法”或伪造的财产所有权，并得到他所享有的寡头权力的支持并征用农民的土地。巴西棚户区农民与土地征用的持久斗争的传奇故事是我们历史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农民战争，其间穿插着兴衰的时刻。

在拉丁美洲农业中渗透和发展的资本主义与列宁分析的俄罗斯所发生的形式尤其不同。在这里，富农没有办法转变为农业资产阶级；一般来说，旧的大庄园变成了资产阶级。巴西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促进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关系，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显著。但这种资本主义与列宁在 19 世纪自由竞争时代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并不相同。它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被压迫国家中形成的资本主义；用列宁的话说，俄罗斯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在巴西这里，发展的是帝国主义产生的、完全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需要服务的官僚资本主义。与列宁分析的俄罗斯不同，这里没有带动民族农业独立发展的民族农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服从于大都市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从来没有扫除农村的半封建关系；因此，这些关系通过其形式的演变继续以隐蔽的方式存在。

在半殖民地国家，农民是主体，而不是农业无产阶级，虽然农民被驱逐出农村，但随着机械化的进步，数量减少的却是农业无产阶级——已经处于机器人技术的应用阶段，并且很快就会出现。机器的远程操作。半封建剥削是帝国主义产生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对国家进行半殖民地征服和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进行超级剥削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它继续自我再生产，而小农经济虽然遭到破坏，但并没有消失，因为它对于在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中能够再生产的资本主义类型是必要的。有了这种落后的、不合时宜的经济基础，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从根本上仍然保留着新的、明显资产阶级形式的潜在半封建制度，其次，仍然是同样的旧形式，例如在法律领域，公民的不平等。权利，在领域。所有这些垃圾只有在土地所有者的财产被摧毁的情况下才能被清除。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它推进得越彻底，我们就越接近社会主义。因此，半殖民地国家对农民的征用并不构成任何进步，在这里这不是社会发展的标志，而是拖延、农村空置、人口减少的标志，这已成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主要反革命政策。拉丁美洲受压迫的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特别是在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革命胜利之后。恩格斯早在 1894 年就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为由批评考茨基时就强调了这个问题：

“我们能够从无产阶级的实际垮台中幸存下来的农民数量越多，并且我们作为农民仍然能够为自己赢得胜利，**社会的转型就会越快、越容易……**”我们没有兴趣等待这种转变发生。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在各地不断发展，直至产生最终后果；最后一个小工匠和最后一个小农都落入了资本主义大剥削的魔爪。”（恩格斯）²⁵⁸

最彻底地扫除地主和土地所有权垄断、支持未来土地国有化的群众，将是农民群众，特别是贫农。能够团结这些群众的旗帜就是没收土地并立即将土地交付给这些农民。这种斗争只能与夺取政权的斗争广泛地联系起来进行，因为如果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那么土地问题就是政治权力问题，是推翻大庄园和土地权力的问题。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统治是通过官僚资本主义来支持的。

因此，半殖民地国家的UOC（马列毛）农业计划是完全错误的，如下所示：

“农业无产阶级不像工业无产阶级那么集中，重要的是，它在纲领和组织上都独立于农民；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业主的农村小资氛围和小财产的幻想。只有这样，才能**教导农民**，为了拯救自己，必须与无产阶级结盟，**反对私有制，把土地所有权转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剥削**，因为个人剥削是有条件的。通过财产。个人，才是导致农民走向灭亡的原因。”[UOC（马列毛）] 259

UOC（马列主义）的领导层坚持指责我们是“左派”，然而，没有比他们的“左派”农农纲领更机会主义的了；他是一个“左”倾机会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试图动员稀缺的农业无产阶级，让那些没有土地的贫苦农民认识到反对私有财产的重要性，说服他们将自己的小财产转变为集体农场，这比俄罗斯民粹主义者的梦想更加幼稚，俄罗斯民粹主义者的目的是改变私有制。农民社区成为社会主义的堡垒。这表明他们对农民的本质及其最大的要求——土地所有权——是完全无知的，就是把他们推向无产阶级，把他们绑在反革命的阵地上。这是一种毫无结果的、简直是愚蠢的教义唯心主义。不仅如此，在农民中实行这种政策，是对无产阶级统一战线霸权战略和夺取政权的犯罪。

农民明白，没有土地、数量少、质量差，是他破产的直接原因。这种敏感的知识是革命性的，因为它将农民的愤怒引向对立阶级：集中和垄断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地主。在斗争过程中，有必要使农民相信，为了新的人民革命，在解放区，仅仅消灭邻近的地主，而消灭整个地主制度，并没收大型私营公司，是没有意义的。国家，直到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在这场斗争中，他才知道私有制是无法救赎的，如果他中途停止斗争，他就会再次毁掉自己；地球将再次变得浓缩。如果仅限于经济和工会斗争，那么束缚工人斗争的铁循环就会重演。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只有当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霸权下的革命统一战线手中，通过共产党，农民才会充分认识小财产的局限性。因此，他们将能够在革命战争过程中形成这种意识，因为他们在那里了解到新的生产关系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他们了解到自由比土地所有权更重要。正如列宁所说，农民在争夺土地的斗争中拿起了步枪，手里拿着步枪，他发现了自由，那么这对他来说就变得比土地更重要。从而把自己转变为与无产阶级牢固团结的革命农民。他再次强化了已经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幻想，即仅用善意的宣言和劝告来说服农民：

“无产阶级现在必须解决第二个问题，向农民表明，它可以为他们提供经济关系的范例和实践，这将优于每个农民家庭适应其空间的经济关系。直到现在，农民们不再相信这个旧制度，并继续认为这是正常的。毫无疑问。**认为我们的宣传可以改变农民对至关重要的经济问题的看法是极其愚蠢的**。农民们满怀期待；中立-敌对态度 在我们面前，他们转变为中立仁慈的态度。与任何其他政府相比，他们更喜欢我们，因为他们认为工人的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他们所描述的那样的残酷暴力、篡夺；而是我们的国家。否则他是比高尔察克、邓尼金等人的追随者更好的农民捍卫者。”（列宁） 260

除了通过宣传令人信服的幻想之外，UOC（马列毛）还将集体化主张作为议程上的旗帜。这项任务甚至不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提出的，尽管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通过土地国有化并没有立即使农民生产集体化。列宁这样论述俄国革命中的土地集体化问题：

“至于从大地主那里没收的土地被胜利的无产阶级剥削的方式，在俄国，由于经济落后，主要是把这些土地及其使用权分享给农民；无产阶级国家只有在相对罕见的情况下才拥有权力。维持着所谓的‘苏联农场’。”（列宁）²⁶¹

1905年农民举起的国有化旗帜，并从此为党所采用，还不等于农业集体化，更不等于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所歪曲的农业社会化。列宁将“1905年至1907年间所有农民代表或多或少一致主张的土地国有化”定义为以下形式：因此，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扫除农奴制的更激进的方法是：

“废除土地私有制丝毫不会改变商业和资本主义乡村财产的资产阶级基础。认为土地国有化与社会主义、甚至与平等享有有共同之处，这是极其错误的。一样的。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意味着商品经济的清算。国有化意味着将土地转变为国家财产，这种转变并不影响土地的私人开发。（……）国有化彻底扫除了中世纪的领土财产制度关系，摧毁了所有人造的障碍。土地并使其实际上免费。（……）国有化将加速农奴制政权的消亡，以及在没有任何中世纪垃圾的土地上发展纯粹的资产阶级农场。这是十九世纪末俄罗斯国有化的真正历史意义。”（列宁）²⁶²

国有化并不是拉丁美洲农民的一面旗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口号必须是“土地属于那些在其上生活和工作的工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土地农民革命是确保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最佳途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确保了无产阶级的霸权。：俄罗斯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及其不间断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列宁强调，尽管过度分享土地可能会带来经济上的不便，但执行商定的土地计划的主要方面是确保革命的胜利和巩固新政权的问题：

“但是，夸大（集体化）这一规则或将其转化为标准，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承认被征用者将部分被征用的土地免费交付给小农，并且有时，甚至到邻近地区的中农。首先，对此的通常反对意见是声称大型农业控股在技术上更优越（……）。为了确保这场革命的成功，无产阶级没有权利在生产暂时减少的情况下停下来（……）。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生产

□ 其本身就是目的；但对于工人和被剥削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击败剥削者并确保他们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工作的条件。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和保证自己的胜利。如果不中立中产阶级，就不可能保证无产阶级政权。没有得到相当大一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小农的支持。”（列宁）²⁶³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并不能解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农农问题。因此，这些国家农村社会根本矛盾的半封建制度就是贫苦农民与大地主之间的对立。共产党人制定的土地纲领必须从领导群众斗争的具体经验出发，以捍卫他们的要求，特别是为那些在其上生活和工作的工人提供土地。推进这场斗争必然会导致革命暴力和权力斗争的问题。毕竟，正如贡萨罗主席出色地确立的那样：

“（……）谈论农民问题就是谈论土地问题，谈论土地问题就是谈论军事问题，谈论军事问题就是谈论权力问题，新政权问题。”我们通过无产阶级通过其政党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实现了这一目标。”（贡萨罗主席）²⁶⁴

回避农民争取土地斗争的方向，必然回避军事问题，这是在土地斗争的最初和最基本形式中立即出现的问题。

利润最大化法则与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

在上一节中，我们批评了 UOC（马列毛主义）领导层关于帝国主义的错误政治和社会观念。我们试图证明所谓的“帝国主义的进步趋势扫除了被压迫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论点与“帝国主义的进步趋势”之间的完全对立。国际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列宁主义和毛主义的贡献和发展。毕竟，正如伟大的列宁所说：“帝国主义的**政治特殊性是全面的反应和民族压迫的加剧**”²⁶⁵。

我们看到这种 UOC（马列毛）立场的后果是多么错误，因为它认为帝国主义向被压迫国家的资本输出是扫除封建制度的原因。因此，这些国家的土地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农村的根本社会矛盾不是农民和地主之间，而是农村无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之间。这导致 UOC（马列毛主义）的领导层提倡半无政府主义的土地计划，捍卫说服贫农将其财产和生产集体化的必要性。这个问题是被压迫国家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的基本问题。

在本节中，我们将批评 UOC（马列毛）领导层的这种错误观念的经济基础。我们发动这场斗争的唯一目的并不是要“证明 UOC（马列毛）表述中的严重错误”，而是主要因为这些对于 MCI 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联合组织（马列主义）错误立场的两条路线斗争，主要是为了提高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特殊性的认识，发展国际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期为解决问题提供解决办法。革命进程提出的新问题。世界无产阶级。其中，我们重点讨论诸如理解帝国主义阶段半殖民地国家的地租问题以及当前农民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角色等理论问题。理论问题涉及当前的实际政治军事问题，即共产党人应该如何面对美帝国主义旨在阻碍长期人民战争发展的清空农村的政策。这些问题都存在着紧迫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当前的争论范围，但当前的两条路线斗争要求这些问题得到重视和深入探讨。

1-利润最大化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性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UOC（马列主义）的领导层坚持认为，如前所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除了垄断之外，还“转变为国际化的生产方式”²⁶⁶；帝国主义“将所有国家及其特定的生产方式连接成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²⁶⁷。我们之前证明了这条链是已经进入资本自由竞争阶段，“大工业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立统一的发展阶段。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世界生产方式”²⁶⁸，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现阶段，“帝国主义已经突破国界，在世界舞台上面临**阶级对抗**”²⁶⁹的理解，构成了重大偏差。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正如 UOC（毛主义）所做的那样，理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阶段，成为“**世界上整个无产阶级与世界资产阶级之间的单一矛盾**”²⁷⁰，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听起来像短语“左”但不是它只不过是托洛茨基主义对帝国主义和纯右主义的一种古老的辩护表述。

列宁强调，帝国主义是由于生产集中而造成的：“竞争变成了垄断。这导致了**生产社会化的巨大进步**”，然而，“拨款仍然是私人的”²⁷¹。因此，生产社会化的这种进步并不是随着为先生辩护阿瓦基安通过“**将殖民地纳入新的全球框架，使帝国主义资本能够在国际上扩张和重组，获得更大的利润，并改变被压迫国家的生产关系，使其适应其需求**”²⁷²。毛主席拿共产国际的结论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拥有全部的金融和军事力量，是支持、鼓励、培植和保存封建残余的力量，**

它的整个官僚军国主义上层建筑”²⁷³。说帝国主义是一种“世界生产方式，通过将殖民地纳入新的全球框架来改变生产关系”，或者“扫除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非是对帝国主义的道歉，是对帝国主义的神秘化。所谓的“进步趋势”。

帝国主义的特点之一是，它通过提高民族压迫来推进生产的社会化，而不是通过克服民族压迫、通过保护封建残余来推进生产的社会化，而不是像修正主义阿瓦基亚和修正主义者所捍卫的那样，通过改造或扫除它们来推进生产的社会化。UOC(mlm)的方向。对列宁来说，帝国主义下生产社会化的进步意味着“垄断资本主义加剧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只要指出生命的匮乏和卡特尔的游戏就可以了。这种矛盾的加剧是以全球金融资本的最终胜利为起点的**历史转型时期最强大的推动力**”²⁷⁴。由于帝国主义是全面的反动，这激化矛盾而不是化解矛盾；然而，它允许无产阶级指导解决所有这些矛盾（甚至是那些有待资产阶级革命的矛盾），因此，标志着新时代，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始。

现在让我们看看UOC（毛主义）的领导层如何寻求在经济上证明其帝国主义概念和被压迫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类型的合理性。在他最近对我们党和LCI的批评中，他指出：

“帝国主义使后备军的增长更加剧烈，并且知道如何利用‘低廉的价格和大量可用或空缺的受薪工人’以及被压迫国家其他生产力的相对滞后，低价格，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意味着被压迫国家无产阶级的过度剥削，而相对滞后又通过超额利润的补偿而再生产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本土统治阶级来说。”[UOC（马列毛）]²⁷⁵

他指出，帝国主义利用后备军的增长，对“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进行超额剥削，从而确保帝国主义者“和**本土统治阶级**”获得超额利润。他说半殖民地资产阶级像帝国主义一样赚取超额利润，同样，它指出这些资产阶级获得了与金融资本相同的利润率。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研究中所论证的那样，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超额利润成为金融资本的特殊性。

正如我们将详细看到的那样，作为垄断利润的帝国主义利润必然是排他性的，正因为如此，垄断公司和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使被压迫国家成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相互争夺被压迫国家的战利品，恰恰是为了保证最好的利益。竞争条件，从而能够确保其公司产品的垄断市场，同时确保原材料和能源的来源，此外还对工人进行过度剥削，因为他们强加的拖延条件这些国家及其独立发展提供了障碍。垄断意味着对商品的生产 and 流通某些更有利的条件的排他性。自由竞争与其相反，至少在理论上对应于平等的竞争条件。UOC（马列主义）所使用的这种经济推理已经被老修正主义者阐述过，但在讨论empulhação的作者之前，让我们首先看看它是如何完全反对列宁主义的，从而分析了帝国主义垄断的特殊性，与19世纪英国对制造业的垄断有关：

“在20世纪之初，我们目睹了另一种垄断的形成[相对于19世纪英国的垄断]：首先，**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的垄断联盟**；第二，**少数富裕国家的垄断状况**，其中资本积累达到了巨大的比例。**发达国家产生了巨大的‘资本盈余’**。”（列宁）²⁷⁶

列宁明确指出，巨额资本积累只发生在少数富裕国家，而不是所有国家。因为这个“资本过剩”形成的原因在于正是在被压迫国家被剥夺的垄断条件下。特权垄断者的状况是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经济基础，如上所述，列强之间争夺允许垄断利润的特权。假设一个被压迫国家可以

以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相同的利润率积累资本，就是完全反对列宁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经济基础。列宁这样对待帝国主义之间关于垄断地位的争端：

“任何比‘我们’拥有更多殖民地、资本和军队的国家，都会剥夺‘我们’的某些特权、某些利润或超额利润……。同样，不同资本家之间 超额利润流向那些机器优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因此在国家之间，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也能获得超额利润。”（列宁）²⁷⁷

换句话说，超额利润，即帝国主义者获得的积累率，只能通过剥夺竞争国的某些特权来实现。因此，更不用说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断言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可以像帝国主义一样赚取超额利润，完全是无稽之谈。垄断本质上是排他性的，这是它的特殊性之一。然而，什么生产条件的垄断保证了这些超额利润呢？列宁给了我们这样的答案：

“20 世纪初的帝国主义结束了少数几个国家对世界的瓜分，每个国家目前都在剥削（在获取超额利润的意义上）‘整个世界’的一部分（……）；由于信托、卡特尔、金融资本、债权债务关系，它们各自在世界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他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殖民垄断（……）。”（列宁）²⁷⁸

问题非常明确：少数国家利用世界部分地区获取超额利润；他们赚取这些超额利润正是因为他们 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垄断地位，这要归功于生产性资本高度集中在信托中；他们赚取垄断利润，因为他们是殖民垄断者。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怎么可能达到与金融寡头相同的利润率，甚至成为资本输出国呢？UOC（马列毛主义）领导层的经济表述达到了这一点，表明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正在成为资本的输出资者：‘被压迫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实现了“资本的大量积累”。资本，使其在那里也变得过度”，人们无法“回避其真正的垄断性质及其帝国主义野心”²⁷⁹。

考虑这种可能性就是为帝国主义道歉，就是说“帝国主义一体化”允许所有资产阶级以同样的比例增长。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那样，在处理资本的集中和集中时，即使在自由竞争的阶段，这种和谐的增长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他所论证的那样，最大的资本总是倾向于剥夺最小的资本。因此，资本日益集中在少数资产阶级手中。帝国主义阶段正是资本高度集中的结果。因此，这使得资本较少的资产阶级不可能积累足够的资本，成为资本输出市场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竞争对手。判断各国资产阶级之间自由结社、分享全部社会剩余价值，是自由主义最愚蠢的幻想，也是修正主义散布的最变态的幻想。

在帝国主义阶段，金融资本的超额利润是最大利润，是垄断企业和帝国主义国家所独有的。我们将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财富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关系的经济基础出发，开始研究利润最大化。资本主义利润及其派生——帝国主义利润最大化，属于马克思所分析的分配领域。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些基础，对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利润规律的转变，即平均利润规律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至关重要。利润最大化法则。

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

与 UOC（毛主义）领导层所声称的相反，帝国主义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质的变化。总的来说，生产方式延续了马克思所分析的相同基本特征。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相反，生产领域的质变正是在这个领域开始的，列宁所分析的质变也是在流通领域开始的：

“半个世纪前，当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时，自由竞争对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是‘自然法’。”
[马克思证明]“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分析，**竞争引发了生产的集中**，而这种集中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导致**垄断**……”现在垄断已成事实。”（列宁）²⁸⁰

垄断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垄断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经济特征，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以至于资本主义进程的根本矛盾仍然是社会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社会表现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生产过程本质仍然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强调的：“（...）我首次表明，制造业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形式”²⁸¹。这也就是说，将生产过程、同一工作行为分割成一系列组合的部分行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分工的具体形式。劳动分工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只有在这个历史阶段，它才获得上述特殊性。因此，制造业的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创造”²⁸²。

□ 这种先于机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创造了新的社会生产力：

“联合工作的效果是无法通过单独的工作产生的，只能在较长的时间或很小的范围内产生。**这不是通过合作增加个体生产力，而是创造新的生产力，知道，集体的力量。**”（马克思）²⁸³

生产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划分、生产社会化大幅提高的事实，与帝国主义时代生产领域的质变并不相符。毕竟，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国际分工及其后果在自由竞争阶段就已经发生了，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

“不断地使部分工人变得多余，现代工业在其所在国家刺激和煽动移民到外国并进行殖民化，从而成为向祖国（例如澳大利亚）提供原材料的殖民地，生产羊毛。**一种适合现代工业主要中心的新的国际分工已经形成**，将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而另一部分则以工业生产为主。”（马克思）²⁸⁴

那么，资本的大规模集中给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带来了哪些变化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矛盾发展的分析**。

正如我们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所看到的，正是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书中，它似乎以更加完整和发展的方式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拨款。后来，在《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一书中，恩格斯通过奠定列宁理论的基础来补充这一分析。阐述了他的帝国主义理论。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分析了生产方式对流通方式的反叛如何成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基础，并最终导致托拉斯和垄断的形成：

危机中，社会生产与占有之间的矛盾会猛烈爆发。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暂时瘫痪。流通手段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一切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规律都被颠倒了。经济冲突达到了顶峰：**生产方式反抗交换方式。**”（恩格斯）²⁸⁵

生产方式对流通方式的反叛是社会生产力充分承认其社会而非私人状况的要求：

“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暴露出它自身没有能力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些生产力更加强烈地推动矛盾的解决，使它们从资本的状况中得到救赎，使它们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得到有效的承认。”（恩格斯）²⁸⁶

因此，由于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之间的经济冲突，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

“正是这种生产力（……）对其资本质量的反叛，这种认识其社会特征的日益迫切的需要，迫使资产阶级本身越来越公开地将它们视为社会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在资本主义关系中这是可能的。这两个时期的高工业压力、信贷的过度扩张，以及随着大型资本主义公司的崩溃而导致的裂缝本身，都刺激了我们在不同类别的股份公司中发现的这种大量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形式。”（恩格斯）²⁸⁷

然而，不仅仅是这种形式上的承认，社会生产力的反叛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流通方式内容的变化：

“当你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种形式已经不够了；一个工业部门的大型全国生产商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信托机构，一个旨在监管生产、确定必须生产的总量、划分自己的联盟 他们之间，从而强加一个预先固定的销售价格。在信托中，自由竞争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屈服了 在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有计划、有组织的生产之前。”（恩格斯）²⁸⁸

社会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这些危机反过来又意味着社会生产方式对流通方式、自由竞争方式的反抗。这一矛盾的结果被恩格斯精辟地指出：“自由竞争变成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新生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计划生产面前屈服。社会生产力对占有方式和资本主义流通方式的反抗已经是向另一种政权的过渡，正如列宁所定义的，充分发展了伟大的恩格斯的思想：

“（……）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属性开始成为它的对立面（……）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一过程的根本在于资本主义垄断取代自由竞争……。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属性；垄断与自由竞争是直接对立的，但后者在我们眼中却成了垄断（……）。与此同时，垄断源于自由竞争，而不是自由竞争。它们消灭它，反而存在于它之上、与之并存，从而产生一系列特别尖锐的矛盾、斗争和冲突。垄断是向更高政权的过渡。（……）帝国主义最深层的经济基础是垄断”。（列宁）²⁸⁹

生产领域的生产集中决定了资本主义流通方式的质变。垄断强加于人并占据主导地位，但自由竞争继续存在于垄断的旁边和之下；资本主义进程的阶段发生了变化。正如毛主席所强调的：在一个发展过程或一个阶段，主要是一个，“但到了另一个阶段，角色就颠倒了”²⁹⁰。因此，帝国主义并不是一种新的统治方式。生产，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改变流程；然而，生产领域和流通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即资本主义的更高发展阶段。让我们看看这些变化还决定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哪些变化。为此，我们不妨遵循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流通方式和分配方式之间关系的分析。

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决定社会的分配方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一套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批判理论，涵盖了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所有领域；将生产领域定义为主要领域，从而决定其他领域，最终，作为社会物质基础的这些领域的总体决定其上层建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分析了这些经济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共产主义创始人从未发表过这篇文章。正是在《反杜林论》中，通过对这些经济领域之间关系的分析，将更全面地揭示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分配方式的决定。：

“（……）很明显，**迄今为止的所有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在每种情况下都是**生产和交换关系的产物**，简而言之，其时代的经济关系，因此，每种结构社会的经济结构构成了真正的基础，必须从中解释整个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上层建筑**，以及每个历史时期的宗教、哲学和其他表征的模式。”（恩格斯）²⁹¹

它将社会的经济结构规定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他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研究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和交换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个不同的功能。**生产可以在没有交换的情况下发生，而交换——正是因为它之前只是产品的交换——没有生产就不可能发生**”²⁹²。有力地支持了马克思的公设，展现了辩证关系生产与流通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决定了生产与流通的关系。这体现了他们的相互制约：

“这两种功能（生产和流通）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特定外部效应的影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其**自己的规律**，其特定的规律。然而，另一方面，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制约着另一个人，并且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如此强烈**，以至于可以用横坐标和纵坐标来表征它们。经济曲线。”（恩格斯）²⁹³

最后，恩格斯用特定社会的分配方式建立了生产和流通两者之间的关系，即如何在社会主体的成员之间、在特定社会形态的社会阶级之间分配生产成果、生产成果如何分配。集合中：

“随着一定历史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该社会的历史前提，产品的**分配方式**也同时被确定。”（恩格斯）²⁹⁴

还是：

“（……）在每种情况下，**分配都是特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条件以及该社会的历史前提的必然结果**，并且这种情况发生的方式是，**了解这些[生产条件]和流通**，**我们可以确信地推断出这个社会的普遍分配方式**。”（恩格斯）²⁹⁵

我们前面看到，资本主义分工的具体形式是把同一个生产行为划分到同一个制造单位；这种分工导致了一种新的生产力——集体力量的产生，它与社会生产资料（机器）一起塑造了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特有的流通方式是自由竞争。而社会产品的分配或占有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如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私有制**”。²⁹⁶

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或者说资产阶级分配方式的特征要素，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涉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新价值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分配。第二个涉及资本家在同一生产过程中占有的剩余价值的分配，或者说剩余价值在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其分配形式为商人的利润、利息和地租。

这种分配方式的第一条规律是，工人通常将其劳动力出售给资本家以换取交换价值。当他购买时，他就获得了在整个生产日消耗劳动力使用价值的权利。然而，这种商品（劳动力）的特殊性在于，对其使用价值的消费导致了更多价值的生产。这个新产生的价值工人一天的劳动成果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构成其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价值，第二部分构成剩余价值。必要价值相当于工资，超过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价值。

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第二定律是关于剩余价值的分配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剩余价值在资本家之间根据其资本的大小进行分配，无论这些资本家是否拥有剩余价值。受雇于资本有机构成或多或少的生产部门。因此，资本家并不直接占有他从工人那里榨取的剩余价值。资本的自由流通、资本之间的自由竞争，决定了全部社会剩余价值由资本家按照普遍利润率分享。这是资本家赚取的平均利润与其资本规模的比例。

根据恩格斯、列宁的分析，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生产领域和资本主义流通方式发生了实质性变革。首先，生产高度集中，某些经济部门建立了托拉斯和垄断，这决定了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转变。根据恩格斯的辩证公式，给定一种生产方式和一种流通方式，就可以推导出相应的分配方式。因此，商品的社会生产和自由竞争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分配规律。上述生产领域和资本主义流通方式的变革，又决定了资本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分配方式的变革。这些变化是什么？国际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对这个问题告诉我们什么？

帝国主义分配方式的两个特点：永久的超剥削和利润最大化

列宁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帝国主义阶段分配方式的两个变化。它展示了资本、卡特尔、垄断在生产领域的集中，以及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金融资本的融合，如何使其赚取**超额利润**，即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从而颠覆在自由竞争阶段调节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分配的法律：“**安抚性垄断**”**超额利润**，即高于全世界资本主义**正常、普通利润的超额利润**。”²⁹⁷ 这些利润他后来将垄断者归类为“**金融资本的超额利润**”²⁹⁸。

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普遍现象。每当某个资本家利用比其竞争对手更有利的生产条件时，他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或超额剩余价值。商品价格的决定因素是它的价值，它对应于时间产生它的社会必要工作；每当资本家设法在低于社会必要平均水平的工作时间内生产它时，他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然而，一旦这些生产条件变得普遍，例如新机器或剥削无产阶级的新方法（例如更密集的生产节奏），所有竞争者的生产时间就会趋于平衡，并且这种差异相对被淘汰。直到出现一种获得非凡附加值的新方法为止，该方法已被淘汰。对非凡剩余价值的追求是同一生产部门资本家之间竞争的主要驱动力。

帝国主义时代超利润的特殊性在于，它表现为金融资本的排他性形式，具有排他性的生产条件，只有帝国主义列强的资本即金融资本才能获得。这些生产条件是帝国主义通过向被压迫国家输出资本来实现的，因为在这些条件下，正如列宁所强调的：“资本稀缺，土地价格相对较低，工资较低，原材料匮乏”。

蟑螂》²⁹⁹。换句话说，金融资本只有通过³⁰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对这些生产条件的垄断控制，才能赚取超额利润。

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转变并没有消除资本之间的竞争。相反，它加剧、兴起，将 17、18 世纪民族国家的商业战争转变为 19 世纪之交和 20 世纪之交及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一国的金融资本与另一国的金融资本争夺这些超额利润，争夺实现这种利益的生产条件。这是分割和分享世界的经济基础，是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垄断控制之争，掠夺其自然财富，并有可能永久过度剥削其无产阶级和其他工人。被压迫国家的当地大资产阶级成为与国际金融资本挂钩的大资产阶级，永远是其“底层”和走狗的角色；它不是完整的，它是完全依赖和屈服的，而且它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屈服。

斯大林同志发展列宁主义，得出重要的经济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但是据说，在现代条件下，平均利润足以满足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不是真的。平均利润是盈利能力的最低点，低于这个点，资本主义生产就不可能进行。但如果认为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大亨们通过夺取殖民地、征服人民和发动战争来努力保证平均利润，那就是荒谬的。不，这不是平均利润，**也不是超额利润**——通常来说，超额利润只代表平均利润的轻微增长——而恰恰是**最大利润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引擎。**”（斯大林）³⁰⁰

这是帝国主义阶段分配方式的第一个特殊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垄断资本主义的目标不是平均利润，也不是短暂的超额利润，而是**最大利润**。如果说自由竞争阶段资本的经济规律是逐利的话，那么资本的经济规律就是逐利。**垄断是对最大利润的追求**，除了这种利润之外，别无他法。而且很明显，这种最大利润是被金融资本垄断的，因为只有占领殖民地、征服人民、策划战争才有可能获得它。我们将处理这个既定概念的其他后果 斯大林同志提出的，但首先我们要分析帝国主义阶段分配方式的另一个特殊性：对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永久过度剥削。

如前所述，对劳动力的过度剥削也并非资本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所独有。我们看到这种残酷的剥削形式是如何在英国出现的，

□ 马克思分析认为，这是加速资本主义积累的一种方式。然而，对劳动力的持续过度剥削至少会产生两个经济社会后果。持续向劳动力支付低于其价值的工资必然会导致阶级的消亡、预期寿命的缩短等。只有在人口不断过剩的情况下，资本家才能采取这种形式的剥削，这样，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人口就会取代因持续过度剥削而日渐消瘦的人口。人口是过度开发的决定性经济因素。

另一方面，持续的超级剥削导致工人阶级的社会爆炸，他们宁可战死，也不愿在资本家的鞭笞下饿死。英国是这样，19 世纪随着宪章运动和工会的爆发，欧洲大陆也是这样，主要是从 1848 年开始，还处于自由竞争阶段，英国的垄断状况直到 19 世纪中叶，制成品的生产让他赚取了超额利润，这些利润开始被用来贿赂本国的某一层工人阶级，旨在缓解本国领土上的社会紧张局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一现象描述为“工人贵族”的出现。

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将证明，在帝国主义阶段，金融资本赚取的超额利润使得这种“工人贵族”在少数国家的所有国家中普遍化成为可能，这些国家压迫着世界上剩余的绝大多数民族。这建立了

帝国主义的出现与压迫国家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控制暂时占主导地位之间有直接联系。同时也凸显了这种贿赂行为不可能长期延续到无产阶级这一层。帝国主义是危机的必然趋势，列强之间的世界份额之争和各自国家的垄断公司之间的竞争，这种情况也造成了工人贵族的不稳定。

这样，在新创造的价值的方式上，在资本与劳动力的争论中，自由竞争阶段的法律也发生了变化。虽然在这个阶段，过度剥削是暂时的，但在帝国主义阶段，它也会具体化，并且对于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或多或少是永久性的。因此，帝国主义给半殖民地无产阶级带来的生活条件比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恶劣得多。因此，它的目的是从资本输出中获得超额利润，并在自己的领土上获得“社会和平”。因此，它试图使其国家的部分无产阶级成为对被压迫国家的压迫和民族征服的同谋。

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过度剥削并非受压迫国家所独有。这种情况有两个意义：首先，这个受到超级剥削的无产阶级是剩余价值的来源，主要是为了金融资本的利润，只是在较小程度上为了被压迫国家的大资本的利润；其次，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领土上也受到超级剥削。今天，移民无产阶级的存在对于维持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商业和服务业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墨西哥、哥伦比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无产阶级的存在，就不会有美国经济。没有土耳其和库尔德无产阶级，就没有德国工业；没有印度、孟加拉国、越南、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厄瓜多尔、巴西等国的无产阶级，欧洲就没有贸易和服务业。

这批移民工人是剩余价值的直接来源，并且受到过度剥削，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利用他们不稳定的法律条件对他们强加有辱人格的剥削条件，从他们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比从他们那里榨取的剩余价值高得多。全国无产阶级。但与此同时，这些移民群众对国家无产阶级构成了压力，给工资带来了下行压力，并允许统治阶级煽动各种反动、沙文主义和法西斯意识形态，旨在将失业率上升归咎于这些移民。工资低了..

一方面，利润最大化具体化为金融资本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对无产阶级的过度剥削是半殖民地国家群众的一种永久形式，无论他们生活在原籍国还是在帝国主义领土上工作。

利润最大化是垄断资本的经济规律

最大利润是资本主义超利润的一种特殊形式。可见，在自由竞争阶段的超额利润特征下，具有最佳生产条件的资本家赚取了这种形式的利润。当这些条件不受垄断时，例如蒸汽机中使用的热水的膨胀力，以马克思为例，它们是普遍化的，它们可以被所有竞争的资本家使用；一旦最有利的生产条件消失，超额利润就不复存在。在帝国主义阶段，超额利润具有将其转变为最大利润的特殊特征。这是因为，生产领域的变革决定了资本的巨大集中意味着某些生产部门只能由规模极大的资本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探索。因此，对这些分支的探索就成为了这些极度集中的资本的垄断。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研究中指出，这种现象首先是在重工业中出现的；例如，恩格斯已经在铁路建设中表明了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这种特殊性。

对资本的垄断性剥削扩展到经济的各个部门，决定了流通方式的质变；自由竞争变成了垄断。在同一生产部门的自由竞争的资本家中，超额利润最初是短暂的，但最初却在某些生产部门中结晶，而这些部门只能通过

巨额的集中资本。在这些领域，金融资本的超额利润转化为帝国主义的利润最大化特征。列宁给我们举了两个关于糖和水泥工业生产中垄断的例子：

“（……）糖业卡特尔设定了垄断价格，并获得了如此多的利润，以至于它能够支付股息（……）卡特尔创建时实际投入资本的近 70%！”（列宁）³⁰¹

和：

“（……）如果有可能夺取全部或最重要的原材料来源，**卡特尔的出现和垄断的形成**就特别容易。但这将是一个认为其他生产部门不会出现垄断的想法是错误的，在这些部门中征服原材料来源是不可能的。水泥工业的原材料无处不在。然而，该行业在德国也严重卡特尔化。（…）**垄断价格**：每车 230 到 280 马克，生产成本为 180 马克！”（列宁）³⁰²

糖业卡特尔在卡特尔成立后允许 70% 的利润率；反过来，卡特尔化的水泥行业的**垄断价格**远高于通常的生产成本。这种超额利润的稳定，最初在某些生产部门，不久之后在所有部门，表明它转变为最大利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方式、流通方式与分配方式之间的关系不是被动的，因为一种方式决定另一种方式的发展：“分配不是简单的生产和交换的被动结果；而是一种生产方式、流通方式和分配方式之间的关系。”以相同的强度，它对两者都有反应”³⁰³，因此，有必要详细了解其含义 帝国主义阶段整个经济基础的这种变化。

水泥卡特尔垄断定价的结果是什么？糖业集团从哪里榨取如此超额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详细论证了利润不能从流通领域来解释。也就是说，生产者以高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其商品的事实不能从社会角度解释利润。正如他所论证的，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利润的唯一来源是剩余价值，它是通过工资生产关系从工人身上榨取的无偿劳动。这一点在帝国主义阶段也不会改变。然而，问题在于，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并不是他剥削的工人立即生产的剩余价值。如上所述，资本家的利润是通过所产生的整个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来调节的。这种剩余价值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不同形式的资本（工业、银行和商业），不同形式的利润（商人的利润，利息和地租）之间，根据给定社会的一般利润率。

价值与价格关系的角度来看，自由竞争阶段剩余价值的分配按照马克思的表述是这样的。不同的资本家，生产相同商品的企业，即直接竞争对手，在不同的生产条件下进行制造。生产商品所需的工作时间各不相同，因此，根据这些条件，条件最好的资本家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生产，而条件最差的资本家则消耗较长的时间。然而，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单一的生产条件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工业商品的社会价值是由竞争资本家的**平均生产条件决定的**。在下一个主题中，我们将看到决定农业和采掘品社会价值的规律与工业商品不同，在农业中，决定社会价值的不是平均条件，而是最恶劣的地形条件，但这一点需要单独分析。我们继续分析工业品生产价格。

社会价值是决定产品市场价格的生产基础。在社会价值下，适用社会剩余价值分配规律，在自由竞争阶段，适用平均利润规律。因此，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社会价值或生产成本加上平均利润。正如已经指出的，生产成本较低的生产者将获得超额利润，这并不构成资本垄断阶段帝国主义的特殊形式的利润。

正如列宁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帝国主义中发生的情况是，最初，在某些生产部门，金融资本强加**垄断价格**，即高于生产价格的价格。

从而确保您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这种剩余利润不能简单地产生于交换；因此它意味着剩余价值分配的变化。换句话说，那些能够对社会施加垄断价格的生产部门比其他部门的资本家占有更多的社会剩余价值。因此，一个分支机构的垄断利润意味着 利润低于其他分支机构的平均利润。列宁强调了帝国主义阶段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的这种变化，他说：

“（……）‘重工业’受到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的赞扬”。（列宁）³⁰⁴

在分析确保垄断部门缴纳这种税收的来源之前，有必要强调的是，由于金融资本在生产中的垄断，存在着一种超额利润，具体表现为最大利润，这一条件决定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利润率**。不可能所有人都获得最大利润 因为生产部门的垄断利润总是以非垄断部门利润率的下降为代价。然而，随着金融资本对生产部门的逐步接管，它们就落入其控制之下，成为垄断部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或最大利润就不复存在了吗？不，“利润最大化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引擎”，这就是为什么在帝国主义中，竞争远没有消失，而是转变为帝国主义列强和各自国家的公司之间为寻求这种垄断利润而进行的疯狂竞争。由于其垄断性质，最大利润是排他性的，只能通过暴力击败竞争对手、“使用炸药”³⁰⁵以及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领地的日益征服来实现。正如伟大的列宁所强调的：

“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每个卡特尔、每个信托、每个财团、每个大银行都是垄断者。**超额利润并没有消失，而是还在继续**。一个享有特权、经济富裕的国家**对所有其他国家的剥削仍在继续，而且更加严重**。少数富裕国家——如果算上财富的话，一共有四个 独立的、真正巨大的“现代”财富：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将垄断扩大到深不可测的程度，获得了数百甚至数十亿的**超额利润**，“剥削”了数亿人的生活。其他国家之间为了分享战利品而自相残杀，最奢华、最丰富、最容易。这正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本质**，考茨基隐藏而不是揭露帝国主义的深刻矛盾。”（列宁）³⁰⁶

，只有少数靠剥削其他国家数十亿男女为生的国家才有可能获得最大利润。这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动力，因为利润最大化作为剩余价值规律发展的结果，成为帝国主义阶段调节分配的规律。正如斯大林所说：

“**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吗？不**。价值规律首先是商品生产的规律。（……）价值规律当然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不仅没有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利润的原则，而且还没有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利润的原则。它甚至不存在这些问题。因此，它不可能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斯大林）³⁰⁷

和：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最恰当的概念是**剩余价值规律**，即资本主义利润的起源和增长规律。它确实决定了特性 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要素。但剩余价值法则是一条非常普遍的法则。**没有涵盖最高利润率的问题**（……）剩余价值法则**必须具体化并进一步发展以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斯大林）³⁰⁸

最大利润是帝国主义决定垄断价格和剩余价值分配的规律。
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帝国主义利润的一些来源。

作为支付给金融资本的社会税的最大利润

垄断扩大到世界经济的所有生产部门并不会使超额利润消失。虽然卡特尔和托拉斯是重工业部门所独有的，但它却得到了其他生产部门的认可。当垄断变得普遍时，这种税就开始由整个社会缴纳：

“**金融资本**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享有有效的垄断地位，**获得巨额利润**，并随着公司的成立、证券的发行、国家贷款等，巩固金融寡头的统治，并**为了垄断者的利益而向整个社会征税。**”
(列宁) 309

金融资本的超额利润相对于自由竞争阶段的平均利润

□ 由金融寡头集团为了自身利益向整个社会征收的税收组成。这种贡品的主要来源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斗争的经济基础之一。每个人都希望为自己确保获得最大利润的最佳条件。为此，列宁强调：

“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从殖民** 世界正变得更加尖锐。它增加了对特别有利可图的金融和海外**公司那里得到** **本的税收。**” (列宁) 310

帝国主义的一切军事化，一切暴力倾向，都是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目的的无节制竞赛为基础和合理性的。因此，UOC（马列主义）领导层关于半殖民地资产阶级将获得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相同的利润率的结论完全是无稽之谈。毕竟，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解释的：

“正是为了**确保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导致垄断资本主义走向了诸如奴隶制和对殖民地和其他落后国家的系统性掠夺、将**一些独立国家转变为附属国家**、组织新的战争等危险的事业。现代资本主义的大亨们最适合攫取最大利润——并最终试图实现世界经济霸权。” (斯大林) 311

□ 最大利润的追求解释了帝国主义阶段民族压迫的恶化，独立国家转变为附属国家。而我们在列宁的解释中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国家输出的资本能够在半殖民地国家赚取超额利润的经济原因是什么，毕竟在这些：“资本稀缺，土地价格相对较低，工资较低”。低和材料是便宜的表兄弟³¹²。了解低地价与低地价之间的关系 廉价的原材料，我们首先需要处理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所以我们将将在下一节中分析这方面。我们将在这里讨论另外两个因素：稀缺资本和低工资。

在讨论帝国主义阶段破坏方式的转变时，我们已经谈到了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受到过度剥削的问题，无论他们是在自己的民族中工作，还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作为移民。只需要强调的是，对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永久超剥削是金融资本最大利润的主要来源。换句话说，全社会向金融寡头致敬的大部分都流向了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正如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贵族现象时所强调的那样：

“在经济方面，不同之处在于，压迫国家的一部分工人阶级获得了**压迫国家资产阶级通过对被压迫国家工人的永久加倍剥削而获得的超额利润的残渣**。经济数据 此外，证明在压迫国家中成为“监督者”的工人比例

□ 高于被压迫民族，即加入工人贵族的比例更高。这是事实。压迫民族的工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帮凶，他们掠夺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 (列宁) 313

被压迫民族工人永久加倍剥削的本质。因为它强调了这种过度开发是 超额利润，他与工人贵族分享其中的残渣；因为它不仅强调探索

是工人的利益，也是被压迫民族的广大人民的利益；因为它将无产阶级的过度剥削和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与金融资本的同谋机会主义联系起来。

列宁强调的在被压迫国家获得超额利润的另一个因素是资本的稀缺。换句话说，当金融资本输出时，它发现自己流向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资本规模小，处于最初的积累过程中。地方资本的有限积累使得与金融资本的竞争变得不可能，毕竟先进国家资本空前集中所带来的生产条件成为金融资本的独家垄断。金融资本把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积累的巨额资本置于两种境地：要么在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不平等竞争中走国家发展道路，并承担对抗的一切后果；要么作为走狗，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条件下继续积累。是对其新生无产阶级进行民族征服和超级剥削的同谋。20世纪，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结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入了，被压迫国家的大资产阶级通常被迫走第二条路，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它选择了第一个，他总是面临帝国主义的军事报复。

这种以大资产阶级的积累资本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地产来征服金融资本的社会，是帝国主义阶段被压迫国家经济社会形态中渗透的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之一。这种情况被毛主席称为官僚资本主义，即不走革命民主发展道路，而是与金融资本联系在一起、与帝国主义和地方大庄园结盟的资本主义。这个大资产阶级，官僚主义和比较，是金融资本的从属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实行过度剥削是他们的直接责任。在这些被压迫国家中，确保这种剥削所必需的政治条件一般来说几乎总是法西斯主义。这些是国家权力绝对集中于行政机关的政治体制，在革命局势升级时，反动武装部队对文职政府实行永久监护或通过军事政权进行直接控制。

这些都是世界各地半殖民地国家或多或少常见的特征。从这个官僚资产阶级和购买资产阶级所赚取的利润来看，它显然不能与金融资本相提并论；但也不能太低，毕竟半殖民地大资产阶级履行了帝国主义的基本职能，并因此得到了回报。因此，它是一个大垄断资产阶级，不是世界市场的垄断者，而是国内市场的垄断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区域市场的垄断者。它通过旧的国家机器控制所有的对外贸易，与金融资本联合垄断货物的进出口。它通过国家或非国家资本控制国家的工业，其基础是维持大地产和财产垄断关系、土地垄断和集中，所有这些都与国际金融资本挂钩。尽管如此，他们获得的分数远低于金融寡头的帝国主义利润，这些利润使他们能够作为垄断、官僚和购买资产阶级再生产自己，并在国家机器的控制中占主导地位。

因此，这个被压迫国家的大官僚和购买资产阶级并没有获得最大的利润，而是与金融资本一起限制了民族资产阶级（中间资产阶级）的利润。通过这样做，它相对于非垄断的普通资产阶级赚取了垄断利润。这个中等资产阶级的生产总是规模缩小，无法与本地和外国垄断企业竞争，一般来说，它充当大资产阶级企业的辅助者，为大资产阶级提供次级产品和服务。国家。它的利润率远远低于金融资本，也远远低于大官僚、比较资产阶级。从政治角度来看，它缺乏官僚资产阶级和购买资产阶级所获得的特权，无论是在免税、获得国家信贷、进口配额还是促进出口的政策方面。它是一个资产阶级，也过度剥削本国的无产阶级，但除了在完全垄断的全国市场上竞争之外，他们没有经济实力赚取平均利润。

剩余价值的一个重要部分被官僚资产阶级和比较资产阶级以及金融资本耗尽了。是受金融资本和资本主义制约的资产阶级

官僚主义，连平均利润都达不到；根据自由竞争法则分配给它的剩余价值部分被垄断耗尽，以弥补帝国主义利润的最大化。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赚取最低限度的利润，因此与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存在矛盾。然而，因为它的利润来自于它所担心的对无产阶级的过度剥削。它在经济上依赖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大庄园，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个经济上弱势、政治上摇摆不定的阶级；但是，由于它与帝国主义、地方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矛盾，它倾向于支持民族民主斗争，民族民主斗争的革命统一战线纲领必须保证其利益，因此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被压制和压制。在一定时间内积极分割其部分，特别是当革命战争迫使帝国主义入侵国家领土时。

对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超额剥削和对民族资产阶级利润的限制是金融资本利润最大化的两个来源。第一是主要来源；第二个最重要的，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是由列宁对低土地价格和廉价原材料的评估构成的。我们看到，生产领域和流通方式的变化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转变，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分配方式的变化。生产行为中创造的新价值的分配从根本来说有两种不同的剩余价值率：被压迫国家的工人的剩余价值率和压迫国家的劳动贵族的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的分配又以不同的利润率进行：金融资本即帝国主义的最大利润、被压迫国家的大官僚和购买资产阶级的垄断利润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小利润。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中产阶级）。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根据资本规模而存在不同的利润率，这已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映，甚至出现在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研究中。我们可以从恩格斯的以下注释中看到这一点：

“在马克思个人使用的副本中，我们在页边空白处发现了以下注释：‘为了发展后来：如果扩张纯粹是数量上的，那么同一行业的利润，无论大小资本，都取决于预付资本的大小。如果量的增加导致质的变化，那么对于较大的资本来说，利润率也会同时增加。’（恩格斯）³¹⁴

利润最大化条件的研究已经是政治经济学的古老的研究对象。例如，在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引用了亚当·斯密的以下段落：

“在大多数商品中，习惯收入可以提高的**最高比率是提取全部土地租金并降低以最低价格生产的商品的工资，使劳动者**在生产时仅能维持生计。工作。该工人有 每当他在从事日常工作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食时；**地租可能会被完全抑制**。例子：在孟加拉，印度贸易公司的人...”（亚当·斯密与马克思）³¹⁵

换句话说，按照斯密的说法，当工资降到最低，并且土地租金完全受到抑制时，可以获得最大的利润率。他向我们展示了孟加拉的这些情况，当时它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在本专题中，我们研究帝国主义利润最大化与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过度剥削之间的关系。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研究抑制半殖民地地租的机制，作为实现金融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基本组成部分。

2、帝国主义时期半殖民地国家的土地收入

分析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国家地租的演变过程，必须吸收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地租理论。如果不很好地掌握这个理论，就不可能理解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现象，以及这个过程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他的资本主义地租理论的提出是从英国的具体情况出发的。

所有制的条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³¹⁶。随着资产阶级土地所有权的经典形式在英国的发展，马克思得以就这一复杂而关键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提出最普遍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从斯密和李嘉图的表述出发，尤其是从这一表述出发，构思了他的资本主义地租理论。

掌握这一理论是将其正确应用于英国以外的特定条件的关键。时间（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和地点的特殊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是拉丁美洲，其经济社会形态的起源与英国截然不同。在这些特殊性中，以下几点最为突出：较新的殖民化、领土广阔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很少。马克思本人在他的阐述中，为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提供了对美国农产品出口大庄园的土地收入的生发分析，以及与资本主义市场联系起来的农民土地收入的特殊性。

这些是理解当前现象非常重要的起点；然而，它们要求国际无产阶级进行理论发展。毕竟，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是在资本主义进程的阶段提出的，在这个阶段，生产上的大垄断，自由竞争支配着资本的流通，平均利润是剩余价值的分配规律。这些由列宁和斯大林确立的条件从 20 世纪以来发生了变化，它们对帝国主义阶段土地收入的运作有何影响？这是 MCI 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回答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理解帝国主义阶段的特殊剥削关系，以及民族压迫和对无产阶级过度剥削的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以及当今被压迫国家的农民。我们党在 MCI 目前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希望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贡献。

UOC（马列毛）在其批评 LCI，特别是我们党的杂志中，通过贬低地将我们描述为“**半封建理论的支持者**”来解决这个问题³¹⁷。附言常常使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变得有毒，但我们愿意接受这种定性，当然还要加上引号，因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定性和 UOC（毛主义）的定性只能是对立的，即使我们不这样做对我们 UOC（马列毛）批评者所理解的“半封建论”有丝毫了解。作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我们是封建主义理论的支持者，半封建制度，国际无产阶级领袖：毛主席、贡萨罗主席、易卜拉欣·凯帕克卡亚、查鲁·马祖达尔和何塞·玛丽亚·西松也是如此。我们捍卫这个观念，因为它是科学的、真实的，并且对于推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向我们扔出这个“后遗症”后，UOC（毛主义）的领导层辩称，“**半封建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关于资本主义土地租金的观点是一致的**”³¹⁸。将毛主席的半封建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立场相比较，至少可以说是无稽之谈，没有很好地理解什么是一回事，又是另一回事。例如，他们指出：

“半封建论支持者的一个主要错误是由于对**绝对地租概念的混淆**。当然，这一事实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家的论点不谋而合。在这种理论中，**佃农与受薪工人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前者的工资不是现金而是实物。这些先生们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佃户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投资资本、**控制工作流程**并做出生产决策。” [UOC（马列毛）]³¹⁹

他们声称，像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一样，我们不理解绝对收入的概念；对我们来说，农民佃农将被无差别地视为受薪工人；我们会忽略农民控制工作过程的事实。UOC（马列毛）的理论是完全混乱的，因为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并不认为农民佃农是工资收入者，而是大地主的“合伙人”，他们从利润中分享。这是

□ 前面分析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伙伴关系概念。对于另外两点，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地租理论中说得非常清楚：农民没有绝对的收入，即使拥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更不用说做佃农了；而且，他并不控制工作过程，而是被工作过程所控制和压迫。

事实上，UOC（马列毛主义）的领导层将农民视为典型的**资本主义佃农**，从而采取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立场**：

“对他们（半封建理论家）来说，这个佃农是不自由和贫困的工人，而不是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佃农**。资本必须由土地所有者贡献，合伙人仅贡献劳动力。这个**贫穷的合伙人**只得到丰厚的工资，而土地所有者则获得收入（正如里卡多所说！）。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理论家所谓的“工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佃农的利润**”。[UOC（马列毛）] 320

在这种批评中，他们只暴露了自己理论上的贫乏，因为他们不了解半封建制的提法，也不了解“新自由主义”，更不了解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毕竟，对于里卡多来说，租户绝不会收到相反，“赠薪”总是获得平均利润。马克思揭示的李嘉图地租理论的错误在于，他无法解释最差土地的地租，即绝对地租，这个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解决的关键理论问题。此外，在2023年1月的这种奇怪立场中，UOC（马列毛）与其在2015年发布的纲领中提出的表述相矛盾。正如我们在对半殖民地国家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中看到的那样，UOC（马列毛），几年前，我认为合伙关系是一种隐性的受薪关系，表面上是封建的，但实际上是受薪的。让我们提醒UOC（马列毛）管理层注意其旧的表述：

“**合伙（……）成为资本主义土地剥削的一种形式。这种带薪生产关系仍然披着合作伙伴的旧外衣**”。[UOC（马列毛）] 321

今天，他在批评我们党时，又重新阐述自己的立场，说半殖民地国家的农业合伙关系是资本主义佃农和地主的关系。上面我们论证了合伙关系并不像UOC（马列毛）领导层先前所辩解的那样纯粹的工资雇佣关系，但它更不能被视为农民佃农的资本主义利润关系。把隐藏在合伙企业中的剥削关系当作资本主义利润，这是最可耻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它试图把所有被资本剥削的人变成企业家、小企业主等。这就是将农民视为资本主义佃农时所辩护的：

“**农民佃农与家人和雇佣劳动力一起在租赁的农场上生产盈余**。该盈余的一部分以收入的形式转移给所有者，另一部分以利息的形式转移给高利贷者/债权人，**其余的则作为利润收入囊中**”。[UOC（马列毛）] 322

对于UOC（马列毛）来说，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关系。因此，这个资本主义农民雇用劳动力，向大庄园缴纳地租，并将所获得的利润装进自己的口袋。因此，农民向地主支付的地租是资本主义的地租，农民出售自己的产品所获得的收入是资本主义的利润，支付给雇佣劳动力的金额是资本主义的工资。这些结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完全相反。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批评之一是，他像一般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一样，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一直存在并将永远存在的“自然”关系。因此，对于李嘉图来说，每一份土地租赁都构成了资本主义土地租金。因此，UOC（马列毛）重复了李嘉图的错误。马克思指出：

“李嘉图在假设资产阶级生产是决定收入的必要条件之后，**却将其应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是所有人的错误 经济学家，他们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视为永恒的范畴。”（马克思） 323

马克思论证了把农民当作资本主义佃农是一个巨大的理论错误；如果说这在自由竞争阶段已经是错误的话，那么在垄断资本阶段那就完全不现实了。UOC（马列毛）在这里争论的是，农民佃农在销售他的商品后获得了资本主义利润。他利用家庭劳动（没有工资）进行生产，这对他来说并不荒谬或奇怪。这一切都是由UOC(mlm)呈现的，纯粹且

简单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在分析爱尔兰农民支付的租金时已经明确地阐明了这个问题：

“例如，这就是爱尔兰所发生的情况。那里的佃户通常是小农。他以地租的形式支付给地主的东 西，往往不仅吸收了部分利润，即他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有权获得的剩余劳动，而且还吸收了他本来可以得到的正常工资的一部分。相同的工作量。”（马克思）³²⁴

换句话说，当佃农是农民时，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租金不仅吸收了利润，还吸收了部分工资，也就是说，如果农民从事同样的工作，他所获得的收入将少于他所获得的收入。是一名受薪工人。正是在这个生活条件比农业工人还差的破败农民身上，UOC（马列毛）希望看到一个“资本主义佃农”。相反，马克思表明，农民租赁中不存在资本主义地租，它只是形式上存在的：

“土地所有者还可以将土地出租给工人，工人同意以租金的形式向他支付租金中高于工资的全部或大部分收入。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尽管支付了租金，但并未支付租金。但是，只要存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条件，租金和应付租金就必须一致。”（马克思）³²⁵

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资本主义地租仅以高于经济体平均利润的盈余形式存在。对于马克思来说，如果佃农没有赚取这个平均利润，并且由于地租减去了他的工资的一部分，或者他的利润的一部分，那么这种租赁并不构成资本主义土地租金。UOC（马列毛）完全忽视了这个问题，甚至总结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范畴（非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农民地主”：

资本主义农民土地所有者（CFLL）主导，这取决于生产条件。”[UOC(mlm)]³²⁶

已经走了多远了！资本主义农业怎么能被“资本主义小农地主”阶级所统治呢？根据条件，地主可以同时成为资本家；这是 在更具体的条件下，农民也可以成为资本家。但大主人怎么可能同时又是小主人呢？上面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评，因为他综合了两个武断的概念来构建“新的”经济范畴；UOC（马列主义）沿着蒲鲁东和普拉昌达的“辩证法”步骤，实现了三者合一的壮举，综合了“资本主义农民地主”的概念，并仍然为我们提供了 及其“英文缩写”。

即使在进行了这种“辩证”的把戏之后，UOC（马列毛）的领导层仍然坚持认为我们这些“半封建理论家”不理解“绝对收入的概念”³²⁷。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地租理论的一些关键概念。对于 UOC（马列毛），资本主义差别收入可以定义如下：

“差异性收入要么源于土地的自然肥力及其有利位置（差异性收入一），要么源于资本对同一块土地的连续投资（差异性收入二）。”[UOC（马列毛）]³²⁸

对于绝对收入，其定义如下：

“绝对地租产生于领土财产的垄断——它是社会对土地私有财产的垄断所缴纳的贡品”。
[UOC（马列毛）]³²⁹

UOC（马列毛）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假设，即资本主义的差别收入是由于生育率的差异或同一土地上的工作积累而“诞生”的；同样，它定义绝对收入“源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因此，它混淆了土地收入因素与其起源。资本主义地租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于制造业，

后来，它又进入了外地。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指出生育率和地点因素“**独立于资本**”³³⁰。

土壤经济肥力的差异及其局限性是资本主义土地收入客观基础的一部分，但并不与其特殊性相对应，因为这些因素在其他生产方式中也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自人类最早时代以来，最肥沃和位置最好的土地（例如靠近河流）就构成了决定生产的经济因素。为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些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下如何发挥作用。换句话说，什么构成了资本主义地租的特殊性。

UOC(MLM) 在进一步解释时指出：

“（……）差别收入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利润，它不是由于土地本身的质量而产生的，而是来自资本对土地的使用；**这是来自农业雇佣劳动的剥削的收入。**” [UOC（马列毛）]³³¹

在上面的引文中，他纠正了之前关于收入“诞生”的说法，但现在，他错误地认为收入来自对农业雇佣劳动的剥削。农业中的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之一，它解释了农村剩余价值的榨取，但绝不能解释资本主义地租。因为这并不包括一般的剩余价值，而是使土地所有者受益的剩余价值的衍生物；是土地所有者从资本家那里榨取的，而不是直接从农业工人那里榨取的，也就是说，农业资本家用资产阶级从城乡工人那里榨取的（社会）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来支付收入。土地所有者，这是需要解释的特殊性。对于马克思来说，对资本主义收入的解释不能与一般剩余价值的解释相混淆：

“因此，在收入分析中，**整个困难在于解释农业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部分**，而不是剩余价值，而是**该生产部门特有的额外剩余价值**”。（马克思）³³²

UOC（毛主义）的领导层并非不知道资本主义地租是由农业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盈余构成的，它甚至指出：

“哥伦比亚农业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超过平均利润的农业利润**。这个盈余就是地租。从外观上看 收入来自土地本身，就好像它是由于土地的固有质量一样。” [UOC（马列毛）]³³³

没错，资本主义地租是农业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部分，这是马克思所说的。但 UOC(MLM)指出，在哥伦比亚农业中，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了这种盈余；以结论中应证明的内容作为前提。他们需要回答以下经济问题：哥伦比亚农民的生产是否赚取了资本主义的平均利润？哥伦比亚农民向土地所有者支付的租金是否构成超过这一平均利润的价值？然而，要回答这些具体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解释一下，农业生产中这种高于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产生的机制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种超额利润是由土地所有者占有的，而不是由剥削农业的资本家占有的。土地。然而，UOC（马列毛组织）却不能这样做，因为它基于两个重要错误：首先，它认为收入是由肥力和土壤限制的差异“诞生”的，如上所述；其次，它认为收入直接且完全来自农业工人的工资。

资本主义地租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流通方式和分配方式影响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只能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在那里研究了资本的两个方面：生产和流通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的生产和流通之间的关系。这种矛盾所导致的剩余价值的分配。因此，肥力差异和土壤限制构成了农业生产的特殊因素，但它们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收入。这也是由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剩余价值的分配）形成的；农产品资本主义流通有一个特殊的规律：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最差土地的生产价格来调节的。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

资本主义需要理解政治经济学的三个领域：生产、流通和分配。在生产、剥削关系、肥力差异和土壤限制方面；在流通中，最恶劣的地形决定了市场价格；在分配中，农业平均利润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

2.1-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地租理论

马克思强调，所有的地租，即所有使用土地的费用或仅因拥有地球的一部分而获得的所有价值，所有这些收入都构成了社会生产的剩余工作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租在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都构成了剩余劳动力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地租的特点是，它构成了高于资产阶级平均利润的剩余劳动力的一部分。因此，马克思指出：“一切地租都是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产物。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地租总是高于利润的盈余**³³⁴。在资本主义中，剩余劳动就是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占有的社会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部门。并且土地所有者适当这部分剩余价值，完全是因为他们拥有继承、征服或购买的部分土地，但这些土地不像其他生产资料（工具、机器等）那样是人类劳动的结果。因此，马克思强调了土地所有者占有部分社会剩余价值的权力：

“其独特之处在于，随着农产品作为价值（商品）发展的条件以及这些价值得以实现的条件，**土地所有者占有这些价值的比例越来越大的权力发展。在没有他干预的情况下创造价值，并且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转化为收入土地。**”（马克思）³³⁵

马克思进一步强调：

“收入代表了价值的一部分，更具体地说是商品的剩余价值，它不属于从工人那里夺取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从资本家那里榨取剩余价值的所有者。”（马克思）³³⁶

简而言之，马克思证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有社会剩余价值都是由资本家（农业和工业）通过剥削城市和农村的工人来榨取的；资本主义地租是土地所有者**从资本家那里榨取的社会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因此，在资本主义中，土地所有权有权占有**在不受土地所有者干预的情况下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这个过程提取了部分 马克思在其伟大的理论中揭示了地主给资本家的剩余价值 土地收入。

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的理论挑战之一是与科学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价值规律保持一致。该法则最初由古典政治经济学制定，主要由斯密和李嘉图提出，认为只有人类的劳动才能创造新的价值。然而，基于这一假设，如何解释农业生产的市场价值除了保证佃农资本家的利润和农业工人的工资之外，还可以为农民提供收入的经验现象？土地所有者？如果根据价值规律和自由竞争规律，资本家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趋于趋于同一平均水平，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解释地球商品的这种超额价值而不破坏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呢？政治经济？因此，资产阶级经典正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有必要解释土地所有者所产生的地租，而不是使用理论诡计，即农产品将以高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的错误解释。尽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正确地阐述了问题的条件，但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剩余价值问题；因此，只有完全由无产阶级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才能成为现实。用符合价值规律的方式解释资本主义地租。众所周知，这项伟大的任务落到了思想和行动的巨人、共产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的肩上。

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李嘉图是解决这一理论问题进展最大的人。在他的价值理论的阐述中，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所有附加价值仅来自两个因素：资本和劳动力。然而，这个新创造的价值分为：利润、工资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在李嘉图的理论中，地租已经正确地表现为仅在分配领域中分配的价值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对他来说，土地所有者在生产附加价值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作用，尽管他在分配所产生的新财富中参与了一部分。那么，李嘉图如何解释这种地租的存在，始终维持农业商品的基础，即使以等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也能为土地所有者提供额外的收入？

对于李嘉图来说，商品的社会价值，无论是工业品还是农业品，总是由最恶劣的生产条件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通过竞争，制造商 A、B、C、D 有必要进行生产来满足消费市场的需要，那么这种商品的价值永远是在最坏的生产条件下所消耗的**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说，最长的时间。根据这个假设，李嘉图假设个人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生产者将获得额外的利润。在工业中，资本之间的竞争往往会抑制这种额外的利润；在农业中，也存在这种优化生产的过程，但由于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壤之间的肥力差异始终是生产条件与最肥沃土地相等的限制。也就是说，肥力较低的土地总是需要更多的资本或更多的工作才能达到与肥力较高的土地相同的生产力。

然而，对于李嘉图来说，决定商品社会价值的始终是最恶劣的生产条件，就农业而言，最恶劣的地形、资本主义地租可以通过土壤肥力的相对差异来解释。因此，在他的收入理论中，农产品的社会价值由在最恶劣地形中消耗的工作时间定义。在这种最恶劣的环境下生产的资本家，和其他人一样，获得的利润率与他的竞争对手相同。然而，当他们的竞争对手开发更肥沃的土地时，即使使用相同数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他们也将获得更多的商品生产，例如，与资本家在最差的土地上获得的小麦相比，他们获得的小麦数量是两倍。所有小麦，无论来自最差的还是最好的土地，都以相同的市场价格出售，对里卡多来说，这始终是最差生产条件下的价格。因此，拥有最好土地的资本家赚取的价值是拥有最差土地的竞争对手的两倍，因为他出售的小麦是其两倍。然而，他并没有把这个剩余价值装进自己的口袋，因为更好的生产条件所带来的剩余利润是土地所有者从他身上榨取的，而土地所有者将这个价值作为地租装进了口袋，并将这块土地割让给资本主义佃农。因此，李嘉图设法解释了土地所有者收入的存在，而不与价值规律的基础相矛盾，因为即使商品以等于其社会价值的价格出售，这种情况也会出现。

李嘉图理论最明显的逻辑问题是，它假设最差土地的所有者不会因使用其土地而收取租金。因为，如果业主以最差的土地费收取租金，他的理论就会被推翻。毕竟，由于最差土地上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决定了市场价格，如果这片土地的所有者收取租金，那么市场价格将是：最差土地的价值+租金，从而价格会高于该值。如果最差的土地上有地租，资本主义的地租就无法用价值规律来解释。实际问题是，最差土地的所有者收取租金以在其财产上进行生产，毕竟，正如马克思所说：“事实上，如果佃户不支付租金，他可以利用当前利润增加其资本的价值，**绝对不诱使土地所有者将其无偿出租给佃户**”³³⁷。虽然，理查德·在解释中，他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回避、抽象出最差土地的收入情况，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难以解决。

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地租理论的优点在于它为差别收入奠定了基础，但其主要局限性之一在于它否定了绝对收入的可能性，即通过最恶劣的地形赚取的收入。李嘉图由于其价值论的局限性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当马克思解决了这些限制时，最恶劣地区的收入问题就变得很容易解决。马克思在 1862 年给恩格斯的信中评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解决这个问题的结果：

“我唯一需要从理论上证明的是在不违反价值规律的情况下获得绝对收入的可能性。这是自重农主义者以来理论斗争的中心点。里卡多否认这种可能性；我肯定这一点。同时，我申明，它的否认是基于一个理论上错误的教条，取自 A. 史密斯——它是**成本价格与商品价值之间假定的同一性**。（马克思）³³⁸

用剩余价值理论成功地解决了斯密和李嘉图价值规律表述中所包含的理论上的错误教条。毕竟，马克思通过基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的剩余价值分配的表述，展示了一般情况下商品是如何以不同于其内在价值的市场价格出售的。也就是说，与斯密和李嘉图的假设相反，来自同一生产部门的商品并不总是以其价值相等的价格出售。马克思证明，只有当考虑到社会的所有生产部门时，价值和价格才能被确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的价格才与总价值完全一致。然而，在每个生产部门中，单独来看，价格和价值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同时性。

价值规律的发展解决了斯密和李嘉图追随者的一系列矛盾，其中包括最恶劣地区的地租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前三本书中从理论上概括了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并转化为市场价格的历史过程。它展示了不变资本的价值如何在商品价值中再生产；以及所产生的新价值（人类活劳动的产品）如何仅分解为工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反过来，它显示了这种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利润，正如在资本家看来，利润是超过成本价格的价值。因此，它详细说明了商品的成本价

□ 等于实际生产上花费的不变资本（原材料+机器磨损）+可变资本（工资）。而那个利润就是超过这个成本价的一切。这样，资本家甚至可以以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来赚取利润，从而只能实现其中的一部分内在剩余价值，另一部分则与其他生产部门的资本家分享。

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是理解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地租理论的前提。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抽象循环的影响；这样，它认为商品的利润=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这一论证对于揭示所有资本为何都是无偿劳动的产物至关重要。然而，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过程时，即考虑生产与流通之间的关系时，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利润与剩余价值之间的这种同时性并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它继续存在，利润总额 = 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额，然而，这种恒等式是由一般利润率调节的，一般利润率原则上根据以下原则在资本家之间分配社会剩余价值总额：每个人的资本规模。

马克思认为，如果情况并非如此，经济理论与现实之间就会出现另一种不相容的情况。毕竟，如果生产的剩余价值与所分配的剩余价值（利润）相同，我们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生产部门中，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的数量较多，利润会更低。毕竟，在一个生产部门，其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为 $90c + 10v$ ，在剩余价值率为 100% 时，商品的价值将为 110。如果该商品以 110 的价格出售，则也就是说，在价格和价值立即重合的情况下，该部门资本家的利润将为 10%。反过来，一个资本家的资本有机构成按 $60c + 40v$ 的比例分配，在剩余价值率为 100% 时，该商品的价值将为 140。如果该商品的市场价格如果与其个人价值相同，则赚取的利润将为 40%。这将导致一个荒谬的结论：机械化程度较低的部门的利润比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工业要高得多。这只是斯密和李嘉图所阐述的价值规律所包含的错误所产生的与现实不符的荒谬结果之一。

正如上面已经看到的，马克思证明，来自不同经济部门的资本之间的自由竞争往往会影响社会的总体利润率。由此可见，利润与资本的有机构成无关。已经研究的利润符合一般利润率。

medium，按照其大小的比例属于所有资本。这样，一般利润率就将社会剩余价值按比例分配到不同的生产部门。因此，以较高有机成分（在上述示例中为 90c/10v）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为 \bar{p} 大于其内在价值。反过来，以较低有机成分（例如 60c/40v）生产的商品以低于其内在价值的生产价格出售。

随着价值规律、生产价值与价格之间、剩余价值与平均利润之间关系的发展，马克思解决了制定地租理论的基本问题，即：并不违背科学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基本规律。因此，它可以解释差别收入和来自最差土地的收入，或者说绝对收入。马克思表明，一旦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在最佳条件下，即在最肥沃的土地上生产的竞争生产者将获得低于市场价格的个人生产价格。这种差别，这种额外的利润，在工业中属于资本家，在农业中则变成了地租。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差别已经被李嘉图概括地解释过。

正如马克思论证的那样，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由于有机成分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个市场价格可能略高于最差土地的个体生产价格，但仍低于其内在价值。这样，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的分配，在不违背价值规律的情况下，成功地解释了最恶劣地区地租的真实存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与每种商品的价格立即与其价值相对应的教条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发展斯密和李嘉图建立的价值法则时表明，商品的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同一性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根据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中的有机构成的剩余价值的分配来调节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绝对收入理论的基本理论基础。

在会计方面，为了进一步例证该理论，以上面的数据为例：在工业部门，资本分为 90c + 10v，在农业部门，资本分为 60c + 40v。对于相同的剩余价值率(m') 100%，工业生产的剩余价值 (m) = 10 ($m = v \cdot m' = 10 \times 100\% = 10$)，而农业生产的剩余价值为是 = 40 ($40 \times 100\% = 40$)。该行业产生的价值 ($c + v + m$) = 90c + 10v + 10m = 110；农业生产的价值 = 60c + 40c + 40m = 140。产生的总剩余价值 = 10m + 40m = 50m。由于剩余价值不是立即由生产部门实现，而是在这些部门之间分配，因此在本例中，社会总剩余价值中的 2500 万将分配给工业，2500 万将分配给农业。因此，每 100 资本，无论其有机构成和直接提取的剩余价值如何，都能赚取 25 的利润。因此，社会平均利润率为 25%。

然而，资本主义地租构成了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分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土地所有者无需用资本或劳动力参与生产过程，即可获得这部分社会剩余价值。就拿上面的例子来说，这 50m 中的一部分被土地所有者占有，比如 1000 万，这样工农业资本家分享的剩余价值就减少到了 4000 万，平均利润率也从 25% 减少到了 20%。保证土地所有者拥有这种权力的特殊条件是，农业和采掘业部门的主要经济因素是由可垄断的自然力量构成的。这种垄断的行使允许土地所有者收取其使用租金。土地收入越高，特定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就越低。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种特殊的剩余价值分配形式，我们现在就以农业部门为例来单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差别收入和绝对收入理论。

我们先从差别收入开始。让我们假设两个相互竞争的资本家，在不同质量的土地的同一种植区投入相同数量的资本。均缴纳 100 本金，分为 60c+40v；A 地的资本家以 100 公斤的资本生产 60 公斤小麦，而 B 地的资本家以同样的资本生产 120 公斤的小麦。两个资本家的成本价格相同=100（不变资本 60，工资 40）；不同的是，最好的土地上的资本家生产 120 公斤小麦，而最差的土地上的资本家只生产 60 公斤。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资本主义农业中，最差土地的生产价格决定了

决定市场价格。最差土地的生产价格，按照马克思建立的公式，=成本价+平均利润= $(60c+40v)+25m=125$ 。这样，每 60 公斤一袋小麦，无论是在什么时候生产的在最好或最差的土地上，它将以 125 的价格出售。在最差的土地上，资本家以 125 的价格出售他的 60 公斤一袋小麦，获得的平均利润为 25，并且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因为它保证了平均利率在特定社会中的利润；虽然我不会向最差土地的所有者支付租金，但这个问题稍后我们讨论绝对租金时会澄清。

在土地 B 上，由于肥力较高，经济结果会有所不同。在这块土壤上，资本家以同样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 $(60c+40v)$ 获得了 120 公斤小麦。他每袋小麦（60 公斤）的成本价为 $=100:2=50$ 。但是，由于市场价格是根据最差土地的生产价格确定的，因此他将以 125 的价格出售每袋小麦，并装入袋 250。袋子卖了。投入资金 100，您将获得总利润 150。这个额外利润的原因是什么？不存在对农业的剥削或对农业工人的更大剥削的新方法（我们假设两者的剩余价值率相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土壤的自然肥力较高，在资本和劳动力支出相同的情况下，其产量是最恶劣地形的两倍。

然而，这种天生的高生育率构成了最好的土地 B 的所有者垄断的自然力量，他们向资本家收取使用其土地的租金，例如，土地 B。

125. 这样，从资本家 B 出售生产的两袋小麦获得的总利润中，扣除支付给这块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即 $150-125=25$ 。这样，资本家 B 根据我们的例子，在 B 土地上生产的产品所获得的利润与在最恶劣的地形上生产的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完全相同，这与在工业中获得的利润相同。

最好的土地所有者收到的租约或土地租金构成级差地租。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差别收入等于个体生产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即最恶劣地形的生产价格。

但绝对收入又如何呢？

我们知道，最差的土地 A 的所有者也会收取租金。马克思并没有像李嘉图在他的理论中那样回避这个实际问题。对于马克思来说，根据上面的例子，最差的土地的租金可以达到 15，仍然不违反价值规律。让我们看看：如果租期为 15，最差土地的生产价格为 $(60c + 40v) + 25m$ 市场价格= $125 + 15 = 140$ 。在这种情况下，最差的土地会产生收入，农产品的价格不会高于其内在价值（140）。马克思由此在不违反价值规律的情况下成功证明了最差土地地租的存在。为了让在最差土地上生产的资本家能够向 A 地主支付 15 美元的租金，市场价格必须从 125 上涨到 140。市场价格的上漲也有利于土地 B 的所有者，他成为收取 $125+15$ 的地租。因此，最差土地的地租是绝对地租，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农业中所有土地所有者赚取的，而级差地租是相对的，因为它根据土地的相对肥力而变化。土地。最差土地的所有者只获得绝对地租，而最肥沃土地的所有者则获得级差地租+绝对地租。

从经济角度来看，农产品就成了例外：它们是唯一市场价格高于生产价格的商品。这构成了这些经济部门的一种垄断。但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这并不是“垄断本身”，如果有机成分较差的商品以高于其价值的市场价格出售，情况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成功地解释了所有土地所有者、最肥沃的土地和最差的土地的收入，而不违反价值规律或自由竞争规律。

对于马克思来说，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生产的商品以高于其内在价值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因为它们占有了其他部门生产的部分剩余价值，这一事实并不构成矛盾。毕竟，正如马克思所证明的那样，这些部门需要更多的资本积累和集中，因此主导着整个经济。当他们通过一般利润率获得剩余价值的份额时，他们也就获得了生产的份额。

资本家。然而，如果有机成分较低的部门（通常是农业和采掘业）的资本家能够以高于其内在价值的市场价格出售其商品，那就毫无意义了。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就意味着农业将主导工业，而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情况恰恰相反。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垄断价格本身就是帝国主义阶段的特征之一。我们看到，列宁在美国卡特尔制糖业的例子中正是指出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农产品以高于其价值的市场价格出售；这个市场价格和这个价值之间的差额构成了帝国主义的一种特殊的收入形式，它与马克思研究的绝对收入不同。在列宁的例子中，这并不是生产者的奇怪统治。糖对洋基经济的影响，而是来自金融资本对社会的统治，金融资本通过强加这种垄断价格本身，从社会中提取形成其最大利润的社会税的一部分。

马克思的表述包含不同的问题，需要在具体案例的研究中反思、吸收和正确运用。马克思在阐述级差地租理论和绝对地租理论时，虽然在几个方面发展了李嘉图，但仍坚持他关于生产的正确假设。农业上的资本主义，即：1) 相同数量的资本和劳动力运用在同一面积土地的不同土壤上，产生不同的结果；2) 运用这种资本需求来实现社会普遍利润率的资本家；3) 最差土地的生产价格为市场调节价。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收入差别并不像 UOC（毛主义）领导层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源于土地肥力的差异；而是“诞生”的。它还取决于租户在所有土地上获得的平均利润，为此，市场价格是根据最差土地的生产价格确定的。因此，马克思说，最恶劣土壤的生产价格“它是差别收入的基础”³³⁹。因此，要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就必须理解为什么最差土地的生产价格决定了纯粹的资本主义基本收入形式的市场价格。

正如所见，对于李嘉图来说，决定商品社会价值的总是最恶劣的生产条件，并且对他来说，给定产品的价格和价值之间存在直接的一致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已经证明，正是平均条件决定了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工作时间。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一规律对于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有效，但在农业生产中，这一规律又具有特定的作用，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收入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工业中存在同样产品的制造商之间的竞争，也存在于资本主义农业中。例如，所有资本主义小麦生产者都相互竞争，并寻求尽可能降低其产品的成本价格，要么通过降低所使用的不变资本（例如种子和拖拉机）的价值，要么通过增加剥削尽可能多地收获农作物。工人。例如，任何通过新的种植方法设法降低小麦生产成本的资本家都将实现其产品的个体价值低于所有生产者的平均社会价值。因此，您将获得额外的利润，就像工业中一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竞争促使所有资本主义生产者使用最合理的生产方式并增加剥削，这导致社会必要工作时间的均等化，个人价值观趋向于相同的价值，利润补充资源因此趋向于趋于一致。消失，商品变得更便宜。

然而，农业和采掘业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种个人价值的均等化和抑制额外利润的倾向。在农业中，土地是主要生产要素，在采掘业中，土地是主要的使用价值储备。新的生产方式或者新的集约化劳动方式都可以被相互竞争的资本家推广和使用。然而，土壤表面的石油来源并不是普遍适用的生产条件。该来源的私人所有权必然会排除其他竞争对手对其进行利用。因此，开发这一资源的资本家的生产成本将比开发最恶劣地形（例如埋在地下岩石中的石油资源）的资本家低得多。这种土壤肥力的差别不能普遍化，因而构成了一种可以被土地所有者垄断和垄断的自然力量。正如我们所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这些自然力量的垄断使土地所有者能够榨取本应属于资本家的部分剩余价值。

可垄断的自然力和平均利润的需要这两个条件决定了在农业和采掘业中，与制造业不同，将由最差土地的生产价格决定市场价格。按照上面的例子，两个资本家在土地 A（较差的肥力）和 B（较高的肥力）上进行生产；资本家 A 只有在获得平均利润的情况下才会在 A 种植小麦；B 的土地所有者只有将其土地的自然力提供的额外利润作为地租（在本例中为差别收入）收入囊中，才会出租其土地；反过来，土地 A 的所有者将满足于绝对租金，该绝对租金最多只能构成这块最差土地的生产价格与该商品的内在价值之间的差额。这些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所有土地所有者都要求获得收入以开发其土地，收入的价值取决于土地的经济肥力；所有租户要求平均利润。

这样，正如马克思所论证的那样，要开发最差的土地，例如小麦的市场价格就必须上升到在那里耕种的资本主义佃农获得平均利润的程度，而小麦的所有者则必须达到平均利润的水平。土地获得收入，无论收入多么小。因此，在纯粹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在农业和采掘业中，最差土地的生产价格永远是市场调节者。然而，这种由最差土地的调节不仅意味着绝对收入的过度升值，还意味着对来自最肥沃土地的商品的人为估价。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假的社会价值**”。让我们来看看：

“关于差别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价值总是高于生产数量的全球生产价格。以表一为例，全球 10 个季度的产品售价为 600 先令，因为 A 公司每季度 60 先令的生产价格决定了市场价格。但实际生产价格是：

土地	宿舍		生产价格 土地		四分之一		实际价格为 每季度产量
A	1	=	60		1	=	60
乙	二	=	60		1	=	30
瓦	3	=	60		1	=	20
D	4	=	60		1	=	15
全部的	10	=	240	平均的	1	=	24

生产 10 个季度的实际价格是 240 先令；它们的售价为 600 美元，贵了 250%。1 季度实际均价为 24 先令；市场价格为 60 先令，也贵了 250%。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通过竞争强加的市场价值决定产生了**虚假的社会价值**。这种现象源于**市场价值规律，土壤产品受制于市场价值规律**。确定产品的市场价值，包括因此，土壤产品是一种社会行为，尽管它们的社会实现既不是有意识的也不是有意的，并且**必然基于产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基于土壤及其肥力的差异**。”（马克思）³⁴⁰

换句话说，由不同的资本主义佃农种植的四块地（A、B、C 和 D）的产量总共相当于 10 季小麦。最差土地的生产价格为每季度 60 先令，成本价（不变资本+可变资本）=50 先令，平均利润为 10 先令，对应一般利润率为 20%。如果市场价格不是每季度 60 先令，在 A 生产的资本家就赚不到平均利润，更不可能支付最差土地的地租。因此，如果市场价格达到这个水平，市场上将只有 10 个季度可用。然而，最肥沃的土地和市场调节最差的土地之间的肥力差异越大，最肥沃的土地所获得的收入差距就越大。这种现象受土壤生产所服从的“**市场价值法则**”的支配，意味着社会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市场价格远高于各季度小麦的实际平均生产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为每季度小麦支付 60 先令，而每季度的实际平均生产价格仅为 24 先令。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10 个季度的差异为 600 到 240 先令。

小麦，也就是 360 先令的这个价值，是³⁴¹社会在级差地租条件下支付给地主的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种价值并不是从土壤肥力的差异中“诞生”的，而是建立在调节土壤生产交换价值的规律之上的；这决定了最恶劣的地形调节市场价格。

土地生产市场价格的这种不合理行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土地私有制不合理的体现。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

□ 在不参与任何生产过程的情况下占有社会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土地私有制和对平均利润的需求意味着，正如上面的例子，社会为每四分之一的小麦支付更多的费用，并支持大土地所有者的寄生阶层。正如马克思对这种情况的分析，这不是农业生产所固有的，而是农业生产的资本主义剥削的特征：

“如果我们想象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被废除，社会转变为一个有意识和有计划的协会，那么这 10 个季度将代表自主工作时间的等量

□ 包含在 240 先令中。社会不会为该农产品支付相当于其工作时间 2.5 倍的费用；**地主阶级的基础将会消失。**(...)同类商品的市场价格的同一性是价值的社会特征被强加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方式，并且一般而言，强加在基于个人之间商品交换的生产上的方式。社会作为消费者为农产品支付了过多的费用，而这对社会来说在农业生产中的工作时间为负数，因此构成了社会的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的剩余。**”（马克思）³⁴¹

大地主和资本主义生产导致农业生产中出现虚假社会价值等非理性现象。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基础相矛盾，部分原因在于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历史内容所强调的事实：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角度来看，资本的财产实际上是第一位的，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所依据的财产类型，它是一种要素并发挥一种功能，而这不适用于土地财产。这似乎是因为**现代土地财产实际上是经过资本作用而转化的封建财产**，因此形成了这种形式。现代衍生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马克思）³⁴²

因此，正如马克思和列宁所解释的，土地国有化是资产阶级反抗封建非理性的一种尝试，而其现代形式正是源于这种非理性。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

“这里的真相归结为：假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家不仅是生产的基本雇员，而且是主要雇员。另一方面，**土地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完全是多余的。**这种生产方式只要求土地不是公有制，反对工人阶级作为不属于该阶级的生产条件，而当土地成为工人阶级的财产时，这个目的就完全达到了。国家，即**国家收取土地租金**。地主，在古代和中世纪世界中是生产的重要雇员，但在工业时代却毫无用处，是一个赘生物。激进资产阶级（也觊觎**抑制所有其他税收**）在理论层面上提出**否认土地私有制**，他希望将土地变成资产阶级、资本的共同财产，以国家财产的形式。然而，在实践中，人们缺乏勇气，因为攻击一种形式的财产——一种工作条件的私有制形式——对于另一种形式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此外，资产阶级自己也成为了土地所有者。”（马克思）³⁴³

如果说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勇气否认土地私有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就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否认土地私有制。这样，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就压制被压迫国家的土地收入，或者视情况侵占。毕竟，金融资本愿意向半殖民地国家的大土地所有者支付这种虚假的社会价值，或者愿意支付代表绝对收入的税收（作为高于生产的市场价格）是不可想象的。最糟糕的土地的价格，给被压迫民族的土地所有者。同样，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资产阶级

半殖民地国家愿意支付平均利润，此外还愿意向小农支付额外利润。

众所周知，半殖民地国家矿产资源的开发、这些国家的农产品出口和农民生产并没有为这些国家或这些农民群众带来额外的利润。这似乎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地租理论相矛盾，但其实并不存在这种矛盾。马克思彻底解决了资本主义地租规律问题；因此，所发生的情况并不是违法，而是因为这些规律在半殖民地的矿产和农业生产以及农民生产中的表现形式不同于 19 世纪英国的纯粹的或古典的地租形式。充分理解资本主义地租理论是看清金融资本统治如何强加形式的关键 向被压迫民族和这些国家的农民群众提供非资本主义收入。理解这一理论是理解帝国主义阶段半封建生产关系形式演变的国际意义的基础。没有这个认识，就不可能准确分析当今世界基本矛盾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找出哪些是主要矛盾。马克思本人就是 UOC（毛主义）领导层所称的半封建理论的先驱。因为正是共产主义创始人向我们证明了农民生产和半殖民地生产不能提供资本主义的土地收入。歪曲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只能得出存在“资本主义小农地主”等荒谬结论，而永远无法澄清帝国主义下地租的现实现象和运行情况。

2.2-马克思对半殖民地国家广大农民和大地主土地收入的分析

在分析帝国主义时代地租的作用之前，有必要回到马克思对自由化阶段半殖民地国家农民土地收入和大土地生产的研究。竞争资本主义。马克思未能对封建和半封建地租或其在已经受制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半殖民地生产中的运作提出完整的理论。然而，它凸显了这些模式并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土地收入形式，并巧妙地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农村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农民的剥削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帝国主义针对被压迫民族。

凡是稍微了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农民群众生活状况的人都知道，这些群众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关系并不包括马克思所确立的资本主义地租原则。无论是拥有中小块土地的农民，还是大庄园土地的“租客”，都很难得出这些“农村生产者”获得的平均利润，即他们作为资本家的利润，或者作为更肥沃土地所有者的补充利润（差别收入），或者如果他们拥有最差的土地，他们将能够强加高于其生产价格（绝对收入）的市场价格。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马克思表明，贫农，甚至他们的土地所有者，通常也得不到平均利润、差别收入或绝对收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生产成果仅相当于他们从事同样工作所获得的工资所对应的价值，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没有赚取这个价值。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拥有土地的农民所处的地形最为恶劣。如果纯粹用资本主义地租规律来统治小农经济，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农民的生产价格（包括平均利润）会调节市场价格，并且也会略高于这个价格，以便为这些小地主提供绝对收入。所有了解半殖民地国家历史和领域的人都知道，情况并非如此。一般来说，市场价格总是低于农民的生产价格，当他们设法出售所有产品时，他们几乎无法支付必要的成本。这种情况恰恰造成了农民群众生活的经济破灭的状况。有多种方法可以操纵市场价格，无论是通过商业化，农民因为无法出售而被迫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其产品，还是通过与可以以低得多的成本生产的大型财产的生产竞争。任何这些或其他形式都会收敛到相同的结果：

贫农没有得到平均利润，没有差别收入或绝对收入。这样，不难看出，在半殖民地经济体中，调节市场价格的并不是最差的土地（一般为贫苦农民拥有或租赁的土地）的生产价格。资本主义地租存在的必要条件缺失；因此，农民土地所有制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外的生产关系。列宁通过以下方式强调了马克思关于农民没有获得绝对收入的结论：

“小土地财产，或者更确切地说，小农场的存在，自然地**对资本主义收入理论的一般论点进行了某些修改**，但它并没有破坏这一理论。例如，**马克思指出，在主要用于满足个人需要的小规模种植中，绝对收入本身通常不存在**。农民 (...)。但商业经济越发展，所有经济理论的论点就越适用于小农农场，因为它被置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条件下。”（列宁）³⁴⁴

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列宁在其中准确地强调了共产党，特别是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必须研究的地租理论大纲的变化。同样非常重要的是要注意，对于马克思来说，一般来说，农民没有绝对的收入。至于列宁关于这些法律在制定时的有效性的声明 重商经济，作为自由竞争阶段的大势是正确的。但在 20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这种趋势发生了变化，进入了垄断资本时代。在帝国主义阶他们至少是来自最差土地的绝对收入。为了作为农民生存，这群人被迫只接受一种 收入与同样工作的工资相对应，有时多一点，大多数时候少一点。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小农经济，毛主席强调了以下问题：

“帝国主义为了满足其侵略的需要，**通过不平等的价值交换来剥削中国农民，从而毁灭了中国农民**；就这样，创造了无数的 贫困农民数以亿计，占全国农村人口的 80%。”（毛主席）³⁴⁵

毛主席强调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农民的“不平等的价值交换”，恰恰强调了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控制市场价格的最常见方式之一。这样，它就向农民强加了严格意义上的垄断价格（即工业品的市场价格加上工业品的市场价格）。超过了它们的价值，它们也超过了这些商品所产生的平均利润）。这样，工具、机器、化肥、农药等就以垄断价格出售给农民，增加了小产权房的生产成本，使他们无法获得平均利润、差别收入或绝对收入。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在帝国主义时代，证实了自由竞争阶段的趋势，即当小农经济变得商业化时，资本主义地租规律将支配小农经济。半殖民地国家的小农经济越是商业化，它就越遭到破坏。困难的不是看到这种情况，从理论上讲，困难的是理解为什么这种被破坏的经济的再生产对于垄断资本来说是必要的，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会寻求澄清。

自由竞争阶段）并不能获得绝对收入的分析：

“正是在这种形式的财产中，通常必须承认**不存在绝对地租**，最差的土地也不支付地租，**因为绝对地租假定，除了生产价格之外，还存在价值剩余**。产品，或垄断价格超过该产品的价值 产品。但是，由于农业主要是为了直接维持生计，而土地

□ 工作和资本不可或缺的活动领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产品的监管市场价格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达到其价值**。”（马克思）³⁴⁶

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马克思发展并纠正了李嘉图地租理论的缺陷，证明了资本主义地租的存在在最恶劣的地形下也可以在不违反价值规律的情况下存在。由于农业是有机成分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生产部门，因此这些产品的市场价格低于其价值，但利润却平均。马克思随后证明，绝对收入在最大程度上代表了市场价格与商品内在价值之间的差异。上面这段话是说，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达到内在价值；换句话说，农民只有在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绝对收入，例如，当某些商品极度稀缺时。马克思指出，在正常情况下，农民没有绝对的收入。

地租理论中证明，只有当生产价格调节市场价格时，最差的土地才会以资本主义方式被剥削。这样，例如，如果小麦的需求大于供给，并且所有质量最好的土地都生产出最大产量，那么只有当市场价格上涨到足以让资本家赚取利润时，资本家才会将生产扩大到质量最差的土地。平均利润，此外，增长足以让他向最差土地的所有者支付租金。马克思强调，这一要求对于农民生产来说并不存在：

“资本的平均利润并不限制对小财产的剥削，而农民

小资本家；当他拥有土地时，收入需求也不会限制他。虽然是个小资本家，但他唯一绝对的限制就是他自己支付的工资 即使扣除了本身的成本。只要产品的价格能够覆盖，他就会耕种土地，而且常常降低工资，达到最低生活水平。”（马克思）³⁴⁷

只要市场价格能够覆盖农民自己支付的工资，他就会生产来销售。换句话说，与资本主义生产不同，农民在最差的土地上耕种，即使他没有利润，即使他是这片土地的所有者，他也没有收入。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使在自由竞争阶段，农民的成本价格也不能调节市场价格；最终，调节市场价格的，是大生产开垦的最差的土地。因此，当农民与大生产的产品竞争时，他们被迫以大生产所确定的市场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即以无法获得满意收入的市场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正如毛主席所表明的，这种市场调节在帝国主义阶段更是不可想象的。一般来说，绝对收入和对农产品实行垄断价格的可能性（如列宁在 20 世纪初美国糖价的例子）对于经济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农民，正如马克思亮点，这些：

“[绝对租金和垄断价格是两种情况]在包裹经济和小土地所有权中几乎不会发生，因为正是在那里，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自身消费，其效果不依赖于一般利润率的调节作用。即使在租赁土地上进行部分开发，租赁资金也比任何其他条件下都多得多地涵盖了部分利润，甚至吸收了部分工资；那里的收入只是名义上的，在工资和利润面前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类别。”（马克思）³⁴⁸

我们似乎很清楚，对于马克思来说，农民从小农占有中获得的收入并不构成资本主义地租。现在让我们看看他如何分析半殖民地大规模农业开发的收入，重点是向世界市场出口：

“由于他们拥有殖民地和年轻国家，因此认为他们有可能以更便宜的价格出口小麦，因此他们的土地必然具有更高的肥力，这是错误的。那里的谷物以低于其价值、低于生产价格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低于在旧国家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生产价格。”（马克思）³⁴⁹

马克思指出，殖民地出口小麦的价格之所以低，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土地更肥沃，而是因为它们的销售价格低于由大都市的平均利润率决定的生产价格。马克思结论的经济意义是这样的：如果殖民地小麦价格低廉是由于土壤肥力较高，那么这就意味着在同样数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下，

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殖民地获得的小麦数量比大都市多；正如已经看到的，这些条件将允许殖民地小麦相对于大都市小麦获得额外利润，这可以转化为级差地租；在这种条件下，殖民地小麦如果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只是无法实现差别收入，但仍能提供平均利润和绝对收入。然而，情况更为严峻；马克思表明，殖民地小麦不仅无法获得假设的差别收入，因为它是在更差的土地上生产的，并且以低于大都市小麦生产价格的价格出售，与农民生产类似，殖民地生产并没有获得收入。差别收入，绝对收入甚至不是全部平均利润。

农民土地收入有重合之处，但也有巨大差异。因为，虽然农民的收入充其量只能支付同样工作的工资，但农产品出口大庄园的收入可能是巨大的。马克思在分析殖民生产时强调了决定这一巨额收入的条件：

“（……）[殖民地]的所有剩余产量都是小麦。这就是基于现代世界市场的殖民国家与以前存在的殖民国家的区别，特别是那些古代的。他们从世界市场获得在其他情况下必须自己生产的成品：衣服、工作工具等。只有在此基础上，联邦南部各州才能将棉花作为其主要产品。国际市场的分工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如果尽管最近存在和人口相对稀缺，存在大量剩余产品，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由于土地的肥力，也不是由于工作的丰富性，而是由于这种单方面的形式和它所实现的剩余产品的结果。”（马克思）³⁵⁰

换句话说，基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的殖民化允许所有剩余生产（用于商业化）被配置为小麦。这种巨大的剩余量既不是由于土壤肥力，也不是由于劳动生产率，而是由于生产的单边性。因此，马克思在这个例子中分析了北方的小麦产量。美国，可以低于大都市的生产价格出售，仍然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这与被大财产永久破坏的农民生产相比是一个巨大的差异。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一般的小农生产和用于出口的大生产既没有获得资本主义地租，也没有获得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平均利润。

殖民地生产和农民生产的这种不保留构成资本主义地租的额外利润的全部甚至任何部分的状况，已经成为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重要斗争的对象。毕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地租是土地所有者从资本家那里榨取的社会剩余价值的一个分支；很明显，该行业反对这种开采，并寻求尽可能降低土地租金。在这方面，农民和殖民生产，尤其是后者，在整个 19 世纪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当殖民地小麦进口时，特别是在没有税收的情况下，以低于生产价格的价格出售时，他就开始调节市场价格。这样，当市场价格下跌时，最好的大都市土地的差别收入就会减少。当市场价格因殖民地小麦的进口而下降时，既不产生资本主义收入，也不产生平均利润，劳动力的价值就会下降，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食品成本组成的。劳动力价值的减少伴随着无产阶级工资的减少，从而导致剩余价值率的增加。因此，殖民地小麦即使在自由竞争时期，也已经成为提高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重要因素。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

“当劳动力价值上升时，由于再生产它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增加，或者当劳动力价值下降时，由于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减少（……），上升对应于剩余价值下降，剩余价值减少，剩余价值增加（……）。”（马克思）³⁵¹

《资本论》第三卷的重要补充中向我们解释了农业生产（无论大小）如何有助于抵消土地收入的增长趋势。

由于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占用以及对同一部分土地连续资本投资（差别收入类型 II）：

“投资在土地上的资本越多，一个国家的农业和文明总体上就越发展，每英亩收入和总收入增加得越多，随着社会额外利润的出现，人们缴纳的税就越大。土地所有者，前提是所有类型的土地都经过耕种继续竞争。这个规律说明了大地主阶级具有惊人的生命力。（……）然而，同样的规律却解释了为什么大地主的活力正在逐渐耗尽。1846年英国废除关税时，关于谷物，制造商认为，采取这一措施，领土贵族将陷入贫困。相反，他们变得更加富有。这很容易解释。（……）由于最恶劣的土壤还没有被消除，最多只能暂时用于其他目的。一般来说，收入的增加与所使用的资本的增加成正比，领土贵族的处境甚至变得更好。

但一切都是暂时的。远洋轮船以及北美、南美和印度的铁路使得陌生的地区能够参与欧洲小麦市场的竞争。有美国大草原、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平原，天生就可以耕种，即使采用不施化肥的原始耕作方法，也能长年丰收的处女地。还有俄罗斯和印度农民社区的土地，他们被迫出售越来越多的产品，以便为国家残酷的专制统治（经常使用酷刑）勒索的产品换取金钱。农民不考虑生产成本，按照商人提供的价格出售这些产品，因为他绝对需要钱来按时纳税。在面临这种竞争，无论是平原处女地的竞争，还是受到税收挤压的俄罗斯和印度农民的竞争，欧洲佃农和农民都无法在古老的收入基础上繁荣发展。欧洲的部分土地最终被排除在小麦种植竞争之外，各地收入下降（……），因此农业灾难从苏格兰蔓延到意大利，从法国南部蔓延到东普鲁士。”（恩格斯）³⁵²

在这段话中，恩格斯对19世纪工业化欧洲殖民地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的经济作用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分析。大规模殖民生产的单边性使得土地所有者能够以高收益出口商品，但无法赚取资本主义土地收入。殖民地农民的贫困迫使他们以无法覆盖生产成本的市场价格出售商品。1846年，英国取消了农产品进口税，增加了这些农产品的进入，而这些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不足以支付高额的资本主义土地租金。这一措施的直接结果是英国贵族的资本主义土地收入减少，因为这些产品的市场价格下降，进而导致英国实业家榨取的剩余价值大幅增加。不向殖民地生产者支付的资本主义土地租金导致食品市场价格下降，从而导致工资减少、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利润增加。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指出的这种对被压迫民族和农民的剥削关系远没有消除，反而在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更加恶化。

因此，毫无疑问，根据马克思的分析，用于出口的农民和殖民地生产，即面向世界市场的单一栽培，是拉丁美洲经济社会形态的特征，并不构成资本主义收入的形式。这些是什么类型的收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地租产生的研究帮助我们澄清了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本次会议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地租和资本一样，是一种社会关系，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生产关系都是剥削关系，是榨取剩余劳动的关系。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所获得的地租类型的表征是表征主要生产关系的关键。例如，它表明，对于拥有生产资料和工作条件的自主生产者来说，将其部分生产成果转移给剥削者，这种转移只能通过“超经济胁迫”来实现：

“根据假设，直接生产者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其工作和生产其生存资料所需的客观工作条件；他自主从事农业，也从事农村家庭手工业。

链接到它。（……）在这种情况下，**剩余劳动力只能由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通过超经济胁迫（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来榨取。展示。**”（马克思）³⁵³

正如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半殖民地的农产品出口地主和农民在提供货物时没有获得平均利润和资本主义土地收入，前者获得了巨额收入，后者则永久破产。这些没有资本主义地租的农产品反过来又导致剩余价值的生产增加，资本家的利润率提高，因为它们为降低这些国家工人的工资提供了条件。这种农业和农民生产的负收入根据其分配，作为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实现，主要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剩余价值。尽管农产品出口大地主和农民是土地的合法和事实上的所有者，但他们并没有充分实现其财产的经济性，即他们无法将这种财产转化为榨取剩余价值的权力。资产阶级，其特征是资本主义地租。毕竟，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收入的分配是实现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形式**”³⁵⁴。然而，无论谁执行从经济上来说，半殖民地大庄园和农民的财产一般来说是大工业资产阶级，最终在更大程度上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因为它将这种负土地收入转化为剩余价值的增加。

在大都市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存在着前者的统治和后者的依赖关系，简而言之，是附庸关系，这种关系通过不同的手段（经济、政治和军事）强迫土地所有者以低于生产水平的价格交付货物。价格。单一种植出口的单边性使得这些经济社会形态具有双重依赖性：它们需要大都市来获得制成品，它们需要大都市来运输其产品，它们需要大都市来进行资本投资。在地方层面上发生在农民身上的事情，在全球层面上的半殖民地农产品出口大庄园中也得到了重演。城市总体上开发农村，特别是工业和农业，而大都市则开发殖民地/半殖民地。因此，大地主就像大都市资产阶级的附庸，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与大都市的思想、习俗和文化保持一致。

所有这些在 19 世纪出现的思潮在帝国主义阶段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此，农产品出口大庄园的地租是封建地租的演变形式，即使基于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它也不提供资本主义地租。因此，这是一种半封建的收入。农民的土地收入也不作为资本家，即使他是这块土地的合法和事实上的所有者，他也不是在经济上实现这一财产的人。尽管生产力低下，但其被破坏的生产却增加了资本主义的利润。其商品中包含的负收入是农民向社会缴纳的贡品，以免沦为无产阶级。或者正如马克思教导我们的那样：

“对于小农来说，自己耕种土地或买地耕种，并不需要像在正常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那样，市场价格高到足以提供平均利润，这对于补充农民的收入来说更是如此。，以收入的形式，高于这个平均利润。因此，市场价格不一定达到产品的价值或生产价格。**这就是为什么在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小麦价格低于资本主义生产国家的原因之一。**在最不利条件下工作的**农民的部分剩余工作被免费提供给社会（……）**。那因此，较低的价格是生产者的贫困造成的，而不是劳动生产率造成的。”（马克思）³⁵⁵

农民受到残酷的压迫。大庄园满足于巨额收入，却以整个国家的损失为代价；它依赖于帝国主义，成为外国统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忠实的盟友。我们现在将从理论上论证帝国主义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压制和侵占土地收入的机制。

2.3-垄断资本压制或侵占被压迫民族和农民的土地收入，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在前面研究的主题“利润最大化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中，我们看到了对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永久超剥削和对民族资产阶级（即平均非垄断资产阶级）利润的限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金融资本创造超额利润的两个来源。我们看到，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帝国主义阶段的一个特殊性，它是由于经济结构发生质的变化而产生的。生产领域和流通方式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同时，我们试图证明马克思如何认为对社会剩余价值分配规律的修改是合理的，即控制一般利润率的形态的规律，该规律决定了所有资本家的平均利润与其资本规模有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质疑，面对中小型资本家的大量资本集中，利润率将如何表现。例如，马克思在他对地租的研究中指出：“（.....）**小资本家**，就像英国的部分情况一样（.....），**满足于获得低于利润的利润。**”

中》³⁵⁶。

在帝国主义阶段，这种趋势得到了巩固，这并不意味着一般利润率的压制，而是存在着金融资本的一般利润率，它调节着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疯狂竞赛中最大利润的分配。为了统治整个地球；另一种一般利润率，它调节各国官僚资产阶级和比较资产阶级之间垄断利润的分配 半殖民地；最后是一般利润率，它规定了特定国家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最低利润的分配。**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超剥削的基础上，并受益于地租的压制。**在半殖民地国家，抑制地租 农民的直接利益使官僚资产阶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受益；对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来说，压制农民的土地收入、农产品出口大庄园和整个国家（在开发原材料和能源来源以及为其公司产品占领市场的过程中）构成了塑造您最大利润的巨大来源。

这样，对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帝国主义利润最大化的来源是：1) 对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永久过度剥削；2) 压制或侵占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原材料和能源来源的土地租金；3) 半殖民地农产品出口大庄园的土地收入受到限制，虽然规模巨大，但远远低于资本主义土地收入；4) 抑制农民土地收入；5) 限制民族资产阶级的利润，将其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利润，有助于塑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最大利润。其中三个来源与土地收入直接相关：抑制农民的土地收入、限制半殖民地大庄园的土地收入以及抑制或侵占与土地收入来源相关的土地收入。来自被压迫民族的原材料和能源。马克思研究了所有这些特殊形式的地租，让我们快速强调他关于这三种来源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全球运作的重要性的一些结论。关于农民生产，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个故事的寓意可以从对农业的其他观察中得出，即**资本主义制度**与理性农业相对立，或者说理性农业与农业不相容。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它有利于其技术发展），**需要依靠自己的工作谋生的小农的行动，或联合生产者的控制。**”（马克思）³⁵⁷

换句话说，在农民经济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出售其产品的情况下，这有助于资产阶级增加剩余价值，因为它允许他们减少工资。并不是因为小农的零碎生产比大规模生产的生产力高，而是因为它不需要平均利润或资本主义地租，所以通过提高资产阶级的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而使资产阶级受益。反过来，半殖民地土地所有者通过处置以被压迫民族的自然财富为代价生产的农产品，帮助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减少自己国家的土地收入，并且主要是为其提供剩余的增加。价值在于土地集中导致农民经济的存在因生产低于其成本的粮食而永久遭到破坏：

“（...）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在 19 世纪]，（...）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佃农生产的高于平均利润的剩余价值并没有在他的土地价格中实现**

产品，但他必须与他的资本主义兄弟分享它，就像所有商品的剩余价值一样，当它在价格中实现时，会给他们带来剩余利润，使各自的利润率高于一般利润率。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利润率将会上升，因为小麦等产品将像其他制成品一样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这种低于价值的销售不会构成例外，而是会阻止小麦成为与同类其他商品相比的例外。”（马克思）³⁵⁸

这种情况，尤其是 19 世纪的美国，为英国市场生产小麦，导致英国资产阶级总体利润率的提高，成为帝国主义阶段世界粮食市场的规则。被压迫民族的农产品通常以低于其价值、低于来自最恶劣土地的农产品的价格出售。尽管他们赚取了巨额利润，因此不属于受帝国主义压迫的阶级，但他们却以与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挥霍半殖民地国家的自然财富为代价来捞取金钱。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原材料方面，马克思已经强调将市场价格降低到生产价格以下是提高利润率的决定性经济措施：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低价原材料对工业国家的重要性**（……）。人们还推断，即使撇开其对工资的所有影响，**对外贸易也会通过降低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来影响利润率**。（……）另一方面，像李嘉图这样受一般原则束缚的经济学家却没有意识到**世界贸易对利润率的影响**。”（马克思）³⁵⁹

与李嘉图不同，马克思展示了世界市场在塑造利润率方面的双重重要性，无论是在低价原材料贸易中，还是因为它导致了恒定的资本经济，因此，成本价格下降，资本家利润增加；以及生活资料、食品的减少，因为它们允许工资减少和剩余价值率增加。这样，很明显，对于帝国主义来说，压制资本主义土地收入（这些收入将归因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生产的农产品和矿产）构成了获取最大利润的重要来源。金融资本压制地租的方法与所有垄断经济关系的逻辑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对生产和流通的垄断控制使得金融资本能够抑制来自殖民地/半殖民地初级产品的资本主义收入，无论是通过支付适度的补偿，还是能够贿赂少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主阶级的特许权使用费。它的价值相对较高，远低于这些商品的资本主义土地租金。或者金融资本诉诸使用炸药，就像美帝国主义所使用的那样，来掠夺被压迫民族的自然资源。正如列宁强调的这一逻辑：

“垄断无处不在，使用一切手段，**从支付‘适度’补偿到北美使用炸药‘追索’来对抗竞争者**。”（列宁）³⁶⁰

帝国主义使用这两种手段的结果总是一样的：金融资本控制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一切生产。当这种控制建立后，原本被压制的地租就被人为地抬高，从而确立了帝国主义时代市场价格的特殊形式：垄断价格。马克思研究了这一现象，但它构成了自由竞争流通方式的例外。正如列宁所表明的，这成为帝国主义阶段的常态：“（……）只要有可能夺取全部或最重要的原材料来源，**卡特尔的出现和垄断的建立就特别容易**。（……）**他们管理垄断价格**”³⁶¹。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垄断价格本身是与绝对收入导致的农产品垄断价格不同的现象。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要了解帝国主义垄断的特殊特征。我们看到，马克思提出的绝对地租理论阐明了如何在最恶劣的地形中不需支付租金。价值规律被违反了。就农产品而言，存在垄断价格并不是因为这些商品的售价高于其价值，而是因为市场价格高于最差土地的生产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绝对收入产生了垄断价格。就垄断价格本身而言，情况恰恰相反，是垄断产生了收入：

“有两点需要区分：（1）**收入来源于垄断价格，因为**产品或土地本身的垄断价格与其无关，或者（2）产品以垄断价格出售。垄断价格是因为有收入。（……）**垄断价格产生收入**。相反，当谷物的售价高于生产价格，甚至高于价值时，租金就会产生垄断价格，因为如果不支付租金，土地所有权就会阻碍资本对未耕地的投资。”（马克思）³⁶²

帝国主义的最大利润恰恰适合这种情况：它是由垄断价格产生的收入，而不是由最差土地的报酬产生的。帝国主义的最大利润是垄断定价产生的收入；这种垄断价格又是通过对生产和生产的垄断控制来确保的。帝国主义内部竞争中的暴力，主要是对被压迫国家的民族征服。帝国主义典型的垄断价格及其提供的收入是否违反了价值规律？换句话说，是否有可能从垄断价格中，以高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获得持续的收入？是的，在不违反价值规律的情况下，这是可能发生的；我们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最后，如果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遇到人为或自然垄断的障碍，特别是土地垄断，那么垄断价格就会**高于生产价格并高于产品的价值**。实行垄断的商品，其价值所给予的限制仍然不会取消。**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只会将其他商品生产者的部分利润转移给它们**。剩余价值的分配将受到间接和局部的干扰，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差异，但剩余价值本身的限度不会改变。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如果进入工人的必要消费，如果工人继续获得其劳动力的价值，就会增加工资，从而减少剩余价值。您可以将工资降低到低于劳动力价值的水平，但前提是工资高于最低生命限额。在这种情况下，垄断价格将**通过减少实际工资**（工人以一定数量的商品换取的大量使用价值）来支付。**劳动和其他资本家的利润**。垄断定价破坏商品价格正常监管的限度是明确的、可以准确计算的。”（马克思）³⁶³

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对垄断定价全球运作的精彩分析，这对于更深入地理解帝国主义非常重要。垄断价格，即以高于其价值或生产价格的价格出售商品，不允许创造更多的财富，即额外生产剩余价值。垄断价格使得财富更加集中于那些控制着能够以该价格出售的商品生产的资本。商品垄断价格的实现是以牺牲其他资本家的利润和对无产阶级更大的剥削为代价的。因此，在世界市场上，不可能所有的商品都以垄断价格出售，但由于这个价格保证了构成最大利润的收入，所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金融资本生产的商品是那些具有垄断性的商品。能够将价格垄断作为其市场价格。它构成了帝国主义间竞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争夺生产和市场条件，确保垄断价格。

垄断价格而改变的剩余价值分配中，土地租金如何表现呢？
让我们再次从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开始：

资本利润（企业家的利润+利息）和土地租金只不过是剩余价值的特定组成部分，根据它们是否用于生产目的来区分类别。资本或土地财产，这一分类绝不会改变其本质。**这些组成部分的总和就构成了整个社会剩余价值**。”（马克思）³⁶⁴

总剩余价值可以分为两部分：资本利润和土地租金。剩余价值只能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地租并不能构成商品的价值，因为假设斯密的价值论，它是生产过程结束后地主从资本家那里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地租不创造价值，它吸收价值。只有作为负收入，即未实现的土地收入，才能创造更多的社会剩余价值。帝国主义压制和剥夺被压迫民族的土地收入，

这些农民；另一方面，当它成为垄断者时，它会寻求人为地增加它，就像列宁关于糖和水泥卡特尔的例子一样。始终处于危险之中的是社会生产的总剩余价值，它不能通过垄断价格而增加，但可以进行不同的再分配，这意味着存在不同的利润率：垄断利润和非垄断利润。

平均利润的分析中证明，农业直接产生的剩余价值并不参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这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剩余价值，当用于向农村所有者支付绝对地租时，并不构成不同工业部门之间分享的社会剩余价值。可见，马克思假设农业生产的所有剩余价值都以地租的形式保留在土地所有者手中，因此不允许农业生产的剩余价值分配给其他资本。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马克思发现的原理仍然有效，因为农业生产的剩余价值实际上仍然存在，但并不构成一般利润率。来自殖民/半殖民统治的金融资本成功地占有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中属于土地所有者的部分剩余价值。然而，金融资本占有部分剩余价值并不是为了一般利润率的利益，而是为了帝国主义利润的最大化。

对于垄断收入，即垄断价格所产生的收入，作为帝国主义利润最大化的典型案例，马克思分析如下：

“即使是垄断租金（……）也肯定是其他商品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即与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交换的商品的一小部分。平均利润和地租的总和不能大于它们各自组成部分的大小，并且这种划分早已存在。”（马克思）³⁶⁵

资本利润和地租之和，构成社会生产的社会剩余价值的总和。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在平均利润规律支配下，总地租将是全球平均利润减去总剩余价值的结果。在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的利润需要超过被压迫民族的土地收入才能成为最大利润。因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的土地上实行了压制土地私有制的计划。然而，它压制被压迫民族对自然力量的私有制，不是为了社会进步，而是为了殖民奴役以获取最大利润。当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控制了半殖民地的所有初级生产时，它就人为地提高地租，从而成为垄断的，而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它这样做不是为了榨取自然财富的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其巨大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利益。

这样，金融资本就人为地增加其控制下的初级生产的土地收入，目的不是减少自有资本的利润，而是减少竞争对手的利润；从中减去以前适当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这场金融资本力量的博弈中，帝国主义的食利性和寄生性内容得到强化，帝国主义试图通过赚取垄断地租作为其最大利润的一部分来提高初级产品的价格。当然这也是有极限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中，原材料和食品价格的不成比例上涨意味着通过增加劳动力价值而导致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下降。但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帝国主义时代出现了大资本之间的竞争现象。

半殖民地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压制土地收入的现象在 20 世纪 50 年代得到了广泛的研究。毛主席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不平等价值的交换**”³⁶⁶，在帝国主义与中国农民之间的剥削关系中，不是一个过程本地的，但范围是全球的。当时收集的大量统计数据证明，金融资本对工业化生产强加了垄断的国际价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垄断价格意味着更大的资本利润，而这种利润可以通过被压迫民族的初级产品所产生的土地租金的减少来补偿。这是工业品垄断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逆差的经济原因。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出现了相反的现象，但其本质仍然存在：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这意味着这些文章中的土地租金有更大的实现，特别是在石油领域。最初，它给帝国主义带来了问题，因为它往往会减少金融资本的利润。但帝国主义通过金融资本的交织以及对这些原材料来源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控制逐渐规避了这一点。作为美帝国主义在中东的宪兵，以色列国的加强是控制该地区石油资源政策的一部分，也是美国与沙特君主制交织在一起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只会加强英勇的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

这样，美帝国主义将资本输出到产油国，在石油价格高的时候赚取额外的利润；另一方面，由于石油的垄断价格意味着资本利润的减少，它会损失利润。今天，美国帝国主义是一个主要的石油生产国，但美国领土上的石油开采是通过钻探沥青页岩进行的。这是石油生产最差的地区，因为它的经济生育力最低。为了让扬基生产商盈利，市场价格必须上涨，直到他们除了获得丰厚的利润外还获得绝对收入。这就是为什么美帝国主义对石油高于一切感兴趣，每桶 50 美元起。然而，作为一个工业化经济体，其资本控制着工业生产的大部分部门，他们对价格远远高于这一水平并不感兴趣，不像原子超级大国俄罗斯，其工业化程度较小，最肥沃的石油来源受益于人为的上涨在石油价格方面。洋帝国主义，因为它是最恶劣的地形，

□ 必须从竞争中消除不同权力资本控制的更多肥沃资源。例如，它通过战争和禁运政策，尽可能限制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参与全球原油市场。这种在经济上人为的军事控制对于美帝国主义确保其公司利润最大化至关重要。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帝国主义时代地租的特殊行为。

大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美国和巴西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大豆生产国，其中大部分被中国接管。尽管我国有大量洋基资本出口用于该生产，但巴西大豆也成为洋基大豆的竞争对手。当然，这是完全不成比例的竞争，因为巴西生产的大部分大豆依赖于美国生产的种子、农药和机械；使得这里大豆生产的增长直接有利于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经济。然而，随着巴西大豆产量的大幅增长，市场价格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种情况对中国帝国主义来说是直接有利的，但另一方面也会损害投资美国大豆的金融资本。随着乌克兰战争的进程，原子超级大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领土，农业投入品的生产价格上涨，导致美国和巴西生产的大豆成本价格上涨。然而，在这里，影响有所不同，因为大豆种植面积扩大到亚马逊地区相对于美国大豆的竞争具有相对优势。通过砍伐森林获得新土地，每公顷生产更多大豆所消耗的投入更少。由于这一趋势，亚马逊地区的马托格罗索州迅速超越巴拉那州，成为该国最大的大豆生产国。这种高肥力使得从洋基队购买巴西大豆的数量大幅增加。美帝国主义限制这种竞争的方式之一就是强化其环境政策，监控亚马逊森林和塞拉多的森林砍伐，目的不是保护自然环境和我们的国家财富，而是确保最好的土地得到保护。被逐出市场，从而确保投资于扬基大豆生产的金融资本获得最大利润。

在欧洲也存在人为抬高地租的现象。例如，欧洲农业协议 (AoA) 规定了每个国家必须生产的公顷数以及将生产的产品。被迫退出竞争的土地收到欧盟支付的土地租金，但支付后却什么也不生产。例如，这种限制竞争的人为方式旨在确保法国葡萄酒的市场价格更高。因此，这是帝国主义操纵土地收入以获取最大利润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控制也是针对的。因此，欧盟对乌拉圭牛奶征税，就是为了人为地保留欧洲大陆小型牛奶生产商的土地收入。欧洲社会为食物支付的额外费用确保了这种人工形式

小规模生产的收入。这是欧洲帝国主义控制非洲大陆农民并将其公司化的一种方式，这在 20 世纪 90 年代表现出了重要的战斗和组织能力。列宁研究过这一现象，与劳工贵族的现象类似：

“此外，丹麦帝国主义的一个显着特点是**获取超额利润**，这要归功于其在乳制品和肉类产品市场上的有利垄断地位：通过最便宜的海路，向伦敦提供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尽管如此，丹麦资产阶级和**富有的丹麦农民**（纯种资产阶级，尽管有俄罗斯民粹主义者的传说）**却成了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繁荣”寄生虫**，并分享了他们的生活。特别安全，利润特别丰厚。”（列宁）³⁶⁷

帝国主义国家的农民贵族现象是资本主义这一特定阶段的另一个副产品。研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今天的存在表明，尽管这个阶级部分瘫痪，但随着帝国主义危机的加深，它可以与无产阶级一起构成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力量。因此，工人贵族不可能长久维持，农民贵族也同样如此。

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的研究，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当前现象和前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宝库，对于理解当今世界基本矛盾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什么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构成当代主要矛盾的关键。

3-资本主义进程垄断阶段的主要矛盾

2022 年 MCI 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是由当时组成 CCIMU 的政党和组织提出的《讨论基础》的出版所推动的，主要集中在以特殊的方式讨论世界上的基本矛盾以及哪些是当今主要矛盾的问题。斗争应该集中在这一点上，因为它的正确划定对于建立 MCI 的共同政治路线至关重要，从而实现其统一。在这个问题上，CIMU 本身也存在重要的两条路线斗争，作为这场斗争的结果，LCI 的《政治和原则宣言》规定：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其**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当从非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世界上存在着**三个基本矛盾**：

第一个矛盾：一方面是被压迫民族与超级大国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这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同时也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

第二个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第三个矛盾：帝国主义内部矛盾。”（LCI）³⁶⁸

《中国宪章》中确立的内容，并纠正了 PCP 已经指出的 1984 年 MRI 宣言中的重要错误和偏差。继续围绕这个问题的辩论和斗争对于增进 MCI 对其总政治路线基础的理解非常重要。我们党认为 2022 年的辩论是富有成果的，因为它澄清了许多问题。作为 MCI 的两条路线斗争的一部分，LCI 成立后，我们也公开表达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哲学，第二：经济和政治。在从这两方面分析 MCI 这个关键问题之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思想发展过程中关于这一主题的提法的发展。

国际无产阶级的。因此，我们旨在反驳 UOC（马列毛）在去年的辩论中所造成的术语扭曲。

马克思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本质，巧妙地奠定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经济基础。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完善了这一表述，并以其最完善的形式呈现出来。在《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中，恩格斯的表述变得更加精确，因为恩格斯已经将新兴的元素纳入其中。分析垄断资本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它强调了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转变：

“当你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种形式已经不够了；工业部门的大型国家生产商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信托机构，一个旨在监管生产的财团；确定必须生产的总量，除以他们之间，从而强加一个预先固定的销售价格。（……）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屈服于新生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和有组织的生产。当然，目前，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和利益。”（恩格斯）³⁶⁹

他将根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总结如下：

“生产成为一种社会行为；交换以及随之而来的占有仍然是个人行为：社会产品由个体资本家占有。当今社会运行和大工业的一切矛盾都从这个根本矛盾中清晰地凸显出来：

- A) (……)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
- B) (……) 每个工厂内部的社会组织与总生产的社会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 C) (……) 生产力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过度拥挤，十年一次危机，恶性循环：生产过剩
(……) 矛盾变得尖锐起来，直到变成无稽之谈：生产方式与交换形式相悖。资产阶级表明自己没有能力继续指挥自己的力量 富有成效的社会。（……）
- D) 对生产力的社会特征的部分承认，剥夺了资本家本身。大型生产和运输组织首先由公司拨款，然后由信托机构拨款，最后由国家拨款。”（恩格斯）³⁷⁰

《反杜林论》中的阐述，证明资本主义中私人和国家垄断的构成对应于对生产力社会特征的强制性部分承认，但不是这一矛盾的解决。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总结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发现时，正是从这个出发点出发的：恩格斯，并将问题陈述如下：

当马克思运用这个规律（矛盾律）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时，他发现这个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和财产的私有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孤立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规模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而在阶级关系上，又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³⁷¹

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经济基础是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反过来，由于经济基础不限于生产领域，根本矛盾表现为流通领域的反映，即生产自由竞争，表现为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之间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特征。毛主席改进了恩格斯的表述，提出了同样的基本矛盾，但表现形式不同：政治与斗争。

经济（生产和流通）。两者都在处理同一个问题，以至于恩格斯将无产阶级革命总结如下：

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并通过它将**社会生产资料转化为公共财产**（.....）。从现在开始，社会生产就可以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计划进行**。生产的发展使阶级的生存变得不合时宜。随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被削弱。人类最终成为自己社会存在的主人，成为自然的主人，自己的主人，自由的人。”（恩格斯）³⁷²

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政治方面，是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始的；在经济方面，是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生产计划的社会化开始，现在已经完全社会化了。这一系列措施使社会阶级变得不合时宜，国家逐渐消亡，部分功能丧失，直至彻底消亡，阶级痕迹消失，最终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毛主席改进和简化了恩格斯的表述，以经济和政治的不同表现形式展示了同一社会矛盾。然而，配方的内容是相同的。

就斯大林对最重要矛盾的表述而言，在帝国主义阶段，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斯大林也是从与恩格斯相同的提法出发，对帝国主义时代最重要的矛盾进行了如下分析：

“列宁称帝国主义为‘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因为帝国主义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发挥到了最大限度、达到了极端程度，超过这个限度，革命就开始了。**在这些矛盾中，必须将三个矛盾视为最重要的：**

第一个矛盾是工作与资本之间的矛盾。

（.....）

第二个矛盾是不同金融集团与不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原材料来源和争夺其他人民领土的矛盾。

（.....）

第三个矛盾是少数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国家与殖民地和附属国数亿人民之间的矛盾。

（.....）

总的来说，这就是**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它把旧的‘繁荣’资本主义转变为垂死的资本主义。”

（斯大林）³⁷³

毛主席在引用这段话时指出：

斯大林在其名著《列宁主义的基础》中解释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鲜明矛盾**，并在并展示了它们如何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的现实问题，并为直接攻击资本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毛主席）³⁷⁴

毛主席不能重复斯大林使用的“帝国主义主要矛盾”这一术语，正是因为他在《矛盾论》中首次在帝国主义历史上阐述了这个词。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每一个复杂的过程中，都存在着许多矛盾，在某一阶段总是只有一个**主要矛盾**。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基础》中并没有讨论这个哲学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使用更重要的矛盾和主要矛盾作为同义词。毛主席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质的飞跃，显然，这些术语不能再用作同义词。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斯大林和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矛盾的表述上有一个重要的改进，这个改进与第三个世纪哲学的发展相对应。马克思主义阶段。换句话说，在对待一种现象时，在识别其矛盾时，必须明确哪些是根本矛盾，哪些是该现象转化过程各阶段的主要矛盾。

因此，中共在《中国信》中这样表述帝国主义时代的矛盾：

“确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出发点，是对阶级、世界经济、政治的整体和世界的具体情况，即当代世界的**根本矛盾的具体分析**。
(.....)

当今世界的根本矛盾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坚持认为他们是：

- 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 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 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 帝国主义国家与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 (PCCh) ³⁷⁵

毛主席在谈到中国革命的发展时，也用根本矛盾这个词来描述这个过程：

“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但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毛主席) ³⁷⁶

毛主席相对于恩格斯和斯大林在概念命名方面所做的改进，符合毛主义阶段的哲学发展。因此，继续使用这些术语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它们在使用时并没有错，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发展而变得过时。因此，我们必须统一概念，用基本矛盾代替比较重要的矛盾，并突出其中的主要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浪费大量时间，正如 UOC (马列毛) 领导层所做的那样，正在将哲学辩论简化为语义问题，从而使问题变得混乱——主要是他们自己。为了回应 PCC-FR，他们批评其“放弃最重要矛盾的思想，拥抱根本矛盾的思想”。UOC (马列毛) 甚至发现了这一点 中共文件中的“错误”：

“回到根本矛盾问题，1963 年的‘二十五点宪章’或‘中国宪章’无疑是不准确的，因为它植入了**四个根本矛盾**。” [UOC (马列毛)] ³⁷⁷

UOC (马列主义) 的领导层表示，我们组成 LCI 的人坚守“1963 年的总路线，就好像它是摩西的石板一样”。我们所做的就是把它作为利纳将军的最先进的表述 MCI，在毛主席时期，我们力求将其运用到新的条件中。同时，我们也发现了这份非常重要的文件的局限性，比如没有明确说明世界主要矛盾是什么。同样，我们承认 1984 年 MRI 会议所代表的积极方面，但主要批评其宣言中的思想和政治错误，这是腐烂的阿瓦基安主义论点的表达，因此受到 UOC (马列毛) 的赞扬。在本宣言中，基本矛盾问题表述如下：

“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所有**最重要的矛盾正在迅速变得更加突出：不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同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根本矛盾。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除非革命阻止它，而这种竞争已经对**世界事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核磁共振成像) ³⁷⁸

这个表述中隐含的最大错误是它包含了阿瓦基安主义的教条之一：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是历史的引擎。因此，它被列为第一矛盾，

最后强调了将极大影响世界事件的矛盾。我们党认为有必要纠正的另一个错误是，今天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定性为仅限于帝国主义国家。毕竟，正如斯大林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中所表明的那样，在帝国主义初期，这种矛盾就成为国际性的，在世界所有国家中都存在，无论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占人口的比例如何。

关于 25 点宪章，我们认为其中有两个不准确的地方，这是由于在 GRCP 之前偏向 CCP 的权利造成的。上面已经提到的第一个错误是提出了四个基本矛盾，但没有具体说明哪一个是主要矛盾。毕竟，根据毛主席充分确立的矛盾规律，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存在多种矛盾，其中一个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毛主席经常指出的那样，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基于伟大列宁的阐述，即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被少数先进国家、强国瓜分，一方面，另一方面，绝大多数落后国家也这样做。

第二个不准确之处在于，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描述只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刘少奇的立场相吻合，刘少奇捍卫了社会主义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结束的错误理论。这两个错误被中共在 1969 年九大的预备辩论和决议中纠正了。CIMU 通过的《政治和原则宣言》纠正了所有这些问题，因此构成了马列毛主义最成熟的表述。对于 MCI。

3.1-问题的哲学方面

在澄清了问题的内容并论证了 UOC（马列毛）领导层对圣经的歪曲之后，让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其哲学方面。这场争论有两个重要的哲学问题：1)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2) **一个过程和这个过程的阶段中的主要矛盾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矛盾律的一部分，毛主席已经充分阐明了。因此，其分辨率可以直接在《矛盾论》本身中找到。

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

在阐述矛盾规律时，强调要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它从矛盾的普遍性这个最简单的方面开始阐述，并规定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在于一切事物和现象的过程中都存在着矛盾，并且它的存在自始至终。整个过程结束。由此可见，在一种现象发生之初，即使对立面的斗争不明显，矛盾也已经存在了。进而论证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建立了辩证关系，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

在这个定义之后，矛盾的“**特殊性的特殊分析**”就开始了。这是一个特殊的分析，因为特殊性比普遍性更复杂，更难以用教条思维来理解。它表明**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各自具有特定的特征。在矛盾研究中，有必要考虑物质运动的某种形式与其他性质不同的形式之间的共同点，特别是有必要检查所研究的运动形式的**特殊性**。不同运动形式之间的共同点构成了普遍的**方面**，每种运动形式的独特之处构成了其**特殊的特征或方面**。

它展示了不同的科学如何通过研究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来处理不同的特殊矛盾，并突出社会科学的特殊矛盾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如何表现。然而，它揭示了，在每种形式的物质运动中，都存在不同的过程，这些过程在性质上与其他过程不同，因此，仅仅研究一个大系统的特定矛盾是不够的。

物质运动的形式，有必要研究“ (...) **每个过程的特定矛盾和本质**”³⁷⁹ 以这种形式的运动。发现过程中矛盾的特殊性 事物或现象发展的过程，即这个过程的本质，凸显了需要研究“各个矛盾**各个方面的特殊性**”。

最后，它强调，仅仅研究一个过程的特定矛盾以及该过程的各个矛盾的对立面是不够的；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时，还必须研究事物发展过程**各阶段**的特殊性：

“不仅是事物发展中矛盾运动的总过程，从其相互联系的角度来考虑，各个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且每个阶段也有其特殊性。**功能**，必须同等重视。”³⁸⁰

他最后指出，“ (.....)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和这个过程的本质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前不会消失。但也应该看到，在一个特定的过程中，“**阶段情况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过程的根本矛盾在阶段过程中发生了变化。换言之，在同一过程的发展过程中，由于阶段性的衔接，每个阶段都会有其特定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改变了该过程的本质。

总之，毛主席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时，从物质运动形式出发，深入到一定物质运动形式内存在的不同过程，直至得出物质运动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一个东西。这里，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呈现出来：不同形式的物质运动的共同特征构成了普遍的方面，而不同的特征则构成了每种形式的特殊性。同样的运动形式，每个过程都有其特定的矛盾性，而这些过程的共同点则构成了它们的普遍性。单独来看事物发展的单一过程，它区别于其他过程的特殊矛盾就成为这个过程的普遍性，而各个阶段的具体特征则构成了一个阶段相对于另一个阶段的特殊性。

在哲学地研究了这种从普遍到特殊的辩证运动之后，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发现的社会科学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过程。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作为**物质运动的必然形式的社会**时，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通过应用矛盾律来研究**这种运动形式中的确定过程**，即资本主义社会，强调马克思发现了这个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财产的私人性之间的根本矛盾——正如上一个主题所见。他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发现中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事物的多样性是不可估量的，其发展也是无限的，在一种情况下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会变得特殊，反之亦然。内在矛盾 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国家来说是共同的，因此也具有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只对应于整个阶级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因此相对于整个阶级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具有特殊性。”。（毛主席）³⁸¹

在一种情况下是普遍的，在另一种情况下是特殊的，反之亦然，这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本质，两者是相互依存、对立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又相互转化的。例如，当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一个过程时，社会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构成了这一过程的普遍方面。然而，当阶级社会被视为一个过程和社会时

资本主义作为这一过程的一个阶段，社会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特殊方面。因此，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毛主席所管理的过程与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就阶级社会整体而言，资本主义社会是这一过程的一个阶段；反过来，如果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过程，那么帝国主义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

毛主席在总结矛盾特殊性这一章时，以斯大林同志对资本主义进程帝国主义阶段特殊矛盾的分析为例。因此，它指出：

“特殊性与普遍性是统一的，一切事物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还具有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我们在研究具体事物时，必须努力**发现这两个方面及其相互联系**，特殊性与普遍性及其相互联系，并发现事物的本质。所述事物与其外部的众多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斯大林在解释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明显矛盾，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达到了极端程度（……）**。他还分析了为什么俄罗斯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为什么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交汇点，为什么俄罗斯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毛主席）³⁸²

在这个例子中，汇集了三个层面，其哲学理解是 MCI 对世界矛盾的共同理解坚定前进的关键：普遍的、特殊的和具体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作为一个过程，帝国主义作为这个过程的一个阶段，以及帝国主义特定矛盾在特定国家（这里指的是俄罗斯）的表现。这样，我们就有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双重关系：一是帝国主义面对普遍资本主义进程的特殊矛盾；二是帝国主义在普遍资本主义进程中的特殊矛盾。二是帝国主义时代全世界共同的普遍矛盾及其在一国的特殊表现。由于斯大林对普遍与特殊之间辩证关系的处理，毛主席指出：

“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普遍矛盾**，论证了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同时，这些普遍矛盾在沙俄帝国主义的情况下有何特殊之处**，解释了俄罗斯为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摇篮，以及这种特殊性如何包含着矛盾的普遍性。对斯大林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相互关联性的模型。”（毛主席）³⁸³

阶段的特定矛盾不能抑制过程的特定矛盾；因为如果在一个阶段消除了该过程的特定矛盾，那么它就不再是一个过程的一个阶段，而是一个新的过程。但是，只有当某一阶段与另一阶段之间存在明显的特定矛盾时，同一过程才会发生阶段的变化。如果不是这样，这个过程就不会有任何步骤，只是同样矛盾的机械增长。毛主席展示了如何通过根本矛盾的激化过程，某些矛盾加深，另一些矛盾得到解决，新的矛盾又出现。正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某些特征的改变，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出现，或者是对一个旧阶段的克服。

去年公开辩论中，在对世界主要矛盾界定的批评中，有人提出，突出世界主要矛盾，会导致革命政党和组织立即机械地把世界主要矛盾与世界主要矛盾等同起来。你们国家的主要矛盾。这种说法虽然表现出对矛盾律认识的不足，但有一定的警示意义，因为在过去，特别是在过去的岁月里，20世纪60年代和1970年代，毛主义政党和势力有一种倾向，错误地将其革命的主要矛盾与当时的主要矛盾，即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等同起来。即使在巴西共产党的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错误，当时巴西革命进程中存在的不同毛主义派系将1964年的法西斯军事政变描述为美帝国主义的直接干预，并因此错误地定义：

该国的主要矛盾是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巴西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贫苦农民与大地主的对立，这一事实被低估了，这一矛盾表现为纳萨斯与半封建制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尖锐而大规模的农民斗争。在那段时期，毛主义对农村的干预做出了非常重大的努力和成果，特别是阿拉瓜亚英雄游击队，这是在我国引发人民战争的第一次尝试。然而，对社会主要矛盾和巴西革命的这种认识上的错误，为这一重要举措在军事上失败后从人民战争道路转向修正主义道路打开了缺口。这对党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损害，几乎被彻底清算。

要防止这种错误重演，就要加强共产党人对矛盾规律的认识和处理。需要更深刻地认识其中的辩证关系 区分普遍性和特殊性，要理解在帝国主义阶段，特殊矛盾的配置不同于先前的自由竞争阶段，同时保持了本质的、普遍的、共同的特征。帝国主义的这些特征对于整个资本主义进程来说是特有的，也构成了“帝国主义矛盾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在全球每个国家都以特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MCI 主义的总路线永远不能取代制定每次革命的政治路线的需要，每次革命都有其特殊性和特殊性，以及全球所有革命进程所共有的普遍方面。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我们提到的第二个哲学问题：**一个过程和这个过程的阶段的主要矛盾问题**。毛主席另辟一章研究它 论矛盾，而是强调主要矛盾问题是部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它表明在开发一个复杂事物的过程中 矛盾有很多，其中一个必然是最主要的。这个主要矛盾又是“其存在和发展**决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³⁸⁴。

毛主席通过说明主要矛盾问题，将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过程的复杂性与中国革命进行了比较。因此，他指出，在发达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种矛盾力量**构成了主要矛盾**”³⁸⁵。他指出，在中国等半殖民地国家，“**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幅复杂的景象**”³⁸⁶。这就说明，当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时，不同社会阶级可以暂时联合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那么，帝国主义和该国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矛盾**，而国内各阶级之间的一切矛盾（**其中主要矛盾是封建制度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群众）**暂时被降为次要和从属地位**。”（毛主席）³⁸⁷

如前所述，毛主席在 20 世纪 30 年代认为中国社会存在两个基本矛盾：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封建制度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他现在要论证的是，根据情况，这些矛盾对可以互换位置，一个占据主导地位，另一个占据从属地位，反之亦然。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中国革命阶段、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和人民战争军事战略的变化。注意到具体革命过程中主要矛盾的变化，对于革命的正确进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对中国革命进程进行分析时，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对 MCI 当前争议至关重要的表述：

“但无论发生什么，毫无疑问，**在一个过程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只有一个主要矛盾**，它起着主导作用。”（总统 毛）³⁸⁸

换句话说，就中国而言，只要没有帝国主义的直接侵略，中国革命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制度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决定了党的政治和军事路线。反过来，当帝国主义侵略时，主要矛盾就发生了变化，它开始统治其他一切矛盾，包括群众反对封建制度的矛盾。因此，在民族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区分了支持侵略敌人的地主和参加民族抗战的地主。在抗日民族抗战中，只有亲日地主受到党的攻击。也就是说，中国革命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相对于上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过程是一样的：中国革命；但主要矛盾却从一个阶段转向另一个阶段，从农业矛盾转向民族矛盾，这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最后、特殊阶段。其特点是资本主义进程基本矛盾的激化，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的阶级关系。这种矛盾在整个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它将一直存在到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彻底消失为止，正如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的那样，这一任务将涵盖整个尖锐斗争时期。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然而，在资本主义进程的发展过程中，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它的黎明，作为一种被封建生产方式征服的生产方式出现；其“百花齐放”，处于自由竞争的阶段；及其在帝国主义阶段的痛苦。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特殊的、根本的矛盾。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仍将继续，但作为一种新的、性质不同的现象，无产阶级将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资产阶级将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和毛主席的论述表明，这一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直至共产主义整个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意识到这种连续性对于维持无产阶级专政、粉碎复辟和向光辉共产主义过渡的企图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这个过程之中的这种特殊矛盾一直持续着，并且作为一个根本矛盾继续存在，直到社会阶级彻底消灭，但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矛盾成熟并成为主要矛盾。在一定的过程中，只有出现了新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新阶段新的特点时，才出现新的阶段。正如上述中国革命进程中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和出现新阶段的例子所示。

因此，毛主席所确立的矛盾律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政治原则宣言》中关于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整个帝国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的定义是完全吻合的。辩证地看，这种划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如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情况一样，任何其他基本矛盾根据条件都可能成为世界主要矛盾，这意味着帝国主义阶段也细分为性质不同的阶段。在这里，我们再次面临普遍与特殊之间的辩证法。正如当我们把阶级社会视为一个过程时，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义社会描述为这个过程的一个阶段一样，我们也可以将帝国主义视为一个过程，其不同阶段与其发展阶段相对应。这样，阶段中的每个阶段都以主要矛盾的变化为特征，但公国又倾向于回到标志着该阶段过程的主要矛盾。

因此，一个过程的基本矛盾就是将其与其他性质不同的过程（例如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区别开来的特定矛盾。但是，当考虑同一过程的各个阶段时，基本矛盾将是通过在不同阶段对主要矛盾进行修改而继续支配整个过程的矛盾（例如自由竞争和帝国主义）。每一个复杂的过程都是由无数的矛盾组成的，但根本矛盾是什么？它们是那些塑造过程及其阶段或阶段的本质的矛盾。现阶段基本矛盾中，一个是主要矛盾，其他矛盾是次要矛盾。

我们已经看到，从哲学上看，在帝国主义阶段识别当今世界的根本矛盾是正确的。而且我们还看到，在这些根本矛盾中，根据具体情况，有一个是主要矛盾，有一个是次要矛盾。这并不能消除这一过程中存在的基本的、特殊的矛盾。相反，这就是普遍矛盾的表现方式，因为普遍性只能具体存在于特殊性中。同时，我们试图论证每个特定阶段又如何以特定的矛盾为标志，或者说以该阶段的主要矛盾为标志，这一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同一阶段中各个阶段的克服。最后，我们看到，世界主要矛盾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各国主要矛盾都相同。

理解这种复杂关系的难点在于理解和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毛主席在更高层次上阐述的矛盾规律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哲学不足以正确识别当今世界的根本矛盾是什么、帝国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正如 25 点宪章所强调的，只有基于“对阶级、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具体分析”，这才是可能的。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3.2-问题的经济和政治方面

马克思在其著作《工资、价格和利润》中精彩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整个资本主义进程的基本社会阶级）之间矛盾的直接经济表现。在这部著作中，无产阶级科学思想的创始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各基本阶级之间的直接经济矛盾，表现为工人工资与资产阶级利润的对立。当马克思向第一国际领导层作这个演讲时，他已经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因此，它以坚实的科学依据证明了实现工资增长的斗争如何意味着资本主义利润的立即减少。因此，他驳斥了劳工运动内部的错误理解，即任何工资增长都可能因随后的生活资料价格上涨而无效。马克思证明，工资和利润构成同一单位的两个部分：生产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因此，增加工资意味着利润的减少。与此同时，马克思在同一部著作中论证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如何不能简化为劳动力的更大增值，即“公平工资”。它表明，只要雇佣劳动存在，只要资产阶级拥有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就将是一个被征服的阶级，通过与自己的兄弟争夺工作岗位而受到剥削和挤压，这是资产阶级设法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减少工资并收回利润。

在《资本论》和《反杜林论》中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经济矛盾是社会生产和私人占有的对立。这一矛盾并没有通过工资斗争得到解决，甚至暂时也没有得到解决，它的解决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相对应，正如马克思所证明的那样，这一任务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然而，这种矛盾的直接表现是资本家不断努力将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到最低限度，并常常低于最低限度，以实现对其榨取增加，这为资产阶级提供了奢侈的生活和财富。他们巨大的财富积累。因此，剩余价值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直接经济基础。

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经济基础又是什么？如前所述，当我们谈论最大利润时，它基于三个支柱：1) 获得更高的剩余价值率，达到适合您并且可以剥削各国无产阶级的程度。受压迫的程度比在帝国主义城堡里还要严重；2) 限制非垄断资产阶级的利润，对其施加最低利润；第三) 金融资本压制或侵占被压迫民族初级产品的土地收入。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争取更高工资的斗争是对这种过度剥削的直接、公平和必要的回应。因此，帝国主义感兴趣的是最大限度的暴力、政治控制、最低限度的工会自由、强加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民族资产阶级对利润受到限制的反应是要求旧国家对脆弱的中小型民族工业采取保护措施。由于其生产通常受制于垄断生产，因此实现这些目标的经济和政治条件非常不稳定。

农产品出口大庄园由于其生产获得高收入，因此与帝国主义保持着稳定的联盟，尽管它们始终受到生产过剩危机和单一作物国际价格普遍下跌的威胁，但它们却受到帝国主义的摆布。国际金融寡头。就国民财富而言，被压迫民族努力确保国家对这种生产的控制，并保证最低限度保证资本主义土地收入权利的定价政策。由于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总体上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场争取帝国主义的斗争土地收入被减少为为了利益或“适度补偿”而进行的讨价还价，正如列宁所描述的那样。

解决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能仅仅从经济上解决，而必须从经济上解决。任何被压迫国家的财团措施或进口替代措施都不能解决这种征服倾向、对这些国家无产阶级的永久过度剥削、对民族资产阶级利润的限制以及对民族资产阶级压榨地租的倾向。资源。只有民族解放，即在帝国主义面前最终实现政治独立，才能确保这些要求的实现；这种政治解放只能通过从不间断的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中的长期人民战争来实现，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建立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

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经济基础首先是对全世界生产的总剩余价值的最大可能部分的控制。为此，有必要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垄断对这些无产阶级的永久超级剥削，从而限制被敌对列强的金融资本剥削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数量。此外，对半殖民地的控制可以抑制其初级产品的土地租金，从而降低不变的资本成本，使他们能够实现最大的利润率。通过控制某些原材料来源，通过对这种初级产品建立垄断价格，它能够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减少仅购买这些商品的敌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剩余价值。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帝国主义战争，它首先对敌对列强控制的被压迫民族进行侵略，直至达到列强在其领土上直接对抗的程度。要消除这一矛盾，只有把帝国主义从地球上消灭掉，因为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是金融资本追求最大利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根本矛盾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成为主要矛盾，从而决定其他矛盾的发展。然而，在帝国主义阶段，这些矛盾主要是哪一个矛盾起主导作用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从帝国主义阶段剩余价值实现的特殊形式出发，即利润最大化。因此，帝国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决定帝国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旨在实现、维持和争夺世界上生产的剩余价值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其他矛盾的发展，将是帝国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这个问题，有助于阐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勘探与生产关系；总体上理解社会阶级的作用，以及半封建基础上的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必要关系。

由于压制资本主义地租是金融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帝国主义始终对维持封建或半封建的土地垄断感兴趣。这就是被压迫国家的大地主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主人之间密切的思想政治关系的经济原因。无论是生产粮食还是提取原材料，半殖民地地区大量财产的存在对于抑制半殖民地地区资本主义土地收入至关重要。毕竟，金融资本为了攫取一个国家的自然财富而向一小部分大型寄生土地所有者支付收入，比为整个国家支付资本主义土地租金要便宜得多。当旧国家是这些自然资源的所有者时，它通常对金融资本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感到满意，而这些特许权使用费总是低于资本主义地租的比率。金融资本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无论是向大地主还是旧官僚国家，都是半殖民地的地租，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地租。区别

两者的量差是金融资本保留的剩余价值，即构成其最大利润的剩余价值。

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的剥削关系在产生最大利润方面所起的作用，与官僚资本主义和半封建制度对这些国家的人民和贫苦大众的剥削是相似的。再生产小农经济需要官僚资本；因为农民为国内市场生产以换取少量收入，这与资本主义地租根本不相符。因此，尽管农民生产的生产率比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低得多，但它往往提供更便宜的食品。这是可能的，不是因为小生产比大生产更有效率，而是因为对农民的镇压及其永久破坏的生产（因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确保了这些较低的价格。这样，官僚资本间接地剥削了农民，因为他的份额中孤立的农民无法面对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并且总是被迫出售其产品以换取所支付的价格。它获得的收入仅够恢复其受损的经济。反过来，这种被毁坏的生产只能在这种条件下维持，同时又被大片土地包围。如果不是这样，农民就会寻求更好的条件来发展和致富。这样，正是大庄园制度确保了农民的压迫、他们的悲惨境况和过度剥削，他们在没有赚取收入或利润的情况下向国内市场提供粮食，就像马克思分析的爱尔兰农民的情况一样。因此，这些农民获得的收入不是资本主义地租，而是半封建地租。这是第一个经济原因 农民生产虽然不断遭到破坏，但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从未完全消灭。

然而，这种现象还有另一个经济原因。被大地主破坏的小农经济的再生产充当了劳动力储备，随时可以从事季节性农业工作；但除此之外，半殖民地国家的农村总是时不时地向城市输送大批工人，被迫在工业和服务部门遭受最恶劣的剥削条件。因此，小农经济的再生产在不断产生相对过剩的人口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人口相对过剩又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另一个因素所必需的：对工人阶级的永久过度剥削。在巴西，建筑业中最繁重的工作通常是由最近被赶出农村的农民承担的。如果这种小农经济被清算，那么这种被过度剥削的工人的宝贵来源（通常构成被压迫国家的农民地区）就会耗尽。

由于其半封建的状况，大庄园是帝国主义的社会代理人，它确保抑制资本主义地租，在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这些地租属于农民，在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这些地租属于国家。自然财富被帝国主义掠夺。大庄园对于官僚资本主义至关重要，因为它确保了农产品和矿产产品出口的收入，另一方面，它确保了农民为国内市场廉价生产粮食以及生产过剩的移民人口。从农村到城市，从而确保了半殖民地工业中工人阶级的过度剥削。这样，大庄园既为官僚资本的垄断利润做出了贡献，也为金融资本的最大利润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官僚资本和金融资本保证了大庄园的所有军事、政治和法律安全，以应对针对农民和原住民的最残暴的犯罪。他们确保了人民公敌这一类寄生虫的收入。大庄园与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这种依赖关系；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是确保帝国主义利润最大化的剥削关系体系的基础。

反过来，这个反动阶级的联盟，这三座大山（半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通过以这种方式过度剥削无产阶级、农民和国家财富，压垮了被压迫国家的农村和城市群众。它的最终产物是无数的移民，他们年复一年地到达帝国主义国家，在各种工作中受到超级剥削。如果没有大量土耳其、库尔德波兰、阿拉伯、非洲移民等，欧洲工业就无法生存。如果没有印度、孟加拉国、塞内加尔、越南、厄瓜多尔等国家的群众，服务业就无法运转。同样，如果没有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等国的群众，洋基帝国主义就无法生存，因为他们在该国生产一切。氧

官僚资本主义以大庄园为基础，负责帝国主义生产这一重要力量的生产和出口。无产阶级受到移民政策和警察迫害的骚扰，发现自己被迫接受帝国主义列强大都市中心的超级剥削条件。正如贡萨罗主席正确分析的那样，这是第一世界的第三次全球化。

垄断价格，是理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落后工业和破败农民经济不断再生产原因的另一个重要经济因素。尽管其生产率水平远低于大工业，但一旦某一部门金融资本的垄断价格确立，非垄断经济的生存机会就出现了。由于生产成本高得多，当垄断价格出现时，中小型生产就变得可行，因为这使他们能够赚取最低限度的利润。在巴西，豆类是广大农民和工人的主要食品之一；传统上，它是农民生产的商品，因此以非常低的市场价格出售，这对工业资产阶级有利，因为这意味着劳动力价值的减少。由于卢拉和迪尔玛执政期间（2003-2016年）劳工党政府推行的大庄园政策，小农经济产量大幅下降。市场上农豆的缺乏导致该商品的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并由大地主生产主导。与农民不同，大地主所有者能够强加其市场价格，使该商品的价格上涨200%。一方面，这影响了广大人民生活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它允许农民的豆子重返市场，随着新的价格，市场再次对农民来说变得可行，尽管生产力低下。因此，垄断价格解释了城市国内工业和农村中小型生产的生存。

最大化可以通过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与大庄园、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大庄园与农民之间的复杂关系来解释。因此，正是在帝国主义阶段的这些特殊条件下，社会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起来，并表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上，—这种矛盾不能仅用其本身来解释，只能用它来解释。首先从工资与剩余价值之间的直接关系出发。甚至于，帝国主义的出现决定了帝国主义国家工人贵族现象的巩固。这样，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压迫就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发展条件的变化。

反过来，正是帝国主义的统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确保了被压迫国家半封建土地垄断的存在。这种土地垄断通过为低于成本价生产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提供基本商品，确保了生产基本食品的破败农民经济的再生产，并决定了无产阶级总体的低工资。从而确保了庞大的工业后备军的再生产，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这支工业后备军成为剩余人口不断向大城市中心输出的一个来源。半封建的土地垄断将大批穷人从农村驱逐到城市，反过来又确保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的永久过度剥削。超级剥削是帝国主义国家部分工人阶级的贿赂来源。半封建的土地垄断、被压迫国家大城市的过度拥挤以及对无产阶级的永久过度剥削，迫使大量无产阶级队伍向帝国主义中心输出。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量移民给大都市工人的工资带来了下行压力，导致了工人贵族的恶化。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越来越需要在自己的领土上增加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因为它不断地与马克思出色地发现的利润率下降的规律作斗争。

毛主席确立主要矛盾是“它的存在和发展**决定或者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³⁸⁹。经济分析，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社会表明，资本主义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被压迫民族和决定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因为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正是由大庄园所维持的民族殖民/半殖民地压迫，造成了被压迫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过度剥削。反过来，这是殖民/半殖民地的民族压迫及其

这些国家对土地租金的压制密不可分，以牺牲竞争对手的利润为代价确保利润最大化。对这些原材料来源的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压迫，也决定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可以概括为列宁在少数强国瓜分世界的斗争中所确立的。

因此，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是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但这并不否定资本主义进程的根本矛盾的存在及其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阶级关系中的表现。因为，即使在帝国主义阶段，这仍然是这一过程的根本矛盾，毕竟在经济上，列强所占有的所有最大利润从根本上都是由从无产阶级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决定的。此外，通过抑制被压迫国家的农产品和采掘业的地租也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直接导致利润的增加（通过降低不变资本成本）并间接导致剩余价值的增加（当商品进入无产阶级的消费）。阶段性主要矛盾并不消除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它是毛主席在矛盾规律中巧妙确立的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

IV- 团结在毛主义之下!

“庆祝第一次国际会议和新国际组织的成立，具有历史意义和伟大超越性，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成就，是对帝国主义和世界反动派反革命总攻势的有力打击，反对修正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朝着统一和克服 MCI 的分散迈出了一大步，为重建 MCI 的有组织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共产国际在毛主义的指挥和指导下，这是一个新阶段，其标志是新的人民战争的发展，这些战争将增加已经正在进行的战争。”（政治宣言和原则，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³⁹⁰

CIMU 的筹备和实现是在“团结在毛主义下！”的口号指导下的。UOC（马列毛）在《讨论基础》出版后才参与了国际层面的两条路线斗争，因为它之前拒绝这样做，并参加了 2020 年 1 月由 PCm（意大利）。在介入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之后，他们不愿意在会议上继续这场斗争。2022 年，两条路线的斗争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哲学问题展开。今年，随着《UOC（马列毛主义）》杂志批评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出版，以及由该组织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两期杂志《Luta de Duas Linhas》的出版，这些组织之间的政治分歧以及那些参加 CIMU 的人。通过这份文件，我们迄今为止试图分析最重要的政治分歧，但有必要揭示这些分歧的真正意识形态背景。

UOC（马列主义）的领导层多年来一直认为毛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第三个和更高的阶段。然而，当我们分析这一阶段意识形态的应用时，当国际无产阶级在自己国家确定世界革命的政治路线时，人们意识到这一宣言变得多么空洞。UOC(MLM): 1) 否认矛盾律是事物的唯一基本规律；2) 否认哥伦比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效性；第三) 否认民族民主阶段作为被压迫国家不间断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的必要性；4) 否认农民在半殖民地国家革命中的战略重要性；5) 否认《中国宪章》对当今世界根本矛盾界定的正确性（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主张）；6) 在评价 20 世纪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时，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考茨基在俄罗斯和中国都赢得了胜利”³⁹¹。我们真诚地询问 UOC（马列毛）管理层：您是否利用毛主义的贡献和发展来制定贵国革命的政治路线？

UOC（马列主义）在其政治传教活动中捍卫毛主义，认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以及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重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和围攻中国的战略。在这种体验中，城市与乡村相伴。它还捍卫了 GRCP 的重要性以及毛主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但是，为了解决世界革命和当前的问题，

哥伦比亚革命并不是毛主义普遍贡献和发展的一部分。因此，它把毛主席的贡献视为一种在过去很重要、在未来也可能是必要的意识形态。目前，它采用了与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同的表述，比如将半殖民地国家定性为“被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捍卫帝国主义进步趋势的存在；主张民族解放的任务可以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解决；捍卫农民土地的立即集体化；最后指出，印度、菲律宾、巴西、孟加拉国以及哥伦比亚的革命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即通过帝国主义的进步倾向，这些国家已经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说，这样的结论是针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结果。这意味着上述国家的毛主义政党捍卫并实施了毛主义的基本理论只不过是毛主义的中国革命经验的机械传达者。他们甚至认为他们正在对哥伦比亚和其他受压迫国家的现实进行创新分析，而事实上他们正在复制旧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特别是冈德·弗兰克、鲁伊·毛罗·马里尼等人的伪造 TMD。

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空地，没有毛主义就滋生修正主义。让我们看看 UOC（马列毛）真正的意识形态基础是什么。

1-设想毛主义就是在无情打击所有修正主义：旧的、现代的赫鲁晓夫主义者-邓主义者-霍查主义者和 21 世纪的修正主义模式

帝国主义进步趋势”的结果是所谓的“被压迫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其中通过金融资本的工作和恩典，“以前的生产方式”被“一扫而光”。——资本家”。国际杂志《Luta de Duas Linhas》中并没有说明这个提法的出处，但是在查找《Luta de Duas Linhas》发表的资料时 西班牙语，很容易找到。他在那里公开表示，他是从“鲍勃·阿瓦基安同志”那里得到的，因此认为美国和智利的 PCR 提出的 1980 年 MRI 宣言的摘录非常积极：

“帝国主义有一种不可否认的趋势，那就是在它所统治的国家中引入资本主义关系的重要元素。在一些附属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如此重要的程度，以至于将它们定性为半封建国家不再是正确的。最好将它们归类为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尽管仍然可以找到半封建生产的重要痕迹，并且这些痕迹仍然反映在上层建筑层面。”（PCR-美国和 PCR-智利）³⁹²

阿瓦基安主义这一提法的巨大谬误在于，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再像自由竞争阶段那样发生。正如列宁所确立的，帝国主义是全面的反动。帝国主义为了追求最大利润，通过支持、保存和再生生产社会关系，在半殖民地国家催生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和生产以及最反动的政治政权。也就是说，通过资本输出，它产生了一种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不会像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革命资产阶级那样破坏前资本主义关系，恰恰相反，因为它具有垄断资本、寄生资本和资本主义资本的反动特征。在分解和折磨资本的过程中，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依靠这些国家腐烂的基础，其金融资本与封建资本和其他前资本主义形式融合，推动官僚型资本主义。这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阐述，也是毛主席进一步阐述的。将半殖民地国家归类为“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只有“上层建筑有半封建痕迹”

□ 否认列宁主义和毛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表述就是否认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基本理论。最后，它是为帝国主义道歉，好像在其统治下社会关系可能取得某种进步。

UOC（马列主义）利用这种阿瓦基安主义的伪造来强调其托洛茨基主义特征，尽管 1980 年的宣言谈到了附属国家，而不是附属资本主义，这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和 TMD 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类别。他们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被压迫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修正主义论点，其中革命将立即是社会主义的。

关于农民问题，UOC（马列毛组织）的领导层将阿瓦基安主义的偏差应用于哥伦比亚。1984年的《MRI宣言》中出现了阿瓦基安主义在帝国主义国家走私“实质上消灭农民”的现象；UOC（马列毛）反过来又捍卫了实际上消除所谓“被压迫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他指出：“在哥伦比亚，农民在农业无产者和老板之间的分解和分化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将阿瓦基安主义应用于分析他的国家，得出的结论是，农村不再有真正的农民，只有农业工人和农业资产阶级。农民就像半封建社会一样，只是一个残余。

因此，UOC（马列主义）所聚合的第一个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基础是特罗斯科-阿瓦基主义。他的论点是所谓的帝国主义的进步趋势、这些被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这些国家中农民的彻底分化（或实际上的消灭）。它们都是半殖民地的，都是从错误的托洛茨基主义-阿瓦基安主义的表述开始的。UOC(MLM)的管理层在其西班牙语出版物中明确认识到了这些表述的重要性：

“自列宁时代以来，[被压迫国家的革命]一直是共产党人面临的问题；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精心对待、解决和发展；自从MRI的前身1980年提交文件、1984年宣言以及《Um Mundo a Gain》杂志的多篇文章以来，MRI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PCR(EEUU)同志特别是鲍勃·阿瓦基安(Bob阿瓦基安)同志强调了这一点。”[UOC（马列毛）] 393

显然，阿瓦基安并没有继续发展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关于被压迫国家革命的重要问题。阿瓦基安从修正主义、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出发，歪曲和混淆了这个问题。它低估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重要性，指责斯大林同志和毛主席犯了民族主义式的错误。UOC（马列毛）从这些反马克思主义观念出发，强调了阿瓦基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

现在让我们看看联合组织（马列毛主义）的威胁与托洛茨基主义表述的直接趋同。UOC（马列主义）在为所谓的帝国主义进步倾向辩护时，只是重复了马屁精托洛茨基和共产主义叛徒的分析，他们认为日本侵华是积极的，因为这会导致无产阶级的壮大。国家，从而为其不断革命创造了条件：

“如果日本能够将所取得的地位维持大约十年，这首先意味着中国北方的密集工业化，以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利益。新的铁路、矿山、工厂、采矿和冶金公司以及棉花种植园迅速出现。中华民族的两极分化将得到狂热的推动。新的数十万、数百万中国无产阶级将在最短的时间内动员起来。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将越来越依赖日本资本。然而，它将比过去更没有能力将自己置于民族战争和民族革命的最前线。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中国无产阶级将会出现，在数量上更加强大，在社会上更加强大，在政治上更加成熟，注定将领导中国乡村。”（托洛茨基） 394

托洛茨基这个顽固的反列宁主义者认为殖民奴役是进步的。UOC（毛主义）的领导层也遵循同样的步骤，认为帝国主义有能力扫除半封建制度。伟大的列宁强调帝国主义最大限度地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却从未声称要解决这些矛盾。

关于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战争的必要民族革命阶段，“毛主义”UOC（毛主义）在其纲领中指出：

“在这个时代，在被压迫资本主义国家，反帝革命运动的内容不再是解放民主的，而是社会主义的”。[UOC（马列毛）] 395

还是：

“半殖民地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UOC（马列毛）] ³⁹⁶

不断革命》中所捍卫的立场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比较一下：

“对于资产阶级发展较晚的国家，特别是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来说，**不断革命论意味着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彻底地解决它们的民主和民族解放任务。**他承担了被压迫民族的领导权，尤其是其农民群众的领导权。”（托洛茨基） ³⁹⁷

让我们看看中国革命的领袖毛主席在《论新民主主义》中是如何评价这些论点的：

“我们支持革命不断发展的理论，**但不支持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我们愿意，取得胜利社会主义，经历民主共和国的所有必要阶段。我们反对追随，但我们同样反对冒险主义和极端革命主义。”（毛主席） ³⁹⁸

“毛主义”UOC（马列主义）与叛徒托洛茨基一样，设想通过无产阶级的直接专政或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部分来解决被压迫国家的民族问题。这是对列宁主义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论断的彻底否定，更是对毛主义关于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在被压迫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的彻底否定。

在一篇题为“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吗？”的文章中，UOC（马列毛主义）的领导层在对这个问题作出否定回应时指出，捍卫哥伦比亚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托洛茨基主义，因为根据他们的说法，“**托洛茨基主义并不在于否认革命的各个阶段。革命必须去**” ³⁹⁹。托洛茨基主义是由无数的谎言和歪曲组成的，其中，是的，否认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革命作用，这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问题，这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证明的，否认革命阶段的必要性，并否认被压迫国家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必要性。让我们观察一下：

“共产国际的追随者首先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公式推崇为整个东方。”（托洛茨基） ⁴⁰⁰

和：

民主革命在其发展过程中，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托洛茨基） ⁴⁰¹

正如托洛茨基指责 IC 将东方革命的公式奉为圣典一样，UOC（毛主义）也指责 LCI 的教条主义，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所有半殖民地国家都有效。正如托洛茨基坚持否认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进程需要阶段性一样；UOC（马列毛）在其计划中规定：

“无论有什么特殊性，在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社会的资本主义特征需要反帝国主义运动，**而不是在一个单独的阶段**”。[UOC（马列毛）] ⁴⁰²

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不仅限于否认革命的阶段性，而且它还构成了对帝国主义的辩解，对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有效性的否认，对农民问题的否认。所有这些要素都是阿瓦基安所共有的，更明确地说，是 UOC(mlm) 所共有的。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他和反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在农民问题上的表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关于农民问题，UOC（马列毛）主张需要：

“（……）教导农民，为了拯救自己，他们必须与无产阶级结盟，反对私有财产，将土地所有权转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剥削。”[UOC（马列毛）] 403

托洛茨基反过来捍卫同样古老的反农民计划：

“如果无产阶级代表进入政府，不是作为无能为力的人质，而是作为领导力量，那么他们将消除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界限，也就是说，**他们将把集体主义纳入议程。**”（托洛茨基）
404

UOC（马列主义）立场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同一性非常强，不能用托洛茨基主义并不在于否认革命阶段的含糊声明来“否认”。当然，这是一个危害性更大的事情，但这种对这一点的否定，才是他外表激进、内容右翼反无产阶级的腐烂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理论的最根本。UOC（马列主义）放弃了毛主义对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贡献和发展，从阿瓦基安主义走私开始，最终陷入托洛茨基主义沼泽。在这种大肆宣扬的反教条主义愿景的背后，他们得出了反科学的表述，例如所谓的帝国主义进步倾向，并最终为半殖民地国家欺骗性的托洛茨基主义“不断革命”辩护。

因此，UOC（马列主义）错误政治主张的第二个意识形态基础是托洛茨基主义。

对于 UOC（马列主义）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过去是正确的，但在现在是错误的；而“不断革命”在过去是错误的，但在现在却是正确的。

UOC（马列毛主义）确实应该铲除这种晚期托洛茨基主义并真正拥抱毛主义。但是，我们认为，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他的分析的托洛茨基主义根源非常深厚。他与这种机会主义的趋同点包括他对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治分析，公开地脱离阿瓦基安主义而流入托洛茨基主义，以及他对被压迫国家的社会形态的经济分析，而他秘密地依靠所谓“马克思主义依附论”。TMD 是由与拉加经委会有联系的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学者于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制定的。这一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是巴西人鲁伊·毛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他多年来在智利和墨西哥担任教授。

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是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试图在经济上证实托洛茨基所谓的“不断革命”理论。依靠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立场和他的谬误的、臭名昭著的“秘密报告”，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英雄光荣的经历和斯大林同志的贡献投下谎言和反革命怨恨的泥潭，托洛茨基主义试图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在国际层面上复兴。1959 年古巴革命之后，主要是在卡斯特罗于 1962 年通过法令宣布革命已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寻求更新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捍卫修正主义的论点，即对于被压迫国家来说，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将解决民主任务，而不需要新的民主革命。这与被压迫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完全相反，在这种经验中，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没收大量财产和大量本地和外国资本来推进社会主义任务，正如毛主席在《关于新民主主义》中所充分证明的那样。他的《民主》等作品。

为了在经济上证实这种意识形态政治立场，马里尼和他的同伙提出了一种错误的依附理论，旨在抵消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马里尼歪曲马克思主义，力图把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完全归结为反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把帝国主义的压迫仅仅归结为对无产阶级的过度剥削，绕过了镇压和占有的机制。被压迫国家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土地收入。此外，马里尼否认中间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些国家革命进程中的存在和政治重要性。正如本文中已经看到的，UOC（马列毛）的立场与托洛茨基主义依赖理论的这些表述完全一致。现在让我们继续（尽管很简短）直接比较 UOC（马列毛）和马里尼的经济表述。

UOC（马列毛）和托洛茨基主义者马里尼都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全球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不同的经济体将被“束缚”或“整合”成相同且独特的经济体。过程。UOC（马列毛）理论家和 TMD 理论家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链条的结果是半殖民地国家的本土资产阶级成为帝国主义剥削政权的“伙伴”，甚至获得与金融资本同等的利润率。帝国主义国家与附属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巨大的不平等。即前者生产过程机械化程度高、最尖端技术的应用，后者工业化程度低；从帝国主义资本的优越有机构成和地方垄断资本的劣等有机构成出发，两者都得出结论：将存在一种机制来“补偿”这种生产力的巨大差异，这将对被压迫国家劳动力的过度剥削。这种超级剥削必定是半殖民地资产阶级独有的，因为如果发达国家也存在这种剥削，就不可能有类似的补偿机制。让我们看看马里尼如何提出这个问题：

“为了避免误解，让我们记住，附属国家利润率的下降与其有机构成的增加相对应，除了特殊情况之外，还可以通过过度剥削劳动力的程序得到补偿。在经济方面有利于农业和矿业公司，可变资本的高盈利能力。”（马里尼）⁴⁰⁵

同样，对于 UOC（马列毛）的领导层来说，允许半殖民地资产阶级获得与金融资本相同的利润率的假定补偿如下：

“构成不变资本的要素的廉价化，即现有资本的贬值或在不更新机器和设备的情况下维持生产，尤其表现在帝国主义者针对被压迫国家的‘进口替代’中。直到 70 年代，‘过时的’机器从帝国主义国家转移到被压迫国家，在那里，超级剥削补偿了当地资产阶级的资本平均利润率。” [UOC（马列毛）]⁴⁰⁶

马里尼对劳动力的过度剥削（据称属于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作为一种补偿机制的排他性提出如下：

“（……）这个资产阶级的产业发展依赖于这些垄断企业专有的技术。那么，他剩下的选择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为他们提供一个社会，并争论强制遏制工人阶级工资水平有助于创造利润的非凡可能性。”（马里尼）⁴⁰⁷

UOC（马列毛）的管理层更明确地说：

“将工资降低到其价值以下，即低于劳动力的价值，在受压迫国家有自己的名字：过度剥削。” [UOC（马列毛）]⁴⁰⁸

不！马克思将工资降低到其价值以下，这被称为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国家对无产阶级的过度剥削。这种机制的起源并非起源于被压迫国家，相反，它与工业本身一起出现在当时最资本主义的国家：英国。

马里尼和 UOC（马列毛）都扭曲了对工作的超级剥削的内容，似乎仅此一项就可以弥补帝国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存在的生产力的残酷差异。他们歪曲了马克思所发现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断言劳动力的过度剥削相对于机械化具有所谓的优势，因为根据他们的说法，过度剥削将使所生产的大量剩余价值成为可能。增加而没有降低利润率的“危险”。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论证的那样，当两个竞争的资本家在不同的机器条件下生产时，在最佳条件下生产的资本家将获得非凡的剩余价值，因为它生产商品的工作时间少于社会必要的时间。对劳动力的过度剥削可以减少这种差异，但永远无法弥补它，马克思对此问题做了如下例证：

“[俄罗斯] 奥尔登堡一家棉纺厂的英国厂长宣称，那里的工作时间从早上 5.5 点一直持续到晚上 8 点，包括周六，而此时，在英国主管的带领下，工人们生产的产量没有那么多。英国工人需要 10 个小时，而德国工人则要少得多。工资比英国低得多，在许多情况下下降到 50%，但与机械相关的工人数量要多得多，在几个部门中比例为 5 比 3。雷德格雷夫提供了有关俄罗斯棉纺织工厂的详细而准确的信息。一位最近受雇于该公司的英国经理向他提供了这些数据。在这片充满各种恶名的俄罗斯土地上，英国工厂第一阶段的古老恐怖正在盛行。俄罗斯工厂的厂长自然是英国人，因为俄罗斯本土资本家不适合这种类型的活动。尽管过度、不间断、日夜工作，尽管工资微薄，俄罗斯产品却只能在国内市场投放，因为它们的生产被禁止。从国外进口。”（马克思）⁴⁰⁹

虽然俄罗斯每天的工作日是下午 2 点 30 分，包括周六在内，每周总共工作 **87 小时**；而在英国，每天的旅行时间为 10 小时，每周的旅行时间为 **60 小时**。尽管俄罗斯的工资比英国低 50%；尽管可能的强度很高，因为俄罗斯工厂是由英国董事指挥的；尽管如此，俄罗斯商品只能与英国商品竞争，因为它们的进口被禁止。马克思的这个实例彻底推翻了马里尼和 UOC（毛主义）的理论，即对劳动力的超剥削可以弥补生产力的差异，从而为“依附资产阶级”提供超乎寻常的剩余价值。

马里尼和 UOC（马列毛）完全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试图将劳动力的超级剥削呈现为一种神奇的机制，使补偿生产力差异和增加剩余价值的质量成为可能。半殖民地国家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竞争的利润率：

“已经确定的三种机制——工作集约化、延长工作日以及征用工人取代其劳动力所需的部分工作——构建了一种**完全基于对工人的更大剥削**而不是发展的生产模式其生产能力。（……）**这使得资本的价值构成减少**，再加上劳动剥削程度的加剧，**导致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同时上升**。”（马里尼）⁴¹⁰

还有他的 UOC(mlm) 弟子：

“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严重失衡导致工资仍然低于平均水平，从而导致**剩余价值量和利润率都增加**。”[UOC（马列毛）]⁴¹¹

“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对无产阶级的超级剥削的“秘密”而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将使当地资产阶级获得同样的利润率、同样的资本积累率，因此，这些资产阶级将成为资本输出国，形成马里尼所说的亚帝国主义：

“所提出的是**巴西**在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扩张，这**实际上相当于亚帝国主义或北美帝国主义**的间接延伸（不是让我们忘记这种类型的帝国主义的中心将是与北美经济一体化的巴西经济）”。（马里尼）⁴¹²

被压迫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

“（……）[他实现了]大量的资本积累，使得那里的资本也变得过剩”。其真正的垄断性质和帝国主义野心是无法“回避”的。[UOC（马列毛）]⁴¹³

通过托洛茨基主义的依赖理论，UOC（毛主义）得出的结论是，被压迫国家无产阶级的超额剥削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将使半殖民地资产阶级获得与金融资本相等的利润率，成为过度资本输出国并因此成为次帝国主义的关键。非常

马里尼和 UOC（马列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压迫概括为对劳动力的过度剥削，从而忽略了金融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其他因素：抑制地租和限制非垄断资产阶级的利润。他们把复杂的现实简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单一矛盾，否认特别是农民和一般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民族压迫：

“帝国主义突破了国界，在世界舞台上面临阶级对抗。” [UOC（马列毛）] 414

和：

“今天，社会工作中最沉重、最黑暗的枷锁是金融资本，它是帝国主义资本之王，它已经蔓延到世界的尽头，毁灭了所有人民，并带走了他们生存、生存和发展的原因：对经济的过度剥削。无产阶级。” [UOC（马列毛）] 415

金融资本存在的原因不仅在于对无产阶级的过度剥削，而且还在于压制被压迫民族的土地收入，掠夺其自然财富。回避这一点，就是否认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就是把世界上的根本矛盾概括为一个：阶级对阶级，这很符合托洛茨基主义的风格。或者正如马里尼所说：“依赖的基础是对工作的过度剥削”。这是一个基础，但不是唯一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并不是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所独有的；它也不是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所独有的。相反，正如列宁所表明的那样，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受到的永久的超额剥削，才是金融资本获得最大利润的源泉。这就防止了半殖民地的走狗资产阶级利用这一条件按照同样的比例。因此，这种过度开发不允许对马里尼理论的、UOC（马列毛组织）重复的利润率进行**补偿**。鉴于其帝国主义性质和条件，这是金融资本特权的一部分。

UOC(mlm) 和马里尼的分析之间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以至于不可能相信它们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托洛茨基主义的依附论是 UOC（马列毛）错误政治观念的第三个思想基础。

除了这些趋同之外，UOC（马列毛）甚至更接近其他修正主义变体。UOC（毛主义）在批评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路线时，一再指责我们偏离“第三世界”。这就是说，我们是邓小平烂“三个世界”论的支持者。我们党捍卫并捍卫在《讨论基础》中出现但在《政治宣言和原则》中没有出现的立场，即毛主席提出的“勾勒三个世界”是正确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与汉奸邓小平的伪造相反。

众所周知，20 世纪 50、60 年代，毛主席提出了这个论断，关注帝国主义领域内部、超级大国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毛主席的论断指出了三个世界：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第一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第二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国家（第三世界）。邓小平歪曲了这一表述，并于 1974 年和 1977 年提出了他的腐烂的“三个世界理论”，这是一条旨在破坏世界革命和打击毛主义士气的国际修正主义路线。1974 年 4 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发表的决定性演讲中，首次公开提出了他的烂理论：

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当今世界由三个部分、三个世界组成，这三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矛盾。美国和苏联都是第一世界的一部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组成了第二世界。**（.....）与此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一方或另一方的控制、威胁或恐吓。超级大国。.....在不同程度上，所有这些[第二世界]国家都渴望摆脱奴役或控制，并捍卫其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滕小平） 416

换句话说，对于叛徒滕来说，有帝国主义国家（第一世界）、发达但被压迫国家（第二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UOC（马列毛）分析世界分为帝国主义国家、被压迫资本主义国家和半封建国家；尽管他们大声疾呼反对第三世界主义，但最终却与滕氏腐朽的“三个世界”理论相一致。像这样，他们得出结论，存在一个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第二世界”，尽管它们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或者正如他们在对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批评中所阐述的那样：

“有可能有些国家既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半封建殖民地国家，而是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UOC（马列毛）] 417

UOC（马列主义）提出的这种可能性，无论来自一个将自己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的政治组织多么不寻常，都不是什么新鲜事，腐朽的修正主义者邓小平早在 1974 年就已经提出过这种可能性。因此，这种与天狗主义的融合构成了 UOC（马列主义）错误政治立场的第四个意识形态基础。

最后，关于本文件第一部分中讨论的哲学问题，有必要考虑 UOC（马列毛）对否定之否定法则的强调。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条法律据称被斯大林和毛主席废除，这将是苏联和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之一。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强调的，UOC（马列主义）在其关于否定之否定的表述中，根本没有区分马克思对蒲鲁东和普拉昌达的调和立场的运用与杜林的错误解释之间的区别。和阿瓦基安。我们表明，对于马克思来说，否定之否定是如何作为对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的完全压制而发生的，而不是作为社会财产和私有财产的结合而发生的。也就是说，不断革命直至共产主义的过程，旨在结束社会生产与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相互依存，旨在将这种对立的统一体一分为二，使新的方面发展成为新的矛盾，使历史的历史发展成为新的矛盾。旧的一面消失。UOC（马列主义）通过不区分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和修正主义者的否定之否定，更接近叛逆者普拉昌达所支持的哲学观念，普拉昌达将否定之否定视为合二而一的过程。

通过放弃毛主义，通过将国际无产阶级的这把强大的剑简化为过去或未来的教义，而在目前没有有效性，UOC（马列毛主义）最终会遇到坏伙伴：阿瓦基安、托洛茨基、马里尼、滕和普拉昌达。名义上和形式上运用毛主义，违反毛主义的基本理论，而不揭示其全部革命内容，因此不可能反对修正主义。UOC（马列毛主义）没有将毛主义的革命内容应用于当前对世界和本国具体矛盾的具体分析，最终在其表述的基础上隐藏了早已在 MCI 运动中失败的旧修正主义论点。在这些错误观念中，最严重、最根深蒂固的是阿瓦基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以及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依赖理论的经济基础，该理论恰恰旨在证实托洛茨基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假定有效性。”在拉丁美洲和整个半殖民地国家。

2-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与民主革命

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与民主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国际无产阶级和 MCI 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相反，它自马克思主义科学意识形态建立以来就存在，并且在帝国主义时代以更新和发展的方式仍然有效。在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这个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主题。就像今天毛主义领域的情况一样。

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前奏”⁴¹⁸。在革命失败的天平中 马克思在 1848 年的民主思想中分析了德国革命过程中小资产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立场的区别，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小资产阶级想要尽快结束革命，

尽快（.....）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包括使革命永久化，直到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第419章

马克思提出的这种不断革命与托洛茨基主义从未实现的纸上革命的幻象毫无共同之处，托洛茨基主义一方面预见了民主任务的放弃，另一方面预见了议会的白痴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继续捍卫在反对德国半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捍卫资产阶级民主旗帜的必要性，即使这些旗帜已被资产阶级抛弃。恩格斯在 1870 年代强调了这一点：

忠于自己，支持资产阶级反对一切反动分子的斗争，就符合工人的利益。如果满足这个条件，资产阶级从反动派中获得的每一项收益最终都会使工人阶级受益。（.....）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不忠于自己，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原则，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么，留给工人的还有两条路！或者**违背资产阶级的意愿，迫使它尽可能扩大选举权**，给予自由新闻、结社和集会，从而为无产阶级创造一个可以自由行动和组织的舞台。这就是自 1832 年改革法案以来英国工人和自 1830 年七月革命以来法国工人所做的事情（.....）。或者，工人们可以完全退出资产阶级运动，让资产阶级自行其是。这就是 1848 年至 1850 年欧洲工人运动失败后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发生的情况。（.....）当工人阶级状况良好时，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相当于**完全政治退位**”。（恩格斯）⁴²⁰

1891 年，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中也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提出德国共和制反对普鲁士君主制的民主要求。因此，1848 年发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主革命之间的关系在整个 19 世纪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第一阶段，围绕这一关系最重要的两条路线斗争是针对喇沙修士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立场的。拉萨尔在 1848 年革命期间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合作，直到 1850 年代末仍与马克思主义保持密切联系。1860 年代初期，他开始公开捍卫机会主义立场，并在 1863 年去世前不久，创立了德国工人总协会。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对于德国革命具体路线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是马克思与其在其杰出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阐述的社会民主主义方向争论的中心。

拉萨尔是一位右翼机会主义者，他试图用左翼措辞来掩盖自己立场的内容。这样，他主张进行纯粹的社会革命，主张无产阶级放弃资产阶级反对普鲁士王国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势力的民主斗争。这一立场的右翼本质在统一德国的方式问题上得到了明确的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统一应该通过无产阶级支持的民主革命来实现，粉碎封建反动派和君主制。拉萨尔则支持德国统一的反动道路，在针对奥地利的王朝战争中捍卫普鲁士君主制。在奥法意战争中，拉萨尔认为“普鲁士的使命”是支持拿破仑三世摧毁奥地利：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种统一的形式，无论我们将其视为德意志共和国，德意志帝国，还是最终作为独立国家的严格联邦

—所有这些问题目前可能仍然悬而未决。无论如何，所有这些部分，如果它们有相互理解的智慧，就必须在每个部分的必要条件下协同工作。

* “印度和中国斯大林主义者的中心口号仍然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历史进程使“民主专政”变成了空洞的虚构，也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危险陷阱。（.....）我们的战略家们并没有赋予革命抽象的民主性质，并只有在建立某种神秘的或迷信的“民主专政”之后才允许革命达到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拒绝一切革命民主动员的中心政治口号，恰恰是这样。制宪会议的口号。（.....）制宪会议，形式上是全体人民的代表与过去的账目进行调整，但实际上是不同阶级相互调整账目，是革命民主任务的普遍的、自然的和必然的表达，而不是只有广大农民群众的自觉意识 如果不是在工人阶级本身的意识中觉醒的话。（.....）赋予制宪会议口号特别深刻的革命民主内容。”（托洛茨基，《印度革命》，大胆我们的）

其中一个例子是：**奥地利的覆灭**。（……）拿破仑即将开展德国统一宪法的准备工作。”（拉萨尔）⁴²¹

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得到了恩格斯在《尘埃与莱茵河》中的支持，旨在将法兰西帝国的进攻转化为民族革命战争，从而导致德国在民主和共和基础上的统一。拉萨尔用左翼言辞掩盖了自己的右翼立场，称除了无产阶级之外，其余的德国民众将是“反动群众”，民族问题将通过一场没有德国人参与的王朝战争来解决。工人阶级的。恩格斯这样描述这种喇沙修士教条：“他们采用了响亮但历史上错误的喇沙修士格言：**相对于工人阶级，所有其他阶级都只是反动群众……**”^{第422章}

因此，与托洛茨基主义一样，拉萨尔主义的右翼本质被左翼的废话所掩盖。多年后，拉萨尔与俾斯麦的秘密协议被揭露，清楚地揭示了在政治和民族问题上回避的话语背后，实质上存在着封建贵族和专制君主政体的进步倾向。拉萨尔在给俾斯麦的秘密信件中写道：

“尽管有共和主义的信念，[工人们]还是倾向于将**社会独裁的统治者视为反对资产阶级社会自私的人**，因为愿国王（……）决定真正走革命和民族道路，并将自己**从特权阶层的君主制转变为社会和革命的君主制**。”（拉萨尔）⁴²³

拉萨尔的立场对德国无产阶级造成了重大损害。德国普遍存在的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民主革命关系缺乏认识的现象，严重影响了1919年德国革命中斯巴达克左派所犯的**错误**。斯巴达克联盟的倡导者之一弗兰茨·梅林举例说：认为拉萨尔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是正确的。梅林在1918年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如下评价：“一旦排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拉萨尔正确地认识到，德国的统一在可能的情况下只能是王朝骚乱的结果**”⁴²⁴。

梅林的这一评价不仅限于对德国革命的历史评价。它充满了对喇沙修道主义的积极思考，特别是与对反动群众存在的评估的趋同。例如，这一立场影响了斯巴达克联盟在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上的错误路线，他们反对民族自决和土地革命作为土地国有化的一种方式。这两个问题又被列宁巧妙地解决了，正是因为他懂得借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源泉，彻底解开拉萨尔的束缚。相反，托洛茨基对这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表达了深深的钦佩：

“拉萨尔从匈牙利和德国革命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从此以后，革命只能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支撑**。”（托洛茨基）⁴²⁵

在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第二阶段，特别是在1905年、1917年2月和10月这三次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列宁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大跃进。他表明，作为民主革命的俄罗斯革命将如何不是与俄罗斯自由资产阶级一起进行，而是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然而，它并没有落入喇沙修士的纯粹社会革命的故事，而是揭示了需要举起结束君主专制主义、土地革命和人民自决的民主旗帜，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阶段。随着1905年革命进入农民政治舞台，他巧妙地提出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需要。此外，他还认为，无产阶级应该在自己的武装力量的支持下，争论民主革命的方向，组成革命政府，旨在完成民主革命，以迈向社会主义。

1917年2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这一辉煌路线的实现。君主制被推翻，工人、士兵和农民的苏维埃成立，但孟什维克的立场仍然很重，它并没有夺取政权，相反，它开始支持自由派霸权的临时政府资产阶级与君主制成分的组合。列宁随后表明

不应参加本届临时政府；相反，随着苏维埃夺取所有政权，向社会主义革命迈进。这就是发生的事情，十月，随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党在彼得格勒起义中夺取了政权，并将其移交给了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无产阶级专政在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开始。

与俄国革命民主阶段相反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是在 1905 年借用另一位机会主义者帕尔乌斯的表述而提出的。随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托洛茨基将试图篡改历史，否认二月民主革命的重要性，并无耻地声称他的不断革命论的腐烂理论在十月得到了证实。托洛茨基在试图歪曲列宁主义时说，列宁后来才意识到他的理论的正确性，并且在 1917 年 4 月之前，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与孟什维克的策略相同：

“值得记住的是，无论对于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来说，当时社会民主主义的官方纲领仍然**保持不变**，并且社会民主主义的实际任务从表面上看，民主革命在两党中都是相同的。”（托洛茨基）⁴²⁶

还是：

列宁认为，如果取得胜利，这种对旧政权的共同反抗将导致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今天，这个公式在共产国际中作为一般教条被重复，但没有试图分析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鲜活历史经验。就好像我们不是 1905 年革命、1917 年二月革命以及最后的十月动乱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一样！然而，当“**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时，这样的历史分析就显得更加必要了。1905 年，列宁他只是谈到了一个战略假设，这个假设还需要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来验证。”（托洛茨基）⁴²⁷

明目张胆的造假！布尔什维克路线取得了胜利，因为二月革命作为民主革命而得以实现。否则，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推翻君主制；此外，1917 年的全部经验才使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可能，如果立即进行的话，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失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确实存在，但它并没有像 1905 年提纲所预言的那样在临时政府中实现，而是在 2 月以来的苏维埃中实现。然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拒绝承认他，并冷淡地支持资产阶级和英帝国主义，加强反革命临时政府。苏维埃这一权力机构的斗争是决定性的，因为在那里进行的斗争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以及士兵，其中绝大多数是贫农）之间的牢固联盟。从广大农民开始的联盟，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都是贫农的集中支持。伟大的列宁对 1917 年两次革命的宝贵评价就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与‘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然后，与贫苦农民、半无产阶级、一切被剥削者武装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农村富人、富农和投机者，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想要在两次革命之间建造一道人为的中国墙**，以某种不符合准备水平的东西将一场革命与另一场革命分开。无产阶级及其与贫苦农民的结合程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歪曲**，它正在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用自由主义取代它。”（列宁）⁴²⁸

列宁主义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建立在一个新的水平上，表明将前者转变为后者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是通过人为地否认这一过程的阶段，而是通过其在事实中的实施。列宁这样总结这个问题：

“**俄罗斯革命的直接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消灭一切中世纪的残余，将它们彻底扫除，清除俄罗斯的这种野蛮、这种耻辱和对所有文化的巨大束缚。以及我们国家的所有进步。国家。（……）无政府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埃塞主义者作为俄罗斯的代表）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即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他们已经说过并且正在说过大量令人困惑的事情。（列宁）”⁴²⁹

还是：

“但是，为了为俄罗斯人民巩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我们必须走得更远，我们也这样做了。我们解决革命的问题 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是我们前进过程中的一部分，顺便说一句，它是我们主要的、真正的工作、我们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工作的“附属产品”。（……）资产阶级民主转型——我们已经说过并用事实证明了——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附属产品。”（列宁）⁴³⁰

正如伟大的斯大林总结的那样：“（……）列宁早在 1905 年就提出的**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是马克思不断革命论的体现方式之一”⁴³¹。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即毛主义，这个问题获得了其经典的、高级的形式。毛主席确立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阶段不间断地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相对应的。它表明，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任务已经在执行，特别是没收大量的本地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将其国有化到新的革命国家手中，也就是说，社会的完全社会化。生产资料受帝国主义和当地大资产阶级控制。此外，他还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专政形式，即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是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不可缺少的过渡形式。全国各地夺取政权结束了民主阶段，将国家的阶级性质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中不能采用这种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革命在这一时期只能采用第三种国家形式：新民主共和国。这是与一定历史时期相对应的形式，因此是一种过渡形式，但具有强制性和必要性。”（毛主席）⁴³²

注意，是毛主席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普遍性；而不是像 UOC（毛主义）伪造的那样，在半封建国家，用“毛主义”印记复兴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这种普遍性既不是贡萨罗主席的作品，也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条主义”，它是最纯粹的毛主义。

在 MCI 的历史上，无产阶级革命和民主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再次被提上议程，现在，那些否认毛主义基本理论、自称毛主义者的人分裂了阵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印共（马）在欢迎尼泊尔革命共产党成立时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党认为，只有执行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在反对帝国主义、官僚买主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长期人民战争的道路上，在基层和上层建筑进行浴血奋战，才能胜利地推进在尼泊尔和印度等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中实现新民主和真正的人民民主。” [PCI(M)]⁴³³

我们认为意共（马）的这一说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它解决了 MCI 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核心政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效性问题。这个问题的思想基础是认识到，从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学说出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主席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发展之一。中国革命的历程。因此，这个问题涉及到毛主义的定义问题、毛主席贡献的普遍内容是什么、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革命的特殊性问题等。

中国或毛主义对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根本性普遍贡献，这些国家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其人口相当于地球上绝大多数人民群众。

⁴³⁴本身已经对此做出了回应），在处理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发展时，强调：“毛泽东思想（中共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无产阶级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第435章}然后他强调，贡萨罗主席“第一个将毛主义表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新的高级阶段”。我们同意印共（马）的观点，即中共九大对于毛主义的确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左派巩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就，在更高的水平上重新确立了1945年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定义，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思想”。这个定义在1956年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被右翼废除。

例如，意大利共产党（马）强调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定义提出了几个问题，例如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确立为社会主义建设内部的主要矛盾；保卫GRCP，需要两条路线斗争来发展和锻造共产党。然而，它并没有像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半殖民地国家的普遍性。因此，贡萨罗主席在1988年秘鲁人民战争期间对毛主义的定义并不局限于命名新阶段意识形态的发展。贡萨罗主席对毛泽东主义的主要贡献是定义了这个新的、第三个和更高阶段的内容。

这是一个深刻的意识形态问题，可能会导致重大的政治错误。正如UOC（马列主义）的表述所明确的那样，它宣称毛主义是第三阶段，但它反对半殖民地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普遍性。贡萨罗主席制定的毛主义定义不允许出现这样的偏差，因为他确立了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整体的飞跃，正如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将矛盾律确立为唯一的根本规律一样；在政治经济学上，极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为官僚资本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在科学社会主义中，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确立了长期人民战争理论。

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各个阶段的普遍性的界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强调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理论和实践工作的普遍性，正是符合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各自的定义。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中每个阶段的定义，恰恰对应于对其普遍性的明确界定，也对应于对每个阶段作为学说的完整阐述。因此，该定义包含了综合，但并未简化为综合。

在当前工委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从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出发，我们看来是不够的。毕竟，像UOC（马列毛主义）那样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适用于所有半殖民地国家，就是将毛主义贬低为中国革命的经验，因此将其还原为这是一个指导思想，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新阶段。例如，UOC(mlm)在比较1980年和1984年MRI声明时就是这样做的：

“[在1980年宣言中]人们普遍认为，在一些附属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并且它们不再是半封建的（.....）。在《MRI宣言》（1984）中，我们回到之前的观点来概括：“即使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被压迫国家（.....），革命通常仍然需要经历一个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阶段。能够开始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就退了一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被机制所取代，目的是实现1938年的中国国情。到今天的情况，就好像资本主义已经停止了，就好像时间已经冻结了。”
[UOC（马列毛）]⁴³⁶

对于 UOC（马列毛主义）来说，严格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只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有效，而在今天，它只在所谓的“半封建国家”有效，而这些国家谁也说不清楚。对于马列毛主义来说，从《共产党宣言》到毛主席的最新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关系始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从不间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否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效性，就是陷入最腐烂的修正主义。

3-贡萨罗主席概括和发展了毛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理论

通过将毛主义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第三个和更高的阶段，贡萨罗主席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世界上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普遍性建立在毛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理论的概括和发展的基础上。2022 年，PCC-FR 在重要文件《对共产主义工人联盟（UOC）关于统一毛主义协调委员会建议的声明的回应》中，对毛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理论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辩护。国际会议（CIMU）。由于这是一个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效性是捍卫其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问题，今天，我们将顺便讨论贡萨罗主席对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一决定性贡献。

贡萨罗主席以毛主义为一个整体，综合并运用了毛主席提出的官僚资本主义理论，并将其运用到秘鲁的现实中，从多个方面加以发展，并将其推广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所有被压迫国家的国情。官僚资本主义是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一部分，毛主席提出的官僚资本主义理论和贡萨罗主席的大力发展，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和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的继续。

贡萨罗主席将官僚资本主义定义为“在落后国家产生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它与已经过时的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受制于帝国主义，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它只为大多数人服务，除了帝国主义者、大资产阶级和地主之外。”并且，从毛主席出发，总结其基本特征：

“一）官僚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在落后国家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它是由大地主、大银行家、大资产阶级的资本组成的；2）剥削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限制中产阶级；3）官僚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与国家权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比较性和封建性相结合的过程，导致其首先发展为大型非国家垄断资本，其次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发展成为非国家垄断资本。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4）当民主革命达到发展的顶峰时，其条件就成熟了；5）没收官僚资本主义是结束民主革命的关键，也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因素。”（秘鲁共产党-PCP）第 437 章

因此，官僚资本主义是与民族形态截然对立的，阻碍生产力的解放，剥削城乡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限制中间资产阶级，压迫全体人民，实现亡国之目的，为帝国主义服务以控制经济进程，无论是在殖民地还是半殖民地国家；而且，与大庄园联系在一起，它维持着半封建、封建甚至其他更落后的剥削关系的过时形式，这些关系通过其形式的演变，无论是通过国家和非国家、联合体还是非国家，在社会中得以延续。联想或混合在一起的形式。这揭开了所有修正主义、卡斯特罗主义、格瓦拉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其他“依附资本主义”的论点，这些论点支持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形式的演变，以“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提来改变被统治国家的革命性质，现在，他们抛开革命的言辞，公开捍卫投降主义和平改良主义，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冷积累”为名，与旧国家融合。事实上，贩卖人民群众的利益，

他们通过机会主义组织、选举主义和议会呆子主义来发起他们的运动，以征服旧国家结构中的“有利可图的地方”。

在对秘鲁社会及其经济社会形态的研究中，贡萨罗主席以官僚资本主义进程的三个时刻为基础，在这三个时刻中，官僚资本主义 1) 开始和发展，2) 深化和发展。3) 进入全面危机；其过程发生在具有“暂时恢复梯度的循环中，但每个新循环都从比前一个循环更低的点开始”的过程。

贡萨罗主席计划将大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即比较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第一部分是在进出口过程中较老的和中间的部分，主要在银行和商业部门发展，并以私人资本的形式表现出来；当垄断资本与作为其主要杠杆的国家合并时，官僚部分就会出现，并且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这种区分是关键，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免受机会主义“阵线”的诱惑，这些机会主义“阵线”主张在大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勾结关系中追随旧国家的管理。

研究官僚资本主义所处的过程和条件，是确定被压迫国家革命的性质的一项决定性任务，即从不间断的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其内容是农业、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和目标。压迫人民和民族的三座大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特征与这些社会中出现的根本矛盾相对应：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与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被压迫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更广泛表现；群众与封建的矛盾，是主要贫农与大地产制度之间矛盾的表现。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可能会根据革命的阶段而成为主要的，并在其过程中改变它们的表达方式，但总的来说，当没有超级大国或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入侵时，群众封建矛盾是主要的，通过土地革命得到解决，当土地革命随着帝国主义军事入侵而进展时，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就成为中心舞台，而这一矛盾的解决则通过民族解放或反帝国主义革命，即民族解放战争来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二个矛盾，表现为人民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反过来，在革命从一个新的、胜利的民主制和摧毁一切半封建制的不间断过渡中发生变化并成为中心。并通过没收所有官僚资本和摧毁官僚资本主义来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民族解放。

贡萨罗主席通过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研究，教导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基础，还要关注思想、政治、法律和文化上层建筑；看到了半封建制在整个社会中的完整表现，从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垄断的基础，其中产生了奴役和半奴役关系，到在政治和机制上表现出大量半封建财产霸权的婚配主义国家的权力，这是土地革命所针对的一个因素；此外，它还提请人们注意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方面，它生来就已经腐烂和病态，随着它的延续，革命发展和胜利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

因此，官僚资本主义理论的概括和发展是贡萨罗主席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伟大贡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当今世界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所不可缺少的。在这份文件中，当我们研究农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土地收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的运作时，我们只是在贡萨罗主席所确立的这一伟大贡献的基础上添加一些经济因素。

4. 确定了两个阵营，分界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对绝大多数国家和绝大多数地球人口的有效性

去年开始的两条路线斗争，围绕着当时的 CCIMU 出版的《讨论基础》，为毛主义统一国际会议做准备——CIMU，是长期斗争的产物。

克服 MCI 内部力量分散和团结的斗争和努力的过程，动员了毛主义政党和组织进行坦率和直接的辩论，这对于推动正在进行的进程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很长时间以来所没有的。最初，分歧集中在哲学问题和贡萨罗主席的普遍有效性的贡献上。CIMU 的实现与创立 LCI 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两条路线斗争的连续性相对应，其结果是《政治和原则宣言》，就组织而言，是一个指导委员会、国际会议的主权机构和由成员缔约方和组织组成的代表理事会。LCI 成立后两线斗争的连续性，特别是 2023 年 1 月出版的 UOC（马列毛）文件，以及该组织和意大利 PCm 出版的两版 *Luta* 两线杂志，服务了需要澄清的是，其中提出的与 LCI 的差异并不直接与贡萨罗主席的贡献问题相关，而是围绕毛主义本身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效性、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问题。革命世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与半封建制度的必然关系，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分量。

我们已经知道 UOC（马列毛）否认半殖民地国家潜在的半封建制度的立场，并否认当今世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效性。然而，随着 MCI 两条路线斗争的发展，随着《*Luta de Duas Linhas*》杂志第 2 期的出版，我们意识到意大利 PCm 也持有同样的立场。在对 LCI 的批评中，他指出：

“对所有被压迫国家‘半封建’特征的教条主义认识，而其中一些国家的一些同志根据自己的革命经验和分析，拒绝这种教条主义认识（例如，在哥伦比亚，UOC 同志）（马列毛）；在其他国家，如突尼斯、伊朗、尼泊尔，一些同志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PCm 意大利）⁴³⁸

根据意大利共产党的说法，哥伦比亚、突尼斯、伊朗或尼泊尔不存在半封建制度。也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存在半封建制！他们以反教条主义的名义得出这一结论。然而，他们只是用同样的话重复鲍勃·阿瓦基安在 1980 年会议上提出的论文，让我们看看：

“（……）这方面要具体分析，**避免机械化倾向**，总的原则是，农村革命运动的发展程度与革命运动的发展程度直接相关。农民的相对数量重要性，**直到农村仍然存在前资本主义关系。**”（PCR-美国和 PCR-智利）⁴³⁹

同样是那些对农民问题无知的人们的咯咯笑声，这些人从未踏出过大城市，却说半殖民地国家不再有半封建制度。阿瓦基亚孤儿加入了秘鲁 LOD RyC 的老鼠行列，他们重复同样的论点，说安第斯山脉不再有半封建制，因此那里的革命将立即是社会主义的。就像土耳其共产党-马列和土耳其人民党的投降者一样，他们拒绝农民作为土耳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以此作为放弃和背叛人民战争的理由。

《*Luta de Duas Linhas*》杂志的编辑继承了 MRI 中存在的最糟糕的情况，无论是在其立场的阿瓦基亚托洛茨基主义内容方面，还是在政党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方法方面。一方面，他们审查了印共（马）文件的很大一部分，公然从 15 页中删去 6 页，并称之为“一个小错误”。他们准确地删除了意共（马）捍卫被压迫民族/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分量，以及长期人民战争中农村对城市的围困的部分。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发表《UOC（马列毛）》的数十页文章，其中暗示印度、菲律宾和巴西的革命将立即成为社会主义。他们没有发表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正在这些国家的农村发展并扫除半封建制度的摘录：

“简而言之，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和使用雇佣劳动而进行的。无论剥削形式如何落后，

土地租赁，只能减缓农业资本主义化的速度，而不能阻止它。列宁在俄罗斯的例子中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当今其他国家的背景下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例如印度或巴西的例子。”
[UOC (马列毛)]⁴⁴⁰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对俄罗斯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移植到帝国主义时期的印度和巴西；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在那里还是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将扫除半封建关系。必须扫除的是 UOC (马列主义) 关于帝国主义进步倾向的托洛茨基主义无稽之谈。至于印度和巴西农村的半封建制，只有长期人民战争它可以扫除你的人际关系。这就是我们的承诺和具体实践。

MCI 目前的两条路线斗争始于 2022 年，围绕着 CIMU 的创建和 LCI 的成立，清楚地划出了毛主义和修正主义（无论是旧的还是现在的形式）之间的界限。毛主义者明确而有力地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矛盾。英勇的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以及世界各地广大群众的巨大支持，充分证实了毛主义者所捍卫的这一真理。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不受社会主义干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承认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世界上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有效性，构成了毛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明确界限。否认这个真理，就是堕入最卑鄙的修正主义，就是放弃被压迫国家的革命道路。

全世界共产党人除了承认这一点之外，还必须承认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因为它涵盖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两大潮流，一是领导层，二是根据地。与阿瓦基安主义和其他修正主义者的辩护相反，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不仅存在于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存在于世界所有国家。我们正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共产党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和半殖民地。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导只有通过长期人民战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在每个被压迫国家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被压迫国家越发展，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条件就越好。

揭示和捍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效性，并主要通过具体的革命实践来运用它，是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决定性分界线。UOC (马列主义) 的领导层多年来一直公开反对这个问题，如果不纠正这一严重的修正主义偏差，它就无法克服与群众的孤立。他所能做的就是陷入选举主义、改良主义和经济主义实践的泥潭。以至于今年 UOC (马列毛) 的领导层放弃了对选举闹剧的抵制，并试图为其激进主义的右翼立场辩护：

“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今年决定不发起反选举政治运动（……）。此时此刻，投票还是不投票，投票给候选人 X 还是候选人 Y，或者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空白，都不重要了。”
[UOC (马列毛)]⁴⁴¹

捍卫选举抵制并不重要，从群众政治化的角度来看，投票或抵制选举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我们看来，这只是为从经济主义实践转向选举实践做准备。实践。毕竟，这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抛弃毛主义、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效性的必然结果。

最后，我们要回应 UOC (马列毛) 领导层对巴西共产党 (PCB) 的卑鄙攻击。

UOC (马列主义) 在批评我们党和 LCI 时指责我们是“左派”和宗派主义。然而，她所捍卫的总路线认为，大多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

“受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将立即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他的国家的革命，他提倡一项设想农民土地“集体化”的土地计划。他认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战争不需要民族革命阶段。实际上，它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所有半殖民地国家的普遍有效性。最终，它本质上假设了一些托洛茨基主义的结论，而我们是“左派”吗？

在去年（2022 年）随着《讨论基础》的出版而开始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哥伦比亚的三个组织参加了辩论：无产阶级权力游击队组织马列毛主义、哥伦比亚共产党红色派和哥伦比亚革命组织（马列毛主义）。所有这些政党和组织都不同程度地对讨论库中的某些主张进行了某些方面的批评，由于讨论库批评者的某些方面的立场，这些批评遭到了其他政党和组织的反驳。哥伦比亚的三个组织中，只有 UOC（马列毛）拒绝参加 CIMU。PPOPMLM 和 PCC-FR 都参加了 CIMU，并积极参与了会议中的两条路线斗争。UOC（马列毛主义）是哥伦比亚唯一在第一阶段放弃两条路线斗争的组织吗？创建 LCI 的政党和组织是宗派吗？

UOC（马列毛）对 LCI 创始人的“左派”和宗派主义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脚。然而，毫无根据的指控似乎正在成为 UOC（马列毛）领导层的专长。在他们批评 PCB 和 LCI 创始人的长篇文件的最后，他们对我们党发起了以下攻击：

“顺便说一句，关于同志们错误方法的第二个方面[宗派主义]，我们在 2016 年巴西的一次广泛会议上已经了解了，我们被正式邀请参加这次会议，但鉴于我们提出的提案为制定工委总路线，活动负责人呼吁“修正主义去死！”（如果“贡萨罗思维”的立场，意图“杀死”修正主义，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吸收 GRCP 的教义和实践来打击它）。

尽管在巴西受到了怪诞和侮辱性的待遇——除了那些热情好客、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工人同志——**我们并没有公开谴责这种行为**（.....），希望东道主能够重新考虑，多年后，东道主与他们进行了交谈。其他组织的同志提出的自我批评，我们从未直接收到过（.....）。模仿恩格斯的话，我们的合唱团很难经受住我们自己斗争同志的猛烈攻击；无论是 2016 年的巴西，还是现在，我们都不会被他们的进攻所吓倒。” [UOC（马列毛）] ⁴⁴²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令人厌恶的攻击得到了加利西亚毛主义共产党建设委员会领导人的支持，以至于在他们关于 LCI 成立的立场上，他们特意提到了 UOC 下的这次攻击（马列毛）对我们党来说，包括以通用和模糊的方式这样做，如下所示：

“我们在 MCI 进行的所有国际交往中，所有组织总是以极大的礼貌和友情对待我们，但 UOC(MLM) 却没有发生同样的情况，它受到了一个**致力于加强加强组织的组织的不公平待遇。MCI 的。**” (CCCPMG) ^{第 443 章}

UOC（马列毛）想要在取消 PCB 资格的猖獗目标中扮演受害者，没有说出真相，声称他们在巴西受到 PCB 以“怪诞和羞辱”的方式对待，包括通过廉价的煽动手段，“除了那些热情好客、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工人同志”。如果是 PCB 邀请 UOC（马列毛）的话，这样的事件会有什么意义，正如我们现在正在考虑的文件中它自己的话所证明的那样。当他说他没有公开谴责这种处理方式时，他也撒谎了——对于 PCB 来说，这种处理方式本身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他不仅这样做了，而且还表示我们会提出关于这次所谓的袭击事件，对哥伦比亚另一个组织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没有提及是哪个组织。PCC-FR 的管理层在信函中告知 PCB，他们已收到 UOC（马列毛）的此类指控，我们对此回应称，在 2016 年巴西事件中发生的所有事实中，PCB 管理层没有任何关于此类事件的信息，他认为这种指控是荒谬的。UOC（马列毛）的领导层甚至没有对这次所谓的袭击提出任何批评；无论是出席巴西活动的他的代表团还是他随后通过信函进行的管理都没有这样做。

事实上，我们只是通过前述 PCC-FR 给我们党的信函，然后通过 UOC(MLM)门户网站上发布的一份文件了解了这次袭击，该文件批评了庆祝伟大的诞辰二百周年的联合声明。卡尔·马克思，2018 年，PCB 签署；以及我们当前评估主题的文件。我们党绝不会贬低思想政治斗争，正如我们绝不会就此卑鄙的事情进行公开争论一样。而且，我们党也没有对此进行任何自我批评，因为我们不会以“怪异和羞辱”的方式对待任何组织，无论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多大。我们现在看到，UOC（马列毛）领导层在这次对 PCB 的进攻中的坚持，其手段还包括主观主义的文字游戏和欺骗手段。你到底想欺骗谁？去 MCI 还是你自己的基地？

2016 年，上述事件发生后不久，UOC（马列毛）对该活动的公开评价却相反：

“此外，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活动组织得非常好，是一次革命性的、国际主义的活动。（.....）此外，儿童、青年和妇女——其中绝大多数是非洲人后裔——的存在也引人注目，他们在斗争中发展起来，具有伟大的革命信念。还有经验丰富的鼓动者，为活动注入了活力。革命信念、助手们的精神状态、继续巴西革命进程的干部们的坚定态度，使我们相信，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不会在其痛苦过程中持续太久，因为埋葬它的力量将是巨大的。已经成熟了。（.....）对于哥伦比亚共产党人来说，参加这次活动是一种荣幸。” [UOC（马列毛）] 444

UOC（马列毛）在 2016 年对同一活动做出了两次相反的公开评估，赞扬了其成就；2018 年，在同一个新闻机构中，他们说他们被“像狗一样对待”，他们在 2023 年文件中重复了这一攻击。这两项评估中哪一项表达了实际发生的情况以及 UOC（马列毛）管理层的真实立场是什么？

UOC（马列毛）管理层坚持重复谎言，迫使我们澄清事实。他的代表团在巴西，像所有其他代表团一样受邀参加预定的三项活动：官僚资本主义研讨会，仅由马列毛主义政党和组织代表团参加的闭门会议，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一天，持续 12 小时）和大规模的政治文化行为。在所有这些会议中，他的代表团都获得了与出席会议的所有其他缔约方和组织相同的发言时间。正如 UOC（马列毛主义）本身在攻击我们党时所说的那样，它的代表团能够在两次半公开的活动中与革命运动的激进分子及其群众基础自由地交谈。其中，他们没有任何限制地分发了《关于制定 MCI 总路线的建议》的复印件。这有什么“荒诞和羞辱”呢？UOC（马列毛）代表团是否缺乏像样的住宿？你们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吗？你不被允许在活动中发言吗？您是否被拒绝享受与其他客人同等的待遇？不，这一切绝对没有发生！

UOC（马列毛）管理层没有报告的是，当其代表团被召集参加政治文化活动时，它没有出席，甚至没有屈尊给予任何满意的答复。是因为在之前活动的辩论中看到出席的大多数政党和组织都是贡萨罗主席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贡献的捍卫者，还是因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激烈冲突而感到不舒服？UOC（马列毛主义）的领导层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绰号，试图抹黑捍卫贡萨罗主席的普遍有效性贡献的毛主义政党和组织。那么，UOC（马列毛）的管理层是否在提出批评时非常“激烈”，而在接受批评时又过于敏感呢？

让我们看看，在这些事件的所有事件中，唯一一个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出我们党对 UOC（毛主义）代表团进行“怪异和侮辱”待遇的指控的可能原因，无论这种解释多么荒谬，在官僚资本主义争论的背景下，许多与会者呼应了“修正主义去死”的口号。如果 UOC（马列毛主义）的领导层将此理解为针对其组织的“冒犯”，那么在对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激烈辩论的背景下，对修正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的打击是正面和无情的，我们只能说是作为掩护，这是 UOC（毛主义）的授权和领导的问题，这是毛主义革命者在任何活动中提出的口号。的方向

PCB 声称，对于那些指出反对如此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政党（包括那些支持激烈斗争的人民战争并指责他们）的人来说，理解这一口号是针对其组织的，这是一种非常防御性的态度。阿瓦基安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教条主义，没有从对当前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出发，也就是说，他们通过长期的人民群众来捍卫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被压迫国家的战争。如果不是他把帽子戴在头上，我们加上恩格斯所说的和你们 2023 年文件中引用的毛主席在中共干部会议上（1962 年）的教导，就好像他预见到党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道路追随者之间、左翼和右翼之间的阶级斗争将会变得激进，他呼吁他们“硬着头皮”，准备好度过难关。风暴。因为，与所说的相反，你的皮革仍然非常脆弱。

加利西亚的一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出席了这次活动，我们对他对 UOC（马列毛）攻击的支持感到非常惊讶，他的行为方式可疑，没有公开批评 PCB。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中间派起到了消除右翼产生的混乱并助长右翼的作用。我们要求加利西亚 CCCPM 明确立场，表明 UOC（马列主义）对我们党的指控是否属实，没有任何歪曲，无论我们的党是否以“怪诞和侮辱”的方式对待他们。他们在巴西时参加聚会。加利西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是当他们在巴西时，他们受到无产阶级的待遇，就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当巴西革命者代表团在加利西亚时，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报。共产党人必须为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水平做出贡献，并作为对 UOC（毛主义）所谓“不公平待遇”的证明，他们必须帮助自己澄清问题，而不是助长谎言。

最后，我们向光荣的秘鲁共产党、英勇的秘鲁共产党和土耳其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土耳其共产党/马列致词，他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为了他们的政党领导的光明的人民战争，我们已经努力了为弘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我国革命而努力。在这场争论的偶然性赋予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中，我们发现自己有义务详细写下所有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都知道的主题，旨在将意识形态斗争提升到两条路线的水平斗争。我们还向英雄的意大利共产党（马）和法国共产党致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炬，我们向兄弟党的公开立场致敬，我们公开重申我们决定促进我们两党之间的旧关系，不幸的是，这种关系已经中断了。出于革命阶级斗争的偶然性，没有任何其他原因，目的是采取进一步措施，彻底克服 MCI 的分散现象并使其牢固团结。特别是，对于 PCI(M) 和 PCF，正如其在对 LCI 的评估以及对《政治宣言和原则》的批评中所述，PCB 重申其致力于在“双边关系”中继续与 PCI(M) 进行辩论和澄清。方式和其他，直接和有组织”。

我们还向参与和支持 LCI 的其他缔约方和组织致函。在这份文件中，我们力求与统一毛主义国际会议上举行的极高水平的讨论和两条路线的斗争相对应。我们向大家致以敬意，向大家致敬，他们在这一年里，在为未来重建不朽的共产国际而进行的激烈斗争的推动下，开展了激烈的运动和坚决不懈的革命工作。

最后，我们向 UOC（马列毛）的领导层致辞，我们相信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批评-自我批评-转变。我们在这里力求从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贵组织提出的错误立场作出回应，我们认真研究你们的文件，并力求从中汲取重要教训。我们希望当前的两条路线斗争将有助于纠正这些错误，有助于推动哥伦比亚共产党的改组，有助于这个拉丁美洲重要国家的革命的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交织在共同敌人——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这个嗜血的巨兽迟早会被埋葬在亚马逊雨林和安第斯山脉之间，北美人民将永远埋葬它。我们确信，在各自共产党的领导下，哥伦比亚和巴西无产阶级和农民将团结起来，完成这一共同任务，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服务！

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万岁！
打倒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
不可战胜的人民战争万岁！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万岁！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毛泽东主席诞辰 130 周年万岁！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万岁！

巴西共产党 – PCB
中央委员会

- 1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 《政治宣言和原则》, 2022 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2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 《政治宣言和原则》, 2022 年, 我们翻译并加粗。
- 3 VI 列宁,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23, 第 14 页。41、我们的翻译。
- 4 VI 列宁,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18, 第 17 页。143、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5 VI Lenin, *Cadernos Filosóficos*, OC, Progresso 莫斯科社论, T. 29, 第 29 页。300, 我们的翻译。
- 6 中共中央所属高级党校革命群众批判编写组, 《中国哲学战线上的三大斗争》(1949-64), 第 11 页。10-11,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7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n° 6, 2023, 由我们翻译和加粗。
- 8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n° 6, 2023,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9 UOC(mlm), *Revista Contradição*, n° 10,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0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n° 3, 2008,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1 UOC(mlm), *Revista Contradição*, n° 10,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2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T.1, 第 12 页。356, 我们的翻译。
- 13 UOC(mlm), *Revolución Obrera*, n° 210, 2007,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14 PCN(M), 《大跃进: 历史的必然需要》, 2001 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5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n° 4, 2009,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6 毛主席, 《五篇哲学论文》, 外语词典, 2021 年, 第 14 页。167、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17 VI 列宁,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OC, Progresso 莫斯科社论, T. 18, 第 17 页。189,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18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7 页。879, 我们的粗体字母。
- 19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9 页。879-80, 我们大胆。
- 20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880, 我们的粗体字母。
- 21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881, 我们的粗体字母。
- 22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881, 我们大胆。
- 23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882, 我们大胆。
- 24 UOC(马列毛), *Revista Contradição*, n° 10, 我们的翻译。
- 25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T. 1, 第 11 页。356,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26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反杜林论》, Boitempo 社论, 2015 年, 第 14 页。160, 我们的大胆。
- 2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反杜林论》, Boitempo 社论, 2015 年, 第 14 页。154、我们大胆。
- 28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反杜林论》, Boitempo 社论, 2015 年, 第 14 页。161、我们大胆。
- 29 PCR-USA, PCR 宣言, 2009 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30 PCN(M), 大跃进: 历史的必然需要, 2001 年, 翻译和粗体由我们添加。
- 31 VI 列宁, 卡尔·马克思, OC, Progresso 莫斯科社论, T. 26, 第 26 页。55-56,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32 Proudhon, Pierre, J, *¿Qué es la propiedad?*, Libros Anarres, 2005, p.229,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33 卡尔·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 Editora Boitempo, 第 14 页。98-99, 我们大胆。
- 34 卡尔·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 Boitempo 社论, 第 14 页。100, 我们的粗体字母。
- 35 《红星》, 第 15 期, 2008 年 9 月 21-30 日, 我们的翻译。
- 36 卡尔·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 Boitempo 社论, 第 14 页。147、我们大胆。
- 37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T. 1, 第 11 页。341,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38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T. 1, 第 11 页。351,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39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反杜林论》, Boitempo 社论, 2015 年, 第 14 页。307, 我们的粗体字母。
- 4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反杜林论》, Boitempo 社论, 2015 年, 第 14 页。308, 我们的粗体字母。
- 41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反杜林论》, Boitempo 社论, 2015 年, 第 14 页。312, 我们的粗体字母。
- 4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反杜林论》, 《Boitempo》社论, 2015 年, 第 14 页。315-16, 我们大胆。
- 4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反杜林论》, Boitempo 社论, 2015 年, 第 14 页。316, 我们的粗体字母。
- 44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反杜林论》, 《Boitempo》社论, 2015 年, 第 14 页。165-66, 我们大胆。
- 45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反杜林论》, Boitempo 社论, 2015 年, 第 14 页。171、我们大胆。
- 46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Obras Escogidas*, Editorial Progresso, T. 3, 1980 年, 第 3 页。246、我们的大胆。
- 4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Boitempo 社论, 第 17 页。111-12, 我们大胆。
- 48 VI 列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OC, Progresso 莫斯科社论, T. 18, 第 17 页。135, 我们的翻译。
- 49 VI 列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OC, Progresso 莫斯科社论, T. 18, 第 17 页。203,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50 VI 列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OC, Progresso 莫斯科社论, T. 18, 第 17 页。204-06,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51 VI 列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OC, Progresso 莫斯科社论, T. 18, 第 17 页。142-43,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52 VI 列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OC, Progresso 莫斯科社论, T. 18, 第 17 页。359 和 361, 我们大胆的翻译。
- 53 VI 列宁, 《哲学笔记》, OE, T. 6, 往后, 第 14 页。100, 我们的粗体字母。
- 54 VI 列宁, 《哲学笔记》, OE, T. 6, 往后, 第 14 页。108, 我们的粗体字母。
- 55 VI 列宁, 《哲学笔记本》, OE, T. 6, 往后, 第 14 页。155、我们大胆。
- 56 VI 列宁, 《哲学笔记本》, OE, T. 6, 《前进》, 第 14 页。192, 我们的粗体字母。
- 57 VI 列宁, 《哲学笔记本》, OE, T.6, 《前进》, 第 17 页。193。
- 58 VI 列宁, 《哲学笔记》, OE, T. 6, 往后, 第 14 页。197。
- 59 VI 列宁, 《哲学笔记本》, OE, T. 6, 往后, 第 14 页。200, 我们大胆。
- 60 VI 列宁, 《哲学笔记本》, OE, T. 6, 《前进》, 第 6 页。298, 我们的大胆。
- 61 VI 列宁, 《哲学笔记》, OE, T. 6, 往后, 第 6 页。298-99, 我们大胆。
- 62 VI 列宁, 《哲学笔记》, OE, T. 6, 往后, 第 6 页。299, 我们的大胆。
- 63 VI 列宁, 《哲学笔记本》, OE, T. 6, 往后, 第 6 页。299, 我们的粗体字母。
- 64 JV 斯大林,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史》, 莫斯科外语版, 1953 年, 数字版, 《作品》, T. XIV, 第 14 页。56、我们的翻译。
- 65 JV 斯大林,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史》, 莫斯科外语版, 1953 年, 数字版, 《作品》, T. XIV, 第 14 页。57、我们的翻译大胆。

- 66 JV 斯大林,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史》, 莫斯科外文版, 1953年, 数字版, 作品, T. XIV, 第14页。57、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67 JV 斯大林,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史》, 莫斯科外语版, 1953年, 数字版, 作品, T. XIV, 第14页。55、我们的翻译大胆。
- 68 JV 斯大林,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史》, 莫斯科外语版, 1953年, 数字版, 作品, T. XIV, 第14页。56、我们的翻译大胆。
- 69 JV 斯大林,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史》, 莫斯科外语版, 1953年, 数字版, 作品, T. XV, 第14页。58、我们的翻译大胆。
- 70 毛主席,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OE, 北京外文版, T. 1, p. 194、我们的翻译大胆。
- 71 毛主席,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OE, 北京外文版, T. 1, p. 197、我们的翻译大胆。
- 72 毛主席,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OE, 北京外文版, T. 1, p. 201, 我们的翻译加粗。
- 73 毛主席,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OE, 北京外文版, T. 1, p. 214、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74 毛主席,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OE, 北京外文版, T. 1, p. 218、我们的翻译加粗。
- 75 毛主席,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OE, 北京外文版, T. 1, p. 232、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76 毛主席,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OE, 北京外文版, T. 1, p. 241、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77 毛主席,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OE, 北京外文版, T. 1, p. 243、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78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T.1, 第11页。352,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79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T.1, 第11页。365, 我们的翻译加粗。
- 80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T.1, 第11页。365, 我们的翻译。
- 81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T.1, 第11页。368,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82 饶庆晃, 坚持“一分为二”, 反对“合二为一”——关于哲学战线大论战的基层谈话, 编着, 《南方日报》(广州), 1965年1月11日,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83 毛主席, 《中国哲学战线上的三大斗争》, 外文出版社, 1973年, 我译。
- 84 中国哲学战线上的三大斗争, 1971年, 北京评论, 外文出版社, 1973年, 我们译。
- 85 毛主席, 有必要批判“综合经济基础”理论的背景, 在《中国哲学战线上的三大斗争》, 1973年, 我们大胆翻译。
- 86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革命群众批判编写组《中国哲学的三大斗争》中需要批判“综合经济基础”理论的背景 前面, 1973年, 我们的翻译。
- 87 中共, *apud* 有必要批判“综合经济基础”理论的背景, 《中国哲学战线上的三大斗争》, 1973年, 我们译。
- 88 毛主席, 有必要批判“综合经济基础”理论的背景, 在《中国哲学战线上的三大斗争》, 1973年, 我们大胆翻译。
- 89 中共中央下属高级党校革命群众批判写作小组, 围绕思想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先验摔跤, 《北京评论》, 第15期, 1971年4月9日, 译我们的。
- 90 毛主席, 有必要批判“综合经济基础”理论的背景, 在《中国哲学战线上的三大斗争》, 1973年, 我们大胆翻译。
- 91 中共中央下属高级党校革命群众批判写作组, 《中国哲学战线上的三大斗争》, 《北平评论》, 第4期, 1971年1月22日, 我们翻译并加粗。
- 92 毛主席,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OE, 北京外文版, T. 5, p. 431, 我们的翻译。
- 93 毛主席,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OE, 北京外文版, T. 5, p. 428,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94 中共中央下属高级党校革命群众批判写作小组, 围绕思想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先验摔跤, 《北京评论》, 第15期, 1971年4月9日, 译和大胆的我们。
- 95 毛主席, 《五篇哲学论文》, 外语词典, 2021年, 第14页。167、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96 中共中央下属高级党校革命群众批判写作小组, 围绕思想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先验摔跤, 《北京评论》, 第15期, 1971年4月9日, 译和大胆的我们。
- 97 毛主席, 《五篇哲学论文》, 外语词典, 2021年, 第14页。168,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98 毛主席, 《党的内部团结的辩证方法》, OE, 北京外文版, 电视, 第11页。564。
- 99 毛主席, 《哲学战线上的三大斗争》, 《北京评论》, 第4期, 1971年1月22日,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100 杨献珍、艾思奇, 《决不能偷偷地用调和矛盾阶级论代替革命辩证法》, 《人民日报》, 1965年5月20日, 本译。
- 101 艾思奇, 决不能偷偷地用矛盾阶级调和论代替革命辩证法, 人民日报, 1965年5月20日, 我们的黑体字, 翻译, 黑体字是我们的。
- 102 艾思奇, 《决不能偷偷地用矛盾阶级调和论代替革命辩证法》, 人民日报, 1965年5月20日, 我译, 加粗。

- 103 《红星》，第15期，2008年9月21-30日，我们的翻译。
- 104 艾恒甫、林青山，“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学习毛主席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一些体会，《光明日报》，1964年5月29日，我译加粗。
- 105 潘孝源，矛盾律应是“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辩证统一，辛建社，1964年7月20日，本校译，加粗。
- 106 Chin Jan，革命辩证法还是矛盾调和？-与艾恒武、林清汉、潘清彬同志的辩论，辛建社，第7期，1964年7月20日，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107 高大胜、冯玉昌，反驳红与熟矛盾的“合二为一”论，北京日报，1964年11月15日，本译加粗。
- 108 高大胜、冯玉昌，反驳红与熟矛盾的“合二为一”论，北京日报，1964年11月15日，本译加粗。
- 109 中共中央所属高级党校《革命群众批判》编辑组，《合二为一论与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哲学》，《北京评论》，1971年4月23日，第17期，我们的翻译加粗。
- 110 毛主席，《矛盾论》，OE，北京外文版，T.1，第11页。345，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111 Chin Jan，革命辩证法还是矛盾调和？-与艾恒武、林青山、潘正彬同志的辩论，《新建筑》，第7期，1964年7月20日，我们翻译并加粗。
- 112 艾思奇，《决不能偷偷地用矛盾阶级调和论代替革命辩证法》，人民日报，1965年5月20日，我译，加粗。
- 113 卡尔·马克思，夏树，《“合二为一”理论的反辩证本质》，《人民日报》，1964年8月14日，译本并加粗。
- 114 中共中央下属高级党校革命群众批判写作小组，围绕思想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先验摔跤，《北京评论》，第15期，1971年4月9日，译和我们的粗体字母。
- 115 饶庆晃，坚持“一分为二”，反对“合二为一”——关于哲学战线大论战的基层谈话，编编，《南方日报》（广州），1965年1月11日，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16 UOC(马列毛)，*Revista Contradicción*，n° 07，1991，我们的翻译。
- 117 UOC（马列毛），《*Revolución Obrera*》，第160期，2005年7月，我们的翻译。
- 118 UOC(mlm)，*Revolución Obrera*，n° 182，2006年2月，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19 UOC(mlm)，*Revolución Obrera*，n° 184，2006年3月，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120 PCR-EEUU 和 PCR-智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统一和 MCI 路线的基本原则，1980年，我们的翻译和大胆。
- 121 鲍勃·阿瓦基安，征服世界？，*Revolución* n° 50，1982年1月（1981年秋季讲座），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122 鲍勃·阿瓦基安，征服世界？，*Revolución* n° 50，1982年1月（1981年秋季讲座），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23 鲍勃·阿瓦基安，征服世界？，*Revolución* n° 50，1982年1月（1981年秋季讲座），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124 PCR-USA，致参加 *Movimiento Revolucionario Internacionalista* 的政党和组织的信，2012年，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125 六、列宁、郑新，《揭露露献珍同志用形而上机械论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光明日报，1964年12月25日，我们大胆翻译。
- 126 鲍勃·阿瓦基安 (Bob 阿瓦基安)，《更多关于辩证法的问题》，1981年3月6日，《革命工人》，第95期，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12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Boitempo 编辑，第14页。119、我们大胆。
- 128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信函，致约瑟夫·魏德迈尔的信，1852年3月5日，《社会科学》杂志社论，1983年，第62页，粗体和我们的翻译。
- 129 毛主席，《矛盾论》，OE，北京外文版，T.1，第11页。356，我们的翻译。
- 130 Lenny Wolf，《革命的科学》，RCP Publications，1983年，翻译并加粗了我们的内容。
- 131 Lenny Wolf，《革命的科学》，RCP Publications，1983年，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32 Bob 阿瓦基安，*Abriendo breccias*，2019，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33 Bob 阿瓦基安，*Abriendo breccias*，2019，我们的翻译，粗体。
- 134 鲍勃·阿瓦基安 (Bob 阿瓦基安)，《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哲学基础》，《革命工人》，第96期，1981年3月13日，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135 毛泽东主席，《矛盾论》，OE，北京外文版，T.1，第11页。336-37。
- 136 鲍勃·阿瓦基安，征服世界？，*Revolución* n° 50，1982年1月（1981年秋季讲座），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37 鲍勃·阿瓦基安，征服世界？，*Revolución* n° 50，1982年1月（1981年秋季讲座），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38 鲍勃·阿瓦基安，征服世界？，*Revolución* n° 50，1982年1月（1981年秋季讲座），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39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布拉克等人的通函》，1879年9月17-18日，OE，《Editorial Avante》，数字版，T. 3，第14页。96-103，我们的翻译。
- 140 Bob 阿瓦基安，*apud Raymond Lotta*，《*Sobre la 'force impeller de la anarquía' y la dinamica del cambio*》，*Demarcaciones* n° 3，2014，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141 雷蒙德·洛塔，《衰落中的美国》，Banner Press，第二版，第17页。49-50和125，我们大胆的翻译。
- 14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反杜林论》，Boitempo 社论，第14页。310，我们大胆。
- 143 雷蒙德·洛塔，《论帝国主义的活力和社会发展的束缚》，AWTW，1985/2，我们的翻译和大胆。
- 144 雷蒙德·洛塔，《衰落中的美国》，Banner Press，第二版，第14页。162、我们的大胆，翻译我们的大胆。
- 145 VI 列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OC，莫斯科《进展报》社论，第27卷，第17页。441，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146 Raymond Lotta 在 *Sobre la 'fuerza impeller de la anarquía' y la dinamica del cambio* 中，*Demarcaciones* n° 3，2014年，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47 Raymond Lotta 在 *Sobre la 'fuerza impeller de la anarquía' y la dinamica del cambio* 中，*Demarcaciones* n° 3，2014年，翻译并加粗了我们的内容。

- 148 PP-OP-MLM, 《揭开阿瓦基安主义机会主义, 我们在共产主义者之间建立团结》, 2022年, 我们的翻译。
- 149 PP-OP-MLM, 揭开阿瓦基安主义机会主义, 我们在共产主义者之间建立团结, 2022, 我们的翻译和大胆。
- 150 Bob 阿瓦基安, *Abriendo breccias*, 2019,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51 鲍勃·阿瓦基安 (Bob 阿瓦基安), 美国革命共产党致尼泊尔共产党 (毛主义) 和尼泊尔共产党所有政党和组织的信, 2008年11月4日, 我们的翻译。
- 152 Bob 阿瓦基安, *Abriendo breccias*, 2019,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153 Bob 阿瓦基安, *Abriendo breccias*, 2019,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54 《红星》, 第15期, 2008年9月21-30日, 我们的翻译。
- 155 PCm (意大利), 《意大利毛主义共产党致 PCN(m) 的讯息》, 2008年4月20日,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56 Prachanda, 致 PCR (EEUU) CC 的信, 2006年7月1日,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157 UOC(mlm), *Negación de la Negación*, n° 03, 2008,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158 普拉昌达, 《大跃进: 历史的必然需要》, 2001年, 我们的翻译。
- 159 普拉昌达, 《大跃进: 历史的必然需要》, 2001年, 我们的翻译。
- 160 普拉昌达, 《大跃进: 历史的必然需要》, 2001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61 普拉昌达 (Prachanda), 阿普德·巴特拉伊 (Prad Bhattarai) 在《革命思想的新纪元十年应用和发展》中, 《工人》, 第10期, 2006年, 翻译并加粗了我们的内容。
- 162 普拉昌达, 《大跃进: 历史的必然需要》, 2001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63 普拉昌达, 《大跃进: 历史的必然需要》, 2001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64 Bhattarai, 《革命性思想的新纪元十年应用和发展》, 《工人》, 第10期, 2006年5月, 我们的翻译大胆。
- 165 普拉昌达, 《论毛主义》(1991), 《尼泊尔革命的问题与前景》, 2003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66 普拉昌达, 《论毛主义》(1991), 《尼泊尔革命的问题与前景》, 2003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67 普拉昌达, 《尼泊尔人民战争与意识形态综合问题》, 《工人》, 第06期, 2000年, 我们的翻译, 大胆。
- 168 饶庆晃, 坚持“一分为二”, 反对“合二为一”——《关于哲学战线大论战的基层谈话》, 《南方日报》, 1965年1月11日, 译本。
- 169 普拉昌达, 《尼泊尔人民战争与意识形态综合问题》, 《工人》, 第06期, 2000年, 我们的翻译, 大胆。
- 170 普拉昌达, 《大跃进: 历史的必然需要》, 2001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71 普拉昌达, 《大跃进: 历史的必然需要》, 2001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72 普拉昌达, 《大跃进: 历史的必然需要》, 2001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73 普拉昌达, 《大跃进: 历史的必然需要》, 2001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74 Prachanda, PCN(m) 致 PCR-USA CC 的信, 2006年7月,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175 赛福亭、贾古林、夏尔希辟柯、田希宝,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本源, 反对阶级和解论——驳斥“合二为一”论, 《人民日报》, 1964年9月20日,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176 PCC-FR, *Respuesta al Pronunciamiento de la Unión Obrera Comunista (UOC) sobre la Comité Coordinador para la Conferencia Internacional Maoísta Unificado (CIMU)*, 2022, 我们的翻译, 原文为粗体和斜体。
- 177 UOC(mlm), *Negación de la Negación*, n° 03, 2008,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178 UOC(mlm), *Negación de la Negación*, n° 03, 2008,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79 鲍勃·阿瓦基安, 征服世界?, *Revolución* n° 50, 1982年1月 (1981年秋季讲座),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80 UOC(mlm), *Negación de la Negación*, n° 03, 2008,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81 UOC(mlm), *Negación de la Negación*, n° 03, 2008,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82 UOC(mlm), *Negación de la Negación*, n° 03, 2008,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183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184 UOC(mlm), *Negación de la Negación*, n° 04, 2009,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85 UOC(mlm), *Negación de la Negación*, n° 03, 2008,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186 UOC (马列毛主义), 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高级阶段和最后阶段, 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厅, 而不是“超帝国主义”的前厅, 1995年, 我们的翻译, 大胆。
- 187 UOC (马列毛), 哥伦比亚革命计划, 2015年,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188 UOC(马列毛), *Contradicción*, n° 7, 我们的翻译, 粗体。
- 189 UOC(MLM), *Sobre la Propuesta asobre del Balance del Movimiento Comunista Internacional y de su effective Línea Política General*, 2022年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90 卡尔·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 Boitempo 社论, 数字版, ps. 200, 我们的粗体字母。
- 191 毛主席, 《党的内部团结的辩证方法》, OE, 北京外文版, T.5, 第11页。563-564,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92 艾思奇, 《决不能偷偷地用矛盾阶级调和论代替革命辩证法》, 人民日报, 1965年5月20日, 我译, 加粗。
- 193 毛主席,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OE, 北京外文版, T.1, 第11页。214,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194 UOC (马列毛), 哥伦比亚革命计划, 2015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195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n° 06, 2023, 由我们翻译和加粗。
- 196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197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198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199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200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OE, Editorial Progreso, T. 1, 第14页。59,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01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OE, 《Progreso》编辑, T. 1, 第 14 页。60-61,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02 VI 列宁,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27, 第 27 页。336,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03 JV 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 选集, Edições Ciências Revolucionárias, 2021 年, 第 14 页。688, 我们大胆。
- 204 毛主席,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OE, 北京外文版, T.2, p. 323,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05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 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206 毛主席,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OE, 北京外文版, T.2, p. 321,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07 JV 斯大林, 《列宁主义的基础》, 莫斯科外语版, 1953 年, 数字版, T. 6, 第 14 页。33-34,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08 VI 列宁,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27, 第 27 页。441,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09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266、我们大胆。
- 210 UOC(mlm), *Negación de la Negación*, n° 6, 2022,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211 毛主席,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OE, 北京外文版, T.2, p. 323,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212 毛主席,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OE, 北京外文版, T.2, p. 323,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213 毛主席,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OE, 北京外文版, T.2, pp. 321-323,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214 毛主席,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OE, 北京外文版, T.2, p. 324,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215 毛主席, 《论民族资产阶级与理智的陕西问题》, OE, 北京外文版, T.4, 第 14 页。214,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16 毛主席, 《论新民主主义》, OE, 北京外文版, T.2, 第 11 页。369,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17 VI 列宁,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27, 第 27 页。429,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218 UOC(mlm), *Revista Contradição*, n° 12, 1993,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219 VI 列宁,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 OC, *Progreso* 莫斯科社论, T. 10, 第 11 页。13、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20 JV 斯大林, 《苏联共产党 (b)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体会议》, 1927 年 8 月, 莫斯科外文版, 1953 年, 数字版, T. 10, 第 17 页。05,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221 JV 斯大林, 《苏联共产党 (b)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体会议》, 1927 年 8 月, 莫斯科外文版, 1953 年, 数字版, T. 10, 第 17 页。04,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222 毛主席, 《论新民主主义》, OE, 北京外文版, 第 2 册, 第 11 页。362-63,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23 毛主席, 《论新民主主义》, OE, 北京外文版, 第 2 卷, 第 11 页。363,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24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 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225 列昂·托洛茨基, 《不断的革命》, *Kairós Livraria*, 1985 年, 第 14 页。137、我们大胆。
- 226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 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227 毛主席, 《论新民主主义》, OE, 北京外文版, 第 2 卷, 第 11 页。358,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28 毛主席, 《在晋绥解放区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OE, 北京外文版, T.4, 第 11 页。247、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229 VI 列宁, 《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社会民主主义的土地纲领》,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16, pp. 350-51,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30 UOC(马列毛), *Contradicción*, n° 7, 我们的翻译, 粗体。
- 231 VI 列宁, 《论朱尼厄斯的小册子》,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30, 第 17 页。06-07, 我们的翻译又大胆了。
- 232 VI 列宁, 《论朱尼厄斯的小册子》, OC, *Progreso* 莫斯科社论, T. 30, 第 11 页。56、我们的翻译大胆。
- 233 VI 列宁, 《论马克思主义的讽刺》, OC, *Progreso* 莫斯科社论, T. 30, 第 11 页。117、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34 毛主席, 《战争与战略问题》, OE, 北京外文版, 第 2 册, 第 11 页。226-227,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235 毛主席,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OE, 北京外文版, T.1, 第 11 页。196、我们的翻译大胆。
- 236 毛主席, 《战争与战略问题》, OE, 北京外文版, 第 2 卷, 第 11 页。228、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237 毛主席, 论持久战, OE, 北京外文版, 第 2 卷, 第 11 页。171、我们的翻译大胆。
- 238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 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239 VI 列宁, 《向第二次全俄东方人民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 OC, *Progreso* 莫斯科社论, T. 39, 第 39 页。338-39,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40 VI 列宁, 《关于俄罗斯共产党策略的报告的提纲》,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44, 第 44 页。37、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41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 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242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 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243 VI 列宁, 《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03, 第 11 页。192,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44 VI 列宁, 《关于我们的土地计划》, OC, 莫斯科《Progresso》编辑, T. 09, 第 11 页。374,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245 VI 列宁, 《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16, 第 17 页。246,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46 VI 列宁, 《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16, 第 17 页。283-84,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47 VI 列宁, 《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16, 第 17 页。284,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48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 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249 UOC(mlm), *Revista Contradição*, n° 18, 1996, 由我们翻译和加粗。
- 250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 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251 VI 列宁, 《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03, 第 11 页。213,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52 VI 列宁, 《19 世纪末俄罗斯的土地问题》,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17, 第 17 页。74,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53 VI 列宁, 《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03, 第 11 页。183-84,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54 VI 列宁,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纲》, OC, Progresso 莫斯科社论, T. 41, 第 11 页。185,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55 VI 列宁, 《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数据》, OC, 莫斯科《Progresso》编辑, T. 27, 第 27 页。148-49,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56 VI 列宁, 《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数据》, OC, 莫斯科《Progresso》编辑, T. 27, 第 27 页。148, 我们的翻译。
- 25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Obras Escogidas*, 编辑进展, T. 3, 1980, p. 319,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58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Obras Escogidas*, 编辑进展, T. 3, 1980, p. 317,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59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 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260 VI 列宁, 莫斯科省 PC(b)R 会议, OC, Progresso 莫斯科社论, T. 42, 第 42 页。29, 我们的翻译加粗。
- 261 VI 列宁, 《关于土地问题的论文初稿》,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41, 第 17 页。184,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62 VI 列宁, 《19 世纪末俄罗斯的土地问题》,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17, 第 17 页。131-32,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63 VI 列宁, 《关于土地问题的论文初稿》,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41, 第 41 页。184-85,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64 贡萨罗主席, 基本文件, PCP, 由我们翻译和加粗。
- 265 VI 列宁,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OC, 莫斯科《进展报》社论, 第 27 卷, 第 17 页。429,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66 UOC (马列毛),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第 6 期, 2023 年, 我们的翻译。
- 267 UOC (马列毛),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第 6 期, 2023 年, 我们的翻译。
- 268 UOC (马列毛),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第 6 期, 2023 年, 我们的翻译。
- 269 UOC(mlm), *Revista Contradição*, n° 1, *apud*, n° 8, 1990,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270 UOC(mlm), *Revista Contradição*, n° 8, 1992,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271 VI 列宁,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27, 第 27 页。336,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272 PCR-USA, 世界的另一个转折点, *apud*, *Revista Contradição*, n° 8。
- 273 毛主席,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OE, 北京外文版, T.2, 第 11 页。323,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74 VI 列宁,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27, 第 27 页。444,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275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第 6 期, 2023 年, 我们的翻译和大胆。
- 276 VI 列宁, 《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27, 第 27 页。376,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277 VI 列宁, 《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27, 第 27 页。16,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78 VI 列宁,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进步莫斯科》社论, OC, T. 27, 第 27 页。426,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79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n°6, 2023, 由我们翻译和加粗。
- 280 列宁,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27, 第 27 页。330,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81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415。
- 282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411。
- 283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374-75, 我们大胆。
- 284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517, 我们大胆。
- 285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 《全球编辑》, 第 14 页。66, 我们的粗体字母。
- 286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 《全球编辑》, 第 14 页。66, 我们大胆。
- 28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 《全球编辑》, 第 14 页。67, 我们的粗体字母。
- 288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 《全球编辑》, 第 14 页。68, 我们的粗体字母。
- 289 VI 列宁,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27, 第 27 页。404-05,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90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T.1, Tome 1, p. 356,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291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反杜林论》, Boitempo 社论, 2015 年, 第 14 页。55, 我们大胆。

- 29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反杜林论》, Boitempo 社论, 2015 年, 第 14 页。177、我们大胆。
- 29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反杜林论》, Boitempo 社论, 2015 年, 第 14 页。177、我们大胆。
- 294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反杜林论》, Boitempo 社论, 2015 年, 第 14 页。178、我们大胆。
- 295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反杜林论》, Boitempo 社论, 2015 年, 第 14 页。183、我们大胆。
- 296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本书, Boitempo 社论, 2013 年, ps. 1778-79, 我们的大胆。
- 297 VI 列宁, 《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裂》,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30, 第 11 页。180,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298 VI 列宁,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纲》, OC, Progresso 莫斯科社论, T. 41, 第 11 页。200、我们的翻译加粗。
- 299 VI 列宁,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27, 第 27 页。377, 我们的翻译。
- 300 JV 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 选集, Edições Ciências Revolucionárias, 2021 年, 第 14 页。693, 我们的粗体字母。
- 301 VI 列宁,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27, 第 27 页。367, 我们的翻译。
- 302 VI 列宁,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27, 第 27 页。339,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30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反杜林论》, Boitempo 社论, 2015 年, 第 14 页。178、我们大胆。
- 304 VI 列宁,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27, 第 27 页。349,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305 VI 列宁,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OC, 莫斯科《进展报》社论, 第 27 卷, 第 17 页。339, 我们的翻译。
- 306 VI 列宁, 《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裂》, OC, Progresso 莫斯科社论, 第 30 卷, 第 11 页。180,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307 JV 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 选集, Edições Ciências Revolucionárias, 2021 年, 第 14 页。692, 我们的粗体字母。
- 308 JV 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 选集, Edições Ciências Revolucionárias, 2021 年, 第 14 页。693, 我们的粗体字母。
- 309 VI 列宁,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OC, 莫斯科《进步》社论, 第 2 卷, 第 11 页。335,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310 VI 列宁,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OC, 莫斯科《进步》社论, 第 2 卷, 第 11 页。376、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311 JV 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 选集, Edições Ciências Revolucionárias, 2021 年, 第 14 页。693, 我们的粗体字母。
- 312 VI 列宁,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OC, 莫斯科《进展报》社论, 第 27 卷, 第 17 页。377, 我们的翻译。
- 313 VI 列宁, 《论马克思主义的讽刺》, OC, Progresso 莫斯科社论, 第 30 卷, 第 177 页。112-13,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314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本书, 脚注 77,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7 页。730。
- 315 卡尔·马克思, 《经济哲学手稿》, Boitempo 编辑, 2004 年, 第 43 页, 我们的大胆。
- 316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四册, 第二卷, Difel 社论, 1980 年, 第 14 页。669。
- 317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第 6 期, 2023 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318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第 6 期, 2023 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319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n°6, 2023, 由我们翻译和加粗。
- 320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n°6, 2023, 由我们翻译和加粗。
- 321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n°6, 2023, 由我们翻译和加粗。
- 322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n°6, 2023, 由我们翻译和加粗。
- 323 卡尔·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 Boitempo 社论, 2004 年, 第 14 页。137、我们大胆。
- 324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835 页。
- 325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003 页。
- 326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第 6 期, 2023 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327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第 6 期, 2023 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328 UOC(mlm), *Revista Contradição*, n° 18, 1996,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329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 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330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868, 我们大胆。
- 331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 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332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1038, 我们的粗体字母。
- 333 UOC(mlm), *Revista Contradição*, n° 18,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334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846, 我们大胆。
- 335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851, 我们大胆。
- 336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1020, 我们的粗体字母。
- 337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997, 我们的大胆。
- 338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信函, 给恩格斯的信, 1862 年 8 月 9 日, 《社会科学》杂志社论, 1983 年, 第 130 页, 粗体和我们的翻译。
- 339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984, 我们大胆。
- 340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879-880, 我们的粗体字母。我们对表格做了一些小调整, 以使这段文字更容易理解。
- 341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880, 我们的粗体字母。
- 342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四本书, Difel 社论, 1980 年, 第 14 页。584, 我们的粗体字母。
- 343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四本书, Difel 社论, 1980 年, 第 14 页。477, 我们的粗体字母。
- 344 VI 列宁, 《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土地纲领》, OC, 莫斯科《进展》社论, Tomo 16, 第 16 页。312-13。
- 345 毛主席, 放弃幻想, 准备斗争, OE, 北京外文版, 第 4 卷, 442, 我们的翻译, 大胆。
- 346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1062。
- 347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1062。

- 348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1066。
- 349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889-90。
- 350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890。
- 351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153-54。
- 35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74 页。965-66。
- 353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Boitempo 社论, 2017 年, 第 14 页。1025。
- 354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845, 我们大胆。
- 355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1063。
- 356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四册, Difel 社论, 1980 年, 第 14 页。471, 我们的粗体字母。
- 357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161, 我们大胆。
- 358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四本书, Difel 社论, 1980 年, 第 14 页。472, 我们大胆。
- 359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144-45, 我们大胆。
- 360 VI 列宁,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OC, 莫斯科《进展报》社论, 第 27 卷, 第 17 页。311。
- 361 VI 列宁,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第 27 卷, 第 17 页。339。
- 362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1027-28, 我们的大胆。
- 363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1112-13, 我们的大胆。
- 364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1084, 我们的粗体字母。
- 365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1099-1100, 粗体字母是我们的。
- 366 毛主席, 放弃幻想, 准备斗争, OE, 北京外文版, 第 4 卷, 442, 我们的翻译, 大胆。
- 367 VI 列宁, 《一打“社会主义”部长》, OC, 莫斯科《进展》社论, 第 30 卷, 第 17 页。202, 我们的粗体字母。
- 368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 政治宣言和原则, 2022 年。
- 369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 《全球编辑》, 第 14 页。68, 我们的粗体字母。
- 37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 《全球编辑》, 第 144 页。78-79, 我们大胆。
- 371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友一, 第 351 页,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37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 《全球编辑》, 第 14 页。79, 大胆。
- 373 JV 斯大林, 《列宁主义的基础》, 莫斯科外语版, 1953 年, 数字版, T. 6, 第 14 页。27,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374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大部头, 第 352 页, 我们翻译, 加粗。
- 375 中国共产党,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命题》, 马克思主义反修正主义文集, 第 2 期, 2003 年, 第 1 页。46, 我们大胆。
- 376 毛主席,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OE, 北京外文版, T.2, 第 11 页。324,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377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第 6 期, 2023 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378 MRI, 组成 MRI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第二次会议宣言, 1984 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379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大部头, 第 11 页。344,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380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大部头, 第 11 页。347,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381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大部头, 第 1 页。351-52,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382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大部头, 第 11 页。352,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383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大部头, 第 11 页。352,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384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大部头, 第 11 页。353,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385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大部头, 第 11 页。353,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386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大部头, 第 11 页。354,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387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大部头, 第 11 页。354,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388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大部头, 第 11 页。355,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389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大部头, 第 11 页。353,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390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 《政治宣言和原则》, 2022 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391 UOC(mlm), *Negación de la Negación*, 第 3 期, 2008 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392 PCR-EUUU 和 PCR-智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统一和 MCI 路线的基本原则, 1980 年, 我们的翻译和大胆。
- 393 UOC(mlm), *Revista Contradição*, n° 7, 1991,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394 列夫·托洛茨基, 《中国革命》, 数字版, 我们的大胆。
- 395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 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396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 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397 列昂·托洛茨基, 《不断的革命》, Kairós Livraria, 1985 年, 第 14 页。137, 我们大胆。
- 398 毛主席, 《矛盾论》, OE, 北京外文版, 大部头, 第 1 页。310-311, 我们的翻译加粗。

- 399 UOC(mlm), *Revista Contradição*, n° 7, 1991,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400 列夫·托洛茨基, 《中国革命》, 数字版, 我们的大胆。
- 401 列昂·托洛茨基, 《不断的革命》, Kairós Livraria, 1985 年, 第 14 页。139、我们大胆。
- 402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 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403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 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404 列昂·托洛茨基, 《结果与展望》, 数字版, 2000 年, ps. 116、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405 鲁伊·莫罗·马里尼 (Ruy Mauro Marini), 《*Dialéctica de la dependencia*》, 《意甲流行时代》, 1981 年, 第 17 页。91、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406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第 6 期, 2023 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407 Ruy Mauro Marini, 《巴西资本主义发展辩证法》, *Vozes*, 2000 年, 第 14 页。98, 我们的粗体字母。
- 408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第 6 期, 2023 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409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本书, 巴西文明, 1975 年, 第 14 页。650, 我们的粗体字母。
- 410 鲁伊·毛罗·马里尼 (Ruy Mauro Marini), 《依赖辩证法》, *Vozes*, 2000 年, 第 14 页。125-126, 我们大胆。
- 411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第 6 期, 2023 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412 Ruy Mauro Marini, 《巴西资本主义发展辩证法》, *Vozes*, 2000 年, 第 14 页。70、我们的大胆。
- 413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n°6, 2023, 由我们翻译和加粗。
- 414 UOC(mlm), *Revista Contradición* N° 1, *apud* n° 8, 1990,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415 UOC (马列毛), *Programa para la revolución en la Columbia*, 第四版, 2015 年, 我们的翻译和粗体。
- 416 邓小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北京外文出版社, 1974 年。
- 417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n°6, 2023, 由我们翻译和加粗。
- 418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OE, *Editorial Progreso*, T. 1, 第 14 页。74、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419 卡尔·马克思, 《中央委员会给共产主义联盟的信》, OE, 《进展编辑》, T. 1, 第 14 页。98、我们的翻译大胆。
- 42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党》, 全集, V. 20, 第 123 页。77-78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421 费迪南德·拉萨尔, 《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使命》, *Gesammelte Reden und Schriften*, V.1, 我们的翻译, 粗体。
- 42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 1975 年 3 月 18-28 日, 全集, V. 45, 第 14 页。61 翻译和我们的
大胆。
- 423 费迪南德·拉萨尔, 《给奥托·冯·俾斯麦的信》, 1863 年 6 月, 费多西耶夫等人, 《卡尔·马克思 - 传记》, Editora
Avante, 1983 年, 我们的大胆。
- 424 弗兰兹·梅林, 《卡尔·马克思——他的一生的历史》, Editora Routledge, 数字版, ps. 857, 我们的翻译加粗了。
- 425 列昂·托洛茨基, 《结果与展望》, 数字版, 2000 年, ps. 72、我们的翻译大胆。
- 426 列昂·托洛茨基, 《俄罗斯革命史》, V.I, 联邦参议院版, 2017 年, 第 14 页。343, 我们的大胆。
- 427 列夫·托洛茨基, 《不断革命》, 序言。Kairos Livraria, 1985 年, 第 14 页。20、我们大胆。
- 428 VI 列宁,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OC, 《进步莫斯科》社论, T. 37, 第 11 页。322,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429 VI 列宁, 十月革命四周年之际, OC, *Progresso* 莫斯科社论, T. 44, 第 14 页。150、我们的翻译加粗。
- 430 VI 列宁, 十月革命四周年之际, OC, *Progresso* 莫斯科社论, T. 44, 第 14 页。153,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431 JV Stalin, 《列宁主义基础》, 莫斯科外语版, 1953 年, 数字版, T. 8, 第 14 页。9、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432 毛主席, 《论新民主主义》, OE, 北京外文版, 大部头 II, 第 11 页。365,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433 印度共产党 (马), 支持组建尼泊尔革命共产党, 2023 年, 我们的翻译大胆。
- 434 LCI, 我们对“印度共产党 (毛主义) 对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 (LCI) 组建的立场的评估, 2023 年。
- 435 PCI(M), *PCI(M)*在 LCI 构象上的定位,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436 UOC(mlm), *Revista Contradição*, n° 4, 由我们翻译和加粗。
- 437 PCP, 《民主革命路线》, 1988 年。
- 438 PCmI, 两条线的战斗, n° 2, 由我们翻译和加粗。
- 439 PCR (EEUU) 和 PCR (智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和 MCI 路线的基本原则, 我们的翻译和加粗。
- 440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第 6 期, 2023 年,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441 UOC (马列毛), 十月的选举和政治行动, www.revolucionobrera.com, 2023 年 10 月 20 日, 翻译并加粗我们的。
- 442 UOC(mlm), *Revista Negação da Negação*, n°6, 2023, 由我们翻译和加粗。
- 443 CCCPMG, 关于 CIMU 和 LCI 的声明, 2023 年 1 月, 由我们翻译并加粗。
- 444 UOC(马列毛), *Revolución Obrera*, n° 458, 2016, 我们的翻译。